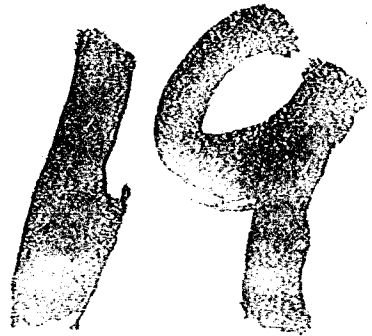


李建芳遺著

各國民族之進退



大道出版社印行

各國民族統一運動史論目錄

- 序：李建芳先生之生平及思想……………一
- 一 德國統一運動……………一九
- 二 日本明治維新運動……………二二
- 三 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一六
- 四 美洲獨立與南北戰爭……………一九一
- 五 尼德蘭獨立革命……………二五七

序

——李建芳先生之生平及思想

先生原姓劉名胤。『李麥麥』和『李建芳』是他的別名。原籍湖北竹山，生于一九〇四年。

一九〇四年，是東亞史多事的一年，因為事變與恩格斯的估計（見馬恩論中國一二四頁）恰恰相反。斯拉夫人經過『日本海海戰』和旅順的攻擊已註定了失去東亞霸權的命運。日本帝國主義却由『亞洲大國』變為世界的強國。新舊帝國的交替，就歷史的意義說來，是暗示對中華民族衰落或興起有密切的關係，但，日本要完成她吞併中國的企圖，却須經過歷史的審判。後日最明白地宣讀這判詞的內容者，却就是同年遠隔戰場數千里之落後地域的嬰兒。上帝是多麼惡作劇呀。

先生在幼年時代的詳細生活狀況。我們不十分明白，我們只知道：他是一個窮苦農民家庭的兒子。他開始在『私塾』中受着初等的教育，五四運動後，他經歷若干的辛苦，到長江流域的重要城市——武漢。在道裏，他被捲入時代的風暴中，他開始和新的文化接觸。首先給他以文化上的啓蒙者，是中國現代的大思想家之一——梁啓超先生的著作，但他的早熟知識

，卻不能在飲冰室文集中得耶滿足：如是他和當日的青年一樣，在思想上，開始了新的發展。

三十年代中國的青年，是幸福而又痛苦的。他幸福，爲着他能够拋脫他的父親時代的束縛；他痛苦，爲着他只是偉大事變中的天真孩子。於是幾乎成爲一個規律：每個在那階段中的青年，轟轟烈烈地生，莫名其妙地死。歷史規律本是如此的殘酷，但卻沒一個國家像三十年代的中國。從整個有歷史的過程看去，辛亥革命所遺留的歷史殘渣，自被「五四運動」掃除後，應該是昂然地走上民族獨立，統一之路。但殘酷的造物主，卻在這一時期，用「十月革命」的紅色布，掩蔽中華民族真正歷史要求的面目。于是在不知不覺中，三十年代的中國歷史軌道上奔馳着兩個列車：一個是繼承數十年民主鬥爭的傳統的民族革命，一個是受「十月革命」影響的社會革命。前者的領導者，是中國國民黨，後者的領導者，是中國共產黨。

他是二十歲的青年，他自然不能和一般青年過着同一的生活。這生活，不是本於任何人的主觀，而是決定于當時迫青年去體受的客觀。我們知道：五四運動之火，是燃自文學的領域，後來逐漸蔓延於整個中國的各部門。牠的發動者之一，不是別人，就是後日手創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爲着這一原因，一般都被「五四」所喚醒的青年，遵循「新青年」主持者所定的政治路線而參加社會主義運動。我們的李先生也不能有所例外。

於是熟悉當日武漢學生運動的人們，都知道「劉胤」。但他的活動，是否和一大批人們的動作一樣，在那「閃電」似的事業進行中，馬上被遺落于電光之後呢？不，他在這瞬息萬

變的局勢中，不是他自己後日所說：「當騎士的偉業已成過去時，始出來冒險的唐，吉訶特」（參閱氏著「論中國共產黨」。因為，當一個大浪流的掀起時，他離開他活動的舞台，而前往「赤都」。

莫斯科「東方大學」的生活，使他接近十月革命所不可免的一串事變，在那裏，他從馬克思主義的研討，「革命者」間的實際鬥爭，數不清「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的政治技術，和斯拉夫人對其他民族——尤其是對於有色人種的「革命者」的待遇，使他十分明白：上帝的樂園和撒旦的地獄。都按照共同的規律而建立。但這是否說，他會拋擲他出國時所負的旗幟呢？那也不；中國三十年代的羣衆運動，和不幸歷史中之夾什着使他走上一股青年所走路途的客觀條件，如沒有更大的教訓，他是不會馬上翻過身來的。因此，「赤都」的一切，不是使他馬上就認識或就從事本國歷史軌道的開掘，只是促他增強「國際主義」的信念，爲着這一點，他不能站在「一國社會主義者」的一邊。在這自然的轉變中，他有了一個幸運。因爲他不和他的「同志」成爲西伯利亞充軍地的顧客，而被「疏遣」回國。

中國在這時候的情況，已和他離開時大不相同。「閃電」之光已經消逝了，但中國的社會革命騎士却見到隱約于實際的火光：換句話說：那些唐，吉訶特們「要逃出這真實的歷史，而走入傳奇的世界。」這世界，他決不會走進的，于是他在短促的時期中，不是進行他所抱負的事業，只是每日和他的生活相搏鬥。麵包逐迫他過着非常困難的日子，儘管他本就是

貧家的兒子但他的健康却因之經不起生活苦子的摧殘。或且換句話說，他病了。疾病給他以思想上的啓示和反省。首先給他的反省的，是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能否實用於中國的問題。

所謂托洛斯基主義，是包括俄國革命與世界其他各國革命之歷史途徑的論爭的問題。他從十月革命的發展和成功，估計托氏的「不斷革命」規律，斷定托洛斯基的自誇：「在中國革命發展中，他（不斷革命論）起了決定的作用，及決定了許多和東方國家革命鬥爭相聯繫的頭等重要議案」（英譯本「不斷革命論」序言。）是不正確。

托氏在批判拉狄客（KARL RADEK）的「工農民主專政」可適用於中國時，曾說：「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條件之下，一個殖民地的國家才成熟到她的土地問題和民族問題之真正的革命解決，這是不能預言的。但無論如何，現在我們敢確定地說；在中國和印度，只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得到真正民衆的民主主義，即是得到工人和農民的民主主義。」（同上第七章）。

李建芳先生却給以否定的估計。他認為：中國和沙俄不同。「不斷革命」只是俄國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中國的客觀情況既然和俄國不同，她自然不能皈依那規律。換句話說；中國的革命，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無須說；更不是史大林氏在當時所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

在這裏，我們要簡述李建芳先生的思惟進展怎麼會到達這一結論，似乎要先說當時中國思想界關於這問題的意見。因為，只有這個陳述，方會明白李建芳先生怎能在真理的沙漠中摸到了一塊寶石。

三十年代的中國，支配思想界的思想，正像支配當時的政治運動，有兩大勢力：那就是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史大林主義，依後一種人的意見，中國的社會是「封建社會」那裏的統治者，買辦與軍閥。都是各帝國主義的走狗。因此，中國的改造途徑，是一面打倒帝國主義，一面剷除封建社會的骨幹——封建地主。這一流行的「思想」，在「中共」的文化園地中，似乎，只有短促的時間，因為當這些見解流佈時，中共已揭開「八七會議」之幕。「八七」的決議，清算中共的歷史命運，連帶地也清算牠的思想。于是，用「半殖民地半封建」代替過去的「封建」。儘管在牠的解釋中，還有冗長的內容，但此後却未曾拋棄這塊金字的招牌。

問題在此：什麼是「封建」？什麼是「封建」之「半」？說着這些名詞的人，一直到今天止，還沒有一個科學的解釋。李先生和他的友人們，就由這一點着手。他先明白「封建」的本義，如「左傳」所說：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昭九年）「文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昭二六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

，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昭二八年）可知在中國，「封建」一語是指「周克殷」後，爲鞏固自己的王朝，「封」同姓功臣，「以蕃屏周」，同時，又在封地從事應有的「建」設。依這名詞的本意，並沒有我們今日所重視的經濟內容，只含有一種政治制度的意義。

「封建」的本義既如上述，那用這意義轉譯英文的FEUDALISM和日文的莊園，不能先經過一個詳細的考察。當時的人們所說的「封建」，並非FEUDALISM，更不是日本史上的「莊園」，因爲牠們是指一個經濟發展的階段，這個階段，稍有歐洲經濟史知識的人，都明白；牠的經濟特徵是「馬克」（MARK）是「曼諾亞」（MANOR）。具有這特徵的中國經濟機構，在「春秋」以前，我們還不敢確定有沒有，而在「春秋」之世，却已難找到蹤跡——至多留着殘蹤。到「戰國」開始，歷史的意義，是趨向「絕對主義」（ABSOLUTISM）的建

立——由分裂而統一，統一的絕對王權與商業資本有密切的關係。歐洲在這一階段，是英國的亨利八世，是法國的路易十四。儘管若干歐洲的糊塗歷史家還把這稱王政，叫做FEUDALISM，但經濟史家們却不贊同。可以說：中國的若干文化名流，對這兩個階段——「曼諾亞」至「絕對主義」的發展，到現在還不明白。他們只概括到，把牠倆叫做「封建」，或且不自覺地分爲「封建」與「半封建」。

李先生解決了「封建」的難題後，又逗起這一思索：何以歐洲的「曼諾亞」或馬克的崩壞，有市鎮的發展，並經過商業資本的破壞作用，進入資本主義的社會，而中國自「絕對王

權」第一次建立——秦始皇起，却繞了數千年的圈子：從這一問題出發，他就着手由秦至太平天國革命前中國社會史的探討。這偉大的工作，是在病榻上舉行，唯一的鼓勵與撫慰，是榻旁的藥爐茶鼎。

他的思惟發展，似乎是如此：中國的歷史發展，是分和合的交代，由秦起經兩漢，三國，兩晉，五胡十六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至清（咸豐止）計二千一百餘年這冗長的「分」與「合」的循環，雖然在形式上有若干差別，而內容却同遵着這軌道走：由一個王朝的興起到牠的沒落，分爲興盛，中衰和滅亡三個階段。當牠興盛時，外則擴張疆土，內則「養民」，使文物典章，有輝煌的表現；當牠中衰時，農民四起屨亂，使王朝的統治，猶如風暴中的火光燭影，當牠滅亡時，牠的送葬者不如是被統治的農民，就是窺伺已久的蠻族。由這些內容，李先生產生了一個學說——中國歷史循環發展說。這學說是在四十年代中一說四思想碑上所安放的一塊基石。

歷史有循環的發展，不是李先生的發明，黑格爾已在「歷史哲學」中說過牠。但這個歷史現象，在黑格爾的思想體系中，並不占重要的地位。而在李先生的思想體系中，却恰恰相反。他的功績不在於這現象的發現，而在於牠的說明，這個說明，我們不能否認，他於若干方面，受黑格爾的啓示，但使黑格爾思想中的胚胎，發展成一枝豔麗的花朵，却歸功於李先生的努力。他如此地解釋歷史的循環發展，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大陸國當商品經濟發展到某

一限度時，因為由商業資本破壞舊社會而生之過剩人口無法解決，必然地引起「破壞歷史繼續前進的廣大農民和小生產者的暴動。強烈的農民和小生產者的暴動，必不可免地要使商業資本的中央王權趨於崩潰，隨後依照着歷史鬥爭的一定邏輯推移，便轉為諸侯的互鬥。這樣就自然而然地把歷史由高度的城市文化拉回到封建初期野蠻的後方，而使過去全部的最高的文化生活教育生活一時歸於毀滅。」（見遺著「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第二節。）

但是歷史不能永遠退落下去的。當牠退落到一定程度時，歷史又要開始其復生運動。商品經濟和城市文化的復生。因之，那種以物質和精神，在舊的文化的廢墟上所建立的新文化的花朵，只要是牠的內在沒有獲得解決矛盾發展的條件和手段，在發達至一限度時，牠不得不反反覆復重蹈那歷史不幸的覆轍。……這種人力所不能戰勝的不幸，在時間悠長的中國民族史上實出現過無數次。」

不難明白：上面的歷史循環發展論，有一說明的出發點，牠就是地理條件。自馬克思主義支配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的人類思想起，為着「地理唯物論」的威脅，人們都不敢把他們的視線，注視着地理的條件；李先生的思想發展，却恰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反抗者。他認為這是馬克思思想體系諸「弱環節之一。專用地理去解釋歷史的發展！」這就是「地理唯物論」的工作。——固然不可，但用牠充當人類歷史發展之一前提，誰敢「難？」李先生自跳出馬克思所局限的圍地後，馬上見到歷史殿堂的奧秘，於是，他用地理與歷史的關係，說明了

諸民族國家的歷史的發展。靠着這一發現，他解答了當時人們所討論的問題：中國當秦時商業資本已有高度的發達，何以此後不能和歐洲一樣產生「工業革命」？

中國歷史之陷於循環的不幸命運，是由於大陸國，而歐洲歷史之有順暢的發展但德國却是例外——由於牠取得地理條件所賜的幸運，「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英國，是牠的活證。高國的英吉利，由市鎮經濟發達起，為着能够與「絕對王權」相配合，所以，自亨利八世後有後來居上的殖民地的占領。殖民地吞納了因商業資本所造成的過剩人口，殖民地的財富緩和了國內的社會危機，並由於市場的擴大，產生工業的革命。

不僅英國的歷史，為着島國之賜，與大陸的中國有不同的命運——自然這就過去的某時期而言。而且地理的條件，還使具有這條件賜與的國家，在文化上有比傳受者更高度的發展，對於這一問題，李先生以希臘與日本的對比，得到深刻的說明。不錯日本也是島國，她也具有似英國某特定階段之歷史的利益，但她在文化史上却有她的「阿喀里」(ACHILLES)，那就是他吸收中國的文化，不能像吸收東方文化的希臘，創造更高級的文化。這一「主要的原因，就在希臘的地理條件優於日本。」

為什麼呢？希臘是處裏海之中，牠和鄰近有各種文化不同的民族——文明的和野蠻的。「因此，處在這種環境之下的希臘民族，只要內部一旦有了較高的文化種子，不僅有充分的可能和鄰近各民族建立密切的經濟關係，以吸收其他民族——特別是比牠更落後的民族——

的血液發育自己，充實自己和提高自己到古代文化發展的頂點，而且最重必的，還在牠能得環境和交通的便利，當牠內部因商品經濟發展而生出人口過剩時，牠能建立解決本國內在危機的殖民制度。由於希臘一方面能和其他民族發生密切的經濟關係乃至文化關係，以增高其本國財富和文化生活，而他方面，又能建立解決本國內在危機的殖民制度，所以，牠一旦有了相當文化基礎之後，便能創造出爲古代東方所無的高級文化形態來。這種文化，不僅在表面上不同於東方，就是在本質上也不同於東方。換句話說，希臘接受東方文化，不是和東方本部文化傳播一樣，接受只是重演先進民族的過程，而是從接受之中造出文化的上昇，造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第二節。）

日本在西洋文化侵入前，成爲中國文化的附庸，不能和希臘一樣，創造更高度的文化，由於島國的處，在克服海洋的限制前，不能不和大陸國一樣產生歷史的倒退運動。換句話說，日本之所以不及希臘，由於環她的海洋，在航海技術幼稚前，不似希臘的內海，促進對別民族的往來，反使牠成爲閉塞的島國。

李先生創造這一理論，是用爲說明中國歷史在太平天國以前的各王朝的交替。至於，太平天國以後的狀況，他也有另一個說明。這說明，可以說，是他在四十年代爲近世中國思想史所奠立的另一塊基石。

他從無數的史實中，發現與歷史循環發展論有關係的另一規律，一個民族不怕受另一個

民族的侵略，只怕他在外族臨門時，不能夠應付這侵略，反忙乎內在危機的爆發。爲什麼有這現象呢？這決定于，當受外族的攻擊時，牠自己是否已克復了農民暴動。如果這暴動已經終止，那麼，外族的壓迫，會發生促進牠的昇華運動，日本的明治維新，是牠的好例子。反之，適當內部危機採取農民暴動形式而出現時，那外族的侵入，就勢如破竹，成爲被侵入國家的災難。三十年戰爭時代的德國與太平天國時代的中國，是牠的例證。對於後一點，他在「德國統一運動史論」中有下面的結論：「這是大陸民族的歷史鐵則之一，當一個大陸民族因國內商業資本主義發展而走入民族統一和民族史上昇時期，牠這時只要環境有可能和必要，牠必然發揮其侵略傾向。反之，當一個民族因資本主義發展超過某一點而生出民族分裂和歷史退落運動時，這時外族的侵入和壓迫，只是內部的分裂退落之必然結果」。

因此，爲着中國歷史最後一次循環的開始——太平天國運動，必然招致已窺伺中國若干年的外族的侵入。這次侵入，和過去五胡亂華等的侵入大不相同，那由于英國的文化不僅非當時之「共水古人」，「滿州人」所可比，而且也是當時的中國所不及。于是，比例于農民暴動所給與王朝的損害，侵略的外族也給與中國歷史以同程度的侮辱，這由鴉片戰爭後的每一事變結果，只增重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可以說明。

最後一次的中國歷史循環運動，是以五四運動爲結束。換句話說，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起，中國開始了李先生所謂的上昇運動，這運動的特性，是什麼呢？他以德國的例子，給

與一個名詞，那就是「民族統一運動」。

這個結論，是由廣博之歷史的對比中產生的。我們不難明白，他在這時候，對於近代諸民族國家的發展史，有精到的研究，他由上自尼德蘭的獨立，經英國的民權革命，美洲的獨立與南北戰爭，法國的大革命，意大利的獨立與統一，德意志的統一，日本的明治維新，土耳其的獨立，下迄十月革命的許多史實，得到下面的結論：

「近代諸民族的維新運動，除了那些……不欲論列的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和具有特殊形態的俄國革命外，其餘的，我們可以把他們分為兩大類：一是十七八世紀的英法古典的民族維新運動；一是十九世紀的德意日非古典的民族維新運動，前一種民族維新運動的特色，就在他所開始資產階級革命好幾世紀以前，這種民族就已經有統一集中的中央王權，並且因為此種王權對於資本主義之保障，這種民族並已經有了強大的資產階級，因此，這種民族的維新運動，在本質上，就是資產階級革命。而這種民族維新運動之基本特色，是資產階級來領導第三等級來推翻專制王權，貴族僧侶官僚制度，而建立資產階級為中心的共和國。……至於後一種民族維新運動的特色，他完全與前一種不同。後一種民族維新運動主要的特色，就在這種民族因國際環境之變遷或民族之刺激，使牠有迫切的維新運動必要時。然而牠為牠的先期的歷史倒退運動和政治分裂運動關係，不僅使這種民族沒有強大的革命資產階級，並且也使牠沒有一個統一並集中王權。因此，這種民族的維新運動，不但不是以推翻專

制王權爲任務，倒是相反，一開始就不得不謀集中王權之建立。而這種民族的民族維新運動之基本特色，不是資本階級之推翻貴族和僧侶以及官僚制度，實是由大諸侯，貴族，武士和資產階級等來建立一個和分裂的封建藩閥作鬥爭，並且永遠消滅其統治的統一的中央王權和巨大的官僚制度。……雖然如此，但因爲這一歷史運動，不是發生在十六世紀資本主義不甚發展時代，而發生在資本主義以民族形式作激烈的競爭時代，和因爲牠自身都是含有民族刺激之因素的，所以，牠在社會立法和文化方面，特別在經濟生活方面，都非加速的資本主義化不可。雖然這種勝利是資產階級的歷史的勝利。但是資產階級自己却不是和英德一樣是政權的享有階級」。

根據這一結論，解決許多的難題：第一就是日本歷史學家所爭訟之明治維新，何以未能使封建勢力完全消失，對於這一點，李先生的理論，比那些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者」之「半封建半軍事」的見解，透澈得多，第二，經過兩個典型的分析後，我們不難明白，何以「由上而下」的維新與「由下而上」的革命，在德意日與英法的歷史發展中，無論在教育，在文化在經濟方面，都有顯然的分野。由這一認識，更使人進一步明瞭：到二十世紀，何以有一「熱心」與「英法」的對立。第三，就是中國現代的上昇運動，既近于「民族統一運動」的典型，那就不能採取非歷史所應有的分類方式，或換句話說：不是使內部的危機更擴大地發展，而是使牠更迅速的終止，因爲有歷史的課題：民族獨立與統一，列在他的面前。

到達了上述的結論後，李先生一脚踢去支配中國三十至四十年代初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他沉着地把馬克思的教條放在書桌下，他自己由所得的結論中，推測中國——已經過第二次革命的中國的未來前途。他把廣東的國民政府，在歷史的過程中，比擬于普魯士，薩丁尼亞，他認為應以這政府為統一中國的中央政府，鏟除軍閥及阻礙統一運動的惡勢力。何以，在當日的中國，廣東的國民政府具有這任務呢？因為她宣言民主政治，她使武力與民衆相結合——更不必說，她是中國民主革命傳統之政黨，（中國國民黨）的政權了。

當上述思想成熟時，李先生不過是三十二歲的青年。他不僅發揚他的成熟體系，還勇敢地在「援助南京政府，即反革命。」的精神威脅下，公開他的思想，當他的論文發表於與中國國民黨有關係之「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的機關刊物——「文化建設」時，他受了若干曾和他一起的「左傾」者的輕視，但在另一方面，他却經過牠接近了許多正徘徊思想歧路的青年。

就在這時期，他和復旦大學發生關係。到戰爭發生他跟學校西遷，由牯嶺到黃梅鎮。他是他的最後休息地，又是他的思想成熟的場所。「美洲獨立與南北戰爭」，「德國民族統一史論」和許多遺稿，都在一期間寫好的。

他所完成的思想體系，我們還要敘述的，第一，他將過去的研究，作一個最後的考察。他不能以各民族國家的成立史與比較為滿足了，他還自感，他的研究近世史的方法，和歐美

的歷史家有一不同之點，後者通常把文藝復興作為近世史開始，他却認為：近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開端，在於尼德蘭的獨立運動。也為着這一認識，他把文藝復興前後的史實，作為他所研究之各國民族國家史的前提之一。他生前曾對他的友人們說：這是他的見解，他要把他所為他的著作「民族統一史論」的序文內容之一。但出版限的困難，却使他不能夠從事這一工作。第二，他在這時期不能以局於各民族國家歷史的比較研究為滿足，投身於歷史文獻的海洋中，發現了東西文化的異同及前途。他生前不只一次告訴他的友人們，他要把這個研究的成果，寫一本書。當他將世界文化發展史的面容，映現於這一書之上時，他自信：他會給歐美的歷史家對於過去的思想和研究方法開始了大反省。可惜，病魔使他不能對這一研究的成果遺留下明白的紀錄。

似他那樣的人，應有的抱負，是他的作品繼續刊世，但命運之神，却在作弄他。有利於一民族國家建立的理論，那樣地受人們的冷淡，牠的創作者，不能不灰心了。因此他開始了非青年人所應有的打算。他知道，他不能在大動亂的時代中，發詞難財；他更知道他的貧苦的家屬不能由他的生活，得到經濟上的改善。因此他特地把眷屬遷回竹山，自己已於半年後滿足倚闌一十九年之久老母的願望。

這次的旅途，依他後日的口述，是像「阿麗思奇遊記」中的主人公走入非意料所及的境界。他坐在滑竿上，穿着萬鳥爭鳴與異獸跳躍的叢林，越過清泉潺潺的小溪。數百里窺找到

宿處，人要裹糧而行。他本來是嗜好自然的，對這大自然的景畫，恰適中胸懷。他一面自己嘆園度的落後，另一面快樂地知道接近他的故里。

鄉居數月之久，他又到重慶來。他應友人之請，在磁器口四川教育學院教書，並兼任中央政治學校授課。雖然他的身體不慣奔走，但他的「中國近世史」却賴中央政治學校的筆記而存留下來。

一九四一年，他又回到復大來。但他的身體似乎受了極大的打擊。處疾病與授課的循環生活中，他的精神一天一天地不振了，終於他的足迹，不能離開他的住處——東陽鎮。

雖然在疾病中，他還和平時一樣接待同學。可以說，在那樣環境中，很難有一個人像他一樣，對於他的學生的愛護，儘管他的聲音啞了，但他還不倦於答覆同學所提出的問題；儘管他是臥在床上，但他還鼓起精神，指導請教的同學。這恰和他平常的情況一樣，所不同的，他沒有洪亮的聲帶，沒有如龍似虎的精神。

若干友人在這時候看他，他所洩露的唯一希望，是回到竹山去。他有一次流着眼淚說。「我要死，也要死在家裏。我要見我的老媽媽一面。」但此撒旦還要撒旦化的耶和華，對於弱者是非常吝惜施捨的。

常他瀕於危亡時，留校的同學們，爲他奔走求醫，爲他籌措醫藥費。三十一年度的畢業同學會，爲酬答他過去的教導，鳩資送他，親近他的同學懷着熱烈焦急的情緒看望他。他似

乎滿足這些的非一般人所能得到的待遇，於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下午四時，永久地離開他的家屬，他的朋友，他的同學而休息了。

逝世後，爲着他的親屬遠在竹山，復大的同學和生前的友人，組織（治喪委員會），辦理一切善後事宜。當夜大殮，翌日公葬於黃梅鎮後山。儀式非常簡單，但十分嚴肅，當黃土掩蓋他的棺木時，成百的青年和他的生前好友們，心裏似乎爲他頌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一段：

「被埋葬了的人，

永生的崇高的人，

他已經向天上，

莊嚴地高升：

他欣悅成長

而和創造的快樂親近：

唉！我們是在大地的胸中

愁苦地生存。」

二個偉大民族各諸片集合起來，成爲一個國家，重新活動，這是如何華美的景象

——某法蘭西人

德國統一運動

第一章 緒言

近代中國民族所經歷的歷史困難過程，在許多地方，都容易使我們聯想到近代史上德意志民族所經歷的歷史困難過程。

我們這樣說，不僅是指近代中國民族在不久以前之內部分崩離析局面和由外部所加於它的種種不平等的壓迫及宰制是與近代史上未統一以前的德國民族相類似的，而且是指近百年來，中國民族之全部歷史變化和政治演變，皆與近代史上德國民族相類似的。不特如此，甚至就是中國傳統歷史演變之特色，也是與德國傳統歷史演變相類似的。因此，研究德國民族史，特別是研究其統一運動史，對於眼前爲統一和解放而鬥爭的中國民族，是有極重大的意義。

一切歷史，不拘是本國史或外國史，都是現時生活之教訓。我們研究十九世紀的德國統一運動史，不僅在用現時的中國史的眼光去重新認識德國民族的過去，重要的，尤在能用過去德國史的經驗來理解中國的現在。因爲，我們並不是爲了過去而研究歷史，而是完全爲了現在啊！



四年前，作者在研究十八九世紀德意志民族復興運動時，對於中國民族運動曾發表過如下的意見：『民族的興起，常是由民族長期痛苦和激憤中產生的。十九世紀下年和二十世紀初，德意志民族之所以稱霸歐洲和世界者，一大半原因，是由於過去兩世紀德意志民族備受英法俄諸強權，長期壓迫之結果。』

『今日的中國民族，各方面都為它的強鄰所欺侮，焉知十年二十年後，不但它的近鄰站在它的面前會顯得微乎其小，甚且亞洲和歐美二洲的關係，亦將因中國之獨立和奮發而完全改變舊貌。不相信麼？德意志民族之復興和稱強就是中國民族之榜樣。德意志民族不僅在十七八世紀是歐洲被壓迫的民族，就是在十九世紀上半還是一個被人欺侮被人宰割的民族。雖然如此，德意志民族被壓迫被欺侮和被宰割中解放出來而變為世界最大強國之一。我們非基督教徒，但我們却認為基督教的『凡犧牲生命的人，將保全生命』這句語言是含有神性智慧的。而十八九世紀德意志民族之死中復生的事實就是最好的證明』。

經過二年多的抗戰和奮鬥，雖然我們的領土之一半已為敵人所奪去，雖然我們全國最大的城市已為敵人所佔領，但我對於四年前所發表的意見仍然沒有半點動搖和懷疑。

當法國的拿破崙以蓋世征服者的氣概對德意志的民族激底征服時，當時為德意志民族之靈魂的赫格爾（Hegel）對於德意志民族的前途曾作過下面的有趣的預言：

『法國人經過革命的洗淘，已經從許多典章制度解放出來。此種典章制度，乃是人類精

神所遺留下來的，有如嬰孩時代的鞋子。因此，這死的制度壓迫法國人的精神，以及別的民族的精神，如同枷鎖，尤堪注意者，就是法國的個人，在革命震動期間，曾經掃去畏死之心，洗掉禮俗生活，因為生死之念，在當時大變革之際，於個人已無何意義，故法國人所表現出來以反對其他民族的偉大力量，皆由於此種革命所鼓舞。因此，他們對於尚在霧中的不會發展的日耳曼精神特別佔優勢。但是這些日耳曼人一旦被迫而拋棄他們的惰性，將要激勵起來，大幹一場，而因為他們對於外界事物之接觸與制勝裏，仍能保持他們深厚的內心生活，也許他們可以超過他們的老師。」

黑格爾在當時對於德意志民族所作出的這種預言，不但當時正在努力壓迫德國人的法國人不相信，就是當時正被法國人壓迫的德國人也很少能夠相信。但經過五十年後，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普法戰爭中，德意志民族完全不折不扣地實現了他們的聖言之預言。

今日的日本，即資本主義沒落時期的日本，無論如何，都不能與拿破崙時代富有朝氣的法國，相比擬。今日的中國，即經過「五四」以來民族醒覺運動和民族統一運動的中國，無論如何更非黑格爾時代支離破碎和無政府狀況的德國所能比擬。因此，今日中國民族所經歷的國難，如其說是它的死亡關頭，無寧說是它行將稱強世界之先兆。不特如此，並且全亞洲一切被壓迫民族之解放，皆將因它的獨立運動之成功而得到新的幸福之春。中國民族革命之意義決不亞於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和本世紀初的俄國革命！

但是，話又得說回來。近代一切偉大的歷史運動之所以不同於古代一切歷史運動者，即在近代一切偉大的歷史運動中，人類主觀方面佔有最大的自覺和預見能力。而主觀的最大的自覺和預見能力之移得，前道雖不一，而民族生活之比較研究，實為最重要者。但是，所謂民族生活之比較研究，又不是抽象的把他民族的革命理論搬到中國來再版，重要的，乃是在比較之中來發現自己民族之特徵。因為民族比個人，是尤為個性化的東西，各個民族及其政治原理，都是從其自身特徵中自長出來的，是不能向他民族竊取來的。因之，不理解自己民族生活特徵的人，是決不能為自己民族實現一種合理的理想。我們研究德國統一運動史，即是在他民族生活之具體比較中，來使人們認識中國自己。須知歷史真理之可貴，並不在它變為一般獨斷教義的一天，乃是在它降生的一天。歷史真理之降生總是神聖的智慧和表現。在這裏，歌德的明言詩更是永遠不朽的：

理論是灰色的。

只有事實永遠是青蔥的。

第二章 大陸民族之歷史特徵

我們的課題，是德國民族統一運動。但這裏馬上即發生一個問題，就是近代史上德意志民族國家之形成為甚於比大西洋沿岸各民族（西，荷，英，法）之民族國家形成，甚至比東

歐俄民族國家之形成要遲數世紀之久呢？

近代民族國家之形成，並不是始於十七八世紀英法資產階級革命時代，而是在此以前好幾世紀以來就已經開始了的。西班牙和英國遠在十五世紀初已開始其民族國家之形成過程，荷蘭和法國當十六世紀時即展開其民族國家之爭取運動，就是在北歐幾個半島民族，如丹麥瑞典等，也是在十六世紀即開始與民族國家之建立。至於東歐的俄國，其文化之發達雖然較西歐各地為晚，但其民族國家之形成運動，亦還在十六世紀。

不錯，十六七八世紀的專制君主制的國家，其國內統一之程度是不及十九世紀以來的工業資本時代的民族國家之堅固的，但這既是程度的差異。反之，如果以十六七八世紀的歐洲專制君主制的國家去比中世紀的四分五裂支離破碎的封建國家，那麼，前者之比後者實可以說，是人類歷史進入一個新階段。專制君主制的國家是民族國家之最好的證明，就在這種國家自身都是從克復自己內部封建反抗運動中產生出來的。這種國家之產生，不僅是商業資本發展之結果，而且是為滿足資產階級國民經濟發展之需要的。不過因為此種政權多為上層貴族，特別是為宮廷貴族所把持，所以，結果當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愈向前發展並要與自己取得政權時，它更急脫離資產階級利益而傾向保護特權階級的利益，而最後的結果，此種專制的民族國家不得不為民主的民族國家所代替。

然而上述的專制的民族國家，不但在十七八世紀的德國未曾出現過，就是在十九世紀六

十年代前亦未曾出現過，因為德國不僅在十七八世紀是處在四分五裂分崩離析的局面下，就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前，德國也不過是一個徒具國家之形式的封建無政府狀態。德國在一八四八年前夕，還保存着三十多個獨立國家。這其中，有一個帝國，五個王國，二十九個侯國。此外，還有許多為國法團體，不能侵犯的自由都市。這很多的國家，他們不僅有其獨立的政治制度，獨立の軍制，獨立の法制，獨立の貨幣制度和度量衡，並且還有其獨立の駐外使節和獨立的外交原則。我們試把這種情形，拿來與同時的英法荷西等統一的民族國家一比，則德國的歷史發展實較以上諸國要落後到數世紀。這種情形是怎樣產生的呢？是由於日耳曼血統劣於盎格魯撒克遜血統或拉丁血統麼？是由於日耳曼人的優生劣於歐洲其他各民族麼？是由於日耳曼人是歐洲的「睡獅」和「病夫」使然麼？不是，皆不是。是由於大陸民族歷史發展之特徵，即歷史退落運動之結果。

我們知道，德國處在歐洲的中心。它與大西洋，地中海，波羅的海北海諸國不同之點，就在它是一個大陸國。為歐洲大陸之中心的德國，在歷史發展之某一階級，她的大陸特徵對於她雖發生過優良作用，但在歷史發展之另階段，此大陸特徵對於她又是非常有害的。同一地理條件，而在歷史發展不同之階段上，對歷史能完全生出絕然相反的作用，這是值得一切歷史家特別注意的。

為歐洲大陸之中心的德意志民族，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比大西洋地中海和波羅的海北海

諸民族爲落後。德國自中世紀以來，特別是在十五六世紀之交，其經濟，政治和文化之發展，不僅不比當時大西洋地中海和波羅的海北海岸民族爲落後，甚且遠駕這些民族而上之。

德國資本主義發展比歐洲各國（除意大利）爲早。牠在十三世紀時就已經開始了資本主義發展。至十五世紀時，牠不論是在經濟方面，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都是立在歐洲之霸權地位。從經濟說，德國由中世紀到中世紀末，都是處在全歐洲商品經濟發達之媒介地位。當時大西洋航線尚未利用。全歐商業，無論是由南至北或由東至西，都是以德國爲樞紐。德國國民經濟，當時確有巨大的增加，而財富的發展也達到很高的程度。有許多經濟現象，已顯出近代經濟飽和的特徵：如大資本的積聚，同業組合，投機交易，採礦業的發達，都是一千五百年左右大衆皆知，日常談論的事件。譬如就金融市場而論，如意大利領袖銀行家美第奇（Medici）在一五〇〇年左右竟爲奧格斯堡（Augsburg）的弗格爾所超過。由於德國這時期的經濟生活之非常發展，這時期的德國不僅出現了許多強大城市，而且還產生了許多保護商人階級利益的商業同盟。

第一，是萊因同盟（Rheinbund）。這一同盟出現於一二四七年。牠包含七十至九十個都市。牠的任務，在謀德國各都市和意大利各都市之順利的貿易，同時並把意大利，弗蘭德斯乃至英國加以聯絡。牠有六百多隻船舶，橫行於萊因河中，即使最有勢力的封建領主也不敢任意侵犯他們的利益，這個同盟的目的，不僅在「藉同盟而使弱者變爲強者」，「而且在

以全力防禦德意志帝國的一切財產」。

第二，是許華同盟（Schwabische Bund）。這是南德各都市所組的同盟。時與意大利，特別是與威尼斯相結合。當這條交通之要道的，有努連堡，累根斯堡，及波登湖畔諸城市。特別是努連堡，她因為地位優越關係，盛大的商工業，科學的進步，和豪華，著名於一時。其美麗的金銀細工，青銅，石工，木材等所作的藝術品，到處都受人歡迎。因此，努連堡不僅是德國的藝術巨都，並且也是中世紀以來德國科學之中心。

第三，是歷史上著名的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這是北德意志各都市，爲了對外貿易，而結合的同盟。加入這一同盟的諸都市，雖代有變化，但最主要的都市，則爲律伯克，漢堡，市勒門，和波的海各都市。此外，還有但澤，維斯比，里加，蘇維斯特，多特蒙德，科斯堡，夫賴堡，法爾克佛，馬德堡等都市。全同盟共約一百個大都市。她出現於十二世紀，她在歐洲各國，如俄之莫斯科，新城，英國的倫敦等處，皆設置商館。它有自己的軍隊，並從各國元首，奪取許多獨佔商業特權。它自與丹麥，瑞典開戰得到勝利後，在長期內，更執全歐商業之牛耳。當十四世紀時，它的商業優勢竟達到這樣高度，而英國羊毛貿易，百分之七十六是操在漢薩商人手中。

這樣看來，德國這時因食地理條件之賜，其經濟繁榮已達於高度時，歐洲其他諸國，除意大利，都還停滯在中世紀狀態剛開始其經濟發展。

經濟的發展，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霸權之建立。自中世紀，德國雖未如後來的英法西等國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但以德意志民族爲中心的神聖羅馬帝國，它的統治勢力之發展，不僅使它傾有西班牙，尼德蘭，匈牙利等國度之全部統治權，和意大利法蘭西一部分統治權，且其勢力所及，就是遠處大西洋西岸的英吉利內政，亦時受帝國權力之影響。再就法制說，爲甚麼羅馬法在文藝復興前後，在德國取得特殊的發展呢？爲甚麼自一五三〇年以來，德國能設立由各階段所組的帝國法院，即最高法院呢？即因爲羅馬法和帝國法院是最能適應當時的德國經濟生活和帝國統治及商人階級要求的。

到生活殷富和政治權力擴展並行的，是教育事業的發達和進步。自從一三七八年，德國和法國因所奉教壇不同，德國教士不能在巴黎求學教書，因之，使德國教育能完成一種解放以來，德國大學的產生，便如雨後春筍一般發展起來。海得爾堡，哥倫，耶爾福，來比錫，羅斯托克，夫賴堡，以後的巴塞爾，格來福華，普羅斯大得，和杜平根，最後還有威丁堡大學。這些大學互相競爭，而且與法意兩國自去有名的大學競爭。

在文學方面，這時期外國模範作品的影響完全過去了。十四世紀中葉至十六世紀初，用德文寫的文章和詩歌，在思想方面雖不十分高尚成熟，但却都有一種德意志民族性的特色。

總說一句，德意志民族這時期的文化生活的發達，雖不一定到處都達到同等程度，但各方面都有力的進步與新生命。所以，稍後的德國騎士詩人胡騰（Ulrich von Hutten）說：

學術發達，思想醒覺，生活是一種愉快；「實在言之成理。而德國這時在歐洲的崇高地位實如帝國主義未侵入前中國在亞洲的崇高地位一樣。

但是啊！歷史自身就是一種無常！歷史之無常變化而又最令我們鬱結不能寬懷者，就是那種崇高的宏大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之突然遭逢沒落。如果說十六世紀初，是德國的國勢和文化達於頂點表現，那麼，同時是其國勢和文化達於終點表現，並且至此以後，它還不得不循一般大陸民族的歷史規程而走向下降之途。

我們已經指出過，德國是一個大陸民族。大陸民族與海洋民族歷史發展不同之點是甚麼？是在海洋民族因海洋之便利，當其資本主義發展而生出貧窮人口時，它可以作廣大的國外移民運動，以解決其國內社會危機，即資本主義第一個時代所特有的貧民革命運動。而大陸民族完全沒有這種可能。這特別是爲歐洲大陸之中心的德國民族是如此。德國史自始就受地勢束縛，並且經過一千多年直到現在，德國還向東西兩方面作戰，爲東西兩方的鄰國所範圍，而不能得到自由向外擴展之機會。由於大陸民族沒有向國外排洩其貧窮人口的可能，所以當它內部的資本主義發展達到大量剩餘人口出現時，此剩餘人口之惟一出路，便是暴動和投身內戰。而暴動和內戰，也成爲解決大陸民族剩餘人口之惟一手段。中國過去各朝的末年的內亂是由此發生的。德國歷史上十六七世紀的內亂和由此而生的歷史退落運動也是由此產生的。

上面已經指出，德國在十五六世紀之交，是歐洲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最發達的國家。但是這種發達，和一切資本主義發達的規律一樣，是以犧牲德國的獨立小生產者，特別是犧牲德國的農民為前提的。這就是說，德國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生活雖甚繁榮和得意，但德國的小生產者和農民生活反因此日漸貧困和破產。但是貧困了和破產了的德國小生產者和農民他們的出路是甚麼呢？它如果不能如十六七世紀的大西洋沿岸諸國一樣把他們移殖到海外去，又不能如十八世中葉以後的英國一樣把他們安插到城市大工業，即機器工業中去那麼，這種貧窮人口除了暴動和投身戰爭以外，還能有其他的出路麼？

自十五世紀以來，德國即是一個充滿了農民戰爭烽火民族。十五世紀，德國有所謂胡斯（Huss）所領導的波希米亞的農民暴動。此暴動在有一個時期甚至在各處都得到勝利，並且這次叛亂之擴大，使教皇組織的十字軍，雖五次進攻，猶不能征服其勢力。至十五世紀中期，全德意志都展開出農民暴動洪流。如一四三一年瓦姆斯的農民暴動，一四四三年，在符次堡，巴登，拜厄倫，亞爾薩斯，布賴斯高以及由條林根至阿爾布斯山麓之間的各地方，都發生了同一暴動。而一五二五年的農民戰爭，其勢力所及，更佔當時德國領土之大半。這次大暴動，最初是出現在巴登，然後轉至亞爾薩斯，萊茵河，和美因河流域，即符騰堡，夫朗肯堡，拜厄斯，條林根，厄爾斯等地，最後更發展到奧大利。在這一戰事，農民提出有名的十二條款，其內容如下：

第一條，牧師由農民選舉，且得豁免之。第二條，把什一稅及其剩餘金，給與貧民或貯以充貧民救濟之用。第三條，承認各人身體之自由。第四條，貧民有狩獵、捕魚之自由。第五條，貴族所有的森林，還給村落。第六條，減輕賦役如舊狀。第七條廢止領主強制農民負擔供物及力役。第八條，減輕地租。第九條，復活舊法，以代新法令。第十條，原屬鄉村其有不收地，為私人獨佔者，令其退還。十一條，廢止死亡稅。第十二條，以上各條，如有違反神意者，願撤回之。

但是，當時的德國是甚麼一種社會力量把這種農民革命的火焰捕滅少呢？腐敗的德國皇帝的兵力是不能鎮壓此偉大農民革命浪潮的。德國農民戰爭之失敗，是完全敗於各王侯和大地主之手，可是德意志皇帝雖因得德意志各王侯和大地主之軍事勢力，打倒了暴動的農民，但同時也就培養了帝國權威——攝政人——德國諸侯和大地主——的勢力。為甚麼？因為由於內戰對於商品經濟之破壞和在反農民鬥爭中建立了德國諸侯和大地主的軍事勢力，於是使反對農民的鬥爭不久就變為地方諸侯和地主反帝國私權之鬥爭，即變為三十年戰爭。德國歷史這一階段，是誠為中國歷史上的五代，殘唐一樣，是所謂：

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秋！

現在我們就來敘說這一民族分裂和民族淪落的經過，因為這種經過對我們這羣由民族分裂民族淪落中抬起頭來的民族是特別重要。

第三章 三十年戰爭

現在德國資產階級的權威歷史家哈勒爾 (Von Johannes Haller)，他把德國歷史上這一次分裂運動即德國歷史上三十年戰爭，看爲是德意志民族獨立自主地找尋到天黨之路的一種必須的和高尚義意的運動。哈勒爾的這種認識，是完全由於他太重着德國三十年戰之表面原因，卽宗教原因。爲從宗教說，巴威自始就站在舊教方面。雖然巴威對於皇帝的宗教政策不表示反對，但它爲純粹的政治動機，對於皇帝却有過三番五次的反抗。這樣看來，我們如可以以純宗教的動機來解釋三十年戰爭發生的原因？實際上，德國史上這一次大混戰是另有歷史根源的。哈勒爾自己不是作過如下的說明麼？「人說路德的出現——哈氏說——以及因他產生的教派分裂，引起了並且加速了國家的分崩離析。我們要把這句話反過來說纔對：因爲國家已經半分崩離析了，纔能產生一種持續的宗教分裂。」因此，宗教並不是三十年混亂之原因，它只是德國已經走向分裂之結果。但是，這時候的德國何以會走向民族大分裂局面呢？哈勒爾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德國歷史家皆未與以滿意的回答。而這一問題之正確的解答，似乎只有我們這爲一切大陸民族之典型民族的歷史研究者始有可能。

事實是，我們所闡述的大陸民族的歷史發展之法則，不僅是理解自古以來宗教神祕的帝國的建立和崩潰的鎖鑰，並且也是理解自古以來一切偉大民族之向外發展或被他族屈服的鎖

論。

這是大陸民族的歷史銖別之一：當一個大陸民族因國內商業資本主義發展而走入民族統一和民族上升時期，它這時只要環境有可能和必要它必然發揮其侵略傾向。反之，當一個民族因資本主義發展超過某一點而生出民族分裂和歷史退落運動時，這時外族的侵入和壓迫只是內部的分裂退落之必然結果。因此，在美洲未發見以前，從來沒有一個大帝國能夠解決其內部因資本主義發展至一定時期所生出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的。因之，在此以前，一切偉大的帝國，在它剛經過它的統一，發展和鞏強時期後，它不可避免的要進入分裂，枯萎和衰落不堪時期，並且前時期的光輝恰是後一時期的暗淡之原因。人們儘可以不相信有歷史的輪迴或報復主義之存在，但天道好還，歷史是無數次他顯現過它的輪迴主義報復主義。

再就民族之主觀精神說，當一個民族在經濟繁榮和國家統一時期，這時這個民族便特別富於生氣，富於團結心鬥爭心和向外發展傾向，並且這個民族內部之各階級和各個人都樂於把民族之最高目的當作自己之最高目的，使階級利益個人利益與整個民族利益完全一致。如用黑格爾的詩來形容，這個時候就是民族爲着他自己的精神目的而行動。我們可以叫這種民族爲倫理的道德的強有力的民族。因爲這個民族正在產生那種爲他的精神之內在意志的東西，所以這時候能在反對外部暴力之中來防衛和發展他自己的事業。

反之，當一個民族因經濟繁榮至一定限度而生出內在衝突和民族分裂時，這時俟民族之

活氣與關切就開始熄滅，並且民族中之階級利益和個人利益經超過民族共同利益，而民族之共同活動也就爲民族中之特殊活動於分裂活動所代替。當一個民族已經過了它的黃金時代而進入無生氣的小集團的繁榮主義時期，即分權奪利的民族內鬥時期，這時外部勢力之佔入和主權領土之喪失，不但不會在這一民族內引起真正有力的反抗，而且牠自身就是招致敵人深入的因素。此即孟子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我們現在所要敘說的德國歷史上三十年戰爭，就是在上述歷史退落運動和分裂運動中產生的。三十年戰爭雖包含有民族原因和宗教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由於德國剩餘人口無出路和諸侯權力之坐大造成的。我們已經指出過，席捲全德國的農民革命的火焰，它不是皇帝的力量之歸於熄滅的，而是德國的諸侯和地主貴族的兵力使之熄滅的。換句話，德國農民戰爭的平服，不是表示中央的權力之勝利，而是表示地方的權力之勝利。雖然，當這種地方權力最初自動地起來和農民作鬥爭是爲皇帝所求之不得的，但是這種地方兵力一旦樹立和強大之後，它們又可轉而以之反對皇帝。漢代三國之亂，唐末藩鎮割據，都是由此同一路線造成的。德國自奧格斯堡和約成立後，它的民族驅幹早已弄得四分五裂了。諸侯在這一次神約之中，不獨在軍事上，政治上，法律上取得獨立，就是在宗教問題上可完全取得獨立。皇權此後之不關重要，可謂空前無比。而諸侯在宗教自由掩護之下所進行的分裂運動就愈益變本加勵。但是一個行將墮落的彗星到底比一羣方纔顯現的羣星爲光焰有力，因此，德意

志的諸侯要想反對皇帝的統治和權力，必須要付最重大的代價。但這種代價是超過德意志諸侯支付能力不上的。因之，德意志的諸侯在反對皇帝的爭鬥中，非借用外力不可。這就是說德意志歷史現在已經走到引敵入室階段了，而德國的外鄰中，那些欲奪取神聖羅馬帝國霸權的各民族遂得以德意志為他們比武的擂台。

由德國自身分裂而引起的強鄰於德國歷史上的三十年戰爭大致可以為四個時期：(一)波希米亞反叛時期。(二)丹麥時期。(三)瑞典時期。(四)法蘭西或國際時期。現在我們就按上述四個時期加以簡略的敘述。

德意志內鬥之開始是以波希米亞對於哈布斯堡的反叛為信號的。這恰像中國近數十年內戰是以辛亥革命為信號一樣。自宗教改革以來，德意志帝國內部的政治勢力已發生極大變化。這期間，一方面，是德國諸侯勢力之增強，但是另一方面，從查理第五以來，皇帝總時期德國不要許多主人，只要一個，我就要做那一個。事實上，哈布斯堡族這一系，在這時期內，不僅在領土上有極大的擴張，並且就權力說，已成爲德意志皇帝尊號之長期佔有者。這個皇族在政治上崇尙專制，在宗教上更是完全擁護天主教，而且自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繼位以來，至特別增強此種傾向。但是德意志西北部甚至中部的諸侯，他們因為自己實權之增加緣故，他們多傾向獨立在宗教上自然都是擁護與皇帝所利用的舊教對立的宗教。譬如，波希米亞的貴族，多半為加爾文教徒。他們深恐斐迪南一旦即位，即要剝奪他們的

獨立特權和宗教上的自由。所以當一六一九年，斐迪南當選爲皇帝時，有一個北德諸侯的公使，寫信給他的君主說：「正如耶穌哭耶路撒冷一樣，我們也應該哭這次選舉，因爲這次選舉要使德國受禍。」然而事實上，騷亂在前一年已經出現。因爲自一六一八年五月波希米亞的貴族把皇帝的兩個代表和一個秘書提到皇室窗外並宣佈波希米亞的哈布斯堡族廢立後，一種長期的國內戰爭便已經開始。

在戰爭發動的第一個時期，對於皇權和舊教均甚有利。一六一八年至一六〇五年之間，波希米亞的反叛完全被鎮壓下去了。哈布斯堡族的皇權又重新建立起來。叛亂的貴族和教徒失去了他們的財產和生命。萊因河的選侯的職位又從加爾文教徒手中移到舊教徒手中。皇帝的火將萬勞斯太因（Jalenscia）幻想使皇帝做德國的惟一統治者，廢除皇帝選舉制，採用皇帝世襲制。而皇帝莫爲一種理想所支配，即謀恢復德國全部舊教教會。然而正當這般新教諸侯在服從與反叛之間躊躇不決時，外部的壓力突然插入進來。這個強力就是丹麥國王基利斯當四世（Christian IV）。於是，使戰爭就進入第二階段。

丹麥之入寇，使德國蒙受了嚴重的損失。一六二九年的律伯克和約，丹麥國王的勢力雖自德國退出來，但遮特蘭，什列斯威與好斯敦三地方皆割歸丹麥管理，而波羅的海與北海的霸權此時也爲丹麥所控制。

丹麥之退出，德國雖然遭受損失，但皇權却仍得到擴張機會。舊教同盟軍在梯里（Tilly）

（領導之下控制着下薩克森，皇帝的大將進至波羅的海海濱，於是全德意志現在都放在皇帝的足下了。斐迪南是前無古人的皇帝了。就是腓特烈第一和亨利第四也不及他。因此，他現在更可以肆無忌憚地厲行教會財產之後日和武力政策運動。因之，現在不僅加爾文教派對哈布斯堡族統治懷不平，就是路德派的諸侯也都驚慌起來。

但是，就德國以外的民族看來，皇帝的空前勝利，不僅恫嚇了波羅的海另一路德派的新教國，瑞典；而且也使法國感覺不安。因為哈布斯堡族在德國的勝利，就是西班牙的勝利。而西班牙之勝利，就可以陷法國於包圍之中。因此，法國與瑞典之合作，對於德國近世史，遂成爲最有影響的事變。

瑞典國王若斯達不亞多法（Gustavus Adolphus）是一位幼想使新教的瑞典變爲北頭最大強國的人物。他的目的是想把波羅的海變爲一個瑞典湖，他在未侵略德國以前，曾佔有芬蘭與愛沙尼亞及俄國在波羅的海沿岸的土地。此外他又在波蘭獲得里窩亞和維斯杜拉河口。他現因爲德國的內部自相火併給他呈現了一個千載一時的良機，於是，他可以把他的貪饒的眼光轉而到德國北部及濱波羅的海沿岸土地了。他此舉不僅在德國內部有受委屈的諸侯之歡迎，而且還得到德國的世仇法國的資助。

若斯達夫亞多法一六三〇年由波美拉尼亞登陸。由於他能取得德國路德派和加爾文派的森侯爲之內應，所以他的戰勝攻取遼勢如破竹。他的進攻的第一步，是聯合布蘭登堡和薩克

諸貴族進佔薩克森。至一六三一年，他又在萊比錫的布賴騰斐特對梯里所領導的軍隊獲得大勝。在這一次大勝之後，他本欲轉向西南，進攻萊茵流域，以便取得科倫，特里爾與美因斯諸富裕區域，惜爲其強硬的法國同盟者所抗拒，於是便不得不移轉其目標到東南，以佔領巴威。實際上，他在萊比錫的大勝，不但把全部北德從皇帝統治下分離出來，就是南德的大門也被打開了。因此，在巴威被佔領以後，他便積極準備要把他的勢力伸到哈布斯堡族世襲領地的心腹。皇帝在危急之中召回窩楞斯太因，想擾亂他的計劃。一六三二年十一月呂曆之戰，在得勝的一剎那中，瑞典國王的英雄事業突然終局，他同一個真正的軍人一樣抗戰死了。

這顆北方的流星突然沒落了，正同他突然出現一樣。

考斯達夫亞多法之死，本已顯示出第三時期的戰爭有結束之可能。自一六三四年瑞典軍隊在諾得林根大敗之後，九個重要的德國新教諸侯都脫離同盟，薩克森最先與皇帝締結布拉格和約，其他諸侯繼之。而皇帝也大赦一切新教徒，並保障一六二七年他們所存的教產，甚至舊教同盟現在也解散了。但是，這時欲破壞德國和平的，倒不是新教諸侯和皇帝，而是法國的大政治家紅衣主教黎塞晉的政策。法國已看出，如果不使它過去一切努力化爲烏有，它必須自己以強大的勢力去參戰，以便使自己有較大的獲得。黎塞晉現在比從前更相信：法國的偉大是有賴於哈布斯堡族之失放的。因此，在皇帝未遭受到重創和德國未達到最後的分散以前，它是決不許諸侯與皇帝議和的。因而法國現在已不在幕後資助瑞典和德國的新教諸侯

而是自己勇敢地登上擂台，宣稱自己要與皇帝比武。

三十年戰爭的第四個時期，即法國時期，是自一六三五年繼續到一六四八年之波亨有前三時期合起來那麼久。法國對德國作戰的目的，不僅想壓服奧大利的哈布斯堡族，和佔取萊因河上最富庶的省分亞爾薩斯；同時也是想給與西班牙在大陸上的霸權以致命打擊。即是說法國想解除西班牙對法國的包圍。所以，法國在對德國作戰時，同時宣佈對西國作戰。法利用瑞典人和德國的新教徒擾亂奧大利的哈布斯堡族，使之無暇他顧，他又利用尼德蘭獨立幫助他反對西班牙。此外，他更從恩荷國叛變，使其在後方擾亂西班牙。這次戰爭一而延長到六四八年，因為最後兩次對皇帝致命的打擊，始逼出和平來。這一年的五月，瑞典攻取了布拉格，八月法國的將軍康狄（Coudé）在隆斯藏滅了一支西奧聯軍，於是一六四八年十月始簽訂威斯特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這個和約，簡直是德國死亡證書。

和約的政治條款爲：（一）德國各邦均可勿需向皇帝請示，得自由議和或宣戰，並享有自主權。（二）除斯特拉士堡自由城外，以亞爾薩斯歸還法國，並對於法國所佔之麥次，都爾及維丹各主教區，加以認可。（三）以控制着奧得河口，波美拉尼亞領域與圍繞布勒門城控制易北河與威塞爾河口的主教管區，給與瑞典。（四）法國與瑞典在神聖羅馬帝國中享有選舉權，和監督德國政治權利。（五）布蘭登堡獲取波美拉尼亞東部與九個主教管區，馬得堡亦包括在內。（六）巴拉丁爲巴威的馬克西米連與廢位的腓特烈的兒子所均分，二人均

得有選帝的資格。(七)正式承認瑞士對神聖羅馬帝國的獨立和荷蘭對西班牙的獨立。

關於宗教糾紛的解決，其條款爲：(一)加爾文派教徒與路德派教徒享同等權利。(二)不論是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凡在一六二四年一月一日所得一切教會財產，均可保全不動。(三)在皇帝的法庭中，舊教徒的法官與新教徒的法官人數應相等。

三十年戰爭的經過和結果已如上述，現在特敘述一下它的不良影響。它的第一個不良影響，是對於德意志民族之毀壞，三十年的長期戰爭，幾乎把德國變成沙漠。人口的死亡將近三分之一。許多巨大的城市，歸於消滅。許多鄉村變爲廢墟。土地荒蕪，天災流行，病疫猖狂，豺狼滿地，簡直使德國歷史倒退至數世紀之遠。在三十年戰爭結束後，德國不僅是一個流民乞丐遍地的國家，並且是一個人吃人，犬吃犬的國家。除了古時羅馬帝國滅亡時的慘像，歐洲是從未出現如此可怕的社會慘像！

第二，是德國的重要領土之分裂與河內商流之被佔領。而佔領這些領土河流的外來人，不僅在港口可以自由收稅，並且對河內商業，更有意加以打擊。漢薩商人在各處受排斥，荷蘭和英國在萊茵河和波羅的海更濫施權威。此種情形不僅在三十年戰爭時爲然，而且其流弊所及竟達一二世紀甚至三世紀之久。

第三，是造成德國內部之永久分裂。這時在歐洲其他各地正是統一的民族國家出現時代，但德國却受到國家之最後解散。神聖羅馬帝國的名義雖還未取消，但在實際上帝國只是一

個陰影。

第四，是這種小國度對於公名性質之影響。一種偉大磊落和自重的國民品格，只有在組織嚴密，堅強偉大的國度內始能產生，而在國度過小的國民，眼界和氣度也自然狹小。在這個小世界內，國民因為要獲得國家的保障，國民候習於走小徑，不走坦途；習於卑躬自保，不敢把腰伸得太直。因此，使這個民族，在長時期內，不適宜於作偉大的事業。

我為甚麼在論十九世紀德國民族統一運動時，而要費去這樣大的篇幅來討論十六世紀以來德國歷史變化的特徵和其分裂運動呢？我的動機有二：第一，我欲告訴讀者一個了解歷史的方法。歷史的變化永遠是前因決定後果的。不研究。十五六世紀德國歷史變化，是決不能認識十九世紀德國統一運動之造因和特徵的。第二，是我在本文一開始說過的，我們研究德國民族統一運動史時，我們不僅要以據我們近代的歷史經驗來了解德國的過去，重要的尤在用德國過去歷史經驗來了解中國的現代。

我們已經指出，德國為一大陸民族。而大陸民族歷史發展的特徵，是因資本主義發展無出路，造成民族歷史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現象而這是我們與德國完全相同的。不過所不同者。僅在德國整個歷史過程較短，這種現象只出現了一次。而中國因為整個歷史過程較長關係，竟現出了十數次。現在試把近百年的中國歷史與我們所研究的十六世紀以來的德國史作一比較，我們即可以看出這兩個民族的歷史相符合到甚麼程度。因為歷史科學是一個廣訊的

比較科。只有從廣汎的比較之中，纔能發現歷史發展的一般的或特殊的規律。

前邊已經指出，德國在十六世紀初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立在歐洲之高峯地位。這一點我們在近代史的初期也與德國無異。因為在帝國主義未侵入前，我們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立在亞洲之高峯地位，由前所述，我們知道，德國歷史衰落運動是始於十五六世紀德國農民戰爭，和在反對農民戰爭中，因為培養了地方諸侯勢力，遂造成太阿倒持之局。這一點，我們與德國完全一致。我們在近代史上，開始歷史退落運動，也正是在洪楊之亂前後。而在反洪楊之中所建立的地方軍事勢力，就是近代中國軍閥制度之起源。我們又知道，德國諸侯反皇權的鬥爭，是在「擺脫暴虐無道的西班牙的奴隸制度」和奪取「日耳曼自由兩口號」下進行的，而我們的辛亥革命也是在反對「外族專制」和「民主自由」的口號之下舉行的。德國的歷史告訴我們，所謂「日耳曼自由」這種法律的成語，並不是指一般人民之自由而言，其意義又僅指一般特殊公侯和大地等之擁兵自由，統治自由和剝削人民之自由而言。而這一特徵與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又相同。辛亥革命後，所謂「自由」也並非指人民有自由而言，不過僅指那般壓迫人民的軍閥和有鎗階級之自由而言。「共和」與「民國」只是一塊招牌，恰像「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對於德國的人民也只是塊招牌一樣。德國諸侯勢力龐大之結果，是三十年戰爭，我們的軍閥勢力龐大之結果，是民國以來近二十年的戰爭。德國內亂之結果，使他不但不無力抵抗外來侵略，甚且歡迎外力給外力侵入以好機會。我們自洪楊之亂以來，特別

自軍閥混戰以來，不但放棄對帝國主義之對抗，甚且因為內鬥危急關係，使各派軍閥變為各派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勢力之嚮導。德國內亂外侮之歸結，是領土喪失，河流和港口被佔領，經濟權益和政治主權之被剝奪，我們的內爭外侮之結局，是屬國脫離，領土被割讓，河流海口被佔有或被使用，經濟權利被侵佔，此外，還有租界，治外法權，外人在中國的駐兵權，傳教權，文化侵略權等等（註一）。

（註一）自一五四運動以來，因為民族反帝國主義情緒之高漲，國人遂把近代中國民族變為半殖民地之原因完全歸結於帝國主義之侵略。這種宣傳，雖能刺激民族情緒，收效於一時，但從理論的真實性說，却缺少深刻意義。其實，近代中國民族之所以變為半殖民地外觀上和表現上雖為帝國主義侵略之結果，但本質上却是由於中國歷史自身不幸變化造成的。如果說，近代中國民族變為半殖民地之原因，是純由於帝國主義之侵略之結果，那麼，我就要問：在晉末唐末宋末明末各時代並沒有帝國主義之侵入，中國是怎樣部分的或全部的失去民族自主權？難道當時侵略的我們的各野蠻民族在經濟上軍事上文化上也是高於我們的麼？還有，如果說，中國在近代變為半殖民地是帝國主義侵略之結果，那麼，為甚麼帝國主義侵略日本的結果，不但沒有把牠變為半殖民地又反把牠在短時期內變為遠東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呢？由此可知，侵略之能改變一個民族的地位或使其喪失自主權，只有在被侵略民族自適身在歷史瓦解和崩潰中時始有可能。換句話

，只有在這個民族自己正在走向沒落時乃有可能。設若一略不是在被侵略民族自己已走向沒落時，而是走向民族上進和民族復興時，高度的文化之侵略，不但不能使其主體，反而會加速其建國和文明化過程。印度亡國，土耳其被宰割後及變為殖民地，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十六七世紀的總意志和意大利變為外族爭奪的錦標者，都是因為自身走向分解之結果。與之相反的，如大彼得之改革，普魯斯的興起，日本明治維新運動，中國近十年的統一運動，其所以能獲得偉大成功者，即因為這些民族自身歷史已經進前或開始走向民族復興之途之故。

假定帝國主義之侵入不在洪楊之亂前後，不在滿清第一個百年開始，而是在滿清入關正統一中國之時。設若在這個時候，帝國主即以其兵艦大砲來恫嚇中國威脅中國，那時中國不但不會變為半殖民地，且會因這種恫嚇和威脅加速地變為近代強邦，最遲當在一百年以前，世界上就已經出現以強大的中國為代表的亞洲以反抗歐美二洲優勢了。設若如此，不但不會有第一次中日戰爭（甲午戰爭）和這次中日戰爭，而且日本早已變為黯淡無色的中國殖民地之一。或者已經消滅日本民族與中國民族的區別。至少會消滅其文字而殊於漢文方面發展。為甚麼會如此呢？因為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正處在緊張的貧民暴亂和社會內鬥階段，這將給外部的侵略者以良好機會，而且和十七世紀的德國一樣，外部的侵略者可以在內部找得最可靠的同盟者和內應者。歷史向我們這數千年來有自

驕天性的民族開了這樣一個大玩笑！它竟使我們經歷近一百年的痛苦歷程之後，現在方開始其民族復興和民族解放運動。

我們現在要問：德意志民族還有歷史希望還有它的將來麼？這是我們所迫切想了解的。這不僅因為要對於一個以往的民族被壓迫表示一種公而無私的關切，重要的，尤在想從此取得一種民族復活運動之經驗。

第四章 普魯斯之興起與德意志政治軸心三元化

三十年戰爭之結果，已把德國退化到封建的無政府時代。但如一看這時德國以外的世界，這時實是統一的民族國家爭出時代。德國處這種優勝劣敗情況下要怎樣才能打開一條出路呢？爲了要想挽救一個民族不致滅亡並發展國家生活，本來只有一條道路可走，即打破現狀，消滅一切林立的封建小國，再從其廢墟上建立一個集中鞏固的中央政權，德國的復興和解放始有可能。然而這一可能之實現，又不能用人民革命的方式來達到，因爲在三十年戰爭後的德國沒有可以担負這種革命的社會階段。反之，對於公共事業缺憾守，對於統治深感恐怖，而且於外侮之來，常常和禽獸一般的儼然吃驚，以及在他方面之陽從陰恨的行爲等等，實是三十年戰爭後德國社會各階級之共同天性。因此，德國這時的統一事業，是不能由人民來做骨幹的，必須在諸國之中，選出較強的一國爲中堅，再以其力量以統一其他諸小國，始有可

能。因此，德國復興運動和統一運動，不能不是自上而下的一種開明的專制主義運動。但在三十年戰爭中，既然把在傳統上有統一德國之根基的「神聖羅馬帝國」的勢力給以澈底的摧毀，既然在實際上，已使此帝國既不是「神聖的，又不是羅馬的，更不成其為帝國」，則統一德意志民族的偉業，當然只有與哈布斯家族統治相對的普魯斯來担負。但是要普魯斯來完成這一偉大的民族事業也有極多難以逾越的困難。原因是：普魯斯為一新起之國，它在德國的歷史譜系上在德國人民心目中，尙未獲得為一般人屬望的資格；這是一。第二 如果說，任德意志變為支離破碎的狀況是為德國以外的列強所需要的，那麼，那種欲使德國統一的企圖，甚至就是建立一個統一基礎的企圖，必為德國的敵人所反對，因此，德國內部統一領導權之建立，必不可免的要引起外力的抵制和德國內部各諸侯之明爭暗鬥。這種複雜的鬥爭，甚且有根本毀滅德國統一運動的可能。

三十年戰爭後，德意志民族之復興和統一運動，須以普魯斯為基礎為領導，恰象辛亥革命和經過十數年軍閥戰爭的中國之復興和統一運動，須以廣東為基礎為領導一樣。就德國傳統文化史說，普魯斯之在德國也恰如廣東之在中國一樣，都是屬於文化後起之區，甚且最初都是屬中部殖民地。這就是說，普魯斯和中國的廣東一樣，是受舊有封建文化專制流毒較淺，在國民天性上比南德特別比奧大利人更富朝氣。但如就西歐文化之輸入說，普魯斯又和中國的廣東一樣，對於國外文化之接受都是處於「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地位。還有，恰象廣

東之容易接近南洋和歐美，因而容易發生民族觀念民族誇耀一樣，普魯斯因為接近波羅的海北梅和大西洋，因而使普邦的人民較之其他各邦自身產民族思想和民族倫理觀念。因此，恰好在軍閥戰爭時代的中國，不管北洋軍閥在實力上是如何的強大和跋扈，而復興中國的任務必須放在廣東一樣，在三十年戰爭後的德國，不管奧大利的哈布斯堡族統治如何優越和鞏固，而復興和再建德意志帝國的任務，必須落在普魯斯身上。因為德國的新教徒的諸侯反皇帝鬥爭雖是一種歷史倒退運動，但無論如何，新教徒的諸侯對皇帝的反抗，特別是普魯斯對皇帝的反抗，總啓發了人民之政治自覺和對於新教諸侯之希望。因此，單就政治思想演化趨向說，德國復興也應以新教的普魯斯為最有希望。再就國家的強力說，也只有普魯斯足與奧大利競爭。為甚麼？因為奧大利如果是南方的化身，是舊教諸侯中的盟主，那麼，普魯斯實是北方的化身，實是新教諸侯中領袖。最後我們如果把這兩大強國所領有的土地和所治的國民拿來加以比較，我們尤能看出普國的優點。不錯，奧國的統治是大於普國的。但一奧大利是一個五光十色的嵌鑲物，一個歐洲的雜沓。它沒有堅固性與團結精神。它所治理的人民，一部分是文化極高的民族，如德意志人與上意大利人；一部分是文化較落後的民族，如匈牙利人。它的土地面積也是散漫不堪。西邊伸展到比利時，東邊到意大利，東邊更擴展多腦海。因此，這個國家時常被逼迫只能從事那些沒有民族觀點的世界主義的霸權政策，激起極多的敵人來皮對它。反之，普魯斯，它的人民完全是德意志。它的領土雖小，然而却比較集

中。它的邊界，萊因下流與法國對峙，東方與波蘭和俄國對峙。因之，它在追求一種政策時，不但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且代表德意志利益。

就以上種種比較看來，德意志民族之復興偉業，屬於普魯斯，實有一切演變之必然性。但是，歷史的客觀發展的趨勢，只是歷史演化的一面，歷史演化的他一面還需要人的，特別是天才的努力。馬克思曾經說過：人是歷史戲劇之作者又是其演者。沒有個人和天才的努力，一種偉大的歷史事業，在應完成的頃刻，常常不能完成。這在事業的條件不大成熟時更是如此。因為條件成熟的事業，常人也能加以完成，而在條件不十分成熟的事業，非天才就不足以當此大任。而且一個天才的創作如果尚未達於完成，其繼承者如果沒有較大的能幹，很容易使此種事業中途失敗。這是我們以後講到普魯斯建國運動過程時還要說到的。

德意志再次鼓起民族復興運動之意志，是以普魯斯的大選侯腓特烈威廉開其端倪。有似其他德意志國家成立一樣，普魯斯亦由臨朝的皇族對各領地逐漸併吞而成。不過普魯自從有了腓特烈威廉這位重要君王，他立刻便給這種散漫的土地一個靈魂。普魯自身雖不過是北德一個小邦，但荷享梭德（Hohenzollern）王室却能使之成一強國。關於政府之性質，腓特烈威廉與當日公侯之見解初無相異之處，他亦是想實行「家族政策」，所孜孜以圖者，即擴張其領土以增加其權力。不過所不同者，他有遠大眼光，和嚴格的管理。為求達到國家政策的成功，使其生活與人民無異。他從不浪費金錢，就是較大的宴會亦不舉行。腓特烈威廉在位

時最大的成功，不僅因他的武功和不顧一切的政策使普魯在第一次北歐戰爭中（一六五五——一六六〇）脫離了波蘭對普魯斯的宗主權，重要的，尤在使普魯成爲當日北德勢力最強，治理最好，而又最受人望的一邦。這是德國新教諸國中的領袖國，薩克森選侯國亦望塵莫及的。當時普魯收入達六百九十萬達勒（Taler），而腓特烈威廉自身及其宮庭每年所費不過二萬五千。節省下來的開支，大半移供軍用。因爲不發展即滅亡，似是這個新國度的中心口號。

繼大選候大位者爲腓特烈第一，他於一七〇一年又得到普魯斯國王稱號。他效法其父王之所爲，亦節省開支，提以養兵，並創基金制。因此，在他手上，他創立了一個非常偉大非常精良的常備軍。在行政上，他更建立了一個爲全德模範的行政組織。他是普魯斯第一個有系統的訓練其臣屬服從與遵守法律的統治者。據說「服從」這句話，在三十年戰爭後，這是初次流行於日耳曼的。在此以前，在德意志境內，不過只有一種「準法的無政府」（Legal-anarchy）現象。他雖然是一個殘忍人，但他却是「一個公正的殘忍者」。（a just beast）此外，他更以其餘暇謀普魯經濟生活的發達。他開拓農業，並使自己成爲一個良好的農民和武人。他作了許多關於提高工匠職業標準的事，並鼓勵織物及其他種類的製造。他的生活的箴言就是「勞動」，故一切懶惰者皆懼他。「總之，腓特烈第一是一個奇人，雖同樣是人類產生，但是須要一世紀，甚或一千年才能見到這種人一次。」（W. H. Dawson）

所以普魯斯的基礎，在這位統治者之下已經築下了。不過只待機會一到，普魯斯和德國

的命運即可發生大轉向。

一七四〇年，腓特烈第二繼承普國大寶以來，他算是十八世紀開明專利君主最成功者之一。他在政治司法上面的固執雖不減他父親那樣強健，但其智力遠勝於他的父親。他的統治原理一如他的名言：「國之有君，猶人之有首；爲君者所視所思所行皆應爲整個社會設想。」又說：「國王是國家的第一個奴僕」，「你們無須感謝我；幫助我的不幸的臣屬，是我的職責。」但是，一切專制主義的政治，都是能降低或敗壞國民品格和個性的。腓特烈第二的智力很能見到這弊病。因此，在他統治下，那種長期妨礙普魯斯精神的束縛被他弛了。他鼓勵思想自由；印刷與文學的文稿檢查官的職務被廢除了；任何人都可以根據其良心去思想談話，行動，無人能使他們恐懼。因此，一種新的文藝復興運動由國都逐漸傳播到全國各地。

以人口比例而論，當日歐洲國家養兵之多皆不如普魯斯——蓋二百五十萬人之中有兵士八萬人。此數視與國多六倍，視法國多四倍。普魯斯的軍國主義由「軍曹國王」腓特烈第一立下基礎。他減少募兵用費，而採用國民徵兵制。至腓特烈第二時，普國已養兵至二十萬。普國的軍國主義的教育是不分貧富貴賤的。在全國男子之中，除學童外，皆可徵集。以致當時普國爲父母者俛語其子曰：「勿長大如此之速，否則招兵官將捉汝矣。」在近史上，只有普魯斯可算是古代斯巴達式國家之典型。蓋當十八世紀時代，國際間一切困難問題之解決

既悉賴於戰爭，則國家之重要程度自應以其國所擁有之兵力以爲斷。這尤其就普魯斯所處之地位和所負之歷史任務說，更非有足夠的武力不可。

普魯斯既然在三大雄主領導之下變爲一個新起強邦，它必然要在德意志境內施展其身手，而它向外發展第一步就是奪取韞勒西亞。但是，三十年戰和威斯特法里亞條約之結果，無異承認國外列強對德國干涉之合法。因此德國內部情勢的變更，必然要使有關係的外強參與其中。因之，德國內部紛爭，不能不變爲國際紛爭之導火線。這次戰爭之一方，是普魯斯，它因韞勒西亞第二這樣雄主卽了王位和又取得法國和巴威爲之外援，它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奪取了韞勒西亞。這是一個巨大殷富的省份，是一個可以左右大局的地方，它由奧大利轉入普魯斯，便改變了德國全部勢力分配。法國爲甚麼要援助普魯斯呢？因爲它要去佔領奧屬比利時，並瓜分大而無當的奧大利。戰爭之他一方，當然爲奧大利。但它並不是沒有同盟者，它的同盟者就是英吉利。因爲後者畏懼法國佔有比利時會侵害它的海上霸權。逼一次德意志內部霸權之爭，大致說，普魯斯是取得了勝利。一七四八年亞享和約，奧大利雖然還保持着皇冕，但却失去它從前的優越地位，而普魯斯這時在實力上實在是一個與奧國能並駕齊驅的國家。德國政治軸心，二元化是展開了。

但普魯斯的勝利是由於半途背棄它的同盟者法國達到的。這便立刻給奧國留下一個復仇機會。奧女王瑪利亞，德利撒（Maria Theresia）不久就成立一個俄法奧反對普特烈的大集團。

奧國爲鞏固法俄對它的援助起見，答應將比利時割給法國；而爲酬謝俄國，則以東普魯斯爲贈品。但是，這一次德普魯統的聯盟馬上引起一個外務局勢之大轉變。在前次普奧戰爭中，英國本是站在奧國方面；此時它乃與普魯斯聯合一致。這一次戰爭延長至七年之久。在這一次戰爭中，雖顯出腓特烈爲空前絕後的大將，爲全世所驚訝，然而因爲東方大敵俄國的出現，使普魯斯應獲得的功業卒不獲。一七六二年，俄國退出戰爭漩渦，沒有要求報酬，但普魯斯到底失去了獲得薩克森選侯國以擴大其領土的良機。而結果不得不以暫時只獲得細勒西亞爲滿足。的確，當時如非的俄國突如其來地向普國出兵，在戰爭發生頭一二年內，普魯斯對於奧大利必能獲絕大勝利。果如此，則德國命運的改變必提早許多年。

七年戰爭既終，腓特烈乃以其餘年以統一和整理他的國家。他設法培植森林，改良農業，并修築運河，以排洩低地貯水。此外，他又重整舊有實業，創辦新實業，並設法從外國輸入技師以達此目的。在外交方面，他利用與俄國合作瓜分波蘭的機會，又使他取得西普魯斯。最後，他還組織一個同盟，以保護普國的輿圖並抵抗奧大利。

德意志的政治軸心二元趨勢已經形成，並且它的第二政治軸心較之傳統軸心更富有朝氣。情勢已經證明，如沒有外來的政治變化和人事上的錯誤，德意志是在普魯斯的領導之下迅速完成其民族統一之大業的。但是，實際歷史有出於人意料所不及者。此後歐洲政治風雲之丕變及腓特烈的繼承人之無能，非特未能統一德國並把它從強敵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反

而因爲西鄰所發生的大革命及由此而生的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不僅把德意志各小邦的獨立和領土摧毀無餘，把「神聖羅馬帝國」的名義和實權都加以破壞，甚且把基於君主個人開明而造成的普魯斯的立國基礎和它行將出來統一德國的一線希望亦席捲而去。

德意志民族復興運動和統一運動的偉業至此不得不變爲荷馬詩歌中的皮滾羅皮的刺繡：日間已完成之功，至晚又不得不重新拆去！

第五章 拿破崙戰爭對德意志民族之影響

專制政治，是一切政治制度中最重「得人」的政治呢。如果君主賢明果決，這種政治也許是一種最有效能的政治。反之，這種政治制度又是一切政治制度中最具危險性的制度。自古以來，自中國的韓非李斯等至近代的馬其亞佛利和黑格爾等，在他們的光輝燦爛的專制政治的改編中，雖對此制度的必然性和效能發揮無遺，但對於如何能有賢明君主這問題，却從來不能作較好的解決。這是專制君主制之致命缺點。這特別在專制王國最初形成中，是不能無賢明君主的。因爲在事業的最初形成中，如果出現爲時代所需的英明君主，它必然顯出「人亡政息」的破局。蓋專制政治純系一種才能政治，得其人，便如虎之獲翼；失其人，便如舟之失舵。普魯斯的創造者，自大選侯以來，已經出現了三個偉大的人物，這已經可以說，是一種歷史上的「奇蹟」。這恰如普魯斯之興起是一種奇蹟一樣。但是大腓特烈的後人，都沒

有担任其任務的能力，都是些貪圖逸樂，缺乏判斷，而又充滿虛榮心的君主。因此，自大腓特烈死後，普魯斯最初在腓特烈威廉第二，繼在腓特烈威廉第三統治下，不僅失去許多發展普魯和統一德意志的良機，而且在大腓特烈死後二十年，普魯斯的國家生活的腐敗和一種反對軍人統治的反動，不僅在普魯開始出現，而且在全德國也開始出現。誠然，在大腓特烈長時期統治下，人民各階級皆遭受不幸。大部分的貴族子弟，皆已死亡；許多城市的商人，已被摧殘；農民和一般國民，因過重賦稅而受到損害。但這一切困難雖然嚴重，但還不至於使該邦陷於沒落。然而使得該邦非沒落不可的，却是邦君的懦弱，政治家無才能和責任心。尤重要的，是這個國家對外政策之錯誤，與軍事訓練日趨羸弱。

我們已經說過，自普魯斯大選候以來，德意志政治發展已趨於二元化。因此，從普魯立國政策講，它是應當利用奧國的敵人，在適當的時候給它以致命打擊，始能收德國統一之效。自一七八八年至一七九〇年，乃是奧國的霸權在國內外最為動搖的時代。當時奧國與俄國聯盟同土耳其作戰，想從勝利之中去瓜分土耳其，其結果弄得奧國精疲力絕。同時奧皇在比利時所作的拙劣的改革，已使比利時發生叛變，並且匈牙利亦有發生叛變的危險。至於它的同盟國，俄國，因為要應付南（土耳其）北（瑞典）兩方的戰線和波蘭獨立，已失去任何新的決定之自由。在這個時候，如果普魯斯的君主對奧國能採取堅決的進攻政策，並聯合一切反奧國的勢力以全力作戰，則奧國在德國內的霸權和地位，不僅可以推翻，就是俄國對德國

的支配亦可從此解除。

腓特烈威廉第二並沒有去利用這千載一時的良機，他乃統率他的軍隊去進攻波希米亞，其結果於一七九〇年七月被逼不得不締結賴萊巴哈協定，造成奧土和約，鬆解了奧國的困難。

賴萊巴哈協定之不利於普國，不僅因它證明普國過去之失策，重要的，尤在此協定造成普國新的更大的失策。而此新的最大的失策，則為普奧國籍以反法國大革命。普魯斯權力發展之最大障礙本為奧大利。法蘭西因為比利時問題早為奧國之最大敵人，由法國大革命所造成的法奧對立，本應當是普國出來消滅奧國勢力之最好機會，這應當是當時的普國政治家所當認清的情勢，且應以盡力和最大的勇氣去應付的。但普國當時不如此去決定它的國策。普國以賴萊巴哈協定而開始與奧國謀諒解，至一七九一年八月，普奧更聯合發表贊成恢復法國帝制之宣言。普國與奧國合作反對法國，失策之點有四：（一）忘掉普國發展和德國統一是在堅決地反對奧大利，即忘掉了自大腓特烈以來的傳統國策。（二）奧國反對法國的目的，在實際上，是為防衛它在比利時的領土；而普魯斯反對法國故實在目的如何，並不清楚。因之，它在實際上，是為奧國所領導，並且是為奧國利益作戰；（三）法國為普國反對奧國可資利用的與國，普對法用兵，實失去自己的與國；（四）法國的新改革以及由改革所生出的力量非普奧所能敵，因此，普國對法作戰，既為不度德，又為不量力。

普國政策之錯誤，又不僅使它失去統一德意志之機會，重要的，尤在使全德意志民族變為歐洲列強作戰的戰場，並且由此加深革命的法國和新起的俄國對於德意志民族之支配和宰割。

誠然，爆發於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和它的尊重人權的精神，及國民解放運動的高揚，是給與當時分崩離析的德國民族以強有力的刺激，然而終因為德國自身之不統一和其統治者之謬誤，它不但不能因受此刺激而奮發上達，反而更成為這新生的法蘭西民族之蹂躪對象。

自從一七九一年，普奧聯盟宣言反對法國革命以來，歐洲大陸曾經有過三次反對法國的聯盟，而這三次聯軍作戰，都是以德國為戰場。法國於一七九二年宣佈對普奧聯軍作戰，然而因為它能使最微弱的法國農民及市民充滿公民的熱忱，又因為它能使奇才異能之士得以出露頭角，大顯國民才能，它不僅在短時期內，將普奧聯軍驅出法境之外，而且還將它的勢力伸張到萊茵河彼岸和奧屬尼德蘭。法蘭西當時更預備侵入荷蘭，以武力援助一切樂於推翻舊政的國家。而路易十四對德意志民族的驕矜和野蠻竟在這般以推倒他雕像，殺害其後代，誅除其宗教特權為能事的共和黨人心中復活起來。

法國的勝利，雖有勝利之原因。法國憲法所宣佈之人權，非僅法人之權利，而乃人人之權利。法國的革命黨人不以依照一七八九年之原則改組法國為已足；他們更希望全歐洲發生革命。當戰爭開始之時，法國政府宣言只對各國暴君作戰，而非對人民作戰。當法軍攻入歐

境時，即宜瓦解封建統治，並廢止封建權利和特權。法國的軍隊和革命黨人，視各國市民爲朋友，但特權階級如貴族、僧侶等一律視爲敵人。所有捐稅令富人單獨負擔，而平民一概豁免。因此，當日各國人民，特別是德國人民，大半都贊成革命，而德國許多城市之貴族婦女更戴藍白紅三色帽緩行經過街上以相誇示。自一七九三年萊茵河流域陷於法軍之手以後，萊因斯（Nancy）即設立一個共和國，其人民並自動請求與法國合併。彼等皆希望在法國統治之下來復興德國。一七九四年是決戰的一年，至一七九五年，普魯斯首先被逼要求與法媾和。它現在對於法國合併萊茵左岸不但作任何抵抗，而且要求法國在萊茵右岸幫助它，作它在萊茵下流喪失的地土一種相當賠償。

普國的失策，不僅使它不能代表德意志民族利益，而且反使它首先破壞舊帝國而將它的領土一畝分賣與法國。普國在三年前出征時，是宣言『爲德意志』作先鋒，而現在則負上『出賣德國事件』之惡名。普國之缺少英主和有能力的政治家，由此可見一般，而務先統治的國家之不能顧全民族利益亦由此得到證明。

一七九五年之法普巴塞爾和約已將德意志民族削成兩段。南德意志與奧大利聯合，仍與法國作戰，北德意志則在普魯斯領導之下保守中立。而哈布斯堡族的西班牙亦因被迫簽名於巴塞爾和約。

法國在北方及西班牙既休戰，而調其所有軍隊以對奧，並且自法軍越阿爾卑斯山侵入奧

境直向維也納進發時，奧國因勢力孤弱亦不得不向法求和。議和的結果，皇帝不僅承認法國佔領萊茵河左岸之地，並承認萊茵河右岸賠償問題。這就是說皇帝允許毀滅其帝國。

普奧霸權既遭打擊後，現在就有一個問題發生，及法國所佔領之德意志領土現在歸誰管理？國民會議決定商諸人民，人民在法國代表指導之下，當然決定歸附法蘭西。但法國現在仍是以承繼路易十四以來征服政策的人得勢。他們以為法國領土須擴至自然邊界為止——即萊茵河，阿爾卑斯山及庇里尼斯山。這就是說法國非佔領此等地以後不能停戰。但法國不能無款進行戰事，而巨大的戰費何自出？只好令被佔領國的國民付出。如是法國政府乃訓令萊茵河軍隊總司令道：「軍隊犧牲敵人，固戰爭之一般原則。是故費總司令可利用所有一切方法為貴軍籌措一切可能之供給。至此，為法軍所佔領之德意志各小國，現在不僅變為法國的省份，並且也變為法國政府謀求的外府。然而這還是在一七九八年以前。自一七九九年，拿破崙擊敗新聯盟，令俄皇退出戰爭並驅與人於南德意志以後，此時拿破崙之處分德意志各小邦有似處分鼎肉一樣，拿破崙利用他的武力把巴威，赫爾維西亞（Helvetia），力克立亞（Liguria）及息薩爾賓（Cispina）各共和國完全加以改變。所有這些共和國皆與法國政府結攻守同盟，並強迫各國遇戰事發生時應以所有海陸軍及資財供法國處分。對於德國，拿破崙更毀盡各小邦，教會各邦，自由城市，國家及領主之土地，以賜與德意志重要世俗公侯。以後拿破崙又令這些國家以奉事德意志皇帝之禮以待彼。一句話說完，德意志各小邦現在不過是拿

破崙統治的法蘭西民族之家臣。

自古以來，凡爲求「自力更生」，而去依人籬下，藉分割本國領土，以改造政治生活者，必然失敗，必終變爲外人統治下的犧牲品，革命時代和拿破崙戰爭時代的德意志，可爲最好的證明。須知一切革命，無論是民主革命或社會主義革命，它們是國際性的，同時又是民族性的。國際性云者，是指一切革命首先雖發生在某一族內，但它又可以作爲後進民族未來政治革命之先導。民族性云者，卽一切後進民族在某程度雖可重演先進民族的革命，但這種重演必須是後進民族自己歷史發達之結果，它決定不能是先進民族對後進民族「政治強姦」之結果。

就目前中國政治情形說，我們固堅決主張中國內部各民族須一律平等同時更堅決要求中國應實行民主政治。但我們所要求的平等必須是整個的，決不是部分的平等。同時我們所要求的民主也必須是統一的民主，決不是分裂的民主。部分的平等運動和分裂的民主運動，發自於內者，爲反動，爲破壞國家統一，爲變象的軍閥割據。發自於外者，爲民族陰謀，爲民族侵略，爲帝國主義宰割中國之另一表現。

一八〇五年，奧皇法蘭西斯第一俄皇亞歷山大第一，普王腓特烈威廉第三成立第三次反法聯軍，但旋因俄皇法蘭西斯之破壞，不備奧國被迫求和，失去巴威，瑞士，萊因西部各省領土和三百萬人民變爲三等國，並且連德意志皇帝這一空洞的尊號，亦不得不放棄。至於普國，

因爲那那戰敗之結果，不僅全軍被殲，並且全國亦爲法人所佔領。普王此時不得不退歸到東方邊境，現在一切被法軍所佔領之區，皆宣言與德意志帝國脫離關係，組織萊因同盟，歸附法國，且允戰時出兵六萬，卽對法作戰亦應如此。

一八〇六年，英普俄第三聯盟，因俄皇政策之突然改變，而破裂後，使拿破崙完全降普國爲三等國。法國現在不僅欲佔領中歐，且取易北河以西之地面而盡佔有之。此外法國又把普國西部行省及赫斯創立威斯特發里亞王國和柏格大公國。其國之統治者，先爲拿破崙的兄弟，後爲其妻弟。這時如果不是俄國要在牠與法國之間，需要一個緩衝地帶，法國早已根本消滅普國的存在。

拿破崙對於德意志這樣一個大民族，不但不幫助牠的自然趨向統一的勢力，反而企圖根本勾消其民族獨立運動和統一運動。他所表演的種種暴行，如軍隊連綿不絕的壓境，兵士的暴橫，財政的誅求，軍需和兵士的徵募，警察制度，和對於德人各種自由之束縛，簡直表現他不把德意志民族當作一個民族，而是常做他的奴隸和殖民地，雖然，當法國革命最初發動時，德意志前進的國民是與法國的運動共同前進的！

德意志民族這時所遭受的外族壓迫和侮辱總算達到頂點。一八一三年的萊比錫（Leipsic）解放戰和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總算是德意志民族獲得揚眉吐氣的一天，但因爲一八一五年出席維也納會議的，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一些給大國外交官拭長靴的小邦外交官，在

議會內，遂使當時一些最小的王朝利益都超過最大的民族利益。在這時候，雖有一位前進的政治家斯太因（Stein）一度提議，應在一個強邦權威之下來統一德意志，但因為德意志各小邦君主及外交官對於德國統一咸持反對態度，結果德國統一問題還是暫而未決。其實，要在國際保障之下來統一德國，不但不可能，也非德國以外的列強所願意。所以，結果還是在普奧均勢之下，組織了一個空洞的三十八邦聯盟。這種聯盟，和辛亥革命後，中國軍閥所提倡的聯省自治，如出一轍。其實，德意志這時的各邦君主厭惡民族統一之原因和抗戰前中國各省軍閥厭惡統一之原因完全一樣：都是只知地方利益和一己利益，而不知全國利益和民族利益。

我們研究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德意志民族所遭受的種種壓迫和痛苦時，我們對人類的同情心已使我們不能寬容歷史更加於德意志民族身上這種毀酷了。當時不僅德國以外的列強覺得德國是一個過去了的民族，就是德國本國某些只見到以往而未看見新生的學者也覺得德國是不能從事偉大政治事業的民族。但是，這些論斷是錯了。要知，正因為十八九世紀德意志民族所受的痛苦是太大了，不能忍受了，所以，自十八世紀末以來，在德意志民族內才生出偉大而又蓬勃的民族醒覺和民族復興運動。這種醒覺和復興為以後民族統一開闢勝利道路。這種運動從兩方面表現出來，一方面，表現在某些較進步的國家內之經濟政治改良運動，他方面，表現在德國古時醫學和文學之發達。這兩個運動繼續展開的結果，便造成十九世紀

下學以來德意志民族之偉大。

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雖然傷害了德意志民族的獨立和統一，但它們對於德意志民族之改革運動實盡到巨大作用。我們且不要說到法國在德國所完成的強制的改革：如廢除封建特權，教會特權，撤沒舊教會的土地，驅逐暴君和反動教士，改變德國法制和法典等等，我們單說德意志因法國的壓迫而生的自發改革運動，其成績亦深堪驚人。當戰爭時代，烏登堡之憲政運動，給人民以國會代表權，並宣佈貴族特權之廢除。又爲衛理少邦爲了提高國民教育，特開辦大學，並請萊因哈特、費希特、謝林等作講學運動。再如巴威之教育制度的改革，以及對於經典及新時代的教材之收集。更有與大利軍事制度的大改革，它已知舊法不適用，現在實行『全國皆兵制』，並師取法人的戰略及組織法。奧國雖然是一個最反動的國家，但此時亦不得不給人民以自由，並幫助人民愛國運動。

然而德意志內部改革運動作得最有成績的地方還是普魯斯。普魯斯是當時德國人物志士薈萃之地。它集合了一大羣爲各種事業所需要的人材。政治家如斯泰因、哈登保(Hardenberg)，尼布爾(Niibühr)，艾希渾(Eichorn)，軍事家如沙倫和斯特(Scharnhorst)，布呂協(Blich)，教育家，如洪保德(Humboldt)，費希特，阿倫特(Arndt)都是在普魯斯。腓特烈威廉第三本爲一個庸主，但現在却爲這般人強迫將他變爲一個英雄。因此，普魯斯的改革運動較之其他任何邦爲普遍有基礎。

普國改革運動第一成功，當推土地改革。我們知道，法國的農村封建特權之廢除，是暴力和革命的結果，而普魯斯由於耶拿戰爭的失敗，是完全由上而下的完成了這種改革。並且這種改革後在德國一般的都是用和平方法達到的。這種改革，雖不是怎樣澈底，但一般的統一土地是可以自由買賣，自由出讓，農民也取得了自由，並且在一切職業上，貴族，平民，農民都是公開的。第二種改革運動的成功，當為地方自治。普魯斯的城市和鄉村，超過八百人口者，皆可自治。對於公共事業，更進行了大大的改良，其種類之多，已不能加以詳細的敘述。第三種改革運動的成功，是在沙倫和斯特主持下的軍事改革，實行強迫徵兵制。拿破崙雖限制普國軍隊不得超過四萬二千，但普國却可以將這四萬二千人訓練好以後，又換四萬二千人。在這種軍制改革之下，使普國每個身富力強的男子，皆能為將來的解放事業而奮鬥，在這一時期普邦歷史是以如下的情形為特徵。國民中受過教育的階級和優秀份子對於國事完全立在發勤和督促地位，國王與政府是立在瞻顧和躊躇不決地位，有時且極端頑固妨礙改革運動。然而大致地說，當時德國一切改革運動，雖發自民間覺悟之士的苦召，但在實行時仍然是自上而下的運動。

然而自十八世紀末以來，比之實際改革運動更有影響更富時代精神的運動，還是這時期德國古典哲學和文學運動。這是近代史上，德意志民族最可以誇示於人的運動。我們先說德國古典哲學對於當時和以後的民族復興及統一運動的影響。

黑格爾說，當一個民族的精神過於爲現實的興趣所佔據時，這個民族這時便不能轉而向內，自加反省以發展天理世界內之活動天才，反之，十九世紀上半德國之所以有如斯偉大和蓬勃的哲學運動者，即因爲德國在實際上之落後於人。所以，黑氏說：「歷史昭示我們，甚至到別的家裏中，哲學已名存而實亡，而在德國哲學就繼續增長，爲各民族之特殊財產」。而十九世紀上半，德意志民族亦確爲近世哲學運動之偉大的繼承者和衛護者。

德國古典哲學運動，誠爲馬克思所云，是十九世紀德意志民族一種可以自負的覺醒運動。這在歷史的天國上，任何民族還未有過先例，今後恐也沒有能及的。爲甚麼？因爲十九世紀上半德意志民族在實際上雖未參與近代諸民族之革命，但却參與改革。這就是說，十九世紀上半，德意志民族雖在實際生活上，特別是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上不是近代的，但在精神生活上都是近代的。所以，馬克思又說：古代諸國的人民是在其想像中，即神話之中，經驗了他們的前史，同樣的，我們德國人，却在其思想之中，即哲學之中，經驗了我們的後史。德意志人不是現代歷史之同時代的人，而是現代哲學之同時代的人。然而最值得我們驚異的，就是德國古典哲學，它並不是僅只籠統的指出德國須由中古走向近代，尤在它更進一步地能指出以後德國歷史發展具體的道路和步驟。

德國古典哲學最大的價值，不是如一般人所說，是在它的理想主義，而是在它的主觀與歷史客觀之充分的契合。恰像上帝按自己的意志創造世界一樣，德意志人是從他們的哲學之

醒覺中產生一個真實國家。

我們現在因為文章的篇幅關係，不欲來敘說康德以來的德國諸大哲人的政治哲學，我們也不能來敘說，費希特的活動和他的主張是怎樣為德意志所必需。我現在只想一敘說為唯心哲人後殿的黑格爾對於德國的政治見解和它與德意志民族運動之關係。黑格爾對於德國政治一個最主要的觀點，就在他和費希特一樣，認德意志民族衰弱之主因，是由於德國之分裂，分散了民族精力。費希特因說過：數百年來同一民族中所發生之種種不幸，皆由於彼疆此界之分化來也。雖然在民族病症之診斷上，黑格爾與費希特是一樣的，但在醫治此病症之方法上，黑格爾却比費希特更進步。費希特看重的是教育，但黑格爾却認為不是單純的教育所能收效的。

黑格爾說，德意志自威斯特發里亞和約以來已不復是一個國家，它不過是個徒具政府的無政府耳。德意志在現在只有在對於過去之記憶上，在風俗和一般的文化上是一個民族，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已不成其為一個民族。雖然統一德意志，是於各方面皆有利益，而德意志各邦小王朝却反對這種統一。但是怎樣來消滅這些不顧民族利益的小王朝呢？和當時的法國一樣，由人民來一個大革命麼？不能，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發達和意識醒覺之結果，而在當時的德國，人民雖有時表示對封建主義之不滿，但「人民絕不知道他們的意向如何」。而且從政治制度發展程序說，民族統一運動第一步，是由和封建領主作鬥爭的集中王權來實現的，

決不是由一盤散沙的人民革命所能實現。在此時大呼自由與革命口號，其結果，只是幫助無法無天的封建主義和回復到中世紀日耳曼森林中野豬式的自由去。所以從黑格爾看來，德國的將一是應當由一個雄主出世用征服手腕來實現。但是，十九世紀不是和十七八世紀一樣，是專制主義盛行時代，而是民主潮流盛行時代。因此，德意志之統一不能為專制政治建立基礎再引起推翻此種政制之革命，而是應當為立憲政治開闢道路，以謀德國政治永遠安定和不搖。十九世紀下半，德意志政治生活之發展完全證明黑氏意見之正確。

在十九世紀上半，英法甚至德國都盛行自由放任思想，並且在英法，自由之勝利，即在專制國家之推翻和國家技能之縮小。但黑格爾完全有另一種看法。他認為德國人民之自由是絕對不能在一種徒具民主形式的紛亂政府中所能求得的，反之，他認為只有在一個強有力的集中主權統治之下，德意志人始能獲得他們需要的自由。這就是說，真正的自由，只有統一的民族國家內始有取得的可能。沒有統一集中的國家，所謂自由，只是德意志諸侯放肆之代名辭。

我們試把十九世紀下半德意志的國家生活一想，我們不僅要承認十九世紀上半德意志舊人政治認識之先見，並且對於他們所持的根本原理「觀念產生事物」這一見解，亦只好讓步承認它在德意志環境內是有其正確性的。

至於說到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上半德意志文學運動，那就更可以看出德意志民族精神

之奮飛。這時候的德意志文學運動，彷彿是在長久冬眠之後的萬象突然達到陽春一樣。民族之光明和新生現象在文學裏面被強調化了。文學與哲學之金翼之均衡的發達，已經使這個民族飛翔到理想的天空裏。但是德意志的偉大文學家和牠的偉大哲學家一樣，他們雖使同時代的德意志人在快樂的薔薇色的光輝中看着他們的未來，但他們却審慎地做到使這一任務之完成不與任何空想主義發生關係。

這時代的德意志文學運動最成功的地方，就在它不是一味模倣同時代的英法文學，而是把它能抓住德意志民族之本身靈魂而反映之而光大之然同時不排他人之長。自德意志第一個大詩人提出「一個自尊的青年作家，應該由現代史或他的祖國史採取材料」這一原則以來，這時期德意志一切最上乘的文學作品無一部不是這新穎民族的精神反映。舉凡這一民族的現狀，忍受，意志，謀和應取的人生態度都被同時代的文學用最藝術最盡善盡美的方法表現出來。這時期的德國文學，並不是以純粹藝術為目的，而是當時這個民族之活躍的教育工具和教化的範型。換句話，這時期的德國文學是具有優越的道德性質政論性質和人生理想目的。克羅漢斯托克（Klopsch）、萊辛（Lessing）和哥德不是如同時代的法國人一樣，以單純的破壞古典反抗傳統為滿足的，反之，他們和德國古典型人一樣，他們是把他希望安放在貴族之自我反省和市民階級之昂揚相契合這一點上。這種生活的典範就是哥德的浮士德。哥德說：「我們所知道的，祇有我知識：一切說出來的話都是不能夠收效的，徒然喚起反抗

中斷和停止。」試問不認識德國古典文學精神的中國的批評家！哥德這種說明是證明他自己的人格生問題麼？否，否。哥德這種說明，乃是證明這德意志文學家追求更充實更豐富人生表現，人生之最高真理不是逞一己意志，而是在尋求比自己強大而且可以克制自己的真宰。從這一出發點說，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上半德意志古典文學是盡了牠的時代之偉大任務的。所以德意志偉大的社會主義者拉薩爾對德國古典文學論說道：德意志國民是在他們的文學精神統一之中，看出他們自身的精神統一的担保，並且也看見國民興盛的佐證。事實上，十九世紀上半以來，德意志民族之光輝的復興運動和統一運動，差不多都由德國的古典文學啓示出來的。

就某一點說，十九世紀上半德意志各邦改良運動和古典學術運動，是與中國近代史上的維新變法運動是同一歷史性質的運動。斯太因和黑格爾或康有為和梁啟超等，都不是出身於鬥爭的資產階級之中，而是出身於覺悟的貴族和士大夫之中。因為他們所生的時代，有一最共同的特點，就是當時都是有迫切的資產階級歷史改革之必要，然而却無担負此種改革任務的資產階級之出現。斯太因和黑格爾或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他們都是希望他們的民族變為一個近代民族，但他們都一致主張，這一目的之達到，不是革命，而是君主立憲運動。因為康有為和梁啟超等對中國問題的觀察正和黑格爾對德國的觀察一樣。在康梁看來，憲政與自由確是振興當時腐化的中國民族之良策，但憲政及自由運動，如果與國家統一和自上而下

的改良運動分離，則憲政與自由兩口號便必然為破壞民族統一的割據勢力所利用。反之，統一雖為當時中國所必需，但如果這種統一，不是憲政的統一不是使人民有自由的統一，而是要一切人皆同化於腐化的統一，則這種統一一定不能保持長久，並且必然要為割據軍閥開闢道路。康梁變法運動是失敗了。但這種失敗，實在是事實無可如何的失敗，決非觀察的失敗。

第六章 一八四八年革命與統一問題

在歷史上，一種偉大的歷史任務之提出，並不是常常與客觀的歷史條件相符合的。在某些地方，即在那些自己的歷史發展立在先進和模範地位的民族內，一個偉大的歷史理想之提出，常常是在能夠實現這一偉大任務的客觀條件已經出現之後。在這裏，民族之偉大任務不僅可以實現，並且只有在實現之機會已經呈現後，任務才能發生。這就說，果子已經成熟在樹上，只待伸手去摘取。反之，在另一些地方，即在受先進民族社會變革影響而生出思想躍進的後進民族內，當一個受人贊美的偉大的任務被提出時，它不僅缺乏實現任務的社會條件，而且連解決任務的歷史方向亦未明白顯現。因之，在這種民族內，民族任務之提出，不但不能有滿意的解決，而且會生出無限的不幸和悲慘來。這種不幸和悲慘只有用流產來比擬。

誠然，一個先進民族內部所發生的革命運動，對於後進民族，特別是對於為其近鄰的後

進民族的國民覺悟上，是有極大的推動作用的，但同時這種推動也就隨混亂後進民族歷史運動之步驟，使這種運動歸於失敗。

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就是一個半爲先進民族的歷史變革所激發的歷史運動。在十九世紀上半，法國三次革命，對於一八四八年前後的德國立在推進和被模倣地位，恰象二十世紀俄國兩次革命，對於一九二七年前後的中國是立在推進和被模倣的地位一樣。雖然十九世紀上半法國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論能在同時期的德國再版，改變德國人的頭腦和思想，但因爲同時期的法國的社會條件不能任意搬運至德國的原故，却不能在同時期內改變德國的實際社會和政治。因之，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不能不是一個無結果的革命，不能不是一個失敗的革命。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中心任務本來是國家統一，但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結果，不但未完成這一中心任務，而且連完成這一任務的道路也沒有認識出。因之，這一革命對於德國以後的歷史運動，甚至對於德國以外的歷史運動雖有重大意義，但對於一八四八年的德國，是完全失敗了。

一個民族的經濟發展的程度，是其政治生活之基礎。因此，要說明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這一幕悲喜劇，最好先來研究一下一八四八年前夕德國經濟發展一般的情況。當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夕，普魯斯的城市居民人數只佔全人口百分之二八。而爲普魯首都的柏林，其居民亦

僅三十萬。在商工業最發達的薩克森邦，城市居民僅達全人口百分之三四。在奧大利境壤。這裏的城市人口雖佔全人口百分之二八，但在這數目裏面有百分之二〇的城市居民仍然是從事農業經濟的。這時期德國工業之落後，可由德國行會勢力之強大得到說明。當時無論是在普魯斯或奧大利，有權從事工業活動的人只有這種人，即從行會條規中取得老板稱謂的人。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四五七，三六五個老板，只僱有三八四，七八三個師傅和學徒；在七八，〇〇〇個工廠企業中，只有五五〇，〇〇〇個工人。工業的經營是完全在行會支配之下，就是企業家所用的人數，所用的材料，和所生產的數量，都要由企業家以外的行會來規定。

機器工業在四十年代以前剛在開始的階段，一八三七年，全普魯斯，包括萊因河南岸煤區，以及薩爾與上細勒西亞各礦區，共有七千五百馬力；至一八四六年，始增至二萬二千馬力。在奧大利，一八四一年，只有二三個汽機，且半數是在奧國本部以外。至於鐵道建築，至一八四〇年，僅長五四〇甚羅米突。

反之，一看這時期的德國貿易。一八三〇年，德國對外貿易的總值為六六〇百萬馬克，至一八四〇年始增至一，二二〇百萬馬克。這個數字不僅說明德國對外貿易的程度，而且也說明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高度。

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夕，德國經濟發展是如此，它的國家制度和政治生活又如何？自維也

納會議以後，德國還有四十一個小邦。這四十一個小邦，後來雖有幾個被消滅，然而終存留有三十六邦。在這三十六邦之內，除了普奧兩強邦外，還有英王領有的漢諾威，尼德蘭王領有的薩克森大公國及施堡 (Lüneburg)，丹麥國王領有好斯敦 (Holstein) 與洛因堡 (Lauenburg) 諸公國。這就是說，傳統所造成的紛亂局面，不僅讓其存在，並且還加了一層國障保障。自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一九年，憲法本被介紹到幾個較小國家，如巴登，巴威，韋登堡，及薩克森威瑪等國，但後來又被普魯斯與奧大利的統治者將其收回，以給與領導為代替。因此，三十多年以來，任何民衆運動皆為各邦統治者所澈底反對。在德國的著作家，如費希特那樣名貴的「告德意志國民書」發表之時，也就成為他變為罪人的時候。

這些小王侯，可不僅保有獨立的統治權，獨立的駐外使節，獨立的關稅制度，而且還保有獨立的度量衡和貨幣制度。一八〇〇年，易北河之貨物由漢堡運往馬得堡者，須納十四次關稅；其由漢堡經萊茵河運往美因斯者，須付三十三次關稅。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描寫當時德國分裂情形道：「德國有三十八道稅關，妨害國內商品的流通，一如人身上每一血管有意的與別的血管隔開，不許血液由一血管流入別一血管一樣。假使由漢堡要與奧大利或者柏林與瑞士經商，則商人須經過十個國家，要研究十種完稅制度，和需要十次的納稅。誰要是不幸住在三四國交界的地方時，那麼，他就要在這些國家的互相仇視的收稅吏中間渡過一生。」

至於德國貨幣制度的複雜，尤爲不合理至極。各邦都有各邦的貨幣單位，各邦都有各邦的小錢和輔幣。商業流通，至感不便，而德國銀行之大宗事業，卽爲計算此種紊亂之兌換，而從中取利。

這樣一個支離破碎統治林立和五花雜湊的民族，要想謀得民族之政治統一，本來只有一條道路可走，卽走武力的道路，亦卽由一邦去征服其他各邦的道路。這是亨利第七在英國所走的道路，路易十一在法國所走的道路，斐迪南在西班牙所走的道路，諾曼王朝在俄國所走的道路。但是，德國現在要走這一條道路也不是容易的事。這是因爲自革命戰爭以來，特別自解放戰爭以來，德國的國民，特別是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早已不願忍受專制主義的壓迫。他們已經吸慣了法國的自由空氣，而對於德國的專制王侯已深惡痛絕。因此，在德意志各邦中，誰如欲統一德意志，必先要對自由主義讓步，並必須有最大勇氣實行憲政，至少應實行開明的專制主義。不然，人民將視戰爭爲專制魔王的表現。因之，他們不但加以擁護，且容易使他們同情弱者去反對強者。

當維也納會議以後，在德意志能夠走這一道路並曾經想走這一道路的，當然只有普魯斯。然而不幸的，就是爲普魯斯君主，並不是大腓特烈式的雄主，而是腓特烈威廉第三這一既反動而又懦弱的昏君。腓特烈威廉第三實是德意志之最大罪人。自維也納會議以來，他不僅

在對外政策上服從反動的奧大利領導，而且在對內政策上，也是追隨在奧大利的梅特涅政策之後。本來自一八〇七年起，普國政治最令人尊敬的地方，即在新舊兩種勢力之聯合一致。這是德國古典哲學家之最高理想，也是斯太因哈登堡等所要實現的最大任務。腓特烈自己在一八一五年會公開允許普國應有一個包括全邦的議會，又於一八二〇年頒佈不得國會全體之同意不能發行新國債之法律。但他自此後，永不想實現這種允許。因此，遂將普國進入立憲政治的允許，展延了一整個世紀，而對於他的人民及其自身，皆給以一種極端可怕的結果。普魯斯不能創造一個適合歷史需要的憲法，不能做德意志各邦模範，甚至使普國元老布呂協也不能提出如下的埋怨：「爲甚麼巴威和別邦要上我們的前？我們覺得，必須要頒佈一種憲法」。然而普邦自一八一五年以來其政策不但不能符合有力的元老所期許，而且自一八三〇年巴黎七月革命發生以後，在全德意志一種反抗民主運動與自由思想的新十字軍完全被組織起來。印刷法規與文稿檢查官愈變爲無道理，大學校自由主義的影響已被洗清，許多教授已被開除，數百激昂的學生或被羞辱驅遣或被逐出國境。除此而外，在德意志皇帝與各王之間還有一種持續的鬥爭，這些鬥爭絲毫不是爲了人民，完全是爲他們自身利害打算。

這樣看來，要想這樣一些完全違犯人民意見迫害人民的小暴君和小王朝來統一德意志簡直是一種夢想。

但是，在一八四八年前夕，走君主統一的道路，既然因人事關係，陷於不可能，那麼，

它是否能走人民革命的道路，以實現國家統一呢？

一個國家的階級結構，是測驗一個國家的革命力量之最精確的寒暑表。那麼，革命前德國各階級間力量 and 比重怎樣呢？

據恩格斯說，在一八四八年前夕，德國的社會階級的結構比別國特別複雜。封建制度在英法是早已被摧毀了，而在德國雖因耶拿戰敗關係，各邦都有過自上而下的改良，但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在奧大利，貴族的保存着由古代承襲下來的大部分的特權。佃租的封建關係盛行於各地，地主仍有審判佃戶之權。這種貴族地主在當時頗其衆多，一部分且極富裕，且資本家化。一般人都公認他們是國內頭等等級。他們担任政府高級職位，軍隊中的長官也差不多完全是由他們充當。

除了貴族，當然要說到德國資產階級。雖然一八四八年前德國資產階級是比較富有階級，但其富有之程度遠不及當時英法資產階級。英國中等階級自一六八八年即已享有政治統治權，法國資產階級自一七八九年已達奪取政權之成功，唯有德國資產階級，因為數量上之缺乏，特別是集中數量的缺乏，完全不能達到政治統治之目的。雖然自一八一五年以來，德國資產階級的財富及與財富相伴的政治上的重要性不斷的增長，並且因為英法自由思想之瀰漫，已將他們昇到現存政府之反對派地位，但要和英法資產階級一樣，直接來掌握政權，不但尙未其時，並且也非他們力所能爲。

除了資產階級，就要說到德國小資產階級。在一八四八年前後所發生的一切鬥爭中，雖然這一階級的態度常左右勝負，但因它所需的地位是在大資本家，商業家和工業家，即一般所謂資產階級與工業無產階級的中間，它的性格永遠是動搖不定的。這一階級的政治要求，首先是想限制官僚政治去減少國家費用，並想將主要捐稅加在大地主和資本家身上。此外，他們更進而要求藉公共信用組織和取締盤剝重利的法律去剷除大資本家。這是它對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態度。至於它對於其下面的無產階級，它就自視爲其天然的領袖，不願他們發展爲獨立的運動。倘使無產階級企圖獨立運動時，他們便陷于垂頭喪氣的狀態中。

至於德國的工人階級的政治及社會的發展，比英法同樣爲落後，有如德國的資產階級之於英法資產階級。有相似的主人，就有相似的奴僕。德國工人階級並不是受僱於近代產業大王，而是受僱於小手工業者。因此，在沒有集中強大和人數衆多的資產階級出世以前，當然也難能產一集中強大和人數衆多的無產階級，並且在近代各民族內，在資產階級各派，特別是其進步的一派，即大工業家，未取得政權和依其需要以改造國家制度以前，工人階級運動永遠不是獨立的。因之，工人階級運動，也永遠不是純粹無產階級性的運動。因此，希望由工人階級來担负國家改造任務，更不可能。

最後，我們要說到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夜農民階級的力量。當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夜，德國已經沒有所謂整個的農民階級。他們之間，有極殷實的富農，有小自耕農，有封建佃農，最

後還有極大的農業無產階級。後一農民層之衆多，完全是由於大陸民族封建性和大工業不發達所致。一八四八年前，德國農民既如此複雜，而利益又不一致，復因爲居住散漫關係，要想他們成爲大規模的政治勢力，當然不可能。

講完了德國社會各階級之後，我們要說到德國智識分子，特別是大學生。這般智識分子，不僅是十八世紀以來教育發達之結果，並且也是受了西歐文化和法國大革命影響之結果。他們是國民中最優秀的分子，也是國民中最急進的分子，然正因爲他們是國民中最優秀的分子和最急進的分子，所以他們的見解和抱負每每不爲多數人所了解，而他們的行動，也每每容易陷於孤立地位。

總上所述，一八四八年前，德國的階級結構之不利於德國革命，正和一九二七年前，中國的階級結構之不利於中國革命一樣。一八四八年前德國各階級所受的痛苦和一九二七年前中國各階級所受的痛苦一樣，不僅因爲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並且因它的發展不足，因爲這時除近代的窮迫狀況壓迫着各階級外，還有整個一系列的遺傳下來的窮迫狀況的壓迫。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各階級爲死的所苦，並不少於爲活的所苦。

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之失敗和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之失敗一樣，它們之所以失敗，不僅由新舊社會階級的矛盾太不發展，並且也由新舊社會階級之間的矛盾太過於發展。它們誠如馬克思所形容，在沒有發揮自己階段之寬大本質以前，就早已發揮自己階級之狹隘本質；在

未克服與自己階級對立的障礙，就先展開自己階級的障礙；在還未慶祝自階級勝利，就已經險到自階級的敗北，而其結果，甚至要完成一個大任務的機會尚未出現以前，就早已過去了。於是，各階級在剛要與其上層階級開始鬥爭時，就被捲入和其下層階級的鬥爭中。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和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一樣，都是在一個共同勝利尚未取得前，革命營壘中就立刻開始新的階級分化和火併。因而使整個革命發生挫折。

一八四八年法國二月革命發生之後，法蘭西的雄雞的高鳴立刻便喚起全德國的騷動。資產階級忙着利用他們的實力和輿論勢力威脅各邦君主向他們宣佈立憲，實行自由內閣。工人階級和英勇的學生青年忙着給各邦反動政府以武力打擊。農民，特別是南德的農民忙着劃除鄉村封建關係。至於爲奧大利所壓迫的弱小民族，他們更乘機忙着爭求民族之自由和獨立。並且當奧大利反動的魯多星梅特涅逃出德國和腓特烈威廉第四爲人民所「保護」後，左右全德國大局的維也納和柏林政府已離然放在民衆監督之下，改爲自由內閣。至於中部各小邦，因爲抵抗力較小，更早已爲人民所屈服，或者宣佈立憲，或者認自由爲政治統治之最高原則。「自由」，「平等」，「立憲」，「責任內閣」的呼聲響遍全德國，德國現在是置身在革命的風暴中了。革命之神不僅降臨着它並且主宰着它。

但是革命雖因外部影響像閃電般來到德國，然畢竟因爲內在條件不成熟和階級結構之不利於革命關係，它也不得不閃電一般離開德國。李卜克內西說得對：「三月革命是勝利了，

三月革命是失敗了。勝利的地方是：軍隊被擊散，貴族被破壞，政府被推翻，君主為人民所制。失敗的地方是：人民制勝了他們的仇敵，但沒有毀滅他們的武裝，沒有驅逐他們離開巢穴，致使他們有轉敗為勝的可能。人民為甚麼不在制勝其仇敵之後，毀滅他們的武裝，驅逐其離巢穴，反而使敵人轉敗為勝之可能呢？這決不是一時戰略的失誤，言是有更深遠的歷史原因。而為其原因，當為以下三點：第一，是如我們所述，革命前德國社會階級的結構太不利於革命的深入和發展。當時革命營壘中階級矛盾太厲害。這是因德國革命是在十九世紀文明條條之下發生的，它有比十七世紀英國革命和十八世紀法國革命時更為發達的無產階級。因之，在革命一開始，各階級都把他們的手槍放在袋子裏，手指放在發動機上，並且很小心各自保存自己的同盟者，因此，只要他們覺得他們的同盟者，少微有點過分的要​​求和行動，立刻便引起他們之間一番新撕殺。其結果，使反動派更為鞏固。因為反動派深知他們的反動是為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富農反對貧農和農業無產階級所必需的。

第二，是因為一八四八年的德國和一九二七年的中國一樣，國內沒有如倫敦和巴黎那樣的中心都市，以決定全國最重大的問題。因之，各邦人民不得不耗費鉅量的流血和能力去進行重複的鬥爭，去解決同樣的爭論。而且凡是在城市散漫的地方，行動亦不易取得一致。因此，鬥爭的耗費雖甚大，但都得不着重大結果。

第三，這是革命失敗之最大的原因，即一八四八年革命，它不是和一七八九九年法國革命

一樣，是以推翻專制和特權爲中心任務的，也不是如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一樣，是以土地革命爲中心任務的，它是和同時期的意大利革命及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一樣，它是以國家統一爲中心任務的。但是，這一任務之完成，並不是各邦之部分勝利所能收效的，它必須以一邦去征服其他各邦。在一個支離破碎的民族內，想完成國家統一，儘管完成的階級可以不同，但完成的道路只能有一條，即須有一強邦能支持較長期的戰鬥，去統一其他各邦。倘使這一層做不到，則所謂國家統一之完成，就根本不可能。

不錯，當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在維也納和柏林及其他各地得到勝利之後，當時奧大利和普魯斯除從叛亂勝利者的手中接受一種憲法外，確然在弗蘭克福特 (Frankfurt) 曾召集了一個代表全德國的國民會議。這一國民會議確然是德意志統一運動的象徵。這是表明德意志的分裂確是爲了各小王朝利益，而統一確是代表全德意志國民利益和民族利益。但是，在一切革命運動之中，甚至就是和平時期，議會的力量並不是建築在議會自身，而是必須建築在議會以外的國民力量上。在一個有集中首都的民族內，革命一旦發生，則代表全國人民的議會，便爲全國人民的力量，首先是爲首都人民的力量所支持，並且在某種情形之下，並須有革命的武裝力量來支持，只有這樣，爲全國人民代表機關的國民會議才是有力量的。復次，如果革命發生是在未統一的民族內，議會雖未能獲得全國人民的力量來支持它，但只要它是與這一民族內某一具有改革政治和統一民族大志的強邦的政策相符合，於是它由這強邦的勢力來

支持，並且此種非是以它做號召來反對其他違犯人民要求的各小邦的，則議會亦可以成爲有實力的組織。如果議會於這兩種支持力一種也不能獲得，那麼，不啻這議會內的代表是怎樣優秀，而它的議論是怎樣急進，結果它不能不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空洞機關。而一八四八年開會於德國美因河畔弗蘭克佛特的德國國民會議，不多不少就是這樣一個機關。它本爲全德優秀分子之集合體，但在表現上只是一老嫗的集會。它自身本是德國統一運動的基礎和靈魂，但結果反成爲德國各邦互爲陰謀和私鬥的目標。它本爲全德國最高立法機關，和有改變全國政治的全權，但結果它只表現它是一個空中樓閣。最後，當它的經過長時期慎重討論的條文付諸實行時，它自己不能不得出如下的結論：

莊嚴神聖的德國統一思想，在實行的時候，遇着了障礙。

弗蘭克佛特集會的國民會議的議員們，他們既然認出他們自己不是一七八九年的法國三級會議，他們當然也不想把德國變爲一個共和國，把皇帝變爲總統，因此，他們不能不把他們的「莊嚴神聖的德國統一的思想」寄放在某一有統一德國可能的一個強邦的君主身上。但是，這一君主是誰呢？當曾經爆發了然而現在又掙扎回到鞏固地位的奧大利在新相斯瓦爾堡（Schwarzenburg）領導下以極強硬的通牒給弗蘭克佛特國會，堅持不僅與屬德意志領土須加入聯邦，並且連奧屬匈牙利，朗巴德，哥羅西亞等處領土亦須加入聯邦，並以堅決態度反對議會內大多數意見時，則這一頂由人民奉獻的統一的德意志的帝國冠冕當然只能給普魯斯

。但是普魯斯王腓特烈威廉第四，當他昂頭看了一看德意志的政治風雲時，他却不願意自由派手裏接受這個人民冠冕。他爲甚麼不願接受呢？因爲普國不願與奧國作戰，不願與民主勢力聯盟，尤不願向民主勢力讓步，去年取德意志統一運動領導權。因爲這種聯盟和讓步的結果，一定會使以後的普國採取嚴格的國會制度。這是普魯斯的官僚和貴族所不能忍受的。普王這種見解，再加以反動的貴族黨，卽十字黨人之推波助瀾，結果竟成事實。

我們看見並且認識他的影子，他因爲胆法才有這種拒絕。

因此，不僅德意的立憲運動爲恢復其鎮定與自信的諸王侯所消滅，就是德意志的民族統一運動至法又不能不遭受失敗。各邦已經死滅了的獨裁政治又復活躍，帝國會議亦於此時恢復其地位，普魯斯與奧大利及其他各邦不名譽的鬥爭又復開始，國民會議不僅成爲空中樓閣，而且被反動專制的暴力所解散。於是各邦反動統治者爲了要證明不是革命取得了最後勝利，而是他們取得了最後勝利，他們便應用超過一切殘忍的方法以鎮壓一度爲革命所激起的國民大眾。

一八四八年，資產階級革命是失敗了。失敗之原因，是因爲這個革命並不是造成資產階級統治條件的運動。而是造成資產階級財產發展條件的運動。一八四八年，小資產階級革命也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因爲這個革命並不是要造成小產階級專政，而是應當造成統一的

主權之開明專政。一八四八年，無產階級革命更失敗了。失敗之原因，是因爲一八四八年革命不是要造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之勝利，而是要造成無產階級革命前提的資本主義勝利。一八四八年整個革命是失敗了。失敗之主因，就是因爲國民不集中，各階級的利益太不一致，不能完成民族統一。

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失敗也自有其重要之效果。這效果在甚麼地方呢？就在這個失敗的革命反將德國國家統一問題弄得更簡單明白了。德國今後統一運動，是不能由任何一個有革命必要的階級按自己的階級意志完成的。它不能由德國資產階級來完成，因爲資產階級力量薄弱和它懼怕無產階級之結果，使它完全沒有進行澈底革命的勇氣。它也不能由無產階級來完成，因爲幼稚的無產階級不但沒有完成此革命的力量，而且當它欲來實現其企圖時，它不僅要遇到現存統治階級的反對，而且要受到被壓迫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反對。因此德國統一所能走的唯一的道路，自然的征服道路，即由一邦以鐵血手段征服其他各邦以統一國家的道路。

但是，要德國走上這一道路，也大非容易，至少必須具備以下九種條件或準備：（一）他必須有進一步的經濟發展，這種發展將迫使全國人民，特別是資產階級，皆感到德國統一是一分鐘也不能延遲的，甚至感到統一較自由和民主都爲重要；（二）必須有一邦不僅要在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上比各邦較爲優越，重要的，尤在這一邦在必要時，敢於施行最大的

政治改革，實行衆望所歸的憲政；（三）統一運動，既然在國內須消滅各種割據勢力之反抗並抑制利害不同的各階級間之對立和磨擦，在國外又須排除列強間的反對與陰謀，因之，在這運動中，就不能不有一位能够應付險阻和具有鬥爭精神的偉大人物，即一位精敏強幹的世界控制者。前兩條件可以說，是客觀的，後者完全是主觀的，並且能否具備這一條件，大半要靠命運之神的好感。

現在我們試來看一八四八年革命後德意志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及其與統一之關係。

第七章 六十年代的經濟發展和統一問題之再提出

一八四八年歐洲大陸的革命劇已經開幕了。在革命的大風暴之前的「過去的權力者」，又成爲「現在的權力者」了。馬克思恩格斯當時因爲還不相信這次革命已經完全失敗，所以他們在一八五〇年三月致德國共產主義聯盟的信上還說德國不久的將來要發生更大的革命，即他們所提出的不斷革命（註一）。但是，德國的不斷革命到底沒有發生，不特如此，就是馬克思在一八五六還抱着希望的並且認爲「整個德國的事情，將決定於這一可能」的「第二次農民戰爭」（註二），結果也還是未曾發生。德國這以後，非但未發生農民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以動搖當時的貴族地主階級的統治，而且完全相反，自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後，德國經濟生活之空前的發達反而鞏固了貴族地主階級對人民之統治。

註一：見一八五〇年三月倫敦中央委會致共產主義者聯盟信。

註二：見一八五六年八月十六日馬克思致恩格斯信。

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運動是失敗了。但是，政治革命的失敗，並不阻礙經濟革命之成功，倒是相反，自一八五〇年起至一八七〇年止，這時期是德國資本主義突飛猛進時期。由於這時期的德國資本主義之突飛猛進地發達，才把德國統一問題變為刻不容緩的緊張問題，變為此時期內德國政治鬥爭的中心問題。

我們試看此時期內因經濟發展所引起的人口比例的變化。這時德國的人口比例是：農業人口佔百分之五一；工業人口佔百分之三一；商業人口佔百分之六；服務於教育，官吏，和軍隊中者共佔百分之十。從人口數字之表面看來，德國這時還是一農業國，然而就這時期德國經濟發展之內容和傾向說，它已完全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並且其發展之迅速，為同時代任何國家所不及。

由人口比重之表面看來，德國此時是以農業人口佔多數，但從內容說，德國的農業不僅比東歐諸國進步，甚且比大革命後的法國農業還要進步，十九世紀的德國農村經濟是以大農經濟為特徵的。當十九世紀上半，在德國佔有六十畝土地的為中等經濟；佔有六〇〇畝以上土地的在全部所有者之中佔百分之〇、八二；佔三〇〇畝到六〇〇畝者佔全部所有者百分之〇、七五；佔三〇畝到三〇〇畝者，佔全部所有者百分之二〇；佔五畝至三〇畝者，佔全部所有者

百分之二九、六；佔五畝以下者，爲百分之四八、七。由此可知，德國土地之大部是爲大地主所佔有。

大農制究有何優點呢？第一，它能利用農村經濟技術發明之成果；第二它容易使土地改良，以增加收穫。在細勒西亞，一個大地主的收入，一八三一至一八四八年爲一一八、一一八馬克；一八五八至一八六〇年已增至一五七、三五二馬克；一八六一至一八七〇年後增至一九九、八七六馬克。很顯然的，大農經濟之順利的發展，如何鞏固了德國大地主階級社會勢力之優越，甚且也提高了這一階級在統一運動中之統治作用。因爲在資本主義發展之中，地主階級的勢力，不但未減小，而且在各方面反而增大，這是十九世紀德國社會發展之最大特徵。

德國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在五十和二十年代也是空前的繁榮。南德是棉織工業發展區；薩克森是五金工業和紡紗工業繁盛區。煤業發達在十年之內，在薩克森增加兩倍；在萊因和威斯特發里亞區增加三倍，鑄鐵價值，十年之內，在細勒西亞增加二倍；在萊因增加五倍。

大工業的發展，必然要增加工業原料的消費。一八三六至一八四〇年之間，全德棉花的消費量，每年爲一八五萬磅之譜，而一八五一至一八五五年，每年達五六、一一〇、六〇〇萬磅。鐵的消費一八三四至一八三六年每人平均爲〇、一五磅；而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七年，每人平均已增至七、二四磅。至於鐵路的縮長，一八四〇年不過四六九啓羅米突；至一八五

○年已達五八二〇；至一八七〇年，已達一八、五二七啓羅米突。

商業的發展，一八三〇年，其總值爲六六〇百萬馬克；至一八七一年，其總值已增至四二四〇百萬馬克。

這是一八四八年後，德意志經濟發展的概況。資本主義經濟之空前未有的發達，雖是提高德意志民族的自信力，但如這種發展，沒有一個中心，沒有一種向心力，而只是勢均力敵發展，則經濟的發展，恐於德國統一運動仍無補益。古典文化極盛時期的希臘，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其城市工商業之發達，雖已達到當時發展之頂點，然而終因爲這種發展，是離心力的發展，而不是向心力的發展，因此，這種發展不但未促進希臘民族和意大利民族之統一，反而使國內生出無休止的分裂和互鬥。同一德意志民族，在十五六世紀之時，其經濟繁榮也是達到很可觀的程度，然而德國在此時，所以沒有形成英法式的統一王國，而只有比較鬆弛的帝國者，亦因爲中世紀以來，德國經濟發展，是離心力的道路，而非是向心力的道路。因爲傳統的歷史關係，德國政治經濟之中心本是在南方，但是從十五六世紀以來，德國經濟繁榮，反而偏重在西方和北方。並且因這種發展，是爲外圍海洋所鼓勵，是走由外而內的多元道路，而非是由內而外的一元道路，其結果，不但未使德國收政治統一之效，反而使外圍分割內部，離心力勝過向心力。待後當諸侯在農民暴動中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獨立軍事權力後，則德國的分裂和內鬥較之古希臘和近世初期的意大利原有過之。

現在是德國商工業第二次新高漲時代，而它的發展的趨勢是否和從前一樣，缺乏中心勢力，缺乏向心力呢？是否和從前一樣，經濟發展的中心和政治統治的中心背道而馳呢？自然，如從傳統政治統治的據點而言，即就奧大利的哈布斯堡族統治的據點說，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德國經濟的分佈，不僅是缺少中心和向心力的，而且是完全與政治的中心背道而馳的。但如就德意志北方唯一雄邦普魯斯的地位而言，到這時期的德意志經濟發展之分佈，不僅是有中心和向心力的，並且這種經濟發展的中心與北部的政治中心——普魯斯的國勢發展完全一致。不特如此，甚至可以說，普魯斯就是北部經濟發展的化身和產物。因此，十八九世紀，普魯斯之反對奧大利的運動，實可以視為德意志境內經濟中心之改變而引起之政治中心之改變運動。

普魯斯何以能具備這種經濟優勢？這完全是地理條件造成的。

我們試一看德意志的地運狀況。德國的南部是為亞爾卑斯山脈所橫貫。亞爾卑斯山的西北部為大平原，東南部為一隔絕的小平原。德國全境有七條可資航用的河流皆發源於亞爾卑斯山。在這七條河流之中，只有一條大河（多瑙河）是向東流的，是在奧匈境內，並且是奧匈結合的基礎。至於其餘向西北流的六條河流，無一條不與普國有關，無一條不為普國所利用。十九世紀上半以來，普魯斯在全德國所處的地位，猶如一架向西北放的單翼飛機。飛機的左翼為普魯斯和東普魯斯，右翼為萊茵普魯斯；飛機的頭部為布蘭登堡等地，機身則

爲細勒西亞。這就是說，普魯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僅使它與向西北流的絕大部分河流發生關係，而且使它在客觀上代表全德國大部分經濟利害和商業利害。自十六世紀以來，在德意志南部，爲了朝代的野心，而傾向向外發展的政治上的代表雖爲奧大利，但自同一時期，爲了德國經濟利害，而與西歐諸國（荷，英，法，丹，瑞典）常常發生交涉的國家，都是普魯斯。所以，普魯斯自立國以來，即使是在昏君庸吏統治時代，它仍然爲北德諸邦衆望所歸之邦。其次，是我們已經指出過的，德國的文化發展，自日耳曼人侵入羅馬以來，本來是由東南而西北的，但十五六世紀大西洋北海和波羅的海商業發達以來，特別荷蘭英國走上歐洲文化發展之領導地位後，德國這時文化發展的方向便完全改變路線，現在不是由東南而西北，而是由西北而東南了。因此，傳統的以東南爲基礎的政治中心不得不爲新起的西北所代替。

一個民族，當其文化中心發生變更時。並且這種變更如果與傳統的政治的中心是背道而馳的，其能引起政治中心之革命，此不僅在十八九世紀的德國爲然，一就是在十九世紀末的日本和近代史上中國也是如此。日本傳統的政治的中心即德川幕府的基本本來是在日本的中部江戶，但日本自與西洋文化接觸後，它的經濟文化的中心，反而遷到日本的南部長薩兩縣所統治的範圍內。因此，一八六七年以來的長薩兩藩倒幕勤王運動並不是別的，它同樣不過是因經濟文化中心之轉變而引起的政治中心之轉變運動。

如果我們一看近數十年中國內部所發生的不斷的內戰和其趨勢，我們尤覺上述規律之有

力。數千年以來，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方向，本來是由西北而東南的。因此，在過去數千年，中國統治的中心不僅是在西北，就是歷來的統治人物大多數也是生在西北。但是自西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的經濟文化發展的方向，完全一改舊觀。中國現在的經濟文化之發展，再不是以西北做中心了，而是以東南做中心了。一切工商業大都市皆在東南，而西北寥若晨星。因此，在近代中國政治鬥爭史上亦表現出十九世紀德國政治鬥爭之特色，即表現為新的經濟文化之中心的南方反對為舊的政治中心的北方。如果我們以中國來比擬德國，那末，為傳統政治中心的華北各省，可以說是德國的奧地利，蒙古新疆等地，可以說是奧屬匈牙利，揚子江以南各省，可以說是北德意志，而廣東廣西可以說是德國的普魯斯。再就統治系統說，北洋政府與北洋軍閥如果說是德國的哈布斯堡族，那麼，國民黨派的軍人當然可以比擬北德意志首腦的霍亨倫索。如果容許我們再作進一步的比擬，那麼，廣東國民政府如果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普魯斯，那麼，一九二六年的北伐，當然可以比之一八六六年的普奧戰爭。而且其結果先後如出一轍，都是新的中心戰勝舊的中心。

地理的位置給與普魯斯的優勢，不僅在經濟文化上可以看出，而在普魯斯所領導的德意志關稅同盟運動上尤可以看出。普魯斯於一八二八年在北德開始關稅同盟運動。此運動便立刻引起其他各邦之嫉妬與競爭。一八二八年以普魯斯為領袖的北德關稅同盟成立之始，同時即有薩克森，漢諾威等邦之中德商業同盟之出現。但是，普魯斯的地理位置到給它以極大的優越

，使它所領導的同盟率戰勝中德同盟。到了一八五四年時，除波斯和奧大利外，它所領導的同盟已包括全德意志。自一八五一年起，奧國曾用過許多方法，要求加入同盟，但結果皆爲普奧所拒絕。

普奧在關稅同盟中的勝利完全是由地理優越造成的。因爲全國絕對大多數可資商運的大河流和公路，皆在普國境內或與它有密切關係。因此，德普邦在工商生活上與其他各種形成不可分割之關係，而使奧大利完全與德國隔絕。

其次，如果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普邦在全德意志經濟生活中是立在天然的領袖地位，那麼，爲普邦首都的柏林大城在全德意志的工業活動中更是領袖之領袖。如果讀者承認我們把六十年代的普魯斯的國土比作一個向西北放的單翼飛機是對的，那麼，爲普邦首都的柏林地位天然地是一個駕駛飛機的地位。它位於哈威河之中部，東與奧德河流域爲鄰，西與易北河流域相接近，它簡直是全德全普邦之神經中樞。

五十五至六十年代德意志經濟發展是獲得了空前未有成功並造成了鞏固的經濟中心。但是這種經濟的成功只是馬上就要展開的政治運動之與奮鬥，它還不是政治成功之本身。德意志的關稅問題雖是趨於統一，但在關稅問題外，它仍然是一個典型的多元統治的民族。因之，這一民族不欲繼續前進則已，如欲繼續前進，它勢非打破這種多元統治的障礙不可。但是，德意志內部又不忘一個單純的多元統治，它是在多元之中又有普奧兩雄的對立。而且由於德

意志各小邦對於新起的普邦之猜忌和對於奧大利的寬大政策之同情緣故，使得普邦在長時期內遭受奧大利的壓迫。因此，德國統一運動，一開始就不能不是普奧兩雄之命運決鬥。

普奧關係之突變是始於一八五九年法意聯軍對奧宣戰之時。顯然地，法意宣佈對奧作戰後，普奧的地位便愈有決定作用。另一方面，一八五九年戰役使意大利統一和立憲運動獲得絕大勝利。這對於馮葛統一和憲政的德意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是一個強烈的刺激。所以，德國于一八六〇年即成立一個『民族聯合會』以謀德國之統一。一部分進步的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更組織一個『進步黨』。而這種運動在經濟與文化較為發達的普魯斯特別得勢。在這般進步黨人看來，德國當時之所以還未統一者，最大的原因，即由於人民沒有認識統一和立憲之理想，倘使此種自由進步的理論一旦被人認識同時又能打破武力統一的迷夢，則德國統一立即成爲事實！

實際上，德意志的統一雖是少不得民主精神，但也決不是單純的民主的講演和宣傳所能生效。因此，隨着普奧關係的緊張和國民對於統一要求之迫切，自然應使普魯斯的軍事勢力之增強。這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德意志政治生活之必然邏輯，然而不幸的，就是這種必然的邏輯並不爲那般幻想以爲自由和進步觀念即可以統一德國的資產階級的國會代表和進步黨人所理解，他們對於這一問題不但不加援助，反而賭死地加以反對。於是，普魯斯爲了這一問題的解決，便在政府與資產階級之間掀起巨大的政治風波。

政府的軍事改革案，是欲擴充普魯的軍隊至四十五萬，軍費增至九百五十萬。而國會中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完全反對這一議案。一八六二年三月十二日政府不得已乃下令解散下議院，並於四月十七日組織保守黨內閣，以期貫徹其主張。但是，政府的勝利只是一時的，至五月六日總選舉的結果，資產階級的代表又佔多數，並且於九月十六日，議案付表決時竟以二百七十二票對六十八票之多數將政府提案再加以否決。至此，普王威廉第一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違背民意實行自由捕獲自由衛軍；或者是覺得自己善意未遂，草退國書，以謝國人。這時國王與重臣皆在彷徨不決之中，而我們所要說到的時代英傑，畢斯麥自法國被召回國担任首相要職了。

奧托，勞，畢斯麥於一八一五年生於普魯斯之許恩豪增。彼於一八四七年始為聯合省議會之保守黨議員，一八五一至五九年為出席德意志聯邦會議的普魯政府代表；同年又任普魯駐俄大使。一八六二年又任駐法國大使。在出席聯邦會議和出任俄法大使時，他不僅透澈地看出德國未來統一運動中之普奧關係，他並且也看清列強對德國統一的態度。在他看來，無論從那一方面說，德國都是應當達到民族統一目標的。但為了要達到這一目標，決不是自下而上人民革命所能生效的，更不是資產階級的善意自欺和講演等能夠完成的，而是非借助於普魯斯前軍國主義的勢力不成。所以他說：

「自下而上革命雖然足以避免在德國境內的紛亂，我們却不求這樣的紛亂，德國不願普魯斯

的自由主義。只顧他的勢力。南德意志諸邦很想恣行自由主義，所以沒有人願意把普魯斯的位置交與他們！普魯斯必要聚集兵力爲好機會作準備。好機會來了去了有好幾次。自從維也納條約立約以來，我們的邊界定得不好，不合於一家強健的政制。時局的諸多重大問題，本是演說與大多數的決議所能解決的——這原是一八四八年與一八四九年的大錯——而是非用鐵與血來解決不可。

畢斯麥的基本政策，一方在使德意志的民族主義與普魯斯的軍國主義結合，他方，他又想使德意志保守主義與奧大利的正統主義分裂。他的政策之適合需要，證明他是當時之適當人物。因之，進步黨人暫時不能不屈服，暫時不能不讓畢斯麥爲所欲爲！

第八章 德意志統一運動之完成與三次對外戰爭

德意志統一運動，是由三次對外戰爭來完成的。這三次對外戰爭之順利的成功，一方面固由於德國人民的愛國心和犧牲精神，他方面，亦由於當時的德國大政治家畢斯麥的天才努力所致。自從畢斯麥以大无畏的精神戰勝了國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反對派後，他現還有一個更重大的敵人要去對付，這個敵人就是對大利。奧國當德意志極端需要統一之際，他不僅想維持他在德意志多元統治中之正統地位，他甚且還要努力的來加強它。他現在擬好一個改組德意志聯邦的計劃。按此計劃，聯邦內應設五個總理，他自己任正主席，而令普魯斯

任副主席。聯邦中設一個代理機關，代表由德意志各邦議院選派。這一計劃當然爲畢斯麥所反對。可是牠在這一計劃遭受反對之後，牠又來一個新企謀。牠爲了想把反對普魯斯出來統一德國的各邦團結在自己周圍以對普國計，牠又出來提議召集一全德意志王侯會議。牠甚至爲了要當時的普魯斯德爲的正統主義而服務，不恤以三十六位在位的王侯名義和派一位國王當信差以奉請威廉第一出席此會議。這次會議雖然又爲畢斯麥所領導的普政府所反對，但牠不僅如期開會成功，而且還通過了三十六條聯邦改組法案。該法案的宗旨當然在提高奧國在德意志聯邦中之地位。甚至欲使奧國所領導的聯邦內開變爲德意志的正式政府。王侯會議開會於一八六三年八月十五日，畢氏聞得此項法案，於同月二十三日即提出抗議。抗議書的內容是：「關於聯邦憲法修正，普奧有同一之權利；故非得普國承認，雖多數決議，亦無效力」。此抗議書發出後，與普關係當然日形惡化。

雖然這時的普奧關係已日趨惡化。但就普國另一突來需要說，牠又不能不設法利用奧大利作一時的合作。普國固日夜在準備反對奧大利的正統主義，但牠現在爲了一個切近的目的，並不得不立即與奧大利及其正統主義發生衝突，而且在表面上還應與之作親切的合作。這種不自然的合作其目的在甚麼地方呢。在什烈威 (Schleswig) 和好斯敦 (Holstein) 兩州鬥爭上。

什烈威和好斯敦是德意志北部與丹麥接界的兩個小公國。自一四五九年以來，這兩個小

公國即在丹麥國王統治之下。可是自從十九世紀民族思想瀾漫全歐洲以來，這二州的外族統治不僅變爲德意志身上的針刺，並且它們的輿情可是德國渴望統一的寒暑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後，普國和其他小邦爲了二州光復曾一度對丹國用兵，只因倫敦會議，英國積極庇丹反德之結果，於是使二州仍爲丹國所統治。不過當時的議案，只決定什烈威完全在丹國統治下，至於好斯敦，雖爲丹國所統治，但在名義上它却是屬於德意志聯邦之內的。不料一八六三年丹國忽通過一新憲法，這一新憲法不僅宣佈什烈威爲丹國所有，並且宣佈好斯敦也如什烈威一樣亦完全爲丹麥所佔有。此新憲法一經丹王基利斯坦第九（Christian IX）宣佈後，即引起全德意志人民之憤恨。這時漢諾威爾和薩克森二邦遵聯邦會議決議，首先對丹國出兵，同時並宣言腓特烈爲該邦君主。因腓族在中古時代，與二州統治家族均爲姻鄰。漢薩聯軍現在既是在光復此二州名義下對丹用兵，而德意志各派輿情自然多同情之。

畢斯麥這時目擊事變，深覺爲了發展普魯斯的權威，普國對丹實有作戰之必要。蓋什好二州與普國壤地相接，戰而勝，不僅可以提高普國權威，而且可以增加普國版圖，擴大其海岸線。然同時畢氏又詳知，普於什好二州向無法權關係，且丹爲英之庇護國，普如單獨對它用兵，不僅一己要受到一八五八年倫敦會議簽字國之反對，而且在德意志內部亦給與奧國以反對自己之機會。因此，普如想併有此二州，第一步實有與在法統上和名義上皆佔有重要地位的奧國合作之必要。因之，畢氏這時乃以甘言誘奧大利道：「此事利害所關至大。若委

之聯邦會議，使漢諾威薩克森得伸其臂膀，是普奧二大國無力之暴露也。」因此，他請求奧國即時與普共同出兵。奧皇法蘭西斯約瑟不知畢氏約請是要使奧國爲普國利益供奔走，於是普奧於一八六四年一月十四日竟對丹麥提出哀的美敦書。此哀的美敦書，限丹麥四十八小時內取消新憲，否則即以兵戎相見。蓋畢氏深知，修正憲法，爲丹麥國會之權利。但此時丹之國會已開會，而新國會之開，又爲時尚遠，斷非四十八小時所能答覆。然而不答覆，正是普奧所求之不得者。因此，一八六四年一月十六日，即在京的美敦書發出之第三日普奧即對丹國實行宣戰。這次戰爭在實際上，並不需要較長時間，只因停戰與議和之延誤關係，直到是年七月，普奧聯軍始逼近丹國國都。於是，丹麥國王才不能放棄三州統治權，和普奧成立和約。

在普奧對丹戰役時，列強，特別是爲丹麥之庇護者的英國何以未達干涉之成功呢？在這裏，我倒又不能不佩服畢斯麥的外交的努力。一八五二年在倫敦會議席上簽字保護丹麥領土完整的首先是俄國。但俄國政府這時正欠普斯麥的外交債。當一八六三年俄國波蘭叛變時，普斯麥曾多方面幫助俄國反對這次暴動。在當時的普俄協定中，畢斯麥不僅保證普國不援助波蘭，並且允許俄國軍隊可以入普國領土追擊叛黨。在這一外交談判之初，畢斯麥是深爲德國的自由資產階級所攻擊。他們皆罵他「賣身給魔鬼」，而「捲入一種以人爲獵的慘事裏頭」，但畢斯麥却另有不同的看法，他以爲一個中央的波蘭很會與俄國和法國聯盟以反對普

魯斯，何況普魯斯如果資助波蘭獨立，更能引起俄國對於普國之仇視和報復。

其次一簽字國是法國。法國現在不能積極干涉這次戰爭，第一，是因為它正有事於墨西哥之遠征，第二，是因為英國在一八六三年在波蘭問題上拒絕與法國合作，所以法國現在不擔任英國。最後，法國政府不能不考慮外交干涉如不成功，自必訴諸武力。而訴諸武力時，英國只能進行海上作戰，至於法國勢必與普與聯軍作大陸戰。這非法國所願意。因此，現在祇剩下一個英國。英國雖不欲普與併此二州，但它一解決不能在海陸兩方反對普與聯軍。因此，英國這時祇好看着他在歐洲的地位與權威在普與聯軍前面太顯墜落。

普奧對丹共同作戰，遠最後勝利。但最後勝利獲得之傾，也就是普奧開始火併之傾。爲甚麼？因爲我們已經說過，普奧合作並不是普國爲了奧國的利益，而是普國爲了自己的利益，普利用奧大利耳。因之，當普奧對丹作戰取得共同勝利後，則二州處分問題，遂立即成爲普奧衝突之要因。二州公民因鑑於德國爲一多元統治的國家，亟欲成立自治邦，今再加入德意志聯邦。此意德意志輿情甚表歡迎，而奧大利爲了自身利益計，遂因利乘勢，加以鼓勵。惟畢斯麥爲了普國權威和德國統一着想，堅決表示反對。畢氏深知如其讓聯邦處分二州，則二州的領土將來必入奧國掌握，而增反普之力。反之，普國如能併此二州，不僅使普國領土和海峽線增長，而且因多得良港，使普國之商港和海軍亦必隨之而發達。於是普國對奧遂不恤以堅強之態度臨之，而奧國因爲國內不寧和在列強中無有力的同盟者種種關係，於是不得不

以普國言和，而誰什烈威於普魯斯。至於勞英堡則由奧大利以二百萬丹幣賣於普魯斯。關於這次買賣，畢斯麥形容得最好：「奧大利因為作這一次買賣，大為世界所看不起。買入者是有體面的，一個賤價出賣的人却被人輕視」。

這就是普與對丹合作之結局，也就是普國在世界前面，在德意志內部，第一次取得對奧大利之勝利。

但是普與衝突之基因，並不是在什好二州之分配問題上，而是在比這一問題更為重要的德意志統一這一中心問題上。徒其形式毫無靈魂的德意志聯邦應當繼續存在麼？德意志境內三十多個獨立小邦應當永遠維持其統治麼？德意志經濟中心既經變遷，而德意志的政治中心可以仍保不改變？最後，是普與勢不兩立的局面可以永久繼續下去麼？如其德意志聯邦不應繼續存在，如其三十多個獨立小邦統治不應維持下去，如其新的經濟中心不應受支配於也不能受支配於舊的政治中心，那麼，除了普與一戰還能看其他的道路麼？換句話，除了提高普魯斯在德意志之地位，並排去奧大利於德意志之外，實無其他辦法。其他如和平進步統一德意志的思想只是自由資產階級自欺欺人的幻想。

畢斯麥是深知普與不久必須以兵戎相見，同時又深知當戰爭發生之際，法蘭西的態度是有決定作用的，因此他在普與瓜分三州事情結束後，即以旅行為名至比亞利子去密會拿破崙第三。在這一次密會中，他因熟知拿破崙第三之領主慾，故特向拿破崙保證，謂普魯斯將在

比利時，萊茵流域，瑞士及盧森堡諸問題上，幫助法國，只要法國在行將來到的普奧戰爭中守中立。他的誘惑果然發生效。拿破崙第三竟對德保證說：「法國是歡迎一個擴充的普魯斯的。」但是拿氏卻不知道，普如勝奧，並不只是「一個擴充的普魯斯」，而是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帝國，並且很快要對他所統治的法國開戰的。

在取得法國中立後，畢斯麥覺得還不夠。他看見德國的南部有一個國家比利時比德國更需要統一，並且爲了實現這一目的，這個國家和普魯斯是同樣要求反對奧大利的。這個國家就是意大利。於是普魯斯於一八六六年四月八日又與意大利結攻守同盟。這個同盟規定，在三個月之內，如果普魯斯向奧國宣戰，意大利即須加入普魯斯方面亦對奧宣戰。這個同盟也是爲拿破崙所贊同的，他的用意是想使威尼西亞脫離奧大利。

畢斯麥在普奧戰爭前對奧國的一切外交佈置都是極盡外交天才之能事。但他的對內政策又如何呢？他怎樣對付那一羣永遠欲維持其獨立統治而誓死反對德意志統一的各小王侯呢？又怎樣來對付甚至牽願同情各小王朝的虛偽的立憲運動，但却堅決反普魯斯軍國主義精神的全德意志的自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本來要統一德意志，首先非使全德意志的人民，特別是其自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起來反對本國的一切小君主和奧大利並擁護普魯斯不可。但欲達到這一目的，自非普魯斯的統治原理與人民要求，特別是自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要求相一致不可。換句話，普魯斯非承認普選的民主政治不僅應爲普國最高的政治原

則，並且非爲全德意志最高政治原則不可。只要普魯斯能勇敢地走這一步，則全德意志的國民必爲它所贏得。但是，畢斯麥不是德意志民主政治之堅決反對者麼？他不是主張過「普魯斯的力量須根據於強權政策，切勿根據兩院和報紙」麼？他對於普選權不是作過「一磅人肉與八骨不能所權衡標準」之譏諷和嘲罵麼？他不是無數次地主張過用獨裁制去抵制民主的議院制甚，難道這樣一位民主制的對頭，自由主義的敵人會出來宣佈德意志應實行民主和普選麼？

是的，並不是別人，正是這位民主制的對頭和自由主義的敵人畢斯麥出來向人民，向全德意志的人民宣佈了民主和普選權。畢斯麥這種決定，並不是表示他的政見不定，或前後矛盾，而是表示他是十九世紀最無成見的偉大政治家。

爲政治家的畢斯麥之目的，並不是專制或民主，而是德意志之統一和強大。他往日所以反對議會和憲法者，不過是爲了在政治上尚未成熟的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們不該利用議會和憲法來反對德國的歷史需要，即不該反對普魯斯的擴張政策和有利於德國統一的外交政策。在實際上，這時期的德國自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上的不成熟和抗戰前的中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上的不成熟正是一樣。他們都熱愛自由，但他們不能區分何爲人民的自由與何爲德意志君主們的自由；他們皆瘋狂地追求民主，但他們又不知統一的民主與德意志各小王朝立憲的民主絕然兩樣。他們爲了自身利益和民族利益，本來都是擁護統一的。但

在實際上，他們反而使自己與割據的各小王朝相一致。如一八六三年奧國在佛蘭克佛特所召集的諸侯會議，其主旨完全是反對德意志統一的，但平日希望德意志統一的進步黨人，他們不但不反對此次會議，甚且過去與那般與會的諸侯作政治調情，使畢斯麥大感不安。

在民族鬥爭的險惡環境中，德意志和普魯斯的資產階級本來都是很愛自己祖國的，但因為他們的政治知識之落後，以致於嚴重的外交應付中，他們常常是站在與德國利害相反的立場上。至於這般資產階級在國會中的代表，他們誠如畢斯麥所形容：他們本來沒有甚麼知識，但他們的生活却是很舒服的；他們喜歡集會，但在集會時只能說些令人詫異的傻話；他們衷熱於彼此相殺，但都是愚而好自用者，他們對於本國的政治理解的程度，本來只有大學生高，至於說到對國外的政治，拿他們一個一個地計算，他們每個自然都是小孩子。如果說到其他事體，當他們一齊集合，也只能算是小孩子。一句話說完，當時的德意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人物，其低能，其幼稚，其喜歡作無知識的叫囂，而在嚴重問題上，只是一羣無能之輩，正如抗戰前中國的所謂「七君子」或「八君子」完全一樣。在這種情形下，不管你是怎樣一個擁護民主的人，如硬要以充滿此種人物的國會，在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上，來為難一個比它具有睿智的政府，並且即使你在別的地方是怎樣反對畢斯麥的，但在此處也當承認他的「一磅入肉與人骨不能作權衡標準」的諷刺是尊實的也。因此，他們對於畢斯麥前此壓迫議會違反國憲的漸然行為也不能不給以歷史的諒解。

雖然六十年代的德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議會的代表，在政治上是這樣的落後和這樣的不成熟，但他們却不能由此得出結論，以為當時德國的整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德國國家統一運動過程中完全不佔重要地位。而是相反，只有它們才是德國國家統一運動的社會基石。而且沒有它們熱烈的參加，要單純的以普魯斯的軍國主義來統一德國，這在當時是勢所難能。德國的統一運動，已經為歷史所注定，總固不能完全由自下而上的民主道路來實現，但也不能完全由反民主的勢力來實現，總想得到澈底的成功，而是非使這兩種力量合而為一不可。

但是啊，要怎樣一種勇敢的政策才能使這兩種互為反抗互為磨擦的力量合而為一呢？那種一意孤引官僚統治和武力統一而寧使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份子去與各小王朝虛偽的立憲運動一致的政策可能使這兩種力量合而為一麼？絕對不能。要想使全德意志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不與各小王朝一致，而與普魯斯的統一主張一致，這在當時只有一條道，一個政策，這一道路和這一政策，是早已為德意志的偉大的社會主義者拉薩爾所提出，就是普魯斯須轉變它的政策，須向全德意志國民宣佈全民選舉權和德意志須變為民主的統一國家。這就是說，普魯斯政府須明白宣佈德意志的統一與民主不能分離的，而且它的立憲運動，不是由牠的各小王朝來領導，而是由獲得全國人民同情的普魯斯來領導。這就是說，普魯斯現在再不是全德意志反動營壘的魁首了，而是全德意志國民所希望的民主政治之發勤者和策源

地了。拉薩爾雖爲此種偉大政策之首倡者，但他在生前並未得到實現。現在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曾經爲偉大的有遠見的社會黨領袖所提出的政策，竟然由一個在過去不僅反對社會主義甚且曾堅決的反對民主主義的保守黨人的領袖，軍國主義政府的首相來實現和執行了。而且執行得那樣勇敢那樣痛快那樣符合民望。當時德意志大歷史家多萊乞克說：「當全國冥想著普魯斯的政策忽然反轉，全國驚嚇到糊塗了」。

畢斯麥晚年對於他自己這次決定也有如下的追述：

「因爲事勢所迫，又要與多數外國奮鬥，若是必要用的話，我是毫不遲疑借助於革命方法的。我很同意用普選選舉權，這是自由最有力量的巧法。只要我以此而能恐嚇君主制的外國，免得他們干涉我們的國事。在這樣一種存亡的鬥爭中，我們是急不暇擇，無論甚麼利器都可以用的。到了這時候，唯一的問題或是甚麼可以成功。甚麼能一定將使其他諸國不來干預我們」。

筆者在本文一開始就說過，研究歷史並不是爲了過去，而是爲了現在。換句話，研究歷史是爲了取得一種生活教訓。因此，我覺得前世紀六十年代，普魯斯大政治家在德意志所執行的統一政策是很可以預得我們這正在從事民族獨立和統一運動的政治家所效法的。畢斯麥是一個保守黨人。當他覺得普魯斯和德意志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不該利用民主來反對歷史需要時，他從不掩飾他對民主政治之反對傾向。反之，當民主政治已經成爲

一種迫切需要時，他立刻即宣佈民主政治之實施。這種態度正是政治家光明磊落的表現。我們知道畢斯麥是徹底地改變了普國的對內政策。然而正因為普國的政策改變得太徹底，才使維也納政府感到德意志各小王朝或從此失去了國民基礎，同時也使自己不能再得到有力的同盟者。因此，它現在不得不準備和平，向普國提議兩國從此應修好罷兵。這無異乎普奧在未以兵相見以前，普國在政治上已經使奧國敗北了。

但是，普奧兩邦此時真的就可以和議無事麼？普國的同盟國意大利在一八六六年四月中旬已守約向奧國出兵了。而奧大利亦於同月二十一日動兵相應。恰在這個時候，而奧王提議向普王言和，而普王威廉竟準備授受這一提議，並且彼是真欲與奧言和。這不止是普王個人的滑稽，這簡直是對德意志的神聖統一事業在最決定的一刻開最大的玩笑。下面是畢斯麥在時局千鈞一髮之際上普王的意見書：

「戰和一事，陛下自有明斷，臣如若以危言淆惑聖意，則非特有違私衷，抑亦背手越誠。區區此心，諒邀明察。和戰之決，陛下自宜受導於上帝，庶幾於國有福。臣志在祈求，非為條陳利害也。然不敢隱而不言者，竊以為我國今日而倡和議，則數月之內，戰禍必將復生，情勢亦將愈不利。夫和平之維持，須二國皆有願和之誠。臣為陛下忠告，習知奧國政策已十有六年，用悉維也納所表現之仇普態度，非惟為奧國之主要動機，且凡係為奧國之惟一動機。一旦奧政府具悉當前之情勢勝於今日，則此種動機將立見實

行。奧國之初步企圖，蓋欲在法意間造成若干情勢，俾使之更有利也。

這一意見書果然獲得了它所應得的效果，普王應允對奧國開戰，而數百年來一樹懸而未決的德意志統一問題，現在起始以武力來作最後解決。

普奧戰爭，雖為十九世紀有數大戰之一，但因為在這次戰爭之前，普國在德意志內部能取得全德人民之同情，在外面又能得意大利之揆援及列強之友好中立，所以他的勝利也就似閃電般的迅速。這次戰爭統共只有七星期，當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普軍進德勒斯堡時，而尼格斯堡議和條約便已成立。

當議和之時，普王和重要軍人皆欲重懲奧國甚至欲分割其領土，然畢斯麥現在又出來盡力反對此舉。他只驅普國勝利達到適可而止。因他已經預見，普國在最近的將來還要以更夫的戰爭來保持這次的勝利。換句話，他這時已看到普法之戰緊隨普奧戰爭而起，而在普法戰爭中，普國必須有奧國守中立，倘此時而割奪奧國領土，則奧國於普法戰爭之際，爲了收復失土，必起而與法國同盟。畢斯麥的意見是勝利了。在議和之中，奧國是保持了領土完整，而且戰費賠償只有三百萬磅。但是，畢氏所要達到的目的皆已達到：第一，是奧國已承認德意志聯邦之解散且自今以後不干涉德意志內部事件；第二，奧國已承認普國併有什烈威和好斯敦；第三，奧國已承認普國在萊茵河北組織北德聯邦，並在萊茵河以南組織南德聯邦；最後，是奧國須應普國之請，割讓威西尼亞於意大利。

普魯斯在這次戰爭勝利中，已爲德意志統一運動立了一個基礎，從此他可以去反抗它的最大敵人法蘭西。

對奧戰爭之勝利，不僅畢斯麥得德意志領土大部分統治權，而且還使他取得德意志大部分資產階級之贊助，因以前反對畢氏最力的進步黨人現在分裂出來，派名爲「民族自由黨」，而這一黨此時則以全力來擁護畢氏之民族政策。

北德意志聯邦之組織確爲德國統一事業立了一個基礎，然它並不十分穩固。因爲在這時不僅南德各邦的統治者不願服從普國領導，且宣言「寧願爲法蘭西的『不願爲普魯斯的』」。甚至就北德聯邦中，如漢諾威因爲種種歷史關係和外交關係對普國亦時生反抗之情。然而這都不是德國統一之主要障礙。此時爲德國統一主要障礙的仍是法蘭西的態度。法蘭西永遠認爲德國的統一是在歐洲大陸上的霸權之致命傷。這恰像最近十幾年日本認中國的統一是在亞洲的霸權之致命傷一樣。因此，法國爲了她在歐洲的霸權着想，她是必須反對德國統一的。而對反叛統一的南德諸邦，自必樂於贊助，並且這如日本帝國主義最初資助北方軍閥反對北伐一樣。

不錯，在普奧戰爭前，拿破崙第三確曾對普國守過同情的中立，但這並非拿破崙氏對德國統一運動表示好感，而是由於他錯估計了普奧兩國的力量。在普奧戰爭以前，在德意志內部甚而在整個歐洲大陸，妨害法國和爲法國之敵的，並不是普魯斯，而是普魯斯之敵邦奧大

利。因爲在其以前，無論就領土說，或人口說，奧國較普國皆大一倍。並且因德意志各小邦之黨與反普關係，益增奧國之聲勢，其次，奧國雖然在一八五九年戰役中對意大利有所讓步，但它在意國畢竟還有一部分領土。而奧領意大利領土不僅與法國接壤，而且包圍着法國。因此爲法國計，在某種程度內縱普國給奧國以打擊，不僅可以破壞奧國的勢力，而且可以使德國進入爲法國所需要的均勢地位。何況除這些計算外，拿破崙第三還有一個更切近的全圖，即他要在德意志這次開鑿的鬥爭中，乘機略取萊茵河左岸以及盧森堡，比利時等處的土地以增高第三帝國的權威。

如果普國實力在當時果如拿氏所估計比奧國爲小，法國當然可以收漁人之利。無如在實際上普國實力不但不比奧國爲小，而且反比奧國爲大。因之，普奧戰爭之結果，不但未使德國進於均勢，而且是破壞均勢，不但是破壞均勢，而且立下德國統帥運動之基礎。一八六六年七月四日當普國在克尼格斯塔對奧取得絕對勝利時，拿破崙第三爲了對普國是否開戰問題在聖克爾即召集一會議。據第三帝國的歷史家說，這是拿破崙朝最重要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中，法國之所以未決定即將對普作戰者，主要原因有二：（一）法國當時方有事於墨西哥之遠征；（二）因法國在此以前，完全沒有對德作戰的準備。這就是說，法國雖明白看出普國的勝利於法國不利的，但却無法加以阻止。所以，當普魯斯在克尼格斯塔獲得大勝的消息傳到法國時，這個消息對於法國猶如一個巨大的災難之降臨一樣。哥斯，並拿巴黎人與馬其頓非

力善征服了伊列提後的雅典人比較。

他們沒有人可哭，然而自然覺得失掉了他們的優越地位：沒有打仗，他們却覺得有戰敗的感觸」。

這有甚麼詫異之必要呢？這是壓迫者感到壓迫之必然表現！中國在完成了牠的統一初步程站以後，而一向欺壓我們的日本帝國主義不是感到：

「中國是如日之上升，日本是如日之下降」。

其實，如果一切法蘭西人，特別是法國的政府要是都有上述的感覺，未始不是法國之大幸，無奈拿破崙第三見不及此。他雖是一個最不會舉劍的人，但他却最愛向人裝腔作勢，他一方認定自己不能立刻和普國作戰，但他方面，又要大驚小怪地去干涉畢斯麥，並不斷地要求賠償，以致使畢斯麥，把這種要求譏之為「要茶錢」。

拿破崙一開始向普國要求萊茵河左岸和美因斯等地，畢斯麥自然加以拒絕。可是畢斯麥一方雖然拒絕這一要求，但他方面，他却使這一要求的消息透露在法國的報紙上，逼使普國和荷德兩邦皆知法國對他們的企圖了。

在上述要求失敗後，拿破崙第三又向畢氏要求薩爾布魯克和盧森堡等地，並申明這一要求不遂時可以改為比利時，關於盧森堡因為普政府向代管此土的荷蘭政府示意的結果，又在倫敦會議上，乃規定盧森堡永遠為中立地，至於比利時問題，不但要求未遂，反而因畢斯麥把

法國過去祕密向他要求比利時的文件轉給永久欲保障比國獨立的英國政府關係，使法國益形孤立。

這時因爲拿破崙因不斷地簽了畢斯麥的外交惡弄，使普法關係已經惡劣至極點，然而偏袒這時發生一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而這一問題之發生遂成普法戰爭之導火綫。

一八六六年，西班牙發生了一次革命。女王伊沙伯二世被迫出奔法國。於是西班牙因女王出奔而欲尋一位新君。西國在他處不易尋得一合適當新君，後來竟使他仍尋到霍亨索倫家族的奧阿普爾親王。普王威廉和里阿普爾親王最初皆不欲承受此王位，然而畢斯麥却一定要親王應允西國之請。但是普國這一次決定，立刻引起法國政府之瘋狂地反對。同時更令法國駐普大使向普政府交涉，一定取消此舉。普王這時雖感法國態度有傷普國尊嚴，但結果還是決定循法政府之請。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二日安頓親王乃正式通告西國政府，申明撤消其子接受西國王位。

但是普國竟以強迫自居並在對德外交上驕傲慣了的法國政府它並不以此爲滿足，它在安頓親王正式申明之後，硬要普王宣言以後永不再提此事。這種逼人的態度當然爲畢斯麥所反對。蓋在畢氏看來，普法戰爭既是不可避免，那麼，戰爭發生得愈快，自然對普國愈有利。因爲普國在此以前早有對法作戰的準備，而法國却是現在才開始其準備，因此，當七月十三日畢斯麥把普王拒絕法政府的要求的電報加以修改發表出來後，至七月十九日普國即接

得法政府的宣戰通告。法國政府這種逼人的姿態，完全是畢斯麥求之不得的，爲甚麼？因爲他早已說過：

要大多數德意志人作廣大的聯合，只有用武力方能達到——否則，就要有一種共同的危險和刺激，以激動他們發狂怒。

一個民族的愛國思想和對外情緒，主要的是由這民族自身所處之時代來決定。十七世紀和十九世紀初的德意志，由於自身不斷分裂之結果，民族的壓迫和欺侮，不但不能增加這個民族同仇禦侮的情緒，反而益使其趨於消極和頹廢。可是現在大非從前可比了。現在不僅是在一八四八年之後，並且也是在一八六六年戰役前四年後，換句話說，德意志已經不是封建的無政府的集合體了，牠現在是一個真正的快具有統一意志統一政府的民族國家了。正惟如此，這時外族的壓迫和欺侮不但不能分裂牠，反而可以加強牠的國民的愛國心和團結精神而且在一定時間可以激之發狂怒。

當一個民族內部已經開始其歷史新生活運動和統一運動，外部所壓力不但不能分裂它，反而加速其統一運動，此事不僅由這時的德意志民族可資證明，而在九二八以後的中國諸事變上尤可以證明，九二八以後的中國，日本對之不斷的施行壓迫，但是所有對於中國的壓迫不但未使中國走向瓦解使中國人民發生消極，反而加速中國的統一運動和國民愛國心團結心，並且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地壓迫使四五萬萬五千萬愛好和平的國民爲了國家民族隨時都可

以赴湯蹈火。

數十年來甚至數百年來一種含恨在心的民族戰爭果然爆發了，而且爆發的根據合乎德意志人的理想。當戰爭爆發時，由於普國是有準備的，除二十萬防守和預備軍不計外，其任戰之兵達五十萬。反之，在法國方面，因為平時並無作戰準備，其出兵總數只有三十三萬。因此，戰爭剛一開始，普軍即以優越的姿態侵入法國境內，至於法軍，不是武器窳敗之苦，卽感軍需供給之不足。因之，勝負不啻在開戰之初卽已決定。

戰爭的進度，可以分爲三個階段。

戰的第一階段，是一八七零年八月，法軍在威奧堡之失敗和普軍佔領亞爾薩斯，第二階段則爲色當陷落，色當之陷落，不僅使法國主 麥馬韓負傷，而且使法王拿破崙第三身爲普軍俘虜。至於軍力的損失，計士兵八萬二千，軍馬六千，大炮五百五十八門，小銃二萬二千，悉爲普軍所有。當時被俘虜的拿破崙第三上普王書道：『朕全軍戰死，所餘者惟朕劍耳，請以之奉陛下。』我們由此可以想像當時法軍失敗之慘。

自色當失敗消息傳到巴黎後，立刻便引起人民革命，並且由人民組織一臨時政府，但是由於新政府向普議和遭 失敗，於是使戰爭乃進入第三階段，圍攻巴黎。

臨時政府因議和不成，卽努力編制新軍以抗普軍。但終因以新立之軍不能敵久經訓練之師，所以至九月二十七日麥茨又告失守。麥茨失守，將校六千人，士卒十七萬餘，大炮五千

五百餘，小銃二十萬支，又悉數落入普軍之手，麥茨既陷，巴黎之圍自然不可避免，到了二一八七年二月二十日法國正式政府成立後，始認定法國一時既無力解除普軍的圍攻，實不如作城下之盟，向普國言和。言和的內容：（一）法須以亞爾薩斯，洛林二州及麥茨和斯拉斯堡兩城割於普魯斯。（二）法國須償軍費五十億法郎於德國，分三年償清：（三）德國得以大軍三萬駐巴黎，以俟償清賠款。

一八七零年至一八七一年戰役之結果，普魯斯對法蘭西是取得了絕對勝利。但是造成普國這次絕對勝利的原因何在呢？有人說，普國的勝利是由於德國猶太資本家在經濟和財政上資助普政府之結果。又有人說，這次勝利是由於毛奇等精確戰勝成功之結果。反之，畢斯麥却說，普國打勝仗，並不是戰勝成功的結果，而是由於德軍兵士身體強壯過於法國兵士身體，比法國的兵士較有耐性，較曉得本務，攻敵較有精神所致。所以他更絕然地說道：「假使麥馬韓所統領的是普國軍隊，而阿文斯利本，所統領的是法國軍隊，戰勝會在法國而不在普國。」以上數種解釋，只能說是一部份原因，決不能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當然是由於德國民心一致。「孫子兵法」說，用兵之經第五，而首在「道」。「道」者何？「令民與上同意。同意可與之生，與之死，而民不畏。」然則人民如何而能與上同意呢？我以為這一問題是由一個時代的歷史決定的，非完全由主觀可能成功的。要之，當一個民族的特殊利害與民族的共同利害能够一致，而此時這個民族內的握政權人就能自覺地從對內政策上來發動這

種一致性，則這一民族自然可以戰勝牠的敵人或壓迫者。反之，雖有堅甲利兵亦必失敗。如第一次中日戰爭時，當時日本的每一個國民都是與政府同生死的，所以日本勝。而他方面，中國當時完全缺乏這種精神，所以中國敗。反之，這次中日戰爭，情形完全爲之一變。在這次中日戰爭中，舉國自動的一致不是在日本，而是在中國。因爲在日本特殊的階級利害與民族共同利害之一致性已經過去。倒是相反，日本現在國民的解放，倒是有利於現時日本軍閥政府之場台。因此，日本現在所謂舉國一致，並不是自下而上的自發的一致，而是自上而下的強制的一致。因之，我們的敵人在這次戰爭中終必失敗，而我們終必勝利，是有普法戰爭爲之證明的，不錯，我們的敵人比拿破崙第三治下的法國爲強，但是祇是程度問題，反之，我們敵人的內在的階級矛盾將比拿破崙第三治下的法國更嚴重許多倍。因此，我們敵人的失敗祇是時間問題，它決不能再有第一次中日戰爭之夢想。

我們已經了解普法戰爭中德國勝利之原因，現在我們進而述說這一次戰爭與德國統一運動之關係。我們已經知道數百年來，法國的稱強常常是德意志統一運動之障礙，那麼，現在它之屈服，當然是德意志統一之保證。因之，法國失敗之日，也就是德國統一運動最後完成之日。這恰如日本帝國主義失敗之日，也就是中國統一運動最後完成之日一樣。

先是當普法戰爭初起時，全德意志國民即乘軍勢方盛之際，開國民大會於柏林，以謀全德意志各邦之統一。這北德各邦統一運動已指出全德意志必須統一之趨勢，因此，致使一

面欲維持其獨立的南德各邦，對此歷史大勢亦不能有所反抗，於是南德各邦如巴登等於一八七〇年九月即實行加入北德統一運動，即加入北德同盟。當時繼巴登之後者，又有巴威和瓦登堡二邦。惟因後二邦要求加入的條件過奢，所以奧斯麥提議召集南德各邦委員於法之凡爾賽宮，以討論聯邦條件。這時巴威深恐孤立，將遭受更大壓制，於是亦慨然派代表蒞會。因此，至是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德各邦遂完全加入北德同盟，於是遂組成全德意志聯邦。即德意志帝國。德意志帝國的憲法大致與一八六七年所成立的北德聯邦憲法相同。普魯斯國王是德意志帝國的皇帝。普內閣總理是德意志帝國的宰相，德意志帝國有聯邦會議，由各邦代表組成之；有帝國國會，由全德成年男子直接選舉成之。帝國國會掌理財政權，法律亦須經其認可，惟立法創制，則屬諸聯邦議會。

由此，統一的德意志帝國遂出現世界舞台，數百年來德意志民族的統一運動也於此告成。今後它不祇是稱霸歐洲，它並且欲稱霸世界。它不僅追上英法美俄諸前輩，它甚至是超過其前輩。至於它在科學和文化上的供獻，甚至使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稱為德意志人的世紀，其價值和功勞不為不偉。

第九章 德意志統一運動之特徵和教訓

十九世紀下半期的德意志民族之統一和建國運動，就其特徵和意義說，牠是和十七世紀

的英國革命和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同樣都是具有世界歷史性質的。如果說，十七八世紀的英法兩民族所發生的革命運動，其歷史意義是使自由主義擴張於歐洲和世界，那麼，十九世紀的德意志統一和建國運動，其歷史意義就在牠使國家主義的潮流瀰漫於東歐南歐甚至東方的日本及其他一切較後進的民族。如果說，英法兩民族是代表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典型，那麼，近代德意志民族，就是一個代表國家干涉主義的新類型，同時也是近代軍國主義的新類型。從歷史的類比上說，如果說，英法兩民族是近世史上的雅典，那麼，德意志民族當然就是近代世界史上的斯巴達。德意志民族哲人費希特說：「德意志人是其他「人類」的先鋒與模範，負有創造新時代的使命」。自然，這種論斷如果施之一般，自不免犯了國家主義的誇大狂。但如果縮小範圍，說近代德意志民族所發生的運動，是代表近代國家干涉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類型，並為牠同時代和稍後於牠的其他後進民族所模倣，那確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德意志民族確是一個新「概念」。牠從模倣外國文化和醉心外國文化起，結果走到反對一切非德意志的（Da-German）文化。

這是近代德意志民族建國運動之主要特徵，這種特徵是如何形成的呢？知其「當然」還不夠，我們必須知其「所以然」。

自中世紀以來，當接近大西洋的西歐各民族離開牠們的封建歷史搖籃而走向近代統一的民族國家時，由於這些民族的發展是立在歷史的發端地位，因而也就較合乎歷史常軌關係，

所以牠們的運動，無論是在經濟上，政治上乃至一般文化生活上，都分出兩個顯明的不同的歷史階段：即專制的民族王國階段和民主的民族共和國階段。前一階段，在英國是始於十五世紀，而完結於十七世紀。在法國是始於英國同時，但因為法國的歷史發展較英國為緩關係，而這一階段的完結遂延長到十八世紀末。後一階段，即民主的民族共和國階段，在英國是始於一六四一年克倫威爾革命，而完成於一六八八年威廉第三的「權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的批准。在法國是始於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而完成於一八七一年第三共和國的建立。

就經濟和階級演變說，前一階段，無論是在英國或法國，大致都是在商業資本時代，其統治階級，則為宮廷貴族，大商業資本家，僧侶等。後一階段，無論在英國或法國，都是在商業資本已經完盡其歷史作用而工業資本正在日新月異時代。其統治階級，現在不是宮廷貴族，大商業資本家和僧侶等，而是經過國會以統治國家的一般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一般自由職業者，甚至還有勞工階級的代表。在前一階段，政治的精神尚專制；在後一階段，政治的精神尚民主，在前一階段，因為資產階級的經濟尚需要國家的保護和指導，所以經濟制度是保護貿易制，而且處處都顯出國家的強制和干涉。在後一階段，由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已如日之方中，牠便處處憎惡國家保護和干涉，因此，無論在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上，資產階級以及整個的第三等級，都是要求自由，民主與放任。這種要求的代言人，在英國為

陸克，亞丹斯密等；在法國爲孟德斯鳩和盧梭等。而十八和十九世紀的民主主義的民族共和國，就是由這些人的思想建立起來的。

這是先進的未受其他民族歷史影響的因而其民族運動能够完全合乎常軌的英法兩民族的民族國家形成之一般的過程。這種過程的最大特色，就在民族國家形成中，分成兩個完全不同的歷史段落。這兩個不同的歷史段落，是以革命爲分界嶺，前者不同於後者，後者更不同於前者。真是所謂「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兩階段除統一這一點相同外，絕無其他共同原則。

這是先德國及其他一切民族而發達的英法兩民族的國家形成過程中之主要特徵。

現在我們要問爲先進民族歷史發展所影響的後進民族的德意志，其民族統一和建國運動的特點果何在呢？我們的答覆是：牠的主要特點，就在其國家民族形成過程中，沒有顯明的專制的民族王國階段和民主的民族共和國階段之區分，而是使前後兩階段在同一時間出現，使兩者發生混同，且合而一。

我們已經指出過，德國自中世紀以來，社會歷史方面是發生退落和分解運動的，迄至十七八世紀，又因爲歐洲文化發展的方向而發生轉換問題，所以使德國至十九世紀中期還是一個封建諸侯林立的國家。當時「德意志」一名詞，和同時期的「意大利」一名詞一樣，只是一定地域的地理和種族的名稱，並非一政治名稱。換句話，當時的德意志民族，只是在血統

，語文上是一個民族；而在經濟，政治甚至文化，宗教上都不是一個民族。就政治上說，當時的德意志是分為好幾十個獨立國家。而這種分裂比辛亥革命後的中國有過之無不及。

可是當德國因地理和在歷史關係，由歐洲強權地位轉入非民族國家的封建的無政府狀態時，這時卻是西歐北歐甚至東歐一切民族國家同時出現時代。這時候在西歐最大的民族國家，有英國，法國，西班牙，荷蘭等；在北歐有瑞典，丹麥，在東歐有廣大無垠的俄國，德國這時處列強之中，由於自身不能統一，對於諸強國所加於牠的欺侮，只得極盡民族容忍之能事。隨後當英法爭霸歐洲，特別在拿破崙戰爭時代，德國復因自身分裂不統一之結果，更成為列強的犧牲品。迄至十九世紀初，工業革命和文化革命以來，英，法，荷，瑞，丹等國，特別是英法，不僅在政治，軍事上高出德國許多倍，而且在經濟生產，商業交換和一般文化事業上，也是高出德國許多倍。德國處此情形下，不欲圖生存則已，如欲圖生存，捨對英法兩頭趕上去外，又能有甚麼辦法呢？在歐洲經濟生活，因工業革命和輪船鐵道的發達，已完全進入大工業時代，德國豈能再去重渡法在十七八世紀那種海外掠奪的商業資本歷程麼？在政治上，當歐洲的政治革命，特別是法國大革命的結果，使民主自由的空氣已瀰漫全歐洲，甚至全世界之傾，德國此時豈能對英法一步一趨的再去建立為世人所憎惡的十六七八世紀的專制主義麼？總說一句，當此世界歷史和世界文化已進入十九世紀時代，時間還能給德國民族一個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讓牠獨立的不受干涉的發展自如的先經過長時期的專制的

民族王國階段，然後再來發展民主的民族共和國階段麼？不能，絕對不能。但是牠能否跳過專制的民族王國階段而直接躍入民主的民族共和國階段呢？這是同樣的不可能。這種不可能，不僅因為在經濟生活上，德國不能採取同時代的英法那種個人主義的和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而且重要的，還在政治生活上，當時的德國更缺乏一個較強大的資產階級和統一的集中政權。在歷史上，除了希臘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外，在凡沒有統一政權的民族內，國民欲廢除封建統治而完全由人民革命來建立共和國，實沒有可能。我們知道，自法國大革命直至前世紀六十年代止，德意志的自由資產階級始終都是以英法美為模範，想建立一個完全自由的民主共和國，但是，這種企圖，最初經過法國的扶助，繼之，經過反動時代的不斷的犧牲，終而爆發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革命，但結果還是一場夢幻。前世紀上半期，德國自由資產階級之欲模倣英法立國原則，恰同本世紀二十年代至現在的中國小資產階級之欲模倣蘇俄立國原則一樣。這兩種模倣都是進步的模倣，但皆犯同一錯誤，即忘掉了模倣者與被模倣者之間的歷史區別。而兩種模倣又都得到同一結果，即模倣者都為被模倣者所利用，而同時又在模倣之中，引起極端之反動，終至視自己的過去和現在的一切都是好的，而視外來的一切，皆是毒物。十九世紀的德意志民族既然欲建立純專制主義政治和純民主主義的政治皆為不可能，那麼，牠的惟一可能的道路是甚麼呢？自然是冷二者為一爐，即將英法兩民族歷史發展的兩步，當作一步走。由於德意志自由資產階級欲模倣英法在德

國建立純共和國之不可能，而德意志的地主貴族欲建立十六世紀專制主義又同樣不可能，因此，德意志民族運動所建立的國家，不能不是專制與民主之混合物。

德意志建國運動之最初目標，本來是專制的民族王國，但牠此種運動一開始，在國際和國內，都遇到民主潮流之有力的反抗，並要牠非給以適應不可。德意志建國運動之最終目標，本來是民主的民族共和國，但牠在實際歷史之可能範圍內，却是才起始進入專制的民族王國階段。這時專制的民族王國固然是真實的並且是適合歷史需要的，而民主的民族共和國也同樣是真實的和是適合歷史需要的。雖然這兩種精神之每一種皆憎惡他一種，但是這兩種精神之每一種，却不能絕對排除他一種。這恰等於德意志的自由資產階級之不能打倒德意志地主，和德意志的地主階級也同樣不能絕對排除德意志的自由資產階級一樣。

不錯，德意志的地主階級，特別是普魯斯的地主階級，因為十九世紀，德國農村經濟資本主義化之結果，固是德國政治鬥爭中之強大階段，但是，同時德國自統一建國一開始，德國不僅有為十六七世紀英法兩民族統一和建國運動第一階段所沒有工業資產階級，甚且還有為牠們在後一階段一開始，即英法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所沒有的無產階級。甚且這是使馬克思錯估計「德國革命即時會成爲引起無產階級革命之序幕」的原因。但是，不管這時德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怎樣強大，並且不管德國自由資產階級的理論和馬克思恩格斯的「不斷革命論」是如何的新穎，但他們均不能獨自用他們的拳力來打倒當時德國三十六個獨立小邦

和封建統治。這時能够打倒這三十六個獨立小邦統治來建立一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的，還非借助於一個較大的封建諸侯普魯斯的君主不可。反過來說，一個封建的普魯斯君主要想出來統一全德意志，他如果反對民主而不能獲得全德意志的資產階級及知識份子之擁護，即使他是一個較大的君主，他在國際和國內諸種不順利條件下，絕無收獲全德國統一之希望。並且在這種情形下，德意志各邦自由資產階級，他們爲他們的權利與自由計，他們寧願擁護各小邦虛偽的立憲，但他們絕不願與普魯斯一致去，犧牲立憲進行統一。因此，德國統一和建國運動，非使「統一」與「憲政」，「君主」與「民主」合而爲一不可。這是歷史自己所選定的道路，非人力所能改變的。於是自下而上的國民力量與自上而下的王權只有合而爲一，以完成民族統一和建國運動。這也就是中國的孫中山先生的公式：「民衆與武力結合」，而「北伐」與「國民會議」同時並進。誰反對這一公式（不管是自左或自右），誰便破壞這一歷史運動，誰便是歷史罪人！當然，也可以反過來說，誰如果有堅定的意志和適當的政策來適應這一歷史趨勢，誰就是歷史上不可磨滅的偉人，英雄！歷史是無情的，因爲歷史是憎惡牠所討厭的人，歷史又是有情的，因爲牠又愛護牠所喜悅的人！

各民族所生活之時代是過於個性化。各先進民族所發生的事變，雖可影響各後進民族，但這種影響到底只限於後進民族所能接收的。各後進民族在它的歷史進展中，雖可以師法各先進民族，但這種師法畢竟是有選擇作用的，且必須是從後進民族的自身需要爲出發點的。

不從自己的歷史需要爲出發點，便會如德意志民族哲人費希特所說：「外來的東西將會成爲磨難自己的種種罪惡」。因之，十九世紀德意志民族在其民族統一和建國運動所特創的國家形態和社會制度乃至整個文化生活，不能不是十六七世紀專制王權與十九世紀的民主精神之混合物。或者更恰當一點說，牠不能不是以君主和軍國主義爲骨，以自由和民主主義爲表的混合物。至於德意志民族之所以非成爲國家干涉主義的「範型不可」的重要原因，就在牠是一個後進國，因之，牠無論是在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上都非有國家和政府之積極提倡和保護不可。十九世紀，爲西歐先進國的英法所提倡的經濟原理，是自由主義和自由貿易；但在德國則爲國家經濟和政府統治。十九世紀英法兩民族所要求的政治制度，是把政府的職權縮小到最低限度，把國民各個人的權利伸展到最大限度；但在德國則反是：牠是把國家的干涉擴展到最大限度，而把個人的權利縮小到最小限度。十九世紀英法兩民族的一切技術和科學之發達，完全是國民自發活動之結果，反之，同時代的德國，其一切技術和科學之發達與發達，多半是政府保護之結果。一八四一年英國官立機械輸出調查會對當時普魯斯政府努力把英國的機械知識輸給國民和政府，在工業及科學教育的指導作用說得最爲明白：

「我在柏林發見政府爲獲得機械製造支配權所行使之最遠進的和最有組織的努力。我不曾遇見過爲這種目的而有節省費用的事，此等努力十分使我驚異。柏林有一個極重要的機關，叫作格維柏學院（Gewerbe Institut），這是涉及各部製造業——這裏面加入科學和機械學

——之實際教育的大建樹。隨着教授走進該學院的宿舍，看見一排房間，完全充滿英國機械的模型。教授告訴我，在這些房間裏有英國的棉花，麻，絲和羊毛製造的各種機械模型，同樣，也有多數美國的和德國的。由於這些工具，他們能有我們最近所改良的機械。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們每能將兩個爲英國所特計的各別的東西，結合在同一的機械上。這是非我們所能辦到的。

「他們告訴我此種組織：這些機械一經英國發明時，即以政府的經費直接輸入，置於格維柏學院中；自己直接製造的運轉模型，亦藏之該院；最初的機械，是政府會對普魯斯製造者給予賞賜的代表。該學院的學生，訓練自己製造機械，學院供給器具，學生則承認以所造的機械與之。」

但是，我們還是回到與近代德意志民族最爲有關的，德意志國家生活之說明上吧。如果說，近代德意志民族，在其統一和建國運動中，沒有經過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那樣激烈的流血犧牲，而竟獲得某種程度的憲法政治和民主政治，是其歷史之特點表現，甚至是其歷史優點表現；但同時我們也可以說，也是其歷史之缺點表現。爲甚麼？因爲德國的民主政治既然不是資產階級和人民革命成功之結果，而是上層階級被迫改良之結果，則這類民主政治自然容易成爲有名無實的東西。因之，德意志的實際政治，自然容易爲君主，貴族，軍人所把持，而以壓迫德國的國民大衆爲能事。

其次，一切帶有二重性的政權，牠是從來不能立在原來的立腳點的，因之，牠隨着社會階級勢力的變遷，牠不是更傾向於國民，牠必然更傾向反國民。因之，此種政權，後來果因德國資本主義之高度集中和政府所握的物質力量之增大，終於變爲帝國主義政權。果然，德國自威廉第二御極以來，德國政治便日趨反動。德皇威廉第二嘗說：「德意志帝國之統一，乃兵士與軍隊之功，國會中之大多數無與也。朕所恃以爲長城者，即在軍隊耳。」又說：「吾德意志之成立，不在國會，乃在精練之陸軍。故德雖名爲立憲國，其民權實不足言；雖有選舉代表之制；亦等於無」。又說：「朕爲上帝之僕，我行我法。現代之思想，在所不顧」。此種武斷專橫之言論，竟出諸一國君主之口，非證明這一民族的民主政治之有若無而何？。德國是一個軍閥統治的模範國家，某德人形容得最爲明白，他說：「在德國，郵政與路政，既是軍隊的「文職機關」，他們的局長，往往是由軍人充任。在這兩種機關裏面，約有七十五萬個職員當上司訓誨時，會立刻立正」。顯然的，一切國家機關，甚至社會機關一律軍隊化，並且把軍隊的絕對服從精神發揮到各方面，這就必然會損害一個民族的國民品格，自尊性和特殊才能，而在反一方面又必然使國民中無骨氣者和隨聲附和者日漸加多。結果則全部國民教育，特別是歷史教育，政治教育和倫理教育，必然變爲一國君主和少數文武官僚以達其私圖的工具，而結果，又必然使整個國家成爲少數貴族，軍人和官僚的私有財產，而與大多數國民的利益背道而馳。

然而惡害還不止此。當一個土地廣大國民衆多的民族，一旦因工業，科學，物質文化之發達，而獲得無限物力和經濟力量時，他因為傳統歷史和階級利害關係，而不能同時有良好的民主政治神經司其指導，則爲少數軍人所統治的這一民族的政治生活必然如脫韁之獵馬，且「可以使牠供獻世界爲天下先者，一變而爲貪求權力之封豕長蛇」。其最後結果，將使整個民族之舟駛向~~滅亡~~和毀滅之途！因此，深謀遠慮爲德意志帝國之手創者畢斯麥，當其末年對於他所備極保護的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生活，作長時期診斷之後，他對於它的政治改造提出如下的值得爲正在抗戰建國的我們借鑑的意見。他說：

「把議院的勢力打倒至現在的程度，也許是我不自覺的供獻。我却並不想永遠使議院處於這樣低的水平線上。我很願意看見議院再得着穩定的大多數。沒有大多數，是不能得着自己所欲得的勢力。議會的永久本務是批評，管制，警告政府，而且在某種環境之中，還要指導政府。我們必須有這樣一個帝國議會，不然的話，關於我們民族的發展的經久與結實，我們將很放心不下。」

又說：

「我的盡職的行爲也許就是使德意志變作可哀的無骨氣的原因；又是使謀事的人與隨流逐波的人們人數增多的原因。最緊要的就是鞏固帝國議會。但這一層惟有選舉澈底獨立的人才能夠辦到。現在的帝國議會是很退化的。若其接連退化，前途是很黑暗的。我深信危機越

來得遲是越危險。我一向未改變宗旨，以為不服任何人，好過嘗試號令他人。我一向都存了一種共和見解，若是你們喜歡這樣的話，也許上帝將給德意志以第二期的腐敗，繼以新的光榮時代——這種時代必以共和為基礎」。

所可惜的是畢斯麥具有這種正確預見並不是在他手創帝國之初，而且是在其卸卻首相責任之後，甚且是在末年時期。因此，這種正確的論斷，牠對於當時的德意志只能是一種預言，決不能成為實際政治改造方針。但是當一種對症下藥的方案而不能為政治當局所採用，則這一民族的政治前途又將如何呢？牠果然覆滅於上次大戰之中，而且代之而興的確然是如畢斯麥所預料，是「以共和為基礎」。

但是，天道好還，現在希特勒統治下的第三德意志帝國，牠又是一個為少數軍人所統治的典型國家，牠的前途又將如何呢？重演過去？抑另闢歷史前途呢？

今日中國負與邦建國責任之人物，其以德意志之統一和建國運動史之得失為借鑑歟！

日本明治維新運動

第一章 緒論

近代日本民族，是由明治維新運動產生出來的。而日本明治維新運動之成功，不僅改變亞洲諸民族（中國、高麗、台灣）之關係，甚至也大大的影響了當時世界政治之變化。

一位德國學者論德國古典哲學說，德意志民族沒有參加近代諸國民之革命，却參與其改革，是德意志民族在近代史上完成了一種可以自負的歷史運動。（註一）如果說這位德國學者這種論德意志民族的語是對的，那末，從未參加近代諸國民革命，然而在短時期內，獲得偉大成功的日本明治維新運動，比之近代德意志民族運動，當更可以自負了。

註一：見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學哲學批評。

但是我們應怎樣來了解這一在近代史上比德國更可以自負的日本明治維新運動呢？這是由於日本民族特別優於其他民族使然麼？這是由於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能特別努力使然麼？不是，一概不是。這是由於日本民族傳統歷史發展之特徵和其與世界歷史接觸時之偶然關係造成的。

如果說，歷史之科學研究，既有在相類似的歷史現象出現得更多時才有可能，如果說，

是在中央民族統一運動與我們的東鄰的歷史廢物堆中那種早已滿被灰塵的日本民族統一運動。這即日本明治維新運動是相比較的，那麼，我們或許比我們東鄰的歷史家更容易去理解他們的光榮的近代歷史運動之性質。我們並不想否認日本民族近代史上之偉大的努力，我們只想指出，這種偉大的努力只有在一定的歷史前提之下才能發生效用。中國民族在近代史上也曾有過幾次努力（如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等）但他們努力的結果，不但沒有把中國推上近代民族的家舞台，反而使其江河日下者，也是由於一定的歷史前提決定了的。把這兩種不同的歷史前提加以比較研究，我們實不難發現日本明治維新運動之歷史特質與其成功之原因。

第二章 明治維新運動之歷史前提

我們的課題，是日本明治維新運動。日本明治運動雖得力於世界歷史之偶然幫助，但畢竟是日本傳統的歷史之一階段。因此，這一階段，不僅與傳統的歷史有密切關係，甚且也是由傳統的歷史發展特徵準備下來的。許多偉大的突發的歷史運動，不管它們在表面上怎樣表現為民族刺激或外部文化影響之結果，但在本質上，絕然是一個內在歷史的規定和產物。這一內在的規定和產物雖可以利用歷史的偶然為自己騰達的條件，但其自身絕不是諸偶然之堆積。寧是以必然性，即內在的傳統的歷史的必然性為前提，為自己決定因素的。因此，我們

要研究日本明治維新運動，我們對於日本民族的傳統的歷史特徵，特別是與日本維新運動有密切關係和直接影響的日本歷史上兩次倒退運動，特別是宋二次的倒退運動，是不能不先加以研究。否則，我們對於日本明治維新運動就不能有深澈的瞭解。

我們要討論日本民族的歷史發展之主要特徵和其歷史上所發生的兩次倒退運動，我們首先不能不將日本民族所處的島嶼自然條件置諸心中。日本雖然是一個島國，日本的歷史發展，頗類似希臘羅馬歷史發展的。但因為日本這個島國不是處於多鄰島和鄰國的裏海之中，而是處在四無近鄰的大洋之中，使它在事實上等於一個孤處的大陸國，因此，它的傳統歷史發展，又不能不是以大陸民族歷史發展的特徵為特徵。

固不難說，在西洋文化未侵入日本以前，日本却曾與中國發生過密切的文化關係，並且確曾像希臘之接受古代東方文化一樣，也接受過中國文化，甚至在某種限度內也接受過印度文化，然而這種接受所生的結果，彼此起希臘味，完全不同。在希臘，它是從接受東方文化之中，創造出更勝於東方的古典的奴隸資本主義文化；在日本，它始終只限於所接受的高度，且始終是希臘文化的孳生培養，是中國文化的附庸。為什麼希臘能從接受之中創立更高的文化形態，而日本不能呢？其主要原因，就在希臘的地理優於日本。

希臘是處裏海之中，它的鄰近有各種種族不同文化不同出產不同的民族，文明的和野蠻的，因此，處在這種環境之下的希臘民族，只要內部一旦有了較高的文化種子的傳播，特

別是有了相當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它不僅有充分的可能和鄰近各民族建立密切的經濟關係，以吸收其他各民族——特別是比它更落後的民族——的血液發育自己，充實自己，和提高自己。已到古代文化發展的頂點，而且最重要的，還在它能得環境和交通的便利，當它內部因商品經濟發展而生出人口過剩時，它能建立解決本國內在危機的殖民制度。由於希臘，一方面，能和其他民族發生密切的經濟關係乃至文化關係，以增高其本國財富和文化生活，而他方面，又能建立解決本國內在危機的殖民制度，所以一旦有了相當文化基礎之後，便能創造出爲古代東方各國所無的高級文化形態來。這種文化不僅在外表上不同於東方就是在本質上也不同於東方。換句話，希臘接近東方文化，不是和東方本部文化傳播一樣，接受只是重演先進民族的過程，而是從接受之中造出文化的上昇，造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反之，在西洋文化未侵入以前，日本之接受中國文化完全是走另一條道路。日本從接受中國之中，不但不能產生更高的文化形態，並且每當內部文化發展至一定程度時，它還不能不循中國民族和一般東方民族文化發展的規律，生出文化倒退運動。

爲什麼日本過去的文化發展每至一定程度時，不能不生出文化倒退運動呢？這完全是由於日本民族的地理條件使然。我們已經說過，日本是處在四無近鄰的大洋之中。而這種大洋在近代航海術未發達以前，它不但不是日本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的因素，反而是使其變爲閉塞的大陸國的因素。因之，在此以前，它是不能和希臘一樣能和其他各種民族建立密切的建

經濟關係的。日本的商業資本發展，曾使它侵略邊朝鮮，但當時的朝鮮之於日本，並不像同時代的美洲之歐洲。這是因為朝鮮在文化史上却不是一個比日本更低的民族，而是比它更高的民族。日本的海賊團體，即倭寇，在明朝時也曾叩擊過中國門戶，但是當時的日本對於中國到底不能如希臘對波斯一樣，日本海外發展不能不是絕望的歷史企圖。既然日本不能對其他民族建立密切的經濟關係以發達國內生產，既然它因缺乏新世界關係又不能建立解決本國剩餘人口的殖民制度，因此，當它內部因商品經濟的發展，即國內商業資本的發展，而生出來的剩餘人口無法解決時，便必然要爆發出發達歷史繼續前進的廣大的農民和小生產者的暴動。

自強烈的農民和小生產者的暴動，必不可免的要使商業資本的中央主權趨於崩潰，隨後依照着歷史鬥爭的一定邏輯推移，便轉為諸侯的互鬥。這樣就自自然然地把歷史由高度的城市文化拉回到封建初期的野蠻的後方，而使過去全部的崇高的文化生活一時歸於毀滅。（註一）

註一：參看拙著中國文化問題導言。

但是歷史是不能永遠退落下去的。當它退落到一定程度時，歷史又要開始其復生運動——商品經濟和城市文化的復生。因之，那種以物質和精神，在文化的廢墟上所建立的新文化的花朵，只要是它的內在沒有獲得解決矛盾發展的條件和手段，在發達至一定限度時

它不得不反反覆復重蹈那不幸的歷史的覆轍。這真是人力所不能戰勝的不幸，並且構思在這種環境內的國民，他們也不知怎樣去戰勝這種不幸。他們完全是歷史矛盾發展之下的犧牲品。假如他們在先前對這種不幸曾經採取過預防行為，那就是無希望的去反對歷史的自然需要，即反對商業資本發展。極重說一句，這真是人力所不能戰勝的不幸！這種人力所不能戰勝的不幸，在時間悠長的中國民族史上實出現過無數次，而在時間較短促的日本民族史上，顯然是出現過兩次。而末一次的歷史倒退運動是與我們所討論的課題是有密切關係的。可惜，這兩次倒退運動不為日本歷史家所了解，因此，使他們在解釋本國歷史矛盾發展時遂不免使自己也陷於永遠不能解決的矛盾中。

日本的近代歷史家，如佐野學，野呂榮太郎等，因為他們對於歷史退落運動之無知，他們都企圖在日本歷史上兩個重要的時代——室町時代末和德川時代末——的社會混亂運動描寫為進步的社會革命運動。但是變革過來的社會形態是什麼呢？他們也都不否認，不是高於從前的，而是比從前低。引他們的講來說，就章由封建發展到封建。實際上，這兩個時期的日本社會運動完全是歷史退落運動表現。只要我們對人類社會發展有一個一般的概念，我們對這兩個時代的日本社會運動即不難作本質認識。

日本的封建制度是建立於大化改革以後。而大化改革以後的日本，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都是其歷史猛進時代。這時候有一個帶動日本歷史發展的特別因素，就是高度的復興的唐代

中國文化之輸入。唐代中國文化的輸入，對於日本文化發展演過重大的作用。日本的物質文化，如陶器，裁縫，製革，建築，制鐵，鑄錢，量衡等等，固是由中國輸入的，就是日本的社會文化，如兵制，國家制度，和日本的精神文化，如宗教，醫學，歷書，文學，哲學，也都由中國輸入的。國外高度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之輸入與移植，不僅大大的促進日本農業之進步，並且也大大地促進了日本商品經濟和城市文化之發達。日本的商業資本之發達，經過奈良平安至室町時代，不僅發達出國民性質的商品經濟，發達了典當業和金融業，甚至也發達出保護此種經濟生活的政治制度——集中的中央王權制度。至室町時代，日本商業資本發展已經達到破竹行會過程了。一句話說完，室町時代日本社會經濟之發展已經達到十五六世紀的歐洲的社會經濟高度了。

雖然，日本這時候並沒有和歐洲大西洋沿岸各國一樣，從室町時代急轉直下的發達到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爲什麼沒有呢？因爲當時的日本不能和歐洲大西洋沿岸各民族一樣，能剝削其他落後民族發達本土生產，能建立殖民地解決本國因商業資本發達而生出的剩餘人口。因此，這個時期的失去土地和職業的農民便完全陷於歷史不能解決的無出路地位。因此，至室町時代後半期，日本不斷的發生所謂十一揆暴動。這種沒有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作領導的貧民暴動，它所產生的唯一歷史結果，是使商品經濟和中央王權趨於崩潰。中央王權的崩潰就是地方諸侯政權之建立和擴大。地方諸侯政權之建立與擴大，就是諸侯混戰之開

端，就是日本歷史上「戰國」時代的來臨。總說一句，日本歷史這時又退回到封建發展的出發點了。

日本歷史上的戰國時代，是日本歷史上罕見的地主專權時代。與中國歷史上的三國五代和德國歷史上三十年戰爭在本質上是沒有任何區別的。

我們應區別清楚：歷史的發展運動與歷史的倒退運動是絕然不同。歷史的發展運動是為了解放較高的社會形態對於較低的舊社會形態之克服，而歷史的退落運動完全相反，牠不是解放較高的社會形態，而是加以摧毀；牠不是克服較低的舊社會形態，這是使較低的舊社會形態返老還童地再生活一次。日本這個時期的社會運動，牠沒有把日本由商業資本的社會階段推到工業資本社會階段，而是把它又推回到大化改革階段，即商業資本開始發展的階段。

戰國時代的末期，日本歷史上出現了信長，秀吉，家康之類的人物。不必說，這類人物，與中國歷史上的隋煬帝，唐高祖，趙匡胤，朱元璋等都是個歷史母親的產兒。這些人物的特點，就在一方面是對於過去混亂局面之結束，他方面，對於未來之開創，即對於中央王權之開創。換句話，這些人是居於商品經濟之復活時期，他們的努力是徧重未來的。

家康以後，果然是日本經濟生活，特別是日本的商品經濟復活時期，但同時也是日本的一統一政權再建時期。而此種統一集中政權之再建運動由豐臣至德川卒告成功。但這裏却有一

個非當時日本統治階級所能解決的矛盾。即商品經濟之復興與活動固是建國時期任何一個統治者所希冀的，但商品經濟的發達和由它所生出來的社會危機却是當時的日本統治階級所深為畏懼的。因之，這時期的日本統治階級也和秦後許多朝的統治階級一樣，他們為防止農民革命，使他對於商品經濟之發達便採取了抑制政策。德川時代的銷國政策就是這樣產生的。

可是，商品經濟，當它為歷史所需要時，它簡直是一個怪物，是一個殺不死的九頭蛇。這就是說，當商品經濟為歷史所需要時，你如果斬去它一個腦袋，它會生出更多的來。德川時代以來的銷國政策和防止農村分化的限田法，在實際上，不但沒有阻止商品經濟和商業資本勢力的發展，甚且這時期的日本的資本主義之發展和社會分化比室町時代有過之無不及。不過它這第二次因資本主義發展和社會分化所生出來的社會危機，其解決之途如何呢？如果說，這種貧窮人口不能在民族的搶劫和殖民運動中找一個出口，它除造成歷史倒退運動的貧民暴動外，還能有別的希望嗎？

豐臣秀吉以來，日本的統治階級，雖然和中國的秦始皇一樣，搜索民間的刀劍，不許民衆攜帶武器，然而到了德川時代末期，農村仍然不斷的發生農民的暴動。享保五年，奧州白河暴動，享保十年，作州津山大暴動。元文三年，奧州泥川八萬農民暴動。寶歷四年，二十八萬人的大暴動。文政五年，紀州，松山，大和，丹波，伊勢各地總暴動，此外，還有京都

，奈良，郡山，明，伏見，山田，甲府，靜岡，與州城市貧民的暴動，最著名的，如明治三十年前的太閤平次郎的暴動。

所有這些暴動。都不是由中央王權的力量鎮服的，而是由各地紛起的諸侯的勢力鎮服的。地方諸侯在與暴動的農民鬥爭中，一方面，固使其經濟地位比以前困難，但他方面却使他們的獨立勢力比以前更提高了，恰像室町末期的農民暴動之結果，又造成了日本社會歷史之離心力運動，即退落運動。

當西洋資本主義各國在前世紀後半期捲土重來侵入到日本民族時，這時候彈丸的日本並不是一個統一民族，而是分裂為好幾個小的獨立國。雖然如此，這一次日本社會歷史退落運動，不幸中實含有大幸。蓋日本當外部資本主義列強未挾着兵艦大舉侵入日本以前，日本民族內部却已經經過了它的內在的社會危機，並且遠在明治維新運動之前，它已開始其歷史的向上運動，即集中王權運動（註一）設若日本的內在的社會危機晚四十年或數十年發生，這時候適值內外危機同一時期發生，那時決不會有近日本民族的。僅僅因為外部的民族壓迫適在內在的社會危機發生之後。這時候外部的民族壓迫不但沒有滅亡日本，反而刺激了它的歷史向上運動，即集中王權運動。而集中的王權運動，即日本的政治統一運動，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新民族文化改造的前提。

註一：我們把近代日本民族的維新運動之所以稱做「明治維新運動」者，是指這一運動

大致是在明治時代完成的，並非說這一運動是開始於明治時代。其實近代日本民族的維新運動，如果不能說是從德川末期開始，至少當嘉永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其時土佐藩和福井藩之流的諸侯所計劃的憲政實施綱領，實類似十九世紀初德國的普魯士和烏登堡之改革。其後，特別可以視為明治維新運動之前驅者，則為慶應三年，土佐藩藩士阪本龍馬所定之八策。實際上，阪本龍馬這時所定的八策；比後來明治元年所頒佈的五條御誓還更為具體而明朗。八策的內容如下：

第一義：招致天下有名的人材以供顧問。

第二義：選用有材的諸侯，賜以朝廷之官爵，除現今有名無實之官（這兩項可視為主張撤廢封建的政治組織，而要求樹立官僚制度）。

第三義：議定外國之交際（這是捨棄銷國政策而主張開國）。

第四義：撰律令，定無極之大典。律令既定，則諸侯伯皆奉之以率部下（這一項可視為要求成文憲法，主張憲法政治）。

第五義：上下議政所（這項是要求由上院下院而成的議會制度）。

第六義：陸海軍局。

第七義：親兵（這兩項是主張軍制改革，軍權統一和國民皆兵主義）。

第八義：使皇國今日之金銀物價與外國平均（這一項是主張開發對外貿易）。

第三章 明治維新運動之經過

一個具有相當文化基礎和傳統的民族，當它與外部的強敵相遇時，這個民族能否藉此發，抑或由此歸於亡國而喪失其統治權，這事不能純粹決定於外部敵民族的態度，而最主要的，是決定於這一民族內在社會情況——是向下抑是向上。如果這個民族在與外部的強敵相遇時適當其社會在向下運動時代，這時候外族之侵入和取得它的統治權，與其說是由於外的偶然引起，無寧說是由於內在的必然促成。例如，希臘之亡於羅馬，羅馬之亡於日耳曼，明末中國之亡於滿人，都是上述歷史公律之證明。反之，當一個民族與外部的強敵相遇適其社會歷史在向上發展時代，這時候外部勢力之侵入，不但不能毀滅它，反而會加速其社向上運動。例如，紀元前四八〇年的希臘，和十九世紀德、意、日，諸民族建國運動亦是證。

從十九世紀以來，日本與中國先後同時與西洋資本主義各民族發生關係，然而在這種觸之中，一則很快的變為強國，一則長期為列強所支配者，此無他，其原因即在一與列強觸時適當其內在社會危機已經結束而歷史正轉入向上運動階段，一與列強接觸的時候正逢內在社會危機進入總爆發階段，而帝國主義之侵入，不僅加速了，並且也加深了這一歷史下運動。

一八四一年、中英開始鴉片戰爭，至一八五〇年，中國便爆發以洪秀全爲首領的中國農民暴動。此運動延長至二十年之久。在暴動和反對暴動的鬥爭中，民族的精神力已耗絕無餘。洪楊暴動以後，還有許多種起的暴動。這些暴動雖爲各省新起的地主兵力（鄉勇）所鎮服，但從此統一的中國不得不無形的分解爲許多獨立的小中國，而釐金制度之實現，更幫助了這種瓦解運動。國內高度的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如山西錢莊）從此一落千丈。這種歷史倒退運動至辛亥革命已達到它的最高點，由鴉片戰爭到袁世凱帝制崩潰時止，這時候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政策，除日本外，都是有利於中國統一的，但這時期的中國民族的內在危機，不僅使它變爲麻木不仁，甚且使它陷於喪心病狂。這時的中國，對外不能執行一個統一政策，對內不能保障自己經濟之發展。然而這兩項使命之完成，是一切落後民族能否翻身上升之歷史前提。

至於日本與資本主義列強接觸時，其情形完全與中國不同。我們在前一節已經指出，日本第二次大退落運動，即日本的農民大暴動，是開始於享保五年（一七一七年）。至嘉永六年（一八五三年），資本主義列強挾着戰艦大砲侵入到日本時，日本不僅已經經過其內在的社會危機，且已開其歷史向上運動。不錯，日本這時候似不及一八四一年中國那樣的統一，但向前看，日本却比中國十倍有希望，因此，這時候資本主義列強之侵入，不但沒有毀滅日本，反而刺激了助長了它的向上運動。（註一）沒有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侵入和列強對於

薩長二藩之幫助，日本的統一運動是萬不能收如斯之速效的。而列強之所以願意促進日本統一者，這又要歸之於另一歷史的偶然，即這時候正當資本主義自由時代，日本之統一可以促進列強與日本之貿易關係。還有，就是這時候最能壓迫日本的美國，他在他的本土還有充分發展的可能，無須巨服遠處太平洋西岸的島嶼日本。

註一：當一個民族內部已經開始一歷史新生活運動即統一運動，外部的民族壓迫不但不能毀滅它，反而增加這統一運動。此事不僅由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民族運動可資證明，而眼前中國的事變足證明。中國的兩廣異動，西安事變，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痛苦的內戰之開端。但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壓迫之加緊，這些事變不但沒有使中國發生新分裂，反而使中國更進一步的統一。日本的軍部，似乎忘記了過去外民族對他們的壓迫，曾經促進過他們的民族之新生運動和統一運動的教訓，因此，他們現在在華所採取的強壓政策對中國民族統一運動所盡的作用，實比中國政府自身所盡的作用不知要大幾多倍。

明白了日本明治維新之內外歷史條件後，我們進而來說它的發展過程。

我們已經知道，日本明治維新運動是有它的歷史前提的，但是促進這運動之直接原因，是幕府（德川氏）以外來之外部民族壓迫。

在幕府末年（一八五三年）以前，俄國和英國都曾遣派過代表向日本請求通商，都被日

本的統治者拒絕了。到了嘉永六年，北美合衆國的海軍提督柏理 (C. Bell) 率軍艦四隻在浦賀進口，強制向日本要求通商時，這時候日本的武士和市民雖大事喧鬧，但日本的統治階級却被迫不得不允許通商。至明年爲安政元年（一八五四年），柏理再入浦賀，並強迫日本締結所謂神奈川條約，於是又許下田開港開爲五市通商。至安政四年（一八五七年），不得已又開江戶、大阪、兵庫新開四港。安政五年（一八五八年）被迫與英俄又締結通商條約，至六年又開橫濱、神奈川、函館三港，到了萬延元年（一八六〇），俄國且欲佔領對馬島。而文久三年，各國聯軍又開始炮擊下關和鹿兒島。（註一）

註一：柏理駛日本的準備是孤軍獨鬥的。他曾以三萬元的代價向荷蘭求得駛日本的海圖，又出巨款購得德探險家西伯爾的 (Sebold) 所著「日本」一書，並屢訪常到日本的有識者及許多學者或專門家，備承指示，以爲參考。柏理駛日本的目的，不過是要求保護這難的捕魚船，與美船以取得煤炭，食料及飲水的便利以及希冀與日本通商等事。但柏理駛日本對於日本確是其國史上之大事件。柏理於一八五二年由美出發，至一八五三年即達到日本浦賀。當美艦達浦賀時，浦賀地方官令其回長崎，但柏理非常強硬，力主直開江戶，呈遞國書，否則，即訴諸武力。當時日本負中樞責任者阿部正板對柏理國書譯本傳示百官及各藩徵詢意見。而各藩意見二日內都已送到，然大部份主張以閉關爲妙，且咸認如允許通商，即爲

遠犯祖先遺訓。此事竟發生在中英鴉片戰爭十三年後，足徵當時的日本的統治階級的世界知識並不比當時中國的統治階級世界知識更為充足。這時候日本統治階級對外之無知，在水戶齋昭的「海防愚見」中表現為最明白。而水戶齋昭的高見與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的無知的官僚當時對外的見解正是一丘之貉。雖然如此，但日本的統治階級比當時的中國統治階級是更無反抗的屈伏在美國的要求之下。但是屈伏之於一民族到底比夜郎自大為好。因為公開的屈伏，可以刺激一個民族的醒悟，而夜郎自大，只是防礙一民族之更生。

這是日本在明治維新前一部份外交失敗史，這失敗會如何驚醒日本民族，這是無須多費思索的。現在我們無須把所有這些事變的經過和如何驚嚇了當時的日本民族都加以敘述，我們現在只想來敘述一件與明治維新運動有直接關係的事，即聯軍擊下關和鹿兒島事件，我們就可以看出當時日本民族怎樣從對外的失敗中馬上轉變到對內——統一國家和改革內政。

先是文久三年五月二十日午後，有美國兵艦一隻駛進馬關海峽，因為適當潮退之時，只好拋錨以待潮漲。但當日落之時，突然有日本長州軍艦向美艦襲擊。美艦因無準備，只好切鍊而逃。至二十三日又有法船基洋號亦被砲擊。二十六日荷蘭商船又受到同樣待遇。日本民族這種違約非外的暴動，馬上給各國艦隊知道了。於是六月一日就有三隻日本兵艦為美國

艦隊所擊沉。至六月五日法國水師提督又進攻馬關，結果日本的砲台盡爲法軍所毀。

日本的排外運動已激起了普遍的憤恨，於是各國都出來要日本應負毀約責任，向列強賠償損失，否則，各國聯合艦隊對日本將施行總攻擊。這時候日本有幾個流居英國的留學生，後來日本維新運動中心人物伊藤博文即其中之一，當他們在英情知道日本排外運動和各國聯軍要總攻擊日本消息，他們便馬上趕回日本。當然，以他們的知識，他們很知道，當時的日本不但受不起聯合艦隊的總攻擊，就是任何一國的單獨艦隊向日本施行攻擊時也是不能應付。於是他們便向長州統治者建議叫他們承認與列強議和。他們的見解是極其適合當時日本民族需要。就是：如其攘夷之不能與不利，且空費國力，實不如以此力統六一割內，恢復汪政權而取開國進取之利益爲愈。

但是當時的日本的統治者也和鴉片戰爭時代的中國統治者差不多，他們昧於世界大勢，他們雖遭受了完全失敗，但卻不欲承認。他們總以爲他們還可以與敵人作一次最後的較量，故遲遲不欲議和。繼而議和時間已過，他們派出和平代表時，聯軍艦隊的英國旗艦的砲聲已響遍馬關海峽兩岸。日本的砲台和要塞均爲聯軍的陸戰隊所佔領。

失敗的長州統治者不得不納降請和。議和的條約如左：

一 從此以後，外洋船隻通行馬關時，當以親切辦理。

二 食物，石炭，薪水及其他用品，應與販賣。

三 馬關海峽，是風濤最大之處，遇有風濤時，應准登陸。

四 不許建築新砲台，舊砲台亦不許修理，並禁止架設大砲和一切軍事設備。

五 關於償金及戰費的賠償，在江戶由四、欽差決定。

這次的失敗，把日本的不知世界大勢的統治階級和頑固國民的排外攘夷夢完全打破了。四面受敵的彈丸島國的日本，再不能容許還沉浸於過去數百年的銷國迷夢中。誠如明治維新前日本的識時之士有馬勉西鄉隆盛所云：「幕府溺於三百年之太平，至於今日，文弱之弊，入於骨肉，如以犬任委之，則日本前途，不堪設想。非以我等之力救之則誰救之耶？同死也。」莫如擇大專而死，則重如泰山。請君放大眼界，勿限於小小日本之內，應入於世界之中。」（註一）因此，從此時起，日本便由對外運動轉到對內運動。嘉永六年以來由美國兵艦侵日所引起的尊王賤藩思想，此後不久就變為實際的倒幕運動。

註一：參治鄉家采著西鄉隆盛傳

明治維新運動不是別的，它是國內最大的諸侯及一部分朝廷公卿和下層武士階級反對國勢分裂的封建諸侯而使政權走上集中統一的一種運動。這時候日本在事實上分為許多獨立的小國。在許多獨立的小國中，也有三個較大的權力，這就是幕府，長州藩，和薩摩藩。如果說，日本的統一運動不能由資產階級和下層人民革命來完成，那就必須要在這三個較大而權力之中選擇一個出來為統一日本的主腦。這就是說，在未實行統一之前，這三個力量是

必先較一個高或勝負。這恰像德國在未統一以前，普魯士與奧大利須先較一個高低和勝負一樣。然而我們又可以先告誦讀者一聲，這是個一決雌雄的鬥爭，總是由那個在經濟上最佔優勢又能適應世界潮流的強藩來收穫勝利的果實。這個強藩在事實上就是長州藩。

但是決定勝負的機會果麼來到了。不待長州藩的勤王倒幕運動的口號叫出以前，數百年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幕府已決定對長州施行討伐了。但是幕府之討伐長州却非始料所及的把事向互相親伺的薩長二藩的關係改善了。爲什麼？因爲薩長二藩當時處在唇齒相依的地位。如果長州失敗，薩摩非受制於幕府不可。因此，薩長在勤王名義之下聯合起來以抗幕府實爲得策。並且薩長因地理優越關係，特別是長州率先與西洋文化發生關係，率先取得西洋軍事技術，率先收得外交教援。因此，薩長在勤王統一日本精神之下不僅取得帝都公卿，下級武士和資產階級之贊助，甚至也取得國外之同情。因此，薩長聯合倒幕運動的第一幕便操了勝算。

幕府失敗了，我們要知道，數百年來，幕府之所以能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全在戰的軍事勢力。今日一旦在薩長二藩之前遭了失敗，則勤王運動之抬頭和幕府之完全崩潰自不可避免。所以在慶應三年十月十四日當皇朝討幕密令發下後，同日幕府的將軍慶喜便將大政奉還王室。由於慶喜奉還大政之神速，故討幕軍如入無人之境，進占了京都。這樣，討幕勤王運動又奏了第二次凱歌。

幕府是崩潰了。王權統一運動雖收了初步的效果，然實際上，仍然是有名無實的。第一，是王室沒有自己的兵力，而所有的兵力都是向勤王各藩借來的。第二，是王室無政治實權。常時據有土地的各藩還是各自爲政，各自徵收租稅，各自施行行政，並且各藩還互相窺伺，互相企圖發展己勢。第三，王室既然不能直接過問各藩行政和稅收，自然無財政基礎。因之，所謂朝政奉還仍有名無實。而要想建立強有力的中央王權，非各藩奉還版籍和廢藩置縣不可。

現在有許多日本歷史家，他們都把明治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薩長土肥四藩連名奉還版籍一事，視爲是日本貴族階級無上的盛舉。但是他們忘記了一件事，就是在幕府崩潰以後，薩長二藩在事實上是沒有中央王權之領導地位。因此，他們這時候率先奉還版籍，不但不損失自己的利益和權力，反而增長了自己的利益和權威。日本的歷史家是太爲日本的武士道的神話傳說所欺騙，他們把維新運動中的大人物一舉一動，都描寫出自純粹的高尚的動機，但他們却忘記了就在這些純粹的高尚的動機之中，實隱藏着深遠的階級利益和個人利益。自明治二年薩長土肥四藩率先奉還版籍後，迨至同年六月，全國領主先後都奉還朝廷。至明治四年，所有各藩知事悉被召宣佈任職，於是數百年來的武人政治從此完全歸於王室。

從明治元年始，至明治十年西南戰役結束時止，這個時候是日本社會及政治之大震動時代。這時薩藩的反抗固不必說。就是統治較穩密的薩長二藩內亦有瀕於崩潰的危險。武力是

一切新時代誕生之產婆。在這短旬十年之內，日本經過了近百次的戰爭，而每次戰爭都是由薩長爲基礎的王室軍隊奏凱歌。最後，直到十年西南戰役結束後，帝國統一的大業才告完成。（註一）

註一：近代日本民族統一運動，因其國土之褊小，總比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中國民族的統一運動收效較速，但其封建勢力和農民之叛亂如果單就次數說不但不比中國的封建勢力和農民之叛亂爲少，甚且比中國爲多。如果說慶應三年，薩長討幕運動是統一對封建之勝利，那麼，以後一切叛亂皆可以說是封建士族和農民對統一之反抗。如伏見鳥羽之戰，上野彰義隊之戰，仙台米澤之戰，熊本之戰，水口之戰，西南之戰，其他如播磨之亂，佐賀之亂，宮崎之亂，實爲這類反抗之最重大者。在這些反抗運動，有時表現爲封建士族和農民合而爲一，有時表現爲士族和農民分道揚鑣，但結果都遭受了悲慘的失敗。這並不是因爲日本的封建士族和農民勢力在數量上不及代表統一的勢力強大，只是因他們的運動是反歷史和民族需要的，才有此結果。因此，讀日本民族統一運動之教訓，對於目前中國歷史運動應取的途徑應有所了悟。

所謂西南之戰是一種什麼性質呢？不管西鄉隆盛所領導的勢力是怎樣複雜，要之，所謂日本的西南戰役是和我國這次兩廣事變和西安事變，是具有同樣歷史意義的運動，是一種割

據勢力對於統一政權之最後反抗。不過因為當時日本封建習慣比現在的中國留存的更多，所以西鄉隆盛出師和失敗途更多可泣可歌之事了。

不錯，西鄉隆盛對新政府的批評在許多地方不失為公平的。特別在攻擊薩長二藩專弄權威，不稱釋各藩人材這一點說，尤不失公平。但我們討論歷史却不能從道德倫理的觀念出發，而應當從歷史的需要和社會階級的需要出發。日本統一運動的政治和軍事的代表人物雖都是出身封建階級，但其社會基礎却是資產階級。統一既是資產階級所需要的，因此，代表統一運動的中心人物自然更接近資產階級更資產階級化，自然在許多地方比以忠誠為特長的封建典型人物來，他們是以狡猾，卑鄙，自私，甚至貪財為特長的。正因為他們是以人類惡德見長，他們才更能夠適應時代而為時代所寵愛。並且他們已使他們私人的慾望（如攬權，野心）與時代的慾望融合為一。這時候西鄉隆盛以「清君側」為名義而反對大久保等，在客觀上却完全成為反統一的罪人。既然是反對統一的罪人，結果當然只有一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不是別的，正是無情的歷史。

後來伊藤博文說：七百年來，日本封建制度之廢除，不是在明治四年廢藩置縣，而是在十年西南戰役之勝利。西南戰役是日本封建勢力之最後反抗。同時也是中央王權之最後完成。伊藤博文的講，是深深的把握了當時歷史運動之脈搏。

明治維新運動，在本質上，雖是一種十七八世紀的中央集權運動，但因為這種運動是發

生在十九世紀民主潮流瀾滿全世界的時候，即使爲了日本統治階級利害計，這個運動非同時兼行廣大的社會改良和立法改良不可。不過我們應特別指出的，就是這只是改良，決不是革命。這種改良不僅是時代趨勢所必需，並且也是握中樞權力的統治階級所必需。因爲當時尙在建立之中的孱弱的中樞統治階級，它要和有各種實權的藩主作鬥爭，如果不能取得國民贊助，特別是資產階級的贊助，是沒有成功希望的。因此，自明治元年五條御誓宣佈後，（註一）接着關於社會立法方面，過不少的資產階級式的社會立法改良運動。這些改良雖不免陷於瑣細而不澈底，但對於日本資產階級社會關係之形成和資本主義之發展實盡了一個巨大的推動作用。

註一：「五條御誓」全文如下。

- 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
- 二、上下一心，以盛行經綸。
- 三、武官一途，以迄於庶民，令各遂其志務使人心不倦。
- 四、破舊來之陋習，基於天地之公道。
- 五、求知識於世界，而大振皇基。

不特如此，如果說歷史的某一階級，爲了滿足自己的目的，而在其自己歷史行爲中常常能生出自己直接欲求以外的東西是對的，那麼，明治元年至十年的改革運動，就不僅是鞏固

了它自身，並且也造出反對自己的新事物，造出資產階級自由黨和議會運動。

現在我們就來敘述日本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勢力之發展。

第四章 明治維新以來的經濟政治之發展

每種政治運動之成功，必須在它能開出一個經濟運動的成功。不能開出一個經濟運動的成功，則政治運動的成功不但是沒有價值的成功，並且也不能繼續保持其成功。日本明治維新運動之成功，主要的，就在它開出一個巨大的經濟運動的成功。這種經濟運動的成功，也是日本直到現今只能產生溫和的資產階級的反對派，而不能產生英法式的資產階級之主要原因。為什麼日本不能產生英法式的資產階級呢？因為日本資產階級是一天也不能離開他們的貴族階級的。過去需要貴族階級對自己之培養，現在更需要它來反對自己更危險的敵人——日本的無產大眾，因此日本資產階級比德意兩國的資產階級更沒有享受過政治的直接支配權利。

但是日本地主階級與日本資產階級這種苟合的關係也不是沒有經濟原因的。不，在日本的農村經濟變革中，我們是很容易找出這種苟合之真實原因的。

我們要知道，日本農村的階級關係和土地所有制度遠在第一次日本農民暴動之前，因為商業資本之發展就已經開始了資本化過程，即土地商品化過程，並且正因為土地商品化和土

地發生新集中，失去土地的農民才起來用暴動的方法以反對一種不幸。第一次農民暴動是失敗了。到了戰前時代地主的武力之大小又成爲其土地之大小的決定因素，資本暫時讓位於武力。但是到了德川時代，地主的武力又開始抵不住黃金的攻擊力。於是到了寬永二年有所謂限田令；這是當時的統治階級欲以人工的方法來防止土地商品化過程。

寬永二年的限田令，在實際上未阻止日本農村之分化過程，因而自享保五年起，日本又開始了第二次農民大戰爭。在這次大戰爭中，日本的農民固然失敗了，就是日本的地主階級也弄得非常困難。不錯，他們的政治權利是擴大了，但他們的經濟情況遠不如往昔。而這時在國民經濟生活中佔優勢的當然是日本的町人階級。因此，地主爲了解決自己一時的困難，就不得不仰求於日本的資產階級。這樣就益加促進了日本土地之商品化過程。因此，日本的資產階級和富農當日本維新運動的時候便無須經過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就已經把一向爲日本地主階級勢力範圍的農村經濟變爲資本制削的對象了。至於日本的地主階級，在資本主義日漸得勢的當時，他們如果想保持自己免於敗北，也非自動的走上資本主義化不可。因爲這種關係，日本的農村改革，差不多都是由立法解決的。如果說在日本農村變革中也使用了不少的暴力，這暴力却不是施於地主，而是施於新近失去自己土地和生產手段的貧農。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個廣大的農民暴動，而日本資產階級的維新運動，却是對於農民暴動之克服。各個民族的歷史發展是怎樣的不同的呀！

明治元年，王政復古大號令中對於土地買賣在原則上雖已承認土地私有權，但還保持一定限制。至明治五年，已絕然宣佈「自今以往，四民都以所有彼此買賣」。這就是說土地私有權和買賣權已完全得到法律的承認。明治六年，改向來以收穫額為比例所定之地租為年年納同一之數，且改穀物地租為貨幣地租。至明治八年，對以往的限制田法，即對土地分割與兼併之限制，更完全給以廢除。於是，日本土地所有制度，因這些立法更飛速走向資本化過程。

日本農村經濟之資本化過程由兩方面反映出來。一方面，反映在日本小農之失去土地和貧窮化上面，他方面，則反映於佃農數量之增加。

先說日本小農之失去土地過程。日本的小農之失去土地單就明治十四年的統計。就有數十萬人，以土地為抵押品者約二百萬人。因貧困而行借貸者，全額在一億四千萬，每人平均的債務至七十一元六角。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在明治維新頭十幾年日本發生了那樣多的農民的暴動。

至於日本的佃農之增加，據野呂榮太郎的估計，明治初年，日本租田的面積，其最大限度不達全耕地五分之一，然而到了明治二十年，租田之數增至一倍以上，明治十九年，佃農戶數約二百萬，其中有一百萬是在這十九年之中增加的，雖然，這個新增加之佃戶數，只是失去土地的小農之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據日本的經濟史家推算，最小限度當有一萬戶，數

十萬人欲爲佃農而不得。這一部分後來不能不流入都市，成爲雇傭勞動者之惟一來源。日本資本主義就這樣變封建階級剝削的對象爲己之剝削對象。

現在我們再來敘說日本經濟變革之另一部門，即城市工業之發展。我們已經指出過，日本的統一王權運動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之前提，而事實上，維新以來的政權，各方面都顯明是日資本主義發展之溫室。

我們要知道，微小的和後進的日本民族，當它進入近代民族經濟發展之人口時。世界資本主義已由競爭階段進入到壟斷階段。因此，日資本主義處這種國際競爭環境內，如無政治的幫助，是談不上能有大的發展的，日本各種重要工業一開始都是由政府主辦，直到後來有了相當基礎和成績時，才轉由私人經營。如日本的造船業，紡織業，製絨，礦業，絲業，航運業，及其他許多工業等，最初都是由政府承辦，後來才歸民營。

政府不僅以官營工廠刺激工業發展，他方面，更不絕的派遣官吏技師職工等至先進民族以獲取工業知識和技術。當明治五年，維也納萬國博覽會開會時，在這時維新草創之際的日本竟付出六十萬元的經費，運送其工業品以陳列該會，由此我們可知日本當時對於工業獎勵之積極了。此外，如工業教育之普及，講習所之開設，勸業博覽會之舉行，工業試驗所之設立，在在都與以便利與積極的提倡。明治政府有限之收入，主要的是支出於工業提倡。

這是日本工業發展的第一個特點。

日本工業發展的第二個特點，是集中程度之迅速，這也是由於幼稚的日本工業爲了和國外競爭不得不如此。例如，日本關於各種工業協定和聯合會等組織，從很早以來就開始其發達過程。這時候日本尚無完全的關稅自主權，關稅的保障似不十分完善，如是本國工業爲了要在國內外市場上和敵國作競爭，不能不走向聯合和獨佔一途。如明治十三年，有製紙聯合會，十五年有紡織聯合會，二十年有洋燭共賣機關。其後各種工業很快的都集合成爲巨大的托辣斯組織。特別是日本的礦山業，因這類工業多是先由政府經營再轉爲私人經營的，所以大多數完全是由少數資本家一手包辦。

以上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兩大特徵。明白了這種特徵之後，我們再來檢察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當我們說到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時，我們並不用那種形容一般經濟發展的字眼如「跳躍」「飛速」等來形容日本經濟發展。因爲這些字眼是不怎樣具體的，我們只可以這樣的說，就是日本半世紀不到的發展差不多可以抵英國五世紀，抵法國三個或四個世紀抵德國一個世紀的發展。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日本輕工業發展的速率。一八八五年，日本輸入外國的棉花只值三十萬金鎊，至一八九四年，輸入的棉花量已值一千九百萬金鎊。即在九年之間，輸入棉花增加了二十四倍。再就工廠數目說，一八八五年，所有紡織工廠其數只十九個，其錠數不過五萬，至一八九三年便有四十六個，其錠數已增至六十萬。總之，至前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的

紡織工業的出品，不僅銷行於本國各區域，並且已向中國輸出了。九十三年，日本輸運至中國的布疋，已值四百五十萬金鎊。

此外，日本的絲織工業，從一八八五年到一八九四年，其輸出品由五萬四千五百鎊竟增至八百五十萬鎊。日本的煤業發達，不僅可以滿足自己需要，而輸出量的增加從二百鎊（一八八五年）竟達六百五十萬鎊（一八九四年）。總計日本對外貿易在這十年之間，增加三倍半。一八八五年，是五千五百五十萬鎊，到一八九四年，已增至二萬萬三千萬鎊。

日本的鐵路發達，當明治五年時，只有東京至橫濱一條長僅八十哩的鐵道。迨至明治三十六年，在國土大如彈丸的日本竟有三千餘里的鐵道。至於日本的航運業，因政府之積極提倡和海岸線之廣長比鐵道的發展更為迅速。

日本資本主義這種飛速度的發展，在日本明治維新運動史上便生出兩種新的歷史運動。第一是暹約從明治十年起的以板垣爲首領的民主自由與議會政治的運動，其次，就是所謂外交運動，即征韓問題和中日戰爭等。而這兩種運動都是由於日本資本主義之飛速發展產生出來的。

我們已經指出過，明治維新運動之第一個階段，在本質上，是一種十七八世紀的專制的中央王權運動，不過這個王權爲了鞏固自己在國內和國外的影響，它不能不使自己成爲資本主義的保護者。但是歷史的矛盾發展簡直是梟鳥天性之至極的發揮。昨天爲專制王權之母所

庇護所培養的資產階級，今天却第一次以反對自己的母親來證明自己之存在了。於是十八世紀的自由平等民主之說，竟響了三島。待至明治十一年，板垣退助被刺不中之事發生後，全國輿論更同情自由黨，於是該黨勢力遂普及於全國。至明治十五年，因板垣的入關，再興已解散的愛國公黨之議。而是年秋在大阪舉行第一次全國大會，竟把全國的民主主義者招羅殆盡。至翌年再在大阪開第二次大會時，來會者有十八縣二十一政社的代表八十餘人，比之第一次加了二倍的黨勢。民主運動幾經挫折和鬥爭之後，至明治十四年因七參議之意見，王室遂發大詔，於是全國所熱望的國會開設問題至此更進一步獲得實現的端緒。待至明治二十二年於宮城正殿宣佈伊藤所起草之憲法，至翌年七月舉行第一次衆議員的選舉，十一月帝國議會行開院式後，一直刻「五、一五」事變發生止，均爲日本的憲政時期。

不錯，當民主運動的初期，確是如當時已經變成官僚政治家的伊藤博文所說，是些「失意官吏，不平之士族等」爲領導人物。但是伊藤博文忘記了一點，就是歷史的普遍理想所假之以活動的，正是那些自己願望與歷史趨勢達于一致的個人。現在的失意官吏和不平士族等把自己的私慾與歷史的公慾達于一致，也正如早年的大久保和伊藤博文自己能使自己的私慾和歷史公慾達于一致一樣。正因爲個人的私慾能納入歷史的公慾之中，而歷史的公慾不納入個人私慾之中，這個運動就轉變爲真實的運動。因之，它的勝利也就有歷史的前定性。

我們已論述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所生出的民主運動後，現在要進而考察資本主義發展所生

出的第二個運動，即對外運動，如征韓問題和中日戰爭等。

我們已經知道，日本資本主義，在明治初新頭十幾年，已獲得驚人的發展。然日本資本主義在這種驚人的發展中却遇着兩個難解決的問題：第一，是原料問題，前面已經說過，日本的紡織工業，鐵路、航運等工業雖有驚人的發展，但日本關於這些工業所需要的原料，例如棉花和煤炭，並不豐富。因此，很容易危害其發展。第二，是國內市場狹小，不足容納和擴大本國工業生產。爲了打開這種難關，日本資本主義從一個開始，就不能不謀海外資源和市場之獲得和獨佔。這就是說，日本資本主義一開始，就不能不發揮其帝國主義性質。

日本資本主義爲了滿足這種要求，就不能不努力於朝鮮琉球和台灣之佔有，這樣就決定了牠非與上述諸地之保護者中國開戰不可。而中國從洪楊以來開始的歷史分裂運動也正與日本資本主義進攻中國以大好機會。

中日戰爭以後，日本因勢力增強和中國對於日本所納之巨大賠款，使日本資本主義更發生根本變化，在工業方面，在公司資本之種類和速率方面，在銀行資本方面，都有飛速度之進步，如果說，中日戰爭以前，日本還不是一個工業國，那麼，中日戰爭以後，簡直是日本工業革命之徹底完成時期。這時候日本公司資本發展的速率有如下的數目字可資證明：明治十七年，公司資本總數是一一五、二二三日元，至二十六年，已增至三六〇、〇一二日元，至三十六年更增至八八七、六〇六日元。至於公司的數目，明治十七年爲二、五一九，至三

十年已達九、二四七。再就日本的職工人數說，自十九年至二十二年，三年之間增加了一倍；更自二十二年至三十八年之間亦增加一倍。自三十年至三十五年，五年之間又增加一成四分；自三十五年至大正元年，十年之間又增加七成二分。再就日本的人口增加說，明治三十六年至三十六年間，總人口增加了一成五分，屬於一萬人以上十萬人以下的都市地方，則增加三成二分七厘。十萬以上之大都市則增加了七成七分七厘。即一萬以上的地方所增加之人口，在十年間，多至三百三十三萬餘。

日本資本主義這種空前的發達，當然繼續使它要向外擴張，但日本要向它的西鄰中國和朝鮮擴張，却遇着一個先由西北而來的俄國。俄國不僅會欲日本向中國東北侵入，甚至就是當時已爲日本外府的朝鮮，俄國亦欲加以染指。然而俄國這種囊括北中國的聲勢，在當時却驚嚇了另一個中國窺伺者，英吉利。英國不僅畏懼俄國的勢力向中國發展，甚且，也畏懼俄國由中國西邊而去佔有牠的印度。於是英國爲了打擊俄國的發展，轉便與新起的日本成立英日同盟。牠默認日本向朝鮮和中國侵入。這樣，在中日戰爭之後，便又發生所謂日俄之戰。

日俄戰爭以後，使日本的國勢發展，直如戰勝波斯帝國的希臘，它現在如果不能說是世界最大強國，至少可以說，是亞洲的最大強國了。日俄戰爭以後，日本資本主義不僅完全領有了朝鮮和台灣，並且以南滿爲其勢力範圍，取得了關東州即大連旅順與其附近屬地，且在

中國北部得到許多重要權利以保其在亞洲之帝國主義地位。

至世界大戰發生以後，日本資本主義已發展到它的登峯造極時期。

第五章 明治維新運動之歷史特徵與意義

當我們說到明治維新運動之歷史特性時，我們是很難同意於一般日本的馬克斯主義者歷史家對於這一運動之種種解釋的。照日本的馬克斯主義者說，日本明治維新運動，就是日本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而明治維新運動之成功，就是日本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之成功。就是日本資產階級之握得政權。雖然如此，但他們也不否認在明治維新運動中，起主要作用和指導作用的階級，是日本的諸侯，貴族，公卿和武士。同時他們也不否認，直到現在，日本的貴族還握着日本的統治權。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豈有在政治上資產階級已經奏了凱歌的地方仍受封建貴族統治的麼？因此，我們對於日本明治維新就是「日本資產階級革命之成功」這句話，實有詳加檢討的必要。

如果說，歷史的比較研究，是最能說明特定歷史運動之本質的，那麼，我們如其和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用與日本完全不相類似的十七八世紀的英法兩國資產階級革命來比擬日本維新運動，實不如用十九世紀德意兩民族的民族運動五四以來的中國民族運動，來比擬日本明治維新運動還更為恰當。

近代時民族的維新運動，除了那些我們在此地不欲論列的殖民地用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和具有特殊形態的俄國革命外，其餘的，我們可以把他們分作兩大類：一是十七八世紀的英法古英的民族維新運動；二是十九世紀的德意志非古典的民族維新運動。前一種民族維新運動的特色，就在牠未開始資產階級革命好幾世紀以前，這種民族就已經有統一集中的中央王權，並且因為此種王權對於資本主義之保障，這種民族並且有了強大的資產階級，因此，這種民族的維新運動，在本質上，就是資產階級革命。而這種民族維新運動之基本特色，是資產階級來領導第三等級來推翻專制王權，貴族階級，僧侶和官僚制度，而建立以資產階級為中心的共和國。這種民族的維新運動，以十七世紀的英法革命和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為典型的代表。

至於後一種民族維新運動的特色，牠完全與前一種不同。後一種民族維新運動主要的特色，就在這種民族因實際環境之變遷或民族之刺激，使它有迫切的維新運動必要時，然而它為它的先期的歷史倒退運動和政治分裂運動關係，不僅使這種民族沒有強大的革命資產階級，甚且也 它沒有一個統一的集中王權。因此，這種民族的維新運動，不但不是以推翻專制王權為任務，倒是相反：一開始就不得不謀集中王權之建立。而這種民族的維新運動之基本特色，不是資產階級之推翻貴族和僧侶以及官僚制度，寧是由大諸侯，貴族，武士和資產階級等來建立一個分裂的封建藩閥作鬥爭並且永遠消滅其統治的統一的中央王權和巨大的

官僚制度。因此，這種民族的維新運動的領導階級，特別在一開始，不是資產階級和第三等級，而是十六世紀建立中央王權的皇室，或大諸侯，貴族和武士等。爲甚麼大諸侯成爲這一運動之領導者呢？因爲消滅小諸侯的統治方能擴大諸侯的統治權。爲甚麼下層貴族和武士等成爲這一運動之積極分子呢？因爲只有消滅小諸侯讓地主之直接統治和代以新的官僚制度，下層貴族和武士等才能跑上政治舞台。雖然如此，但因這一革命運動，不是發生十六七世紀資本主義不甚發展時代，而是發生在資本主義以民族形式作急烈的競爭時代，和因爲它自身都是含有民族刺激之因素的，所以它在社會立法和文化方面，特別在經濟生活方面，都非加速的資本主義化不可。雖然這種勝利是資產階級的歷史的勝利，但是資產階級自己却不是和英法一樣是政權的享有階級。

這種民族維新運動，以十九世紀的德國意國和日本爲典型。從某一點出發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民族運動也是屬於這一典型的。

這種民族的維新運動，除了社會階級和政治任務不同於前一種外，就是鬥爭的方式也是不同於前一種的。如我們所說，由於前一種民族維新運動，在本質上，就是資產階級革命，所以這種民族的維新運動之總是採取人民暴動和直接奪取政權方式。由於後一種民族維新運動，在政治上，是謀集中主權之建立，因此，它總是表現爲一個較大的軍事權力對於其他較小的軍事權力之克服運動。不過比較大的軍事權力必須是該民族中首先能行民主改良和議會

政治者、如普魯士之統一德國，薩丁之統一意國。廣東國民政府之統一中國，都是得功於武力民衆之結合，其次，在思想運動的方式上後一種民族維新運動也是不同於前者的。爲什麼德國的古典哲學，中國的康梁的思想都不脫離傳統唯心論的方式呢？爲什麼里格爾和康梁都是君主立憲的主張者，而不是極端的民主共和的主張者呢？因爲他們的時代而能實現統一的君主立憲使國家走上統一發展，是歷史的一大進步。

爲什麼提倡民主政權的孫中山先生的政治學說中，有所謂軍政說呢？因爲在這種民族內，在欲實現一個全國的資產階級式的民主共和國，同時需要一個能够克服軍閥統治的鞏固的中央政權。

我們現在再來一看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社會階級，鬥爭方式，思想方式，看它們是否與我們上述的意見相符合。完全符合。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領導階級，正是日本的薩長兩大諸侯，王室公卿，貴族和武士等。至於日本明治維新運動之鬥爭方式，也正是和德國意國民族統一過程相似，首先表現爲國內能够施行民主改革的較大的權力對於較小的權力之征服。而明治頭十年的維新運動史，也正是一部統一戰爭史。而薩長在日本統一運動中所起的作用，也正如普魯士之在德國，薩丁之在意國，廣東政府之統一中國一樣。

至就思想運動方式說，尤見符合。爲什麼明治維新運動最初是由陽明之學奠下基礎呢？這不僅因爲陽明之學說尊重儒家大一統思想，並且也因爲陽明之學是以唯心論爲特徵的。爲

什麼近代日本民族在思想上好自比於德意志呢？爲什麼日本憲法的起草是以德國憲法爲底本，而不以英法憲法爲底本呢？因爲日本的民族維新運動是類似德國民族維新運動的。

這樣看來，所謂日本明治維新運動，是一種比十七八世紀的英法資產階級革命更爲複雜的一種運動。明治維新運動應分爲兩個時期。即明治十年以前，爲一個時期，明治十年以後，才後爲一個時期，明治十年以前，是一種類似十七八世紀的中央王權運動；明治十年以後，才開始資產階級的議會運動。這就是說，日本明治維新運動，是一種十七八世紀的中央王權運動和十八九世紀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之混合物。不過，因爲日本的王權始終是日本資本主義之培養者，所以日本資產階級的政治生活比德意志資產階級的政治生命途更可憐更爲短促。假如說，德意志民主制度之推翻曾經過急烈的反革命的革命，日本在結束資產階級議會政治時，只需要一兩次小的政變就告成功。爲什麼這樣容易呢？因爲日本的封建階級就從來沒有一天是放棄過自己的政權。

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雖是一種土地貴族和武士等所領導的歷史運動，但它却把日本由中世紀的分裂狀態解放出來使之走上了近代民族國家之路。不特如此，就是日本地主貴族和武士等所領導的這種歷史運動，它在過去不僅培養了日本資本主義以與歐美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列強作競爭，變弱小的被壓迫的日本民族爲東亞惟一獨立民族，並且它還爲現在和未來的日本無產階級革命創造重要的物質前提。

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

一 緒言

出現於近代歷史的各國革命，不管牠們在表面上是怎樣的歧異，但是大致仍可以把他們分作兩大類：（一）單純的對內革命，即革命的全民向專制王權、貴族和僧侶統治革命；（二）不僅是對內部封建統治革命，並且還要向國外的壓迫者革命。前一種革命，如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和十九世紀的法國革命是。後一種革命，如十九世紀的意大利革命，其他如十六世紀的尼德蘭革命，十九世紀的波蘭革命，十九世紀的西班牙革命，二十世紀的土耳其革命等則為屬於民族的革命。因為後一種革命是含有民族性質的，所以担負這種革命運動的政黨通常總以民族的稱謂作為自己的稱謂。如青年德意志、青年意大利、少年土耳其、其中會等。

復次，後一種革命，因為牠不止是對內的革命，並且又是對外的革命，所以這種革命的性質和鬥爭的邏輯開展特別複雜，尤其是十九世紀的意大利革命和現在的中國革命是這樣。所以研究意大利的民族革命運動對於中國特別重要。

我敢說，在近世各個民族史中，除近代德意志歷史外，再沒有近代意大利民族史那樣與我們的近代史相類似的了。這不僅指意大利和我們的革命都是民族革命，而且是指近代意大利

利民族與近代中國民族之全部興亡過程的類似。

假使我們在二次革命之前，我們的國民大眾對於世界諸民族的革命經驗有深切的研究，特別是對於十九世紀的德國革命和意大利革命的經驗有深切研究，並且能應用這種研究到實際鬥爭上，那末我們至少要受半世紀的民族壓迫的痛苦。現在雖然一種緊張的民族鬥爭的實際任務又臨到我們面前，但我們一方面，除了積極的參與此鬥爭外，他方面我們更應利用一切可能和機會來研究諸先進民族的鬥爭的經驗。我們要知道，民族的經驗是至不易取得的，但一旦取得之後，牠却是鬥爭中的無上武器和惟一保證。反之，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這是偉大的世界革命的領袖早已警告過我們的。

二、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的意大利

我們的課題是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但我們要知道十九世紀的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必先要知十九世紀以前的意大利民族命運之興廢。意大利在十九世紀上半是一個非常落後非常分散的民族。當時的意大利僅一地理名辭，並非是一個統一獨立的國家。但這不是說，意大利在以往任何時候都是這樣落後呢？不是。意大利在十五世紀不但不是歐洲文化落後國，並且是歐洲文化最先進的國家。意大利是歐洲文化最先進國云者，就是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是從意大利開始的。

意大利既然是資本主義文化之先進國，但他又怎麼落後了呢？這是本文首先要解答的問題。對於這一問題有透澈了解，對於後來的意大利民族復興運動，才有正確的認識。當然，我們所指的意大利民族復興運動，僅指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的意大利民族革命運動，並不是指大戰後的法西斯運動。

首先說明者，就是意大利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是文化落後國。假如說，意大利在十七八世紀乃至十九世紀上半還是歐洲文化落後民族，那並不是由於牠的歷史從來如此，而是由於牠歷史不該發生逆流運動。因為十五世紀的意大利，不論是經濟、政治和文化都是立於歐洲文化之先進地位。及至十六世紀，因為世界商路之改變，這個民族因失去了其地理之優越，才完全放棄其商業和文化霸權而退出世界歷史舞台。總之，從十三世紀以來意大利之所以成為資本主義之先進者，是由於地理關係，後來到了十六世紀，意大利之所以成為落後國者，同樣也是由於地理關係。

意大利是地中海裏面一個半島國家。牠的古代發展和近代發展都是受賜於其地理的優越。從中世紀末以來，歐洲內部因經濟發展的結果，便開始了十字軍東征。而首先受到這種東征利益的，就是意大利各城市，特別是威尼斯、熱洛亞和佛洛倫斯。復次，意大利既是個與海上半島民族，而海又容易使民族與民族相通，因此，意大利便是最早從事掠奪別的民族的民族。經濟史家宗巴特（Sombart）說……

「我們欲了解意大利城市所以富厚的緣故，不可不曉得牠們掠奪別的地中海區域，恰如我們欲了解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蘭西、英格蘭的興旺，不可不曉得牠們以前破壞亞拉伯文明，掠奪亞非利加，蹂躪南亞細亞和南亞細亞島嶼各國，即富饒的東印度羣島（包括印度、印度支那、馬來羣島等等）及引嘉（Indes）和亞斯特克（Aztecs）各繁盛的國家」。

從十二世紀以來，熱洛亞、比沙、威尼斯等城市在經濟上已經控制亞索夫（Arab）西沙列亞（Sarcra）、亞克耳（Acre）、西頓（Sidon）、太耳（Tyre）等城市。隨後因數次十字軍東征之結果，意大利諸城市共和國的勢力早已伸張到埃及、巴勒斯坦、伊琴海、黑海和小亞細亞。總之，意大利這時是握西方和東方通商之樞紐。

意大利除了這些正常的貿易以外，還有一種使其獲得大宗利潤的奴隸貿易。僅就意大利所統治的克利特（Crete）島說，在奴隸貿易正盛時期，這個島上的人口竟由五萬增加到十九萬二千七百二十五人。

這時候，意大利各城市不僅把種種的商品供給全歐洲，甚至也把牠們的貨幣供給全歐洲的國王。住慣今日資本主義社會的人，一切習而不察，但在中世紀末，許多不會知道的事物，都是由意大利發生或供給。如交易所、保險、公債、統計、累進稅等等早已出現於意大利各城市了。

經濟的發展之結果，必然要帶出一個文化生活之改革，於是一種轟轟烈烈的文藝復興運動。

動便出現於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的意大利。

文藝復興（Renaissance）運動不是別的，牠是新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至一定程度時一種爲解放新的經濟活動之束縛的思想文化革命運動。不過這新的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思想文化在古希臘羅馬曾經有過，所以把這個運動叫做文化再生運動。

意大利本來是一個有古代光榮遺跡的民族，復因爲意大利與希臘有繁盛的商業關係，使意大利更背識了古代文化的價值。至於意大利各城市自身，牠們因爲新的經濟生活之活躍，正竭力想脫離中世紀的封建桎梏，因此，就非常揆味的使牠們看到雅典共和國中的一種各方面爲牠們所需要的文化生活和思想方式。這就是文藝復興運動的社會基因。

文藝復興運動因爲是中產階級的意識覺醒運動，所以又稱爲人文主義（Humanism）運動。人文主義運動云者，意卽尊重人類，尊重文化和科學以別於傳統的壓迫人類的宗教運動。文藝復興運動的政治目的，就在造成意大利的統一。這完全是中產階級的民族國家要求表現。這在馬基維利的著作中表現得最爲清楚。

意大利的興盛是怎樣中落了呢？中落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世界商路之改變。

好望角的周航和美洲的發現，在人類歷史上開了一個新紀元。古典政治經濟的開山人亞丹斯密和古典哲學之集大成者黑格爾認這兩大發現是全部新歷史之要素，完全是對的。但這兩大發現的重要任在甚麼地方呢？在於牠使商業的活動忽然由內海而進入大洋。可是這種揭

然的變化對於意大利是最不利益。因此，以後據世界商業霸權的民族再不能是意大利了。意大利現在是失去了牠的商業王權，不能不讓給大西洋沿岸諸民族——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等了。

跟着世界商路之改變，世界通商中心亦發生改變，凡是與新的商路相近的各海口商埠，不久就成爲巨大的通商中心，反之，就必然的退出世界舞台。意大利各城市便是首先退出世界舞台的。

復次，因爲世界商路之改變和全部經濟生活之變革，現在已不是和中世紀末一樣，是各個城市與城市之間的競爭，現在是整個的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競爭了。在民族與民族競爭之中，強者的發展以犧牲弱者的血肉爲前提，這就是說，從歷史舞台退落下來的大利不能不成爲其他強者的犧牲品。意大利現在不但不能保持以往的光榮，並且還要食以往的光榮生出來的痛苦。牠的因商業發達而生出來的過剩人口就是過去光榮留給牠的。牠的殖民事業和遠征事業相繼被其他民族剝奪後，牠就無法把其剩餘人口安插在對外鬥爭中，因此，這剩餘人口唯一出路，只有投身於強劫和戰爭中。

十七世紀的意大利，就是一個城市與城市、小邦與小邦不斷的內戰的意大利。我們的用意不在於敘述這些內戰與其經過，我們的目的是在指出這內戰的必然結果，這必然的結果，就是加深意大利向前崩潰過程前進。十八世紀意大利的內戰雖然減少了，但一種歷史的逆流

運動並沒有改變分毫。

專制制度、官僚、賦稅吞食者、僧侶、偽幣製造者、土匪、強盜、流氓、破產的農民、一無所有的勞苦大眾，這就是十八世紀的意大利。

十五世紀的意大利是初昇的太陽，十七八世紀的意大利只是一個黑暗統治着一切的夜之國。

三、十九世紀上半意大利民族內之封建壓迫和民族壓迫

我們已指出意大利民族從十六世紀以來，其經濟政治和文化是怎樣由先進的地位進入一個急劇的沒落過程，同時我們並把近數百年中國民族的興廢過程拿來與之作一番詳細的比較。現在我們就要問：這種衰落會引起什麼結果？必然地要加深國內的封建壓迫和國外的民族壓迫。說到這裏，我想我們對十九世紀上半的意大利應有深切的了解。爲什麼？因爲洪楊亂運後的中國，牠所受的國內封建壓迫和外國民族壓迫並不比意大利輕。

一點也不錯，當我們說到十九世紀上半意大利民族之國內封建壓迫時，單就國內說，他們還比我們更多一層壓迫，這就是加特立教和僧侶的壓迫。羅馬的教皇，不僅是僧侶的國王，並且也是世俗的國王。由於十七世紀不斷內戰之結果，在意大利境內所引起的政治反動也許比中世紀的反動更爲厲害。

意大利的各個諸侯，他們對人民剝削之高，竟使意大利的農民大多數都完全破產。這特別是在南方的教皇區域（Papal State）和西西里。至于北部，不僅有許多諸侯和僧侶的壓迫，並且還有奧大利人的軍事壓迫和賦稅壓迫。奧大利極殘酷的把這個民族屈服在自己的統治下。至於意大利各城，現在也完全屈服在封建的和財政的寡頭政治統治之下。意大利的農村，由於過度的封建的剝削之結果……，致使許多耕地盡成荒蕪。至於意大利的稅收制度，一切上層階級，特別是貴族和僧侶，完全免稅，而一切稅收完全都加在農民身上。諸侯及地主都是吮吸農民血汗至最後一滴。

十九世紀上半的意大利，農奴制度在某些地方，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但在實際上到處都是。農民，無論其爲佃戶爲農奴，都非完全依賴地主不可。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財產制度，無論是突斯堪、皮芒特、巴底都是存在的。至於意大利的法律制度，或由於經濟落後，或由於外於統治，或是由於已死的法律之復活，更是特別複雜。譬如說，教會就有他自己法律制度。至於是意大利的關稅制度，那更是意大利經濟發展之致命傷。十幾個分立的小邦都有其關係制度不必說，就是統治意大利的奧大利也同樣有權在意大利境內設立關卡，向意大利人收稅。當十九世紀，奧大利在倫巴底和威尼斯徵收的賦稅等於國家收入百分之二十八。

至於說到意大利民族在十九世紀上半所受到的民族壓迫，如果我們用一種世界的歷史眼

光線觀察，那末除了大衛王朝後的猶太和十八世紀的波蘭外，再沒有十九世紀至現在的中國這樣類似當時的意大利了。大衛王後仍猶太，特別是其首領巴勒斯坦，簡直是埃及敘利亞和以後的亞述帝國爭奪的遊戲球。而十八世紀的波蘭則為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大利互相爭奪的遊戲球。至於十九世紀至現在的中國也正是互相爭食的一塊肉。而十九世紀的意大利，特別是其北部，簡直是西班牙、法蘭西、日耳曼皇帝和奧大利等之角鬪場。十九世紀的意大利，自己的土除供人角逐外，其內的分散是不能執行任何統一政策的。此外，自己民族內部是不斷的發生分宗分派運動，而種宗派和黨派又都是深深地為列強所影響所支配。親愛的讀者，也許你們不了解我所說的意大利民族分宗分派運動，我是說，十九世紀上半，意大利也有他們的殷汝耕！汝殷耕的漢奸政府，那就是為外族所左右的民族分宗分派運動。總說一句，意大利的一些小統治者，常常是統治意大利的外強手中的木偶，而在遇到非常事變之際，則常常由外國的軍隊担任保護之責。在一八四八年前，米蘭，威尼斯，托連特（Trieste），特里雅斯特（Triaest）等富庶之區，盡為奧大利帝國所有。統治者亦完全為奧人。奧國領地之南，中部意大利，如摩德那、突斯堪（Tuscany）、帕馬（Parma）為奧國哈布斯堡王家之姻親所統治。前已言過，奧大利在倫巴底和威尼斯徵收的賦稅等於國家收入百分之二十八。一八四九年倫巴底土地增加一倍有半，而威尼斯於十年之間，其間接稅也增加二百餘萬。

凡此一切壓迫和負荷，却不能不使當時的意大利民族，特別是知識分子發生的自覺和民族的自覺。所以早在一七八一——一七八五年，意大利的經濟學家傅蘭特里耳（Filandic）在其經濟規律中，對於意大利民族這種種的黑暗生活發出無情的批評。他說：

「如果農業弄到如此難堪狀況，如果農民處在過度的貧窮之中，我們對於封建統治所暴露出來的恐怖有驚異之必要麼？只要是產生貧窮的原因存在以前，只要是保護少數人的私有財產之積壓的法律存在以前，只要是封建的苛捐雜稅沒有廢除和改良以前，只要是農村中保留農奴制度，和未取消農奴佃戶對地主隸屬關係以前，貧窮是永遠會統治着重要的和應受尊敬的農民。」

因此，傅蘭特里耳高聲的叫道：「廢除封建關係是走向改良下層地位和提高農業生產的第一步。其次，便是改良國家行政和改良剝奪農民一切希望的賦稅制度」。

可是，怎樣才能得到改良呢？誰來施行這改良呢？

貴族，僧侶都是反對改良的。少數的中產和多數的農民雖希望改良，但他們又無力實現他們所要求的改良。中產和農民在反對封建貴族和寡頭政治鬥爭中，顯出他們自己是非常軟弱。此地還應特別指出的，就是意大利各城市中，有從手工業者和農民分解出來的巨大的流氓。這些社會的贅物完全是統治用來反對革命運動的工具。因此，意大利革命要想獲得成功，是必須有賴於中產社會之興起。

但是，假如一個民族處在這樣一種悲慘情形而不能自動的改革，他會怎樣呢？他除了供人犧牲外，還能有別的希望麼？下面我們就來敘說這一民族在十九世紀被人蹂躪被人犧牲的經過。

四、十九世紀意大利民族所受之革命影響和戰爭蹂躪

我們已敘述過意大利民族各個小邦的統治者本來只會壓迫國民而在對外關係上是不能實現任何統一和獨立政策的一羣小丑。但是這一羣小丑並沒有自知之明。不僅如此，他們的反動和糊塗，竟使他們在國際革命怒潮來臨之頃，去排演着西萬蒂斯（Corymbes）的英雄。他們也正和西萬蒂斯的英雄一樣，在可憐的失敗之中結束了武士的光榮。他們的失敗，本來是罪有應得，但意大利的人民由此而得到了的戰爭損失和蹂躪是無法計算的。

當一七九一年，意大利各城市因感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已經到處發生學生市民和警察的衝突。這衝突是純政治性的，結果爲意大利的統治者的殘酷的恐怖所鎮服。由於厭惡革命，他們更向歐洲的反動的聯盟請求合作去與革命的法國作鬥爭。比芒特的國王維克多爾、亞米吉（Victor Amédée）便是此種運動之發起人。可是到了一七九二年秋，革命的軍隊在孟特斯克和安塞媽領導之下便佔領了薩甫（Savoie）和宜斯（Nice），並且即時取得人民贊同將兩地合併於共和國。至於意大利的統治者和貴族，他們一致與歐洲的聯盟相結合，並且至一

七九三年春，比芒特便爲五萬聯軍所支配。雖然當時各小邦，並沒有一個統一政策，如某幾商業國，是寧守中立的，他如突斯堪對於聯軍也是取靜觀態度。一七九六年，意大利似乎還看不見革命的生長，但是，三四年後，自由思想之發展便獲得巨大的成功。同情雅各賓派和急進派出現於全國各地。士林、米蘭、佈蘭、尼亞坡耳等地的中產階級和出身貴族的知識分子現在都渴望三色國徽，並且都積極的出來號召國民和專制制度僧侶及諸侯作鬥爭。這種革命的鼓動並不爲當時統治意大利的恐怖所停止，反之，牠給拿破崙的進軍準備了一個勝利的基礎。另一方面，意大利的統治階級從一七八九年以來，仍頑強的反對一切改良並試圖分毫不變的維持着舊制度」。

可是革命的軍事勝利，很快地使維克多爾、亞米吉與拿破崙締結了和平條約。待到一八九七年，北意和中意完全入法國掌握。二三年後，意大利便生活於整個革命氛圍之中。當革命的軍隊勝利第一個時期，意大利的國民起用一種狂熱的態度來歡迎的。但是，由一七九七年秋到一七九九年，勝利者便決然將意大利屈服在法國之下。法國共和國現在視意大利爲自己的勝利品，而且伴之而來的就是對意大利國民之剝削。這樣，在意大利的農民和中產者之中便激起了對法國軍隊的不滿，這是意大利的諸專制魔王後來勝利之原因。

一七九七年，在拿破崙未侵入米蘭之前，米蘭就開始暴動了。國民攻擊與大利軍隊所佔住的堡壘。於是法國軍隊便決然對與作戰。拿破崙現在把革命思想的傳播和鼓動放在自己手

上。他與意大利的中產者約定：建立統一的意大利，取消貴族，允許無神論的宣傳和自由思想的傳播，允許意大利以最大自由，並且意大利的執政者都不由法國決定，而由意大利自決。米蘭這個時候已成爲全國雅各賓派活動的中心。

可是意大利的中產者不能與恐怖和雅各賓相調和。農民也感駐軍之苦，而法國的軍事長官更任意干涉行政機關之民主工作。但革命的利益是偉大的，人民是與新統治相調和的。革命擴張到全意大利，於是法國軍隊便在愛米里、芒吉、勒特利、阿爾拉、布廊等地幫助意大利人組織共和國。解放的國民在辯護士安東亞爾金領導之下召集了國民代表會議（一七九六年十二月）。代表大會決定統一一切自由國並建立西扎屏共和國。這是意大利中產者之巨大勝利。共和國是一個包有三百萬國民的大國家。在這裏一切都是法國的制度統治着。此外，如熱諾亞和後來的威尼斯也都歸併於共和國。但這時期也就開始了法國中產者的征服政策第三期。拿破崙根據一七九七年科姆坡弗耳米和約將威尼斯讓於奧地利，至一七九八年一月八日奧地利的軍隊即開始佔領此城。在這裏，我們要特別指出拿破崙的軍隊給奧威尼斯和西西扎屏共和國的影響。意大利人對法國最表示不滿的，就是法國軍隊對勒特利、威爾拉、布廊等城市之搜刮。西西扎屏共和國現在每年要向法國納三十萬法郎。此外還要維持法國駐意國的軍隊用費，且在商業上還要與法國以優先權。更感痛苦的是法國駐軍對意國內部事業之干涉。他們甚至要他歸併於法國共和國。他們已做盡一切，但還是不滿足，法國在三個月之內會

三次變更西扎屏共和國的政治制度。

在比芒特和羅馬也同樣發生這類事情。至於尼亞坡耳，那裏特別表現出革命時代的意大利的歷史特徵。農民和城市流氓是站在反動派方面。並且由他們的幫助和溫和中產者之中立國王的軍隊才打敗雅各賓派，且於一七九八年又重新恢復其統治。一七九九年，尼亞坡耳的政府軍隊屠殺愛國派約一萬人。此外還有二萬人被投入獄，三千人被放逐。意大利的中產者運動現在採取了另一形式，使意大利統一和獨立的思想現在代替了對法國革命的同情。但他們忘記了意大利革命並不是中產農民和城市貧民自己革命之結果，而是與法國戰爭之總結。

反革命的勝利只繼續了十三個月，至一八〇〇年，法國的軍隊又來到意大利。但是，這時意大利在拿破崙看來，不過是他對奧作戰中一個軍事根據，不過是法國財政的外府，不過是銷售法國商品的市場和祖國工業原料之供給者。

雖然，在一八〇〇年前，意大利表面上還是獨立國。待至一八〇一年，情形就不同了。一八〇一年拿破崙召集西扎屏共和國各名流和中產者代表至里昂，爲的好在法國直接壓迫之下來完成他的立憲。這個國家現在叫做「意大利共和國」。因爲法國想統一意大利。共和國的總統就是拿破崙自己，而副總統則爲意大利的麥爾茨公爵。這個國家雖然也有一個「國會」，但國會是分等級的。政府的首領麥爾茨自己就是一個大財主，就是雅各賓派的對頭。他

保護貴族和僧侶，他與法國聯歡，但對民主派備加攻擊。農民在這種情形下，很明顯的是不滿意共和國的，而自由知識分子甚至對共和國取仇視態度。由於拿破崙的經濟政策之關係，中產者更幻想民族獨立和自決。民主派的雅各賓現在也失去意大利勞苦大眾之同情了。

拿破崙想盡一切方法使意大利併法國。一八〇五年，他竟然宣佈他的繼子愛夫赫布加恩爲意大利國王，並使意國行政完全集中化。他的格言是：「你的（布加恩）制度應如朕所需要的簡單」。新兵募集，一年比一年高。一八〇五年爲七千人，一八〇六年爲一萬二千人，一八一一年，爲三萬六千人。預算案由一八〇五至一八一二年由八千二百萬法郎增至一億四千四百萬法郎。特別增加的是間接稅和土地稅。此外，公民法典上還規定着廣大的社會勞役，如修路開水道等。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民所得的利益太少，所以他們大多數是傾向於脫離這種軍事專政的。由於道路之改良和對商工業之保護，僅中產者是得到相當的好處，但正因爲牠的經濟政治意義之生長，所以牠也要來自由和獨立。

這種情形，也同樣出現於歸併於法國的意大利的別些地方（如比芒特及其他等區，約佔全意十分之三）。這些地方的國民甚至更銳利的感到法國政府之特權。其他，如西面里，法國的統治更引起了農民之強烈反抗。至於尼亞坡耳王國更是企圖反抗拿破崙的。雖然，一八〇六年九月二日，拿破崙的繼任者，他的兄弟約西夫旁帕那特宣佈各王國如西面里，加拉伯里等地封建制度之廢除，然而紊亂的戰爭還是發生了。紊亂的指導者是貴族，並且恰像在法

國本部的王特暴動一樣，這裏的紊亂完全由於在農民問題領域內之怯懦的土地政策引起的，而且想停止這種叛亂也只有澈底的革命的土地立法。但是這事在拿破崙和其繼任人思想也沒有想到。他們只是簡單地憑藉他的軍事力量和溫和中產者與貴族小集團。

一八〇八年，法國的軍官牛拉特還是西西里王國的統治者，他用了火與劍的力量肅清了叛亂後，並採取絕對的專制制度。但是勢已處此，他能繼續平服這種不滿麼？反叛運動很快地又復活起來，甚至牛拉特自己叛變以後也不能改變這不滿。所以，當拿破崙在大陸的敗北消息傳出後，牛拉特便決定投降到歐洲的反動聯軍方面。封建的復辟運動完全勝利了。意大利又重新為歐洲的反動勢力所支配，白色恐怖又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我們追憶意大利在反動聯軍勝利以後所受到的恐怖和蹂躪，我們更感到眼前帝國主義對中國之統治和未來太平洋戰爭對中國蹂躪之可怕。

五、意大利為民族統一而奮鬥

意大利從一八〇八年以來是重入反動的聯軍掌握。至一八二〇年，意大利因為西班牙革命之影響，又開始民族鬥爭。一七九六年至一八〇八年間的意大利國內的革命不是意大利國民自己奮鬥之結果，而是革命的戰事之結果。但一八三〇年後的革命就不同了。一八三〇年後的革命完全是意大利國民自發的革命。

一八〇八年在意大利的反動派的勝利和一九一四年維也納會議給予意大利民族的命運以決然的變動。維也納會議的結果，不僅把革命時代和帝國時代一切改良完全廢除，並且還把以往的一切小王國都重新復活起來。二千四百萬國民的半島，現在竟有十個王國。在全意大利，特別是在教皇區，白色恐怖君臨着一切。但是對於意大利最爲恐怖的，是奧大利的統治者。奧大利政府在意大利採取兩重壓迫；農奴壓迫和民終壓迫。牠干涉牠的內政，破壞牠的稅收，吞沒牠的土地稅，此外，還用盡一切力量來妨害牠的商工業之發展。

意大利境內的統治者大多數都是外國人。而尤以西班牙布爾本後系的尼亞坡耳國王最爲殘酷無人道。意大利的中產者，知識分子，一部分貴族，士官和農民現在正準備向這些專制暴君宣戰。爲意大利革命特徵之一的，就是意大利的流氓，他們仍然是本國和外國統治者反對革命的工具。

意大利的反對派分爲兩派：燒炭黨 (Carbonari) 和佛蘭馬榮派 (Fianc Mason)。燒炭黨發生於十八世紀末，中產的知識分子和小資產者都積極參加到牠裏面。這是個共和主義的祕密結社。下級分許多支部，而一切支部又統一於上級指揮。這一黨是在統一國家和推翻專制旗幟下準備暴動。佛蘭馬榮派是自由中產者的祕密組織。意大利的自由派，恰像大陸上的自由派一樣，他們僅幻想英法式的政治制度之實現，但他們大多數是害怕國民運動的。雖然，社會鬥爭的領導權是屬於自由派。

一八二〇年，意大利因西班牙革命之影響，便開始向各王國君主宣戰。而尼亞坡耳和比芒特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更是充滿了革命的風暴。燒炭黨向尼亞坡耳王國進攻。他們在軍隊中有極大的影響。同年六月五日尼亞坡耳國王雖宣佈了立憲，但革命運動是殘酷的爲奧大利的反動軍力量（五萬兵）所鎮服。

同樣的運動又出現於薩丁王國。薩丁的自由派在山大羅薩伯爵領導之下舉起了意大利民族統一旗幟。這個暴動因爲沒有得到農民的充分擁護，結果與大利的軍隊又起了決定作用。革命平服後，白色恐怖竟繼續了十年。意大利各王國的專制制度是爲與大利的帝國政府所維持。

後來，到一三九一年，在六月革命影響之下，意大利各小邦，特別是教皇區，又開始革命的暴動，結果與大利的干涉又奏了凱歌。

雖然，意大利革命運動並不因此停止，待到十九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意大利民族統一和民主政治運動，在下層國民之中找得更積極的擁護，而意大利的革命運動因此更進入一個新階段。

由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五〇年，意大利的資本主義之發展使意大利的革命運動走上一新途程。誠然，意大利這時還是一個農業國，但因直接近歐洲市場關係，封建義務是逐漸地在廢除中，並且這種廢除是與農民失去土地攬手的。農民現在再不像十年前一樣，去幫助反動派

，他們現在已開始加入革命了。假如說四十年代，農民加入自由運動還不成功，那末城市的革命者會更無力。

這時，意大利的主要工業是絲織工業。絲織爲輸出品之主要對象。在倫巴底和威尼斯，每年絲的生產價值達七百萬鎊，而全部輸出品之價值爲一億鎊，輸入則爲一億二千五百萬鎊。繼威尼斯而後的就是尼亞坡耳。此外，如比芒特，其工業生活也佔很大地位。

隨着意大利各地一般經濟生活之增高，就是中產者及其政黨——溫和的自由派——意識之增高。而憑藉城市手工業羣衆和各個農民集團的知識分子一部分便構成共和黨。共和黨的首領是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 和加里波的 (Giuseppe Garibaldi)。前者是運動的思想指導者，是政治首領；後者是一位軍事指導者。瑪志尼雖然是一個統一的共和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但他却有很深的基督教思想。他的口號是：上帝與國民。毫無疑義，瑪志尼的思想是有反動成分的，然正因此，他才能在落後的意大利的手工業者和農民中取得廣大的同情。爲意大利革命基本特徵的，就是意大利革命運動之展開，同時展開出意大利的統一運動須在其某一國王或羅馬教皇領導之下來完成。

意大利統一運動之成功，也和德國一樣，是有兩條道路：革命的道路和經過統治者的妥協道路。自由中產者選定後一道路。他們希望某一國王或羅馬教皇來統一意大利。反之，以瑪志尼爲首領的急進派，他們却走上革命的道路。瑪志尼是「青年意大利」黨的黨魁，他準

備用革命的手段去反對奧大利和各小邦統治。

三十年代，瑪志尼及其黨徒即積極的在意大利各國舉行革命的叛亂，但結果都遭受悲慘的失敗。一八三三年、三四年、三七年，曾發生許多大暴動，結果都被捕殺。直到四十年代，運動才更有組織更帶羣衆性質。現在半島上的各國君王亦都想出來作民族統一運動。乃至教皇辟益九世也說現在是「陽春時代」。從一八四七年以來，運動的範圍是一天擴大一天。這時期羅馬的運動領導者，是手工業者契切魯克歐（Cicherovalco），在中意大利是瑪志尼和加里波的，在威尼斯是辯護士馬甯（Madaia）。一八四八年一月革命在西西里開始了。至三月十九日米蘭也發生暴動。至於倫巴底更全部動員以反對奧大利的軍隊。當革命出現於奧大利統治各地時，奧大利的反動勢力準備給革命以澈底的打擊。可是自由派和共和派的最大的努力來壓制國內各君主的，首先是亞爾伯特（Albert）的軍隊出來反對奧大利軍隊。於是意大利各獨立君主爲民衆所逼迫不得不宣佈立憲。待至一八四八年六月，與軍擊敗意大利軍隊的主要部分後，於是從敗北中醒轉來的統治者自己也開始拒絕改良了。這時各黨之間興起了尖銳的鬥爭。急進的共和派現在不能不反對溫和的自由派。在羅馬，教皇辟益九世被迫退却了。共和派在小資產者和手工業無產擁護之下取得了政權。羅馬現在建立了共和國和革命專政（一八四九年二月五日）。這運動於一八四八年秋已出現於奧大利所包圍的威尼斯。馬甯就是這個地方的革命的獨裁者。但是在羅馬和在威尼斯一樣，革命的展開恰在大陸革命

運動失敗之頃，而這兩個城市又是與意大利其餘各城市處在一樣孤立地位。復次，無論是羅屬或威尼斯，當時的革命專政又都是由損傷中產者和私有財產的，譬如馬寧自己就是一個反對左派同盟者——工人的人。因此，在因循的攻擊開始之後，在飢餓疫症蔓延之後，威尼斯開始投降了（一八四九年八月二日）。至於羅馬陷落得更快。羅馬的陷落，法國的軍隊起了一個決定的作用。當路易旁那帕特的反動軍隊攻下羅馬之後，復辟運動立刻開始。隨後，這種復辟運動擴大到全意大利。甚至就是「自由的」君主也要廢止一切已經准許的改革。

這裏我們對於薩丁王國有特別一提的必要。本來在一八四八年，關於意大利統一，各方面都屬意於薩丁。因薩丁有比較強大的常備軍。但一八四八年，薩丁對奧作戰失敗以後，比芒特（即薩丁軍）軍隊也被奧軍擊破。可是當一八四九年全意開始復辟運動後，獨薩丁的立憲仍保存着。因此，便形成未來在統一意大利旗幟下動員一切革命力量反對奧意大利的專心。

一八四八年意大利革命失敗了，但牠對於意大利不是沒有意義的。牠是未來成功運動之預演。不過，這是由於意大利經濟發展之薄弱和強大的無產者幹部之缺乏，也就預定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意大利的統一運動不能不由反對國內勞動人民利益的上層來完成。……

六、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之完成

由於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失敗，便留下一個革命鬥爭的根本問題，即民族統一問題沒有解決。但民族統一是一意大利工業資本主義發展之必須的先決條件。可是意大利的統一也和現在的中歐一樣，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對內問題，即廢除小邦統治，寡頭政治、農奴制度的殘餘等，牠的統一必須一開始就要對國外的統治者作頑強的巨大的流血的鬥爭。

一八四八年後，首先關心國家統一的當然是中產者。因為意大利現在正開始大工業發展，中產者是願望民族統一的。其次，統一運動對一部分貴族和現在已成爲資本主義經濟構成一部分的地主也是有利益的。至於意大利的農民，從主要方面說，他們固已脫離了封建義務，但他們現在仍然是極痛苦的屈服在專制的和僧侶的統治之下，所以農民也是需要革命的。至於意大利的城市，在當時只有很薄弱的發展。因此，真正近代的工人運動在意大利是不存在的。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只在手工業無產者之中才取得若干成功。在手工業無產者之中恰像在小資產者之中一樣，瑪志尼和加里波的獲得一種特殊聲望。一八四八年以後，他們的聲望更是逐漸向上。

當我們敘說一八四八年革命後的反動時，我們會指出，當時只有薩丁王國（即比芒特）還保存着立憲制度。比芒特在當時並不是屬於經濟發展區域，只因牠的國王在一八四八年有

對奧作戰的功勞和他想使其餘的意大利及奧國所領，屬於己有，他才對國內的反對派取寬恕態度。因此，比芒特在反動時代簡直是全意大利反對活動的中心。這對於比芒特國王和資產者是有利益的。因為反對派的活動給他們事業架下一個基礎。同時比芒特的國王爲了反對依賴大地主僧侶和一部分農民的反動的君主黨，也迫得他不能不與自由派的貴族（右派的中心）和工業商業中產者（左派的中心）聯盟。而策畫此種聯盟的人就是一意大利的畢斯麥——加富耳（Cavour）。急進的共和派則把他們的中心建立在熱諾亞。但是他們並沒有多少自信力。因爲在意大利也恰像在德國一樣，民族的統一並不是下層澈底革命之結果，而是上層改良之結果。不過，意大利與德國不同者，就是上層改良還不够，必須伴以國民武裝鬥爭。而這一任務之完成就是革命的將軍加里波的事業。這是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之基本特徵。

加富耳於一八五二年受命組閣。他的政策的第一步就是積極的增加軍備。他宣佈與教皇辟益九世的反動政策作鬥爭。他參加克里米戰爭，雖然巨大的代價只是換得列強對薩國的支配。此外，加富耳並用了同樣的代價與法國訂立聯盟，但是，我們知道，這聯盟所達到的結果是如何的欺騙了加富耳。一八五九年四月，比芒特與法國聯盟乘奧大利在歐洲之孤立，對奧宣戰，而索非里諾（Sofierino）一戰是十九世紀最巨大的流血戰事之一。但結果法國很快的單獨與奧言和，而意大利不得不割尼茨（Nice）和薩甫（Savoie）以謝法，至於拿破崙第三不但助意大利統一，甚至以意大利統一爲己患。加富耳這時，只有辭職一途。六個月後

，當加富耳重任舊職時，這時突斯塔、巴姆、陸克等小國已宣佈歸併比芒特。而中產者更把未來革命事變一切指導都奉給威克多瑪諾（Victor Emmanuel）政府。很奇怪的，就是加富耳這時不但懷疑這種歸併甚且想加以反對。爲什麼？因爲他怕拿破崙第三。

由於薩奧戰爭的結果，不能主張完全統一的民族主義者滿意——他們對於割讓尼茨和薩甫尤至不滿——這時民族鬥爭已開始從下層發展起來。一八六〇年，西西里發生暴動，急進派提出統一意大利的口號以領導革命，至五月，加里波的以一千二百「紅衣」志士的義勇軍深入西西里，這支軍隊在短期間建立了大功。擊破那不勒斯二萬四千之衆，不上一月佔領了三百萬人口的西西里島。同年如佛蘭斯王國、尼亞波耳，和南意大利大部分的土地概落於加里波的之手。這時薩丁得到革命勝利消息，比芒特政府立刻遣兵南下，九月遂佔領那不勒斯城（一八六一年那不勒斯屬於薩丁），比芒特更進而擊破教皇軍隊。教皇區全部都被佔領（羅馬城除外），在那不勒斯及教皇區全體人民投票中，多數贊成歸附薩丁。一八六一年比芒特國王正式宣佈。成爲「意大利國王」，而加里波的所取得的區域亦完全歸併於「意大利國王」。但這時統一工作還沒有完成，威尼斯還在奧國手裏，而羅馬還不是這個國家的首都。因爲羅馬是爲法國軍隊所保護。

威克多瑪諾對於破壞意大利統一的法奧完全不敢取進攻政策。一八六二年，當加里波的以少數義勇軍向羅馬進攻時，王朝不但不出兵援助，反而出兵擊加里波的，宣佈加里波的

爲「叛賊」，而加里波利自己也爲他的頑固英士所辱罵。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的結果，給意大利以將回威尼斯機會。但是羅馬仍在全意大利之外。於是加里波利的於一八六七又再度進攻羅馬，他的少數軍隊在意大利國王完全「中立」之下完全爲法軍所擊敗。直至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開始之後，並且僅在色丹（Sedan）戰後，威克多陽瑪諾才派遣軍隊進攻羅馬。一八七一年意大利國王奧都羅馬，意大利統一遂告完成。

意大利王國是以犧牲急進共和派的軍事而建立的。僅因急進共和派比自由派和改良派更尊重民族的統一，所以才把所奪得的政權和平地讓于中產者和國王。

意大利的統一是和德國一樣，是由國內最大的軍事權力在全國人民革命熱情之下漸次克服國內其他較小的軍事權力和國外統治而得到統一的。

美洲獨立與南北戰爭

第一章 緒言

美國現在是太平洋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自從中國抗戰和歐戰發生以來，牠在太平洋上的地位，更顯出從來未有的重要，目前暴日所畏懼的，並不是蘇俄和英國，而是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因為美國現在不僅在軍力上足以打倒暴日，就是在經濟力量上也足以制暴日之死命。

可是，在太平洋上這樣一個能夠以自己的武力和資力壓迫其他一切的國家，牠昔日竟有一個典型的被壓迫民族，竟是全世界上一個最典型的殖民地，並且在牠沒有變為獨立國家以前，牠所受到的諸種民族壓迫的痛苦，在某幾方面看，正不亞於近百年的中國。但是從另一方面說，美國不僅是近史上的一切被壓迫民族的革命的先驅者，並且也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發源地。而愛護自由的詩人，且把牠的爭求解放的精神喻為

逆行天地常道，炫耀着的第二個身披火焰的太陽。

美國革命成功最初數十年，牠對於世界的影響正像十月革命後蘇俄對世界的影響一樣，世界分為贊成牠和反對牠的兩大派別，急進派若承認牠的缺點即是反動，保守派若承認牠的

優點即是叛逆。由此可知美國獨立革命影響之大了。

可是，美國歷史的起源怎樣呢？他在未獨立之前所受宗主國的壓迫又如何？他又怎樣脫離宗主國的統治而變為一個獨立民族呢？他在十九世紀又為甚麼發生內亂？和又怎樣重新得到統一呢？又，他的獨立和統一的教訓有否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呢？

自然，從世界史的進程說，今日中國的民族獨立運動，無論在那一方面，都與十八世紀美國獨立運動有所不同的，十八世紀美國獨立運動，是近世資產階級革命之發軔，是後於牠的法國大革命之先聲，是近代一切被壓迫民族獨立革命之典範。至於我們的民族解放運動，就國內說，雖是在謀自己民族之獨立自由平等，在謀自己經濟生活之自由發展，但就中國解放運動之世界意義說，牠卻是直接促進世界真正和平的。

雖然二十世紀的中國民族獨立運動，與十八世紀的美國獨立運動之世界意義是如此不同，但我們應否放棄對美國獨立革命的經驗研究呢？我們絕對不應放棄。我們不應放棄美國獨立革命的經驗研究，恰像我們不應放棄任何大革命之經驗研究一樣。因為一切具有歷史意義的革命，他是不為民族界限所限制的，並且一切流血的犧牲，都必然是為全人類流的，因此，不管十八世紀美國獨立戰爭與我們眼前抗戰是怎樣懸殊，但其寶貴的民族鬥爭經驗對於我們總是可貴的，親切的。並且在實際上也是我們不可多得的精神武器！

反之，如果我們丟掉中國抗戰與美國獨立之世界意義而不談，而來單就這兩個民族獨立

運動自身類似點說，那麼，美國獨立戰爭，甚至牠的統一運動，與眼前中國的獨立與統一運動，實有極多類似之處。而且這些類似之處都是值得我們慎重加以研究的。我們知道，美國在獨立戰爭前並不是一個統一民族，牠的統一與團結，是逐漸在反對外國（初爲法國，後爲英國）壓迫中形成的，這一點與我們很相同。其次，就地形說，美國獨立革命所反抗的國家雖是大西洋彼岸的一個島國，而美國自身卻是一個大陸國。這一點又與我們相同。第三，美國獨立運動的成功，並不是一時幸運之結果，而是從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得來的，而且牠的抗戰時間延長到八年之久，這一點也與我們相同。至於說到我們在抗戰後的統一和建設工作以及開發西北運動，將來必有極多類似美國之處。

諺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就是我現在要來研究久被遺忘的美國獨立革和南北統一之原因

第二章 美國歷史的起源

談到美國歷史的起源，我們首先不能不對於十五六世紀的歐洲的商業資本的發展有所論述。德國大經濟學者說，無論是在古代和近代，凡商業資本佔有無上權威的地方，她便表現一種掠奪組織和向外發展傾向。而美洲之發現和歐洲移民運動，正是歐洲資本主義發達之結

但是十六世紀，爲歐洲最大的商業資本的國家並不是英國，而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因此，自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後，美洲大部份的優良土地皆在西班牙之手。西國這時爲美洲最偉大的殖民國家，而墨西哥，祕魯，阿根廷，密士失必，格蘭德河，佛羅里達均爲其所。至於未被西班牙所佔有的北美，在英人佔領之時，同時有荷蘭和法國的活動。

英國從事殖民運動，以時代言較爲落後，以成績言則最爲偉大。並且英國卒因得力本國中等階級的增加，商業的發達，和其海軍的擴張，使牠在殖民事業上遠駕西，荷，法諸國而上之。

當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家之鼓吹移民新大陸的動機甚多，而最重要者有以下幾種動機：

(一) 欲打倒西班牙的勢力；(二) 欲獲得冒險商人應得利益；(三) 以爲英國人口過多；(四) 宣傳基督教；及(五) 增加國家尊嚴。十六世紀末葉，和琴茲 (Captain John Hawkins) 掠奪西班牙的奴隸貿易，德賴克 (Francis Drake) 侵略西班牙殖民地，可謂英國殖民事業之發端。之後，吉爾伯特 (Gilbert)，刺里 (Raleigh) 等亦都是英國殖民的先驅。到了斯圖亞特朝，英人之移至新大陸者更多。當時英移民可分三種：(一) 非國教的教徒，如清教徒，分離教派，及天主教派等 (註一)；(二) 擁護國會反對君權神授的革命份子；(三) 受經濟變遷的痛苦的人們。希望到新大陸求得生路。

註一：屈勒味林說，容忍各式宗教在英國國內雖爲一六八九年以前所未聞；但在海外則

爲整個斯圖亞特時期殖民政策的一部分，國王與國會俱能體會這種容忍精神。因此，在英國國內，不論任何教徒，凡不滿意於本國遭遇者，皆可得政府贊助移往美洲。在美洲殖民地內。雖是仍居英國旗幟之下，但皆能獲得良心自由甚至政治自由。於是，一切在國內輾爲搗亂多事的分子，皆去美洲發揚英國的國力和光榮。這一比較自由的原則，是工商業者在殖民霸權爭奪上能戰勝西班牙和法蘭西之主要原因。

即使十七世紀英國在北美海岸殖民，還是帶着普遍性質。所有的土地都看爲英國國王的所有地，而用鴉片渡大西洋而往，只有印第安人（Indians）住居的新世界，非個人能力所能及。那裏探險隊所用的船隻，係由富裕的企業家之商業公司供給的。這些探險隊，由政府取得廣大地域的特權，其境界不能有任何規定。因此，特許地域的範圍，用刻度而決定之，如一六〇七年，麥隆哈斯公司之行的廣大地域，爲紀念以處女終其一生之英女王伊利沙伯，便命名爲Virginia（意即「處女地」），希夫（Robert Heath）將軍，於一六三〇年，拜賜加羅蘭納（Carolina）；巴狄摩亞爾（Baltimore），於一六三三年，拜賜馬利蘭（Maryland）；約克公（Duke of York），於一六六四年，由荷蘭之手奪取新亞姆斯特丹地域，於是又與紐約（New York）之名相洽。北美最初的主人，都是富裕的地主。他們是美洲貴族與紳士之前身，又是與英國名門貴族有非常近親關係的人。

雖爲，本國與殖民地之土地所有制，彼此有本質的差異。在英國地主驅逐農民離開自

古以來就住慣的農地，並把它變為牧場。但在美洲則相反，給與人民以土地所有權，比甚麼都在先。並且爲了獎勵移殖，更給移民以種種方便。於是自由的移民羣，依慣行的道路，而向美洲奔流，而殖民地由之也逐漸進步。所以，殖民地的最初狀態，是時刻萬變，並非完全相同。

南方的殖民地，如維基尼亞，加羅蘭納，馬利蘭等地，較別的地方，殘留着從古而來的性質。在這些地方，有使用奴隸勞動的大農場，在那受熱烈陽光照射的沼澤地帶，甘蔗和棉花都有很好的長成；至於維基尼亞，菸草的發育更爲佳良，並且許多菸草栽植者都變爲富人。白人勞動者不適合於炎熱的不健康氣候，所以對於殖民的事情，代價甚高。流放的犯人，又每有逃亡。開墾者們，爲着廉價而有忍耐的勞動力，便歡迎黑奴。由於上述原因，在南部大地主所有制不僅發達，而且根深蒂固。如從他們的血統及出身觀之，與英國貴族，有密切關係。復次，這些地方又是由法國來的貴族和許格諾教徒的根據地。因之，這些地方既少工商資產階級的勞力，復又缺乏獨立的小農。

在海岸的北部所建立的殖民地，完全取不相同的形式。北部是湖山相接地帶，不適耕作。惟這些地方，有優良的港灣，爲狩獵及漁撈之適宜地。這裏的殖民，統一於新英格蘭聯邦，主要的人民，是收集商，艦員及探險家。大土地所有制，在此處不易成立。殖民以及取得土地耕作特權的殖民公司，俱陷於破產而瓦解；而由印第安人手上收買毛皮的商業則很爲發

達。尤其是以烈酒交換印第安人毛皮的商業。因此，在北部便出現了大胆的和充滿了生氣的資產階級。最初資本積蓄的主要泉源，是非洲之黑奴貿易，和海賊式的海上秘密通商。所謂糖，酒，黑奴這三種交易事業，本來是一般人致富之道。他們由南部殖民地輸入蜜糖，以該糖在北部釀造精酒，再以該糖酒輸入南部作為輸入奴隸之交換品。紐約，在其創立之初，即是一出賣海賊掠奪品的主要市場。奴隸的買賣，走私，海賊，在資本主義成立之初，並不認為是可恥的。

因為沒有封建制度，或者可以說，受貴族的影響較薄弱，在北部殖民地，顯然地，是表現為一種自由的民主的共和國的性質。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最初都有同移民同來的英國官吏，並且這些官吏以後有昇為總督的。但在北部，「英國的法律不行於美洲」的思想，仍是根深蒂固，因此，北部殖民地，對於在母國因信仰及宗派而受驅逐的人們，從很早以來，就成為避難所。凡橫渡大洋，而來到北部的英國殖民，他們都是最活動，最富於進取性的國民。他們反對國教的立場與他們的政治的急進主義相聯繫。

海岸中部的殖民地，帶有一種特別性質。在這裏，最足為代表的，是廣大的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此地因受天產富饒，氣候和暖之賜，無果樹的原野，與人跡未到的草原，展列於開墾者之前，這裏的移民，專營農業畜牧。大土地所有制，在這裏無法立足。白人勞動者少，奴隸勞動因土地制度的關係亦不多。土地隨便佔領。因之，在故鄉貧困不堪的農

民一到這裏，毫無困難地就能取得一部分土地。耕种土地之人，就當與猛獸和印第安人鬥爭。英格蘭人和愛爾蘭人，不斷向此處移住。棲息新地和耕作此處女地都不容易，所以此地既沒有領主統治，也沒有農奴和佃農，更沒有警察不斷的監視；一般農民與細微的財產，都起來到這地方，同時也攜來了對於地主貴族，君主及僧侶之憎惡。這裏的移民，除古羅馬的移民足以此擬，他們實具有為其他民族所沒有的優越點。他們都是具有不能抑制的精力，都具有一種絕對的約束自己的能力，都具有熱烈的道德和宗教感情；都具有一種直接推進到不願社交之獨立性。他們後來不僅是獨立運動的柱石，並且是十九世紀美國農業的民主主義之基礎。由階級觀點說，他們可以說，是堅實的農民資產階級。

中部殖民地，除了上述的富裕農民外，也間或存有少數大地主，並且在都市中，還有工商業資產階級之生長。

其次，手工業無產階級和農業無產階級也發生了。對勞動者的需要，超過供給。不滿現主人的勞動者，都易找得別的工作，並能充當獨立的農夫。

上述的階級特徵，隨着歷史的進展漸次固定化。由歐洲來的移民，正確的反映出歐洲自身的社會對立和鬥爭，並且他們是使本國的政治的大風暴，在大西洋的彼岸得到獨特的解決。英國本國大地主，當他們把農民驅之離開土地，並迫害中產階級時，而被迫害的人民，皆在美洲殖民地內實現了他們對於土地，人生自由，和獨立諸要求。但英國本國革命發生後，

一種相反的现象亦隨之發生。即君主制與封建貴族，因在本國遭逢末運，於是這般地主也有不少的都流入南部殖民地，因此，使這時的移民不免帶着反動色彩。著名的貴族與家族一起，儘可能的帶着資本，逃往維基尼亞和南北加羅蘭納。

但是，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後來又不限於英國血統。在一七〇〇年後，蘇愛人（Scottish）因宗教與經濟的不滿，大多移至賓夕法尼亞及向南的殖民地。革命以前他們來到美洲的約有三十萬人。其次，十七世紀因不堪宗教戰爭和王朝戰爭的日耳曼人亦大批移到美洲，菲列得爾菲亞（Philadelphia），至賓夕法尼亞及馬里蘭等地；至一七七五年已有二十萬人（註一）。此外尚有法國的新教徒，衛爾斯人（Welshmen），愛爾蘭人，瑞士人，及猶太人。因此，美洲的人種至爲複雜。

註一：歐洲移往美洲的移民中，日耳曼人的移殖最爲悲慘。當時適值三十年戰爭以後，在德國，無論城市和鄉村皆受澈底的毀壞，因此，一般在祖國找不着生路的人，皆逃下萊茵河，撥入亞姆斯特丹，變成一般如狼似虎的船舶經理人的犧牲品，這些人將他們最後由錢財的搶完後，再把他們裝在十分擁擠與不堪的航海的船舶上，一切飲食的供給又十分惡劣，以致半數的人是死在航途中，其餘殘存者雖得在美洲登陸，但他們因積欠船員的款項太多，竟被賣作臨時奴隸，藉以償清旅費。

各殖民地彼此間的關係，在一開始時，是很危弱的，彼此相距既遠，道路又壞，而社會

經濟的結構又不相同，因此，牠們最初都是各自過着獨立生活。可是，至十八世紀初，各殖民地的關係就日增密切。殖民地的經濟關係既已開始飛速的發展，而人口也就日增無已。一七〇〇年，十三州的居民總數不過二十萬，至一七五〇已增至百三十七萬。工商業日益發達，互相間貿易也大為增加，而一六九三年設立的聯絡南北交通的郵政至是更促進各殖民地之接近，但是圍繞南北美最大的動力，還是英法在美洲的爭霸。

法國自佔有聖羅倫士河的南岸之後，勢力漸漸膨脹，以達到俄亥河和密失士必河流域。法國的殖民者拉薩耳（Lassalle）是一六八二年抵密失士必河口的。英人於是驚嚇起來，發出『高爾人禍』（Galle-Peril）的呼聲，英法在美洲的利害鬥爭，結果自然是由戰爭來解決。

一七五四至一七六三年的戰爭叫做『法印戰爭』（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此次戰爭是由於英法爭奪俄亥河而起。當時法人團結一致，軍隊有良好訓練，且有印第安人為同盟，故力量雄厚。英人的情形正是相反，號令既不統一，殖民又各自為政，而殖民軍隊和英國軍隊又互相猜忌。因此，英如欲戰勝法國，非鼓起各殖民地的愛國心，使他們團結合作不可，這次戰爭的結果英國是戰勝法國，並做了北美的主人。

英法戰爭，就英國本身說，並不是一個成功。但對於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卻是一大刺激。『高爾人禍』是沒有了，他們在軍事上可以不必倚賴母國。他們認識了軍事上合作的意

義，自信和自尊心都強盛起來。因為殖民地的民軍，在對法戰爭中，戰鬥並不亞於英國的正式軍隊。獨立革命時代的軍事領袖後來並為美國第一任總統的華盛頓便是英法戰爭時代美國的民軍組織者。

就政治說，英法戰爭對於殖民地的人民影響亦甚重大，因作戰期間，對於籌劃經費，供給軍需，編練民團等工作在在都需要組織，十三州的好些地方會議的政治活動頗有影響和成績。

美洲殖民地自法國被驅逐後，地位已非昔比。他們在與法人及印第安人戰爭結束時，有許多有思想的觀察者便提出了殖民地遲早會推翻英國統治的意見，一七六五年路易十五的名臣雪與色爾（Chateau）固曾預言過，美洲將會發生使英國退回歐洲的革命。一七六七年法政府派往美國的密使科爾布男爵（Rousselle）的觀察尤為明確。他說：

「這裏所有各階級的人民都浸染了這種獨立自由不受羈絆的精神。如果各地方都能在這種共同的代表機關之下聯合起來，獨立國家不久便可以成立。無論如何，這種國家總有一個時候會出現的。不管倫敦如何做法，這個地方正在長成這麼大的力量，再不能久受距離這麼遠的統治。」

第三章 獨立運動發生之原因

自十八世紀以來，美洲的商工業已是日益發展，而這種發展之必然結果，當然要引起美洲人民，特別是資產階級與宗主國的反動統治發生衝突。因為殖民地的經濟生活既不仰賴於宗主國，而宗主國的統治勢成障礙。因之民族獨立的要求，只是遲早的問題。雖然，這只是就當時的客觀的歷史趨向而言，並非指當時的美洲人民在主觀自覺上也達到這種程度。反之，如果就當時美洲人民主觀自覺說，不僅一般美僑人民未有如是之覺悟，就是獨立革命初期的一切政治領袖，他們在主觀自覺上也未想到要脫離英國而完全獨立。當獨立宣言發佈的前一年，當時美國的大思想家的佛蘭克林，政治家華盛頓等固沒有想到要脫離英國，就是這時為美國獨立運動的最大的煽動家，哈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和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也沒有想到這件事。哈米爾頓在一七七五年討論英美關係時，還在承認「皇帝是帝國的唯一的統治者」，至於亞當斯，不僅承認英皇是英國的統治者，並且說他必須是散佈全球的帝國各分子之統治者。為了補充這一意見，他提議帝國皇帝應當同時加冠許多地理的名字，如大不列顛，愛爾蘭，馬薩諸塞……等。既然如此，為甚又發生獨立運動呢？

爲了解答這一問題，我們一方面要理解英國殖民政治的傳統與殖民地的利益衝突，他方面，他們又應理解喬治三世之愚笨及英美當時之社會不調和。

英國對殖民地的政策，較之西班牙和法國西，向來本具自由性質，但詹姆斯於一六〇三年即位後，斯圖亞特朝對於美洲的殖民地便採取高壓政策。他於一六二二年委任一個貿易參

事會，在美洲執行英國法律，且收回倫敦公司特許狀，使維基尼亞成爲皇家州。至查理斯第一又命十二個樞密院顧問組織一委員會，以統治殖民地。他的計劃幸因一六四二年革命而未實行。

復興時代，查理第二對美洲殖民地又想實施皇權，並於一六八四年取消馬薩諸塞的特許狀。後來到了詹姆士二世，他又是查理第二政策的繼承者，於是又將北布置於皇家總督統治之下。查理第二的政策，後來總算因光榮革命而遭受停止，但這時英國的國會，却認殖民地的統治因商業的理由，而應隸於國會。英國的立法家這時和歐洲的政治家一樣，都是倚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把重商主義的理論用之於殖民地，就是殖民地只能以廉價原料供給宗主國，而同時專向宗主國購買製造品。這種理論之實行，於是隨產生各種與殖民地不利，並爲他們所仇視的立法。

第一，是所謂航運法（Navigation act）。規定殖民地的出口貨物一定要由英國船隻運輸，歐洲貨物之輸入殖民地者也一定要如此，否則，一概受罰。第二，是所謂規定貨物條例（Enumerated Commodities Act），凡特別貨物而爲英國所不生產者都只能輸往英國成爲英國所獨佔，如煙草，糖，棉花，羊毛，染料等皆須爲英國所獨佔，而這種規定貨物，又是每年增加的，加一七〇四年，一切船舶用品皆爲「規定貨物」一七〇六年，米亦爲「規定貨物」。一七三二年，銅，海狸皮。及其他毛類：一七六四年，鐵，皮革，鯨魚，木材，生絲，

苛性加里亦皆爲「規定貨物」。「規定貨物」只能賣給英國，即使他國以較高的價格買此種貨品，殖民地之人民亦不能出售。第三，是商品條例（*Sample Act*）。凡歐洲國家輸入澳洲殖民地的一切商品，除少數例外，皆須經過英國的口岸，再運往殖民地，這完全是爲保護英商利益的。

但在美洲方面，他們的經濟繁榮是依據甚隱。他們十分之九的商人係私運貨物者。獨立宣言的署名者有四分之一是習商的，駕船的，和從事於有干禁令的商業的。罕科克，特薩巴爾，和哈米爾頓都是人所共知的熟於并贊成不法商業的人。罕科克更是不法商人之王。他因被證實爲私運貨物者罰鍰五十萬元的條件，于勒克星敦發生流血慘劇之際，以約翰亞當斯爲辯護士，受審於波士頓海軍裁判所之前。

在諸種束縛美洲人民的不良的立法中，其中最壞的一種，是所謂禁止製造條例。這種條例，是完全爲打擊英國製造業的。條例主要作用，只許殖民地的人民買英國貨物，不許他們自己製造，即使製造出來，亦不能輸出海外。如殖民地的鐵，和鑄鐵，只作成鐵條而輸出，決不能作成物品而輸出。一七〇五年，雖然在殖民地建立有製鐵廠，但同時却發佈禁止在殖民地建立鐵器製造廠的命令。又如殖民地栽培的甘蔗，只許在殖民地內榨成糖汁，如製成完成的沙糖，則被禁止。此外，對於一切新發明的機器，甚至圖樣，要想輸入殖民地亦被禁止。

還有一種條例，比其他任何條例所引起糾紛都爲廣大，這就是紙幣條例。一切殖民地過去因種種關係都發行大宗紙幣。除賓夕法尼亞外，所有殖民地的紙幣都大大的跌價。但是在殖民地經營商業的英國商人，他們於貨物出售之時，不能不接受這種紙幣。英國人是憤懣者，他們是贊成取締紙幣發行的，反之，美洲的人民是債務者，他們是希望紙幣低落的。因此，利用殖民地對於紙幣的感情，使之變成革命的動作，這是特別容易的事。英國商人利用英國的國會，制定一種法律，禁止新英格蘭及各殖民地再發行紙幣。反之，在殖民方面，幾乎每個殖民地的立法會，都爲債務者所支配，總是與英國的國會及英國駐美洲的總督兩對立的。這種連續不斷的爭執，自然把各殖民地分爲兩派：一派爲殖民中立之極少數，他們依附於總督；另一派，爲殖民之絕對大多數，則屬於立法部。

自巴黎和約之後，英國的債務已增加一倍，而她在美洲的費用自一七四八年後增至五倍。因此，本國的商人與地主皆欲藉增加殖民地的財政負擔以減輕他們自身負擔。就是在巴黎和約簽訂的後一年，英國就有所謂「皇家告示」，建立美洲四個新政府，並保存阿利根尼諸山與密失士必河間的領土爲印第安人之用，命令殖民地止於諸山以東的一條線。此命令引起美洲商人、殖民，及土地接獲家之強烈的反抗。一七七四年魁北克案，對「皇家告示」雖有若干改正，但殖民地已經認識英國欲否認他們對西部土地之要求權。

此外，英國不欲在美洲作直接的賦稅剝削。如關稅法，規定殖民地的稅吏直接向英國關

稅委員負責，稅收剝削最受殖民反對的是印花稅，按該稅收法，殖民地中所有的一切的正式文件俱須帖印花，這是英國對殖民地全體國民徵收直接稅的第一個企圖，因此，殖民地的人民皆大聲急呼：「沒有代表不能徵稅」。殖民地這種根據正義的呼聲甚至使當時新輝格黨（*the Whigs party*）庇得（*William Pitt*）也不能不表示同情。「美洲人民——庇得說——實是英國的嫡子，而不是英國的私生子，他們既是子民，便亦應享受產生代表的一般權利，而決不能不經他們的同意而強迫他們納稅，我深願一知在這裏代表一個美洲人民的是誰，即便是一個無人見過的代表，這便是所謂憲法的腐敗部分……我慶幸美洲會繼續抗，在一個有穩固的良好故事上，我國的軍力實能將美洲舉得粉碎……但你們的成功必是很危險的，美洲如果傾覆，必要像一個強有力的人傾覆，她必欲擁抱着國家柱石，並絆倒憲法。

印花稅總算因庇得的反對而歸於取消，但至翌年英國國會又通過所謂填增德法案（*Income Tax Act*）。令英國在美洲的行政官向殖民徵收玻璃，鉛，繪畫顏料，茶與紙等捐稅。而這種徵收又為殖民地所反對。總之，這時在英國方面，因為國家負擔之增加，政治家特別是喬治第三總希望殖民地分担帝國負擔一部分；而在殖民地方面，即便徵稅在實際上縱無多大損失，但英國的國會沒有美洲人民代表便可以自由徵稅的原則勢非取消不可。

除了上述種種經濟衝突和政治矛盾外，英美兩民族社會習慣的懸殊，亦是一大原因。英國名歷史家屈勒球林（*Frederick Madden*）說……

「英吉利的社會在當時猶是貴族的，而美洲的社會則已是平民的。倫敦及波士頓之間相隔有六七星期不舒服的大洋顛沛，所以人與人的往來極少，而自祖國向美移民的潮流，則自一六四〇年後早已瀕於停滯。在英吉利，政治及高雅社會，非清教徒之所得插足，但在新英格蘭則新教高於一切，且從而瀰漫於其它的殖民地；在馬薩諸塞盎格利干涉主義轉為不時髦的信仰。英國的社會是古舊的，繁複的，人爲的，美洲的社會則爲新進的，單簡的，生糙的，英吉利社會建築於極不均等的財富之上，而在美洲則財產猶是比較的均等，有望的童子儘可有於日後和本鄉首富相將的希冀。在英吉利鄉紳的意見操縱政治上的意見，但在美洲，則政治上的意見來自農夫，沿海的暴民，及森林中的邊民。」兩社會日常生活的處境和空氣既如是過異，要想對殖民地的統治有良好的結果，目非有高瞻遠視的政治家出而當權不可。可是在實際上，不僅代表英帝在美洲的一般總督將校都是驕傲無能之輩，就是英皇喬治第三自己對美洲殖民的處理亦極盡昏庸之能事。當美洲獨立時庇得已失去指導帝國政治勢力。他雖儘向喬治第三進警告，然而忠言逆耳，恩將怨報，喬治不但不聽，反誣之爲「叛亂的喇叭。」

這樣一來，美洲獨立運動，便只好如常時法國的大經濟學家兼政治家的斗哥（Turgot）所說：

殖民地如果實一樣，在她成熟的時候，自然會脫離樹身落下來。

第四章 獨立革命的爆發和經過

如上所述，在獨立革命未發生前，美洲和英國的衝突已是不可避免。可是從主觀方面說，美洲獨立革命也和其他一切革命一樣，牠在一開始並不是就有堅決的革命信念，反之牠是一步一步被逼上革命道路的。當時殖民中竭力贊助革命的，在北部為農民，工人，與小商人；在墾植地諸區為地主；在邊疆為多數人民。但熱烈親英的人民也佔三分之一，他們為北部的大地主，富商，皇家官吏，英國國教教士，及仰富商地主安息的人們。

革命運動一開始，殖民對英國尚有相當的感情，一時不想走極端，並且一般人們恐怕革命產生無政府狀態或軍事獨裁，將比英國統治更壞，所以當時華盛頓說，美洲有思想的人沒有想到獨立這件事。

獨立革命的直接誘因，就是反對印花稅和軍用稅。上面已經說過，印花稅是英國向美洲人民全體徵收直接稅的初次企謀，軍用稅就是要殖民須供給壓迫自己的英軍以住宿和軍需。這些法案與執行，大大的激動了殖民的情感。他們高呼：「為自由，為財產，不要納稅。」反對的方式，最初是遊行示威，毀壞英國官吏的房屋，隨後便變為大規模的抵制英貨運動，抵制運動幾乎是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運動之重要武器。國民一致不買舶來品，牠給與英國工業資本家以致命打擊。於是英國的商人只好對美洲人民取妥協政策，所以當洛金漢（

Rockingham) 內閣成立時，印花稅即明令取消。

在印花稅取消之後，一七六七年又發生反對課收茶酒的新稅運動。這次反新稅運動又是與抵制英貨同時並進。這種抵貨運動，與五四以來中國的好幾次最大的抵制仇貨運動一樣。竟發生了偉大效果。牠竟使英國在中部殖民地的輸入減少到三分之二。英國政府對於二次抵貨運動雖是採取讓步政策，但牠同時通過三種重要法令：(一)命令紐約議會，不納英軍駐防費，不得再進行任何事項；(二)在波斯頓商埠設立官廳，監視商業條例之執行；(三)申明英國政府有干涉殖民一切事情之權力。

這些法令，只是更進一步激怒殖民的反英情緒。一七六八年，馬薩諸塞總法院便發出致各州通知書，要求聯合反抗。馬薩諸塞的總法院因此被解散了。而維基尼亞的立法機關的民選代表團，亦因簽字贊成此通知，受到同樣命運。雖然，殖民反英運動並不因此屈服，他們現在在各地組織秘密通信委員會，藉以鼓吹殖民的權利和反英運動，而一向反對英國在美洲實行茶業獨佔的波斯頓，市民更於此時組成有名的波斯頓茶業黨 (Boston Tea Party) 並且由於這般市民之英勇的舉動，使革命隨成不可避免。

茶業是英國統治階級與美洲私運商利害衝突最大的因素。原來握有茶業貿易壟斷權的東印度公司是英國宮廷寵幸的所有物，他當時大有破產之勢。因此，政府擬出一個計劃，讓他在美洲享有獨佔權，並免其捐稅，這一決定便毀滅了美商私運貨物的利潤，於是他們開始抵

制這種茶業，及十二月嚴寒之夜，一羣波斯頓市民爲「私運大王」罕科克所召集，他們穿着印第安人的衣服，跑到英國的茶船上，把三百餘箱的茶業，都丟到海裏去。

波斯頓海港發生了有名的拋擲茶箱之舉後，勃然震怒的英吉利政府即鑄成萬古不滅的大錯，牠在美洲殖民革命情緒正在日漸高漲時，牠反而去施行火上加油的大壓迫政策。所謂火上加油的大壓迫政策，就是懲處法案：（一）封鎖波斯頓海港；（二）馬薩諸塞政府，廢除一六九一年特許狀，波斯頓市議會非得總督許可不得舉行；（三）令所有關於美洲的政治犯案件統移英國審理；（四）強迫馬薩諸塞州供給英軍的住宿與糧食。此種處置失當的錯誤，不僅使別的殖民地盡歸附馬薩諸塞州，而且使本可爲英政府所利用的猶豫和保守派的分子亦悉站在激烈黨人的背後。

懲處法唯一的結果當然是和殖民地宣戰，因爲牠除了把殖民的行動引上戰爭外，他們絕無辯護可能。因之，殖民對於懲處法的回答亦甚爲堅決。他們立即召集第一次大陸會議，其重要議決是：（一）宣佈懲處法案無效，主張訓練民團以自保；（二）宣佈殖民的權利與苦情，致最後通牒於英國，要求恢復一七六三年的狀態；（三）對英實行經濟絕交；（四）上請願書致英皇，并向魁北克及英國的人民發表宣言，以求解決殖民的痛苦。

第一次大陸會議以後，美洲急進派的領袖便在各殖民地組織「安全」委員，以厲行對英絕交。在馬薩諸塞，給治（Cass）將軍已與愛國志士發生爭執，結果一七七五年四月變爲武

力衝突，待到勃覽星敦與康科特大流血發生時，立即震動各殖民地，這時一方面，是英軍對殖民之殘酷的屠殺。

綠林裏躺著死了的白髮老翁與青春少年；

草地上染紅了死難兄弟的鮮血。

他方面，是全國傳遍了抵抗之聲，爭自由與獨立的愛國男兒們，他不僅在拔用滿塗黑油遍插羽毛及其它土著方法以統一民意之效，并且開始向各地召集民兵并由各種大道小徑向波斯頓集合。數日之間英國駐在城內的軍隊全被包圍。

本來初次集合的散漫的民兵，從戰鬥的實力和紀律上說，是經不起久經訓練的英軍之一擊的，無如英國政府雖已決定用強硬的方法對付殖民地，且挑之使出於用武的一途，然而他們在勒克星敦事變發生前十二個月之中，他們所作者只是波斯頓之佔領。繼而當戰事在勒克星敦發生時，柏翰因（Burgoyne）在波斯頓寫道：

我們延誤已久，我們不特沒有採取有力的處置，且連這種處置的預備也沒有着手；然而我們忽然地採取決然的行動起來。我們此時正際惡戰開始之時，然而戰士們除了火藥外，什麼作戰品都還沒有徵發！

威爾統治階級方面的軍隊之腐敗，殖民地的革命民衆不僅一方面可以用他們自己的力量包圍着波斯頓，他方面，他們又舉行第二次大陸會議。第二次大陸會議舉行於一七七五年五

月。這次會議，急進分子完全佔着優勢。他們發出武力抵抗宣言，任命華盛頓爲大元帥，規定貨幣制度，並向外國進行同盟，至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更通過由賓斐孫起草的獨立宣言。

宣言內容是說，人生本是平等的。人皆有天賦的不可侵犯的權利，即生命，自由，求幸福等。政治的目的在使這些權利有所保證，政府的權利都是從國民來的，倘若政府不能執行職務，國民便有權更換這個政府，在人類進化過程中，當一國人民認爲有解除與別國人民政治連繫必要時，按照人類平等原理，他們就可以宣言分離。此外，宣言並臚列英國對殖民地種種弊端及殖民地諸種痛苦。末則堅決的宣佈美洲殖民地完全脫離英國而獨立。

這個宣言給與當時美洲獨立革命和以後歐洲革命以非常大的影響。偉大的思想，用一種雄壯的文字敘述出來，是永遠能振作人的志氣的。獨立宣言及佩因「常識」小冊子之版，他們不僅給酒樓茶館的人以談論革命的資料，重要的尤在這類宣傳品對於羣衆有非常大的力量。

在實際上，一切革命都是少不了下層羣衆之擁護的。英國革命也和其他革命一樣，牠并不是純由學者和書面人幹的，牠大半也是由暴動的人民用專橫手段與恐怖主義來完成的。撒母耳亞當斯就是當時一個最大的天然組織者與煽動者。他所主持的通信委員會，在革命中所使用的方法就是極殘暴的方法，他們不但絕不讓反對黨享有言論自由，他終且把他們完全羈

逐出外國，此外，如焚燬房屋，沒收財產，屠殺反動分子，亦是普遍現象。由於羣衆在革命動作的一開始就能有這種勇敢，堅決的努力，牠才給英國在美洲的統治勢力和托利黨（Tory Party）以致命的打擊。

美洲革命，有眼光的歷史家皆認爲，牠不是兩個民族間的鬥爭，牠只是兩個黨的鬥爭。兩個國家的保守派爲一黨，兩個國家的自由派爲一黨，而且有一些最兇猛的鬥爭是在英吉利國會中表現出來。國會中的反對黨人數雖少，但他們的言論極有力量，性格互異的察坦姆，柏克，及少年的福克斯都是美洲人民的同情者。

美洲沒有強大的貴族和封建勢力，但有團結一致勇往前進的國民，這固是其優點，但如果牠沒有一位文武全才長於組織亦長於訓練的大政治家華盛頓爲之領袖，恐怕他還是不易戰勝英國的統治。華盛頓本是美國的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他在與加拿大相接近省區有三萬畝土地，自魁北克法案後，革命若不爆發，他便要失掉這項財產。此外，他在阿利甘尼以西是和紅印第安人和法人見過戰陣的邊民。他深知美國人民的靈魂，復看到這新國家將來向西發展的偉業，故他當革命發動時，決意拔刀與民衆站在一邊，而與英吉利宣戰。美洲散漫無紀律的民兵，因他的施措和訓練的結果，竟成爲最有忍耐和最有戰鬥力的軍隊。

美國獨立戰爭大致可分三方面來觀察；這就是北部戰爭，中部戰爭，和南部戰爭。我們知道，當敵對行爲開始時，波斯頓已爲給治（Gage）所統率的英軍佔領。他知道勒克星敦有

軍械貯藏所，特開一部分軍隊去從事破壞工作，但他卻不料他這部分軍隊一大半爲一種游擊隊所掃滅。

雖然，這還只是部分的損失，而英軍在波斯頓所作出的錯誤，更是無異乎幫助敵人以打倒自己。就地形說，波斯頓差不多是一個島，只有一條窄的沙堤才使牠與大陸相連接。在北面有查勒士敦半島，島上有布利茲山及邦刻山兩高地，向南有一半島，這裏有達徹斯特高地俯視波斯頓。因此，英軍如欲堅守波斯頓，必須佔四圍高地，這是軍事學上的初步原則。但英軍的動作并不向這方面發展。牠在勒克星敦事變前十二個月始終只駐守城市。待到革命的軍民在占勃湖西岸的皇家頭 (Crown Point) 與泰昆得洛家要塞 (Ticonderoga Fort) 獲多量軍需品和大砲火藥，并開始在波斯頓高地向英軍猛攻時，英國的守軍才大吃一驚。如其英軍在較早一點，開始即施行攻擊，不僅因當時的美軍是一般烏合之衆，不堪嚴重的攻擊，並且由於他們當時還沒有軍火，而在被攻擊時，更沒有較強的回攻武器。但是，現在英軍已陷於危險境地，牠非退出波斯頓不可。幸而牠有充分船舶停泊在波斯頓港灣內，在殖民的砲兵的砲術并不高明條件下，在波斯頓失勢的英軍，還可能開向革命軍缺乏守備的哈黎法克斯 (Halifax)。可是英軍在新統帥豪威 (W. Howe) 指揮之下離開波斯頓時，他們給敵軍一種多麼值得感謝的贈禮啊！

牠們遣下大砲二百尊，火藥數百箱，和一大批其他軍用品。沒有一種舉動對於革命的供

獻能比得上這種以放火以資敵的，豪威將軍本來是英國最熱烈的輝格黨徒，並為英國國會中極力擁護各殖民地者之一。他的這種失策，人們皆認為是他有意幫助殖民革命。

富豪威將軍在紐約請求英政府增援時，援兵很快地就送來了。他旋有三萬五千至四萬武裝齊備，給養豐富，和訓練有素的軍隊。而這時為華盛頓所統率與之對敵的軍隊，統共只有一萬五千人，並且都是服裝破爛，給養不足，與軍器不利的兵士。可是豪威這時並沒有積極的軍事行動，他不但想立刻去打敗華盛頓的軍隊，而且常常給予華氏以恢復元氣的機會。

一七七七年，豪威所統率的英軍佔領着紐約，他的兵力遠過於保守這地方所需要。如果他這時能使英軍佔領得孫河的全流域，那末，各殖民地的脊骨便被截斷。那樣一來，為叛亂中心的波斯頓與美洲最大城市菲列得爾菲亞差不多就容易被佔領。澤門，喬治貴族 (George Germain) 正看到這一要點，他覺得美人是佔有內線與南北都能取得聯絡的便宜。因此，他們派柏賴因去加拿大，使其沿哈得孫河直下以隔絕新英格蘭。他的計劃是對的，但他沒有嚴令豪威將軍自南北以上和柏賴因會師於薩刺托加，同時豪威也沒有對與他相峙的美軍作有力攻擊，因此，就給少數美軍能分出一部分軍力去幫助北部攻擊柏賴因，因而使柏賴因及其五千正式陸軍被包圍於大河旁的野地，而不得不向薩刺托加的美國義勇軍繳械納降。

薩刺托加之役對於美國獨立運動有絕對影響。這次勝利首先使贏得專制主義的法蘭西之

幫助並出而與英國作公開戰鬥。法國是七年戰爭中的戰敗國，從巴黎和約以後，法人時刻都在謀報復。在此以前，牠之所以不願公然幫助美國獨立者，皆因慮及美洲殖民沒有獨立作戰的力量，現在美洲人民的力量已經對英國取得重大勝利，法國爲了打擊英國計，自然願意資助美國作戰。自法國出面後，至翌年（一七七七年）西班牙亦加入對英作戰。

薩刺斯加是美國獨立戰爭一大轉機，但獨立戰爭並不是從此一直勝利下去，反之，一七七五至一七八年，是美國獨立戰爭史上最「黑暗」的時期。「自豪威將軍返國後，戰事反而更轉急烈，以致時常表現出革命要失敗的樣子。這個時候華盛頓帶着敗兵向北撤退，已經進入福格流域。他們在此過了一個愁慘的冬天。士兵只有破爛不堪的衣着，並時受饑餓之苦。參加美國獨立戰爭的法蘭少年將軍拉斐德述說當時美兵情形道：「不幸的兵士缺少一切東西，沒有外套，帽子，襯衣，甚至連鞋子也沒有。他們的腿都凍成黑色的了。軍中有時終日沒有飯吃。官長與士兵的堅忍，完全是莫明其妙的。」

其實，所謂「莫明其妙」的「堅忍」，也自有他的歷史原因。因爲美洲獨立戰爭是一種革命戰爭。革命的軍隊是遠非英國在德國所召募的赫士（Hess）軍隊所能比擬的。他們全爲民族解放的熱情所鼓舞，所以儘管他們的軍需不足，軍器窳敗，但他們終能戰勝他們的最頑強的敵人。

自一七七八年二月，美韓因牠的有能力外交家佛蘭克林的交涉，而得與法國締結協定

並從而由法國取得人，錢，及糧食之諸種幫助後，於是對英國便立刻採取反攻。一七七八年六月，英軍因聽得法美兩國聯盟，他們決意放棄非列得爾菲亞，以備集中勢力於紐約。當英軍正向北去時，忽被華盛頓擊敗於蒙穆斯（Monmouth）。當時美軍中要不是因李將軍的謀叛，英軍定遭大大的失敗。

英軍因在中部作戰之不利，牠又看到加羅蘭納及左治亞的親英派之擁護，牠於是改在南部作戰。一七七八年英軍取塞芬納，一七八〇年又攻下查理斯敦。英國在南部進軍最初似甚得意。因此，英主將克林吞（Clinton）使親回紐約，而留康華理（Cornwallis）代他留守南部。

可是康華理雖在卡謨登（Camden）大打勝仗，但遊擊非他們所長，故沒有多大的控制能力，而在王山一役，英軍及親英聯軍又為加羅蘭納邊民所擊敗。

英軍因在加羅蘭納之役，將士傷亡過甚，感到是一種得不償失的勝利，於是他們便不敢去佔領內地，而康華理所統率的英軍便緊沿海岸向北進行。一七八一年，他們冒昧地進到維基尼亞，並屯駐在約克河（York）與惹米士（James）河之間約克唐（Yorkton）。但他們都沒有料到這時法軍與美軍之合作。原來一七八〇年，法王路易十六因接受拉斐德的意見，已派遣洛霜波（Rochambeau）及一支法軍來美。次年又派格拉斯（Grasse）率軍援美。因此，當康華理北進消息傳給華盛頓時，華氏即聯絡法軍包圍康華理於約克唐。至一七八一年

十月十九日康氏所統率的英軍終於被迫投降。

英國在美洲的勢力因約克唐之慘敗，這時已成強弩之末。同時又因為對美戰爭已使牠與半個世界為敵。法國，西班牙海陸並進向牠施行攻擊。俄國，普魯斯，荷蘭，甚至斯干的那維亞諸國亦都對牠維持武裝中立而保護中立國人的權利。此外，在愛爾蘭，抗議教徒及公教徒亦能空前絕後地聯合起來以推翻犧牲他們的共同利益而專利英國的弊制。英國處此大聯合的敵對條件之下，所謂海上主人者幾亦無可如何。

一七八一年佛蘭克林，亞當斯，及賓氏受命往巴黎和英國代表討論議和條件，一七八三年，英國在內外無可如何的條件下，遂不得不承認北美十二洲之完全獨立與自由。而美國獨立革命從此也就獲得最後勝利。

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不僅是英國托利黨在美洲統治的傾覆，同時也是使英王親政在英國得到結束。庇得謂在美洲之失敗會導致英國憲政之失敗固未實現，但由於美洲的失敗，使英王自身受到致命的失敗，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國王的失敗，固然增強了英國的憲政和國家柱石的力量，並且也連君主制度因而得到保全。所以，名史家屈勒味林說：「因了美洲的巨變，替王位恢復政權的嘗試，遂告結束而不在竊發；這倒是一件極關重要之事。如果喬治三世的及他的子孫的御攬政權能延及於下一世紀，則新時代的民主及改革運動將因直接和國王，和以主要的的保守勢力自居的國王，發生衝突之故，必然變為反王黨的，甚至變

獨共和運動。」

第五章 獨立後的經濟發展和政治運動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的美國史是一部經濟生活無限制的發展與政黨迭更統治的混合史。關於政黨鬥爭的情形，留在本章後段再說，茲特先敘述其經濟生活的發展和變遷。

一七八三年，美國獨立運動的告成，它不僅是美國經濟發展的起點，並且也是牠的土地無限擴張的前提。因此，研究這時期的美國史，是不能像研究同時期的意國史和德國史一樣，真是敘述一個固定範圍的國民活動情形，而是非寫出牠的不斷拓殖不斷開發的真像不可。因為獨立戰爭後美國人民向西移殖的情形比十七八世紀歐洲人民向美洲移殖的情形是更為壯觀更為偉大的運動，西部無限處女地之開發與耕植，不特形成美國經濟生活的特點，並且形成牠的國民生活之中心。「美國民主政治」一書的作者托克維爾（De Toqueville）形容這時美國情形說：

「我由衷承認美國人中無詩人，但絕不承認美國人無詩人的觀念。歐美人大談美國荒原，美國人自己却從不想起他們，他們對無生物界的奇跡無成與，他們須至採伐森林時纔去理會四周的茂林。他們的目光注視在另一方面：他們注視着自己在這些荒原上的行程——宣洩沼澤，改浚河道，殖民僻地，征服自然。這類雄偉的自身意像，非特會間歇地引起美國人的

凝視，而且無論當他作大事或小事的時候，總會縈繞着他，常在他的心頭迴翔。天地間任何事物，誠然都不像美國人的生括那樣渺小，那麼平淡，那麼斤斤於蠅頭微利，總而言之，那麼遠反詩趣。然在這種生活所暗示的思想裏面，却亦常有一種思想充滿着詩，那便是能予形骸以魄力的潛在神經。」

一八二一年，一位英國的作家對於當時的美國人民的心理情況也有極好的描寫。他說：「別的國家於跨過去或現在，真正的美國公民却昂首向天空，冥想他的國家將來會如何偉大。別國人因歷來的祖先的功業而覺得光榮，自以為值得尊敬；美國人却跨耀於後世子孫的成就。別國訴諸歷史，美國人訴諸預言。他會隻手拿着馬爾薩斯的著作，隻手拿着待開區域的地圖，一面斷然否認我們預料美國將來會成何種樣子，一面且沾然竊笑幾何級數會給美國史滿上怎樣的光榮。這種訴諸未來的心理，乃是他們無窮的資源。英國旅行者埋怨美國的旅館，微露他不願一夜只睡四小時的意見，那麼，最初他會被人當作誹謗者，嗣後還會有人吩咐他靜候一百年，再來看美國的旅館勝過英國。要是他提起沙士比亞對密爾頓，或牛頓，美國人又會對他說：「等我犁遍了荒地，有了注意別種事情的空閒再說，你且等一九〇〇年。然後你就知道我們的詩人，天文家，望遠鏡，比你衰老半地球上所產生的高貴得多，深遠得多，照遠得多了」。

在實際上，移植與拓荒也實是十九世紀美國史上最偉大的運動。在整個十九世紀，美國

向西拓殖所用的手段雖不一定，但他們橫斷大陸的開發運動是始終沒有間斷。一七八三年密失土必河東半部由英國讓與美國，一八〇三年，實斐孫更由法國購得密失土必西半部。一八二一年由西班牙買得佛羅里達。一八四五年，取得泰克薩斯。至於泰克薩斯以西至太平洋洋濱的土地，是一八四八年從墨西哥奪為已有的。

隨西部拓殖之展開而來的，則為人口之飛速度的增加。一八二〇年，阿利該尼以的移民數是二百二十五萬，至一八四〇年時，幾增至七百萬人。

自然，初期拓殖者所過的生活，並非都是充滿了幸福的陽光，不，他們在一個較長的期間內，不但要和原有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作殘酷的鬥爭，而且還要與諸種不適宜白人生活的自然遭遇和疾病作鬥爭。瘡疾與其他熱病，盛行於整個的西部，以致使許多移民蒙害終身，許多竟因受這種磨折而死，雖然，這時美國人民生活情緒仍然如他們的詩人惠特曼(Whitman)所形容。

我們來担負這不朽的勞役，重任與工作，

墾荒者，啊，墾荒者啊！

農業與墾植固然因無限的優良的土地而得到空前的暢達，而商業的發達更因英法長期混戰關係亦受到從來未有的恩賜。一七八三年美國獨立運動告成，一七八九年歐洲便發生法國大革命。因為法國革命一方面是向整個舊歐洲進行空古未有的挑戰，他方面，又因激怒了

英國資本主義之忌妬，所以至一七九三年，便導出英法普奧俄諸國之長期混戰，當整個的歐洲都捲入戰爭與革命的混亂狀態時，牠却給年青的美國資本主義發展以絕好機會。這時只有美國是惟一主要的中立國，牠担当交戰國與殖民地之間的貿易，因而，牠的通商海運便急激的發達起來。

一七九一年，美國的入口貿易總值是四千八百萬美元，至一八〇一年，增至二億零五百萬，一八〇七年，復增至三億八千五百萬元，至於輸出的增加，在這些年內，由一千九百萬元增至一億零八百萬元。

美國海運的發達，至一七九三年，牠所具有的海船噸數，除英國外，牠已超過歐洲任何國家。

與商業發展相適應的，是美國農村和工業出產之增加，農村經濟的輸出，一八〇二年是一二、七九〇、〇〇〇美元，至一八〇七年，已增至一四、四三二、〇〇〇元。棉花的價值在一八〇二年是五、二五〇、〇〇〇美元，至一八〇七年，已增至一四、二三二、〇〇〇美元，美國小麥的價值在上述同一時間之內，亦提高一倍。

美國的綿織工業，一八〇八年，紡錘數為八千枚，至一八一五年已增至五十萬。

美國這種巨大的發展，不久便引起英國人非常厲害的忌妬，英國於一八〇四年實行封鎖法蘭西，這對於中立國的美國自然是一種重大的損害。而且自它宣佈封鎖以來，美國有一千

六百隻商船被扣留。美國這時是在喬治孫爲總統時代，因爲他對法國外交的成功，他在國內已得到多數人民的擁護。於是，美國在他的領導之下又第二次決定對英宣戰，歷史上，把這次戰爭叫作「第二次獨立戰爭」。如果說，前一次獨立戰爭是政治上的獨立戰爭，那麼，這一次的獨立戰爭，便可以說是經濟上的獨立戰爭。

單就棉織工業說，在第二次獨立戰爭後，美國的棉織工業開始驚人的成功。一八三七年，棉織企業的數目是七九五，至一八六〇年已增至一、〇九一，一八三一年，紡錘的數目是一、二四六、五〇三，至一八六〇年，已增至五、二三五、七二七。

但是，作爲十九世紀上半美國經濟發展主要部門的還是農業的發展。自一七九三年輝特尼（Whitney）軋棉機發明後，美國的棉花收獲七年之間，增加百倍。一八六〇年，美國的輸出額爲三億七百萬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二係棉花出口的價值，棉花出產佔中心地位，所以當時的人都說，「棉花成爲王者」。至於食糧貿易，因爲農耕方法之改良，由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六〇年竟增至三倍之多。

商船噸數的增加，在戰前是七十六萬三千噸，至一八六一年，已增至二千五百萬噸。鐵路路的增加，一八三〇年爲二十三哩，一八四〇年爲二千八百十八哩，一八五〇年爲九千〇三十一哩，一八六〇年，已突增至三萬〇六百十五哩。

最後，我們要說到美國人口的增長。首先是移民數。一八二一至一八三〇年爲十四萬三

千四百三十九人；一八三一至一八四〇年爲五十九萬九千二百二十五人；一八四一至一八五〇年爲一百七十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人；一八五一至一八六〇年爲二百五十九萬八千二百一十四人。至於城市人口，一八三〇年住在八千居民以上的城市中的的人只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六、七。二十年後，便增至百分之六、一。

十九世紀美國的情形猶如同時代英國一樣，他的經濟生活每變動一步，他的政治生活也跟着發生變化，說到英國的政治運動和政黨鬥爭，它們本肇始於殖民時代。維基尼亞，當十七世紀末葉就有過高地農民與濱海紳士的衝突。至革命爆發時代，愛國者與保皇黨的衝突時刻發生，而工匠，農夫用激烈的手段恐嚇商人的事體，更層出不窮。

待到獨立告成，制憲建國之時，聯邦黨與共和黨的鬥爭便以嶄新的姿態出現於歷史舞台。

這一時期的社會分野表現出如下的特色，即一切富商，大賈，工業家，政府公債所有人，及濱海城市與人口衆多地方的不動產所有者，皆爲當時制憲運動和集中政權之有力的擁護者，反之，全國的農民，和一切債務者，都是天然的立在政府反對派地位，卓爾德（Ogletree A. Benih）在他的名著裏面，曾將制憲派的經濟背景，給與過明析的分析。他說：

「美國制憲運動之生產與進展，大抵以四種對於動產的利害觀念作基礎，金錢，治安，製造，貿易及運輸，這四種觀念在聯邦條例施行時代，早就與該條例背道而馳地的產生

了。

「菲列得爾菲亞制憲會議中各邦代表除少數以外，總是急切而又直接地關懷於新制度的創設，並從新制度的創設中獲得經濟利益」。

因此，卑爾德說：「美國憲法根本是一部經濟文件，這部文件所依據的概念認為私有財產的基本權利非特為政府而存在，且在道德方面非多數民意所得搖動」。

的確，聯邦派，特別是財政總長哈密爾頓，是實行了許多種經濟設施，但他的設施對於當時聯邦政府的鞏固有很大的供獻，而對於國民大眾却增加其負擔。如革命時期所發行的舊公債，當獨立戰爭後，一元之值不過一二角左右，及當政府確定基金與繼承債務後，紙價證券的價值就增至四千萬美金左右——這在當日是個巨大的數目，可是聯邦政府從甚麼地方弄得償還利息的款項？於是就不得不重稅人民。但出稅者並不是債券所有者，實在是一般農民。此外關於關稅的確定，銀行的建立，和船務的獎勵，雖為建設時代所必需，然對於一般國民總不免有所傷害。

因此，自上述的方案施行後，便引起較傾向民主的共和派之堅決的反對。譬如，佐治亞邦的一個議員說：「國家銀行的計畫，不過是用來為美國少數人謀利益，即商業經營者的利益而已，至於農民，自耕農都得不到甚麼便益」。關於鋼鐵保護關稅，共和派的議員更認為「不過是一種間接的對於農業的苛稅」。對於國家銀行的建立，他們以為是：「（一）使財

產黨中在少數人的手裏；（二）使成一個有政治作用的貨幣機關而已。

共產黨的領袖就是窩斐孫。窩氏是一個蠶植家，對於農業上的利害，十分明瞭。由他看來，「耕種者就是最貴重的公民，他們是最有魄力，最能自立，最有道德的人，他們不輕易離開國土。」

在內政上兩黨是互相對立，在外交上也是一樣。我們知道，美國的獨立是曾經得過法國的援助的，法國是一七八九年發生大革命，一七九一年成立第一共和國，至一七九三年，便發生反對牠歐洲列強之同盟。這個時候，急進的共和黨對於法國的同情達到頂點，他們在英法戰爭中，無時不在想法公開地或秘密地幫助法國以反對英國，反之，聯邦派所支持的華盛頓政府，却又公開地反對法國而表同情於英國。因為在他們看來，當時舊世界所發生的鬥爭是和同時代的美國所發生的內政紛爭一樣，都是產業秩序與民主治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鬥爭。

兩黨鬥爭最後的結果，是共和黨取得最後勝利。而共和黨所以能獲得最後勝利，是因為美國當時不斷地向西開發，不斷地增加了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義的獨立農民的數量。自一八〇一年至一八二九年，這二十年之內，在美國當政權的俱為共和黨員，窩斐孫，馬迪孫，門羅和約翰琴稷亞當斯。就是約克孫，在政治思想也是忠實於窩斐孫黨的。

當共和黨當政的時候，在實際設施上雖每每不免與他們的理論有矛盾之處，但一般地說

，他們是做到了所抱定的「愈少統治的政府爲愈佳政府」的信條。他們贊美宗教自由，擁護多數統治，和出版自由，鼓勵農業並使業商爲前者之助。提倡智識普及，並力行文官支配武官，聯邦黨在經濟和財政上所作的許多設施，他們大致皆按他們的意見，加以改造，特別是聯邦黨人所提倡的總統跳舞會，巡行，飾帶，金辮，鋼鈕，金箔，馬毛，及長袍等儀式，一概加以取消。農民都是不甚理會儀式的，所以共和黨注重簡樸。因此，他們廢除由華盛頓至亞當斯所設立的種種官場禮節和儀注。當賀斐孫當選總統時，他爲諷刺聯邦黨人之高踞人民之上的風度，曾由寄宿舍下車，徒步走到國會議事堂就大總統職！

當共和黨佔優勢的長期間，美國這時的經濟生活已生出根本變化。西部之巨大的移殖運動，固增強了賀斐孫平等學說之影響，而東部北部之工業革命，和城市工人之出現，亦更增加共和黨之社會勢力。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二〇年，二十年間，波斯頓人口增加兩倍。而紐約城則由六萬增至十二萬三千七百人。初時，因諸州憲法對於選舉權有財產的限制，所以多數移民及本國工廠的勞工均無選舉權，但在十九世紀初期後，財產限制，已由平民的煽動而歸於消滅。

一八二八年共和黨的左派賀斐孫當選爲總統，他是象徵大多數人民在政治上將有更進一步的勝利。他曾宣稱，他是無條件的擁護他所謂「人民的權利」，當他與美國銀行宣戰時，他更表示他是爲社會下層份子的利益，而反對「豪富及有權勢的人」。

約克孫對於憲法所規定的總統職權，採取最新的觀念。他不計幣面與時勢，辭退舊時官吏中的「貴族」，特給他的朋友與黨徒。因此，共和黨即漸漸含棄舊名，很誇張地改名爲民主黨 (Democrats)。

但，約克孫的左派活動，同時也引起另一反對黨的興起。這一反對黨初定名爲國民共和黨，後改爲輝格黨 (Whigs)。這一改黨的政綱，大致代表工商資產階級。他們主張工業之充足保護，統一內政，加強聯邦政府，大理院權力與管轄權之保存，參議院爲聯邦政府重要的保守部分亦保留之，就組織說，輝格黨完全是一個龐雜的集合體。所以當時有人譏諷牠說牠是「五個麵包和兩隻魚」。

輝格黨的勢力，從初起便較約克孫與凡標梭的聯合爲雄厚。克雷因曾與約克孫作爭鬥時，也加入這個新黨，欲爲牠的候選人。不過後來因他樹敵過多，恐其不易獲選，遂被棄置，又改推哈禮孫 (William H. Harrison) 爲總統候選人。哈氏得名的惟一原因是二十年前曾爲將軍，在對印第安人一次仗火中獲得勝利。這個黨於是充分的利用此等事件以引起國民的同情，並發起巨大的宣傳和遊行。結果哈禮孫卒當選爲大總統。不過輝格黨因想急於獲得勝利，不幸選出泰勒耳 (John Tyler) 爲副總統。台氏是一個很接近民主黨而不接近輝格黨的人。這是對於輝格黨固宜不原則的一種懲罰。因爲當哈禮孫於就職數星期後死去時，台氏即變成總統，因此，民主黨再度得勢。一八四八年，輝格黨又應用從前的方法，又提出第

二個軍人斯各脫爲候選人，但這一次他們却一敗塗地了。

從本質上說，輝格黨應是過去聯邦黨之復活。他們的活動，一致是趨向保護工商階級的利益，而主張發展海外勢力，以增加工業品之銷暢。如一八四四年美、英、中國成立正式國交關係，一八五四年和理（Perry）之開放日本，皆爲輝格黨治下的政績。至於牠的失敗原因，與過去聯邦黨失敗的原因亦復相同。當時西方處女地有無限開發的可能。因此，使對立的農民與墾植家的人數始終站絕對優勢。政黨鬥爭的經濟原理的運用，使農業上的兩翼能生出諒解，而使他們對於商工業階級的要求始終具有戒意。這是輝格黨之失敗主要原因。

當然，輝格黨失敗的原因，就是牠的敵黨民主黨獲得成功之原因。他們統治時間甚爲長久。由一八二八至一八六〇年；除了兩任總統外，民主黨次次都當選爲大總統。在他們統治的時期內，他們反對保護稅，反對形式特權，不許再建美國銀行，不作國內改革事業，不許發行公債，不許干涉奴隸制度——這是墾植家勞力的供給者。在積極方面，他們曾擴大選舉權，並且爲了滿足墾植家和農民的要求，他們提倡不斷地向西拓殖，而使奴隸領主及自由不動產的所有者，得到更多土地爲目的。一八四五年使泰克薩斯加入聯邦。一八四六年，他們因不願輝格黨的反對，造成墨西哥戰爭，結果在一八四八年又得到許多領土。誠然，當時若非輝格黨的反對，他們或已吞併古巴，南美，及加拿大。雖然，他們的征服慾，只是爲滿足美、英的獨立農民和地主，於工商業有利益的海上發展與海軍的擴充，却甚爲冷淡。

民主黨的統治並不是永遠的。牠終爲另一政黨的統治所代替。不過使牠的權力歸於毀滅的，並不是單純由於選舉，而是由於內戰。

第六章 內戰與南北統一

由於各州地方利益之不同和經濟發展之不平衡，使得六十年代前的合衆國不僅不斷的發生統治黨之迭更，並且也使牠時常生出地方對抗與聯邦分裂情勢。例如，一八一二年，當第二次對英宣戰之初，爲聯邦之一的新英格蘭，便以退出聯邦相恫嚇而反對英作戰。當時新英格蘭的商人均極力反對聯邦政府。他們拒絕募集國債，鼓勵他們的民軍反抗中央政府命令，匯寄大宗款項到加拿大去支付英國的匯票，供給英軍船舶和糧食，總之，新英格蘭這種反中央的行爲，最初是非常激烈的，後來當他們覺出在封鎖中比在國內戰爭可以獲得更多金錢時，他們始緩緩退盟要求和報復手段。

又如，南加羅來納，在一八三〇年以前雖贊成聯邦政府所定的稅則，但對於一八三二年的新稅則則堅決地表示反抗。終則演爲脫離運動。

西部各州亦同樣發生過以退出聯邦相恫嚇的事件。他們在某一時期，甚至陰謀與西班牙聯盟。當牠們感受東部各州壓迫時，也曾取組織一個橫互阿利根尼國家的步驟。而在一八六〇年前，沒有一州的大多數居民不贊成退出聯邦的。

聯邦內部分裂現象在一八六〇年前，雖是時常出現，但結果因為種種關係，皆未成事實。但是一八六〇年的分裂便完全不同。因為這次分裂，不僅把南北分化為兩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並且造成南北長期的戰爭。這種不幸的局面是怎樣造成的呢，牠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黑奴問題。

十九世紀上半，美國資本主義發達，雖呈現出一日千里之概，但牠的發達主要的是在北方。至於在南方，工業的發達是非常貧乏的。南方因為氣候關係，從很早以來就成為產棉的中心。一八〇〇年，南部諸邦的棉花的輸出是二億磅，至一八四四年，便至十五億磅。南方棉花輸出的激增，牠便使得南方的奴隸制度也跟着發生變化。奴隸制度在獨立革命後已漸就衰退，這不單是北部諸州是如此，即南部諸州也是一樣。當時除掉加羅來納及佐治亞的米和靛青之耕作以外，奴隸勞動明明是不利的。所以，當時許多著名的南方人，也贊成奴隸制度的廢止。可是隨着棉花生產的增加，奴隸制度不僅日益發達，而且發生根本變化。

由一八三〇年起，至一八六〇年左右，南部蓄奴經濟和十八世紀的家長式的殖民制度完全發生變更。數百黑人所住的莊院，當十八世紀時，被人看為很大的莊院。黑人在同一殖民地中生長，往往於數代之中，受同一主人的束縛。這樣的奴隸制度，實在是過去奴隸制度的殘留物。如以後所見到的，這樣的奴隸制度，是逐漸地衰落。由當時情形看來美國的經濟制度，大有走歐州道路的可能，就是不給奴隸制度以特別打擊，牠大半也會日就消滅。獨立革

命後，溫和的廢奴運動的理論，即造因此種情形。

可是在十九世紀的奴隸制度，性質與十八世紀完全兩樣。牠不是中世紀的單純遺留物，而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物。蓄奴的人，不是封建領主，而是文明開化的資本家。而且因為十九世紀棉織工業之發達，現在的奴隸制度，非但不走向凋落，反而一天比一天發達。黑人現在成爲資本主義的商品，成爲交易所的投機品，成爲大量輸出的對象。所謂最有效利用奴隸的勞力問題，幾乎有科學的研究。黑人勞動之有用，只有十年工夫，一達到一定年齡的黑人，便比老牛老馬更爲無用，於是作爲廢物將其棄置。黑人之蓄養和買賣，曾投下極大資本。在南部各州黑人的數目有如下的增加。

一八〇〇……八九三、〇四一，黑人勞動者。

一八一〇……一，一九一，三六四

一八二〇……一，五四三，六八八

一八三〇……二，〇〇九，〇〇三

一八四〇……二，四八七，三五五

一八五〇……三，一七九，五〇九

一八五二……三，二〇〇，〇〇〇

另外，奴隸的收益，也不斷增加。一八〇〇年，每一奴隸的生產價格爲十六美金，一八三〇

年爲二十二美金，一八五一年爲五十二美金。奴隸的需要逐漸增加，因之奴隸的價格亦增加。十九世紀初，一名黑人的代價爲百五十金元，至世紀之半則增至一千五百金元與三千五百金元，至一八六一年南北戰爭之前，增至四千金元。

促進近世產業集中的內部壓力對於棉花生產也發生同樣作用。因此，當蓄奴隸制度將近沒落的時候，獲利的人數愈減，勢力愈大，驕傲愈甚，而貧求統制之心也愈熾。一八六〇年，在南部九百萬白人中，實際從動產奴隸制獲得利益的不過五十萬。而這五十萬人中成爲南部經濟，社會，和政治者的又不過一萬人。此等少數統治者在白種人普選制下維持他們的優越地位。大蓄奴主也引用不少的白人，他們的職位是在代主人監視和督促奴隸勞動的。直至內亂迫近眉睫時爲止，這裏大多數白人對蓄奴的統治者總是忠順不渝的，他們對於奴隸總自認是屬於特殊階級，而且極以此爲滿足。因此，假使有人在他們的主人和他們面前要提議廢除奴隸制度，他們便認爲是侵犯了他們的人權和自由。但在實際上，這般沒有蓄奴的白人，在蓄奴主看來，是從來沒有構成他們所謂「南部」的任何部分。他們對自己生活中的法律的構成從來沒有參加過。除了蓄奴主利益，南部無宜法可言。這般白人在實際上，並沒有選舉權，亦不爲法律所保護，他們惟一的特權就是幫助蓄奴主獵取職位，參加一種淺薄的和受限制的政治運動。

可是從另一方面說，奴隸勞動又是最妨害自由勞動和社會經濟之進步的。以棉花爲主要

產物的南方諸州說，他們的耕作方法總不脫殖民時代粗笨農業的情形。棉花也和菸葉及玉蜀黍一樣，依然採用燒枯樹木而成耕地的方法。農具的使用，亦甚簡陋。因此，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南部較之北部實不可同日而語。

譬如，以鐵路言，北部和西部的「自由」各州在一八五七年鐵路的總哩數爲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五哩，而蓄奴各州則僅爲六千八百五十九哩。雖然，南部諸州當時是中央政府的支配者，對於領取土地特許狀一事還特別比北部佔便宜，然成績只是如此。此外，如電線的建設，郵政的改良，南部亦皆不及北部。

再以人口和財富說，當美國獨立之初，南北兩部人口差不多相等，每部都不過兩百萬居民。兩部土地面積和肥沃亦差不多相等，他們的商業也不相上下，甚至兩個區域的財產也幾乎完全相等。但是至一八六〇年，即南北戰爭前夜，南方的人口總共才不過九百萬，內中還有三百萬黑奴。而北部的人口這時已發展至二千二百萬。說到財富，北部的物質興盛，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遠勝過南部。在一八六一年，美國的海上商船僅亞於英國，但這樣多的船隻幾乎全屬於北部。

亞里斯多德在數千年前就說過，只要有機器出現，奴隸勞動自然成爲不必要。而當時的美國因爲英國工業革命之結果，正在日新月異的興起一種機器生產以代替舊日的手工勞動。國之，南方的奴隸勞動與北方的自由勞動終久要發生不可避免的搏鬥。

南北第一次嚴重的衝突是發生在一八二〇年。蓋自北部諸州廢除黑奴制以來，自由州與蓄奴州之數目歷年相等，迄今亦無變動。因爲新加入的八州裏面，自由州是四個，蓄奴州亦是四個。當年國會議員是每州二人，在南部看來，雙方州數如果一樣，國會便能保持均勢。然自一八二〇年密蘇里加入聯邦之後，均勢之局即將破壞，南部諸州即將獲勝，從此就發生激烈的爭辯。這次爭論的最後結局，是將緬因加入自由州，藉以平衡密蘇里。同時并規定將來西部各新州如果建立在北緯三十六度三十分以南，均須實行奴隸制度，如果建立在北緯三十九分以北，均不得實行奴隸制度。這種妥協，在表面上是蓄奴州對反對不蓄奴州的一種勝利，但在實際上，却是一種失敗。爲甚麼？因爲西北一帶仍有建立好些自由州的可能，而牠所獲得的面積比南部要大好多倍。

南部後來是看到自己失敗了。但在代表南部利益的民主黨的執政時，他們終於採取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歸併泰克薩斯，並在其境內恢復墨西哥政府所廢除的奴隸制度。後來墨西哥政府提出抗議，於是便釀出對墨西哥戰爭，結果美國遂佔有現在的加尼福尼亞，內華達，猶他，亞利桑那，及新墨西哥等地。雖然如此，南部仍未如願以償。原來這些新領地，祇有加尼福尼亞的人口增加較速，不久便加入聯邦，而且加尼福尼亞雖半在密蘇里協定綫以北，半在協定綫以南，但卻決定排除奴隸制度。結果奴隸問題便陷於絕境。

一八五〇年，自由州與蓄奴州成立一次新協定，而這次新協定的結果，不但不能解決由

南北社會制度不同所發生的根本衝突，反而使之日趨劇烈而不可收拾。一八五四年當伊利那的參議員達格拉斯根據內布拉斯加法取案消密蘇里協定時，林肯即堅決地出來發表他第一次反對隸奴制度的演說。

「自治學說——林肯說——雖則是天經地義，絕對而且永遠是天經地義，然而應用在這種場合（指密奴——筆者）卻並不是正道。或者我應該說，這種學說之能否得到適當的應用，須視黑人之是否有人的資格而定。假如黑人不算是人，則是人的當然可以根據自治的學說爲所欲爲，但假如黑人也算是人，那末，若說黑人不應自治，豈不全然摧毀了自治學說，白人自治是自治，自治之外再去自人，便是跨越自治的範圍——那是專制。猶如一個人逐漸而專一地走向坟墓一樣，我們是正在逐漸而專一地捨棄舊的信仰，醉心於新的信仰。八十年前，我們開端就高呼一向人生來平等；然從當年直到現在，我們已轉向了另一種信仰，認爲甲族奴役乙族是「神聖的自治權」了。這一種理論是水火不相容的，就像上帝和錢麗一樣」。

無論就那一方面，北部皆較南部爲正大光明。北部是主張自由勞動，在原則上則爲自由平等表現，而南部卻是主張勞動者對主人只能有服從和低首下心。北部欲藉機器之發明爲全人類謀幸福，其思想傾向現代，反之，南部欲藉黑奴勞動爲少數人謀繁榮，其思想傾向復古，傾向反動。在政治上，北部主張一切人不分膚色與種族皆有選舉權，這是大公無私的民主主義表現，但南方是反對奴隸有人權的，是一種赤裸裸的寡頭政治表現。最後，北方因爲是

代表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的，他們爲了保護本國經濟繁榮是主張保護關稅的，反之，南方是代表黑主利益的，他們卻主張自由貿易。

我們已經指出過，自從一八〇一年富斐孫當選總統以來，中間除輝格黨有過短期的執政外，聯邦政府的中央大權始終是在得到西部獨立農民援助的南方大地主代表手裏。因爲當輝的利益必須永久在中央政府取得優勢必須是在國會多數保護之下，否則，黑制度便有傾覆的危險。這是數十年來南方奴主所念念不忘的。假如不幸，他們在國會中不能佔多數在中央政府內不能取得優勢，他們這個時候的惟一武器，就是退出聯邦。

現在正是南部臨到使用他們最後武器的時候了。聯邦人民於一八六〇年正式選舉林肯爲總統。輝都知道，林肯是生於西北部的，他在赤貧中生於肯塔基，七歲全家住印第安納。後來因爲印第安納依舊無出路，於一八三〇年又再舉西遷，遂遷往伊利那。林肯於一八五八年當選爲伊利那州議員，一八六〇年當選爲聯邦總統，並不是表示別的，他是表示多年以來彼此關係已發生根本變化的西部與北部之合作。當然，西部與北部之合作，在另一方面，便是與南部不調和。至少是不加贊助。這種變化原因有三：（一）西部諸州皆爲聯邦政府所建立，因此，使該地的人民對本州的忠心比較淡薄，而對於聯邦的忠心比較濃厚；（二）西部與東部大洋有數百哩的道路間隔，不能和大洋那邊的歐洲發生直接關係，因此，他們希望聯邦政府提倡道路建設並幫助他們去黎印第安人，並請他們開放水陸交通，因之，他們特別希望

聯邦能够統一，而反對分裂；（三）西部諸州皆爲自由州，白人勞動者逐漸增加，他們不願一般富人再顯用黑奴來和他們競爭，妨害他們。有此數因，便實現西部於丹堅決主張廢奴的北部之聯合。而林肯當選爲總統，便是這種合作之具體表現。

林肯是當選爲總統了。就在他當選總統的消息宣佈之頃，南加羅蘭納和邊區的密失士必，佛羅里達，阿拉巴瑪，佐治亞，路易斯安那，及泰克薩斯七邦遂退出聯邦，宣告獨立。內戰是不可避免的，林肯在他第一次就任演說中，對於希望以內戰來反對聯邦統一的南方猶提如下可堪紀念的勸解：

我的不滿意的國人們，兇險的內亂問題是握在你們手中，不在我的手中。政府並不須攻擊你們。你們自己要不是甘爲戎首，你們那裏會有衝突。天國裏並沒有判着你們的誓言叫你們破壞政府，但是我有最尊嚴的誓言，教我存救，保護，並維持他。我如不願意格鬥。我們本不是仇人，是朋友，我們必須不要作仇人。偏見雖說可以使我們的感情聯結緊張，但須不要破了纜好。記憶中神秘的弦已由各個戰場上及各個愛國的墳墓上，繃到這個大陸上各個生人的心裏，各個人家的爐灶上了。要是憑我們良心上的善良天使再把他的彈彈，聯邦的諧聲仍可以洋溢乎人耳。這的確是可以做到的。

南方的奴隸主能够聽這種深夜警鐘的勸告而放棄他們的干戈麼？不能，絕對不能。而一個長期的兇猛的内戰果然由他們甘爲戎首而爆發了。而一個久懸未決的南北社會矛盾現在開

始以武力作最後解決了。這次戰爭發生於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戰爭的時間延長到四年以上。這是美國獨立運動後最大的一次內戰。但是南北戰爭，又不是一種尋常性質的內戰，牠是一種社會革命。在內戰中，一切地主，奴隸所有主多是維護南方的，一切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自由勞動者是維護北方方向的。當這次戰爭終結之時，即北方取得最後勝利時，南方的破壞達到最高度。人民大都流於貧困，農場已經變成荒地，籬笆不是被軍隊剪除，就是因無人照料而自趨枯朽。田園中草木叢生，農場用器具蕩然無存。在城市內，商業停滯，銀行和商業代理店或停止營業，或因倒賬而關閉；錢幣的情形十分惡劣，鐵路和郵政更值不得談及。但是最壞的事還是南部的專以勞動糧口的白人許多不是在鬥爭中犧牲了，就是終身廢，不復能夠視作經濟組織工作中的要素，單是憲夫士必一州，當戰爭結束時，貧苦無告的孤兒人數就有一萬人之多。

戰爭的破壞力固可以使人寒心，但就畢竟是完成了牠的主要任務。牠不僅使數百萬的黑人由奴隸狀態，變為自由人，而且也使一向南北擋二的美國變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體，變為一個統一近代國家。

一八六〇年，南部各邦敢於脫離聯邦並甘願為內亂或首者，實由於他們有種種錯誤的信仰。兩種錯誤信仰之一，是認北方的戰鬥力不及南方（註一）；另一，認爲歐洲有賴於南方棉花的供給，由此，可以逼迫歐洲早日承認南方的獨立。並且他們還認爲，如果戰事延長，

還可以逼迫歐洲出來干涉。一個南加羅來納參議員哈孟德（Haithood）於一八五八年在美國參議院有下面這麼一段話：「爲甚麼我們趕不會有戰爭，如果沒有其他理由的話，請問那個頭腦清楚的國家會向棉花開戰？如果他們向我們開戰，我們不開一鎊，不拔一刀，能使全世界屈服於我們的足下，如果三年沒有棉花的供給，會成甚麼樣子？」不特如此。南部的其他政治家更有認英國的「財務大臣是坐在一個棉花包上的」並以爲工業革命後的英國只是南部棉花王國的一個附庸。可是，當一八六二年他們派往歐洲的使者遭受失敗回來之後，他們才知道：

「那些以爲棉花王可以逼迫英國政府承認我們的政府與打破封鎖的人，以及那些希望英國完全放棄他的文化而承認我們的政府與打破封鎖的人，都是大錯。其錯誤在棉花王國的性質，他的權力是商務與財政的，而不是政治的。」

註一：階級的偏見常常使得統治階級表現出一種錯看當前局勢和含有覆滅性和誇大性的自信。當一八六二年失敗已明白表現於南方統治階級之前，但爲南方一個重要報紙，德波評論，對於當時敵己的估計，仍然爲盲目的自信所欺騙。她說：「北部是破產了。他的人民必須移往西部，否則唯有餓死。一八六〇年戶口調查毫無疑義地證明紐約，賓夕法尼亞，新英格蘭各州每年所生產的肉類與麵包不足以供牠們的人民半年之用，並且除掉少量羊毛外，沒有產出任何物品供人民製衣。牠們的土地極端殘廢，要施過許多年的

肥料，才能使這種土地養活現有的入口。他們不能生產自己的衣食，並且也無錢購買各項衣食。南部單是一年的棉花和茶葉收成出售所得，當四倍於上述各洲所有流通的錢幣。他們需要這種錢幣的每一小錢去充內部的用費，至少在戰爭中是如此。他們的製造品僅能在西北部出賣，並且只能出少數最便宜和最粗糙的物品——以此供缺乏的衣食還不到四分之一。在南部退出聯邦之前，牠們的粗棉布是能夠出賣于世界市場的惟一商品。現在棉花十分昂貴，使牠們不能再向外國出售棉製品。當退出聯邦之舉一經成爲一種完成的事實，牠們從家宅，工廠和鐵路等等所收的地方財富將歸於烏有。牠們的海上商船是能夠出賣於外國市場的唯一物件，此等商船在國內再也沒有用處，牠們將儘可能地迅速出賣。南部將需要還一切船舶，並當買入，以便進行海上貿易，這是退出聯邦一事從北部轉移給牠的。」

但是，南部對歐洲外交的估計，也沒有完全使牠們失望。英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當戰爭發生之後，雖未刻出來承認南方政府並實行武力干涉，但牠們却很有力地以金錢和武器供給南方，資助牠脫離聯邦而獨立。法國當時也採取同一立場，只有沙皇的俄國因爲克里米亞戰敗對英法含恨關係，才同情於北方。至於歐洲的民主主義者和勞動界對於北部寄以最大同情。馬克思在一八六四年會代表第一國際中央委員會對於領導這次戰爭的林肯致過如下的祝辭，他說：

「前此美國工人未能得到真正的勞動自由，未能幫助歐洲的兄弟爲解放而鬥爭。現在歐洲工人深知美國此次廢奴戰爭，替無產階級開了一個政治的新時代，正如美國獨立戰爭替中產階級開一個新時代一樣。」

馬克思對於廢奴戰爭之社會意義的估計，實不免過分樂觀。實則，這次內戰只產生美國現社會的各種原素。牠創造了大資本，大工業，和二者所託足的機械基礎。牠使二者支配中央政府，使資本主義發展在這個由內戰達到統一的國家內得到舉世所無的高度。

第七章 美國的民族性

吾人研究美洲史，使吾人看出美洲民族活動有一奇異而不調和之現象。美洲原爲兩個面積相等土地相等的大陸所形成而爲一海峽所連湊之大陸。自哥倫布發現此新大陸後，牠們又都是白種人殖民地，而且後來又都生活於同類之共和政體下。但一考這兩大陸國民生活之實際情形，他們之間距離幾乎不可以道里計。在北美，我們看到一種舉世無比的繁榮氣象，一種產業與人口不斷增殖；一種民主自由，並且益鞏固的共和政體；一種從來爲別民族所不能有的愛勞動與自治精神。這種精神在上層社會之中一如在勞苦工人之中。一入這一民族的公共生活，便會看出無論是修理一村之貯水池，或建築一大商埠，首先看到的，總是從個人開始，很少是由國家。在這裏，從其立國至現在，始終表現牠是勞動，繁榮，秩序，活力，自

由，自治，優越，光榮之化身。

反之，在南美，從其天然出產看來，乃世界最富足區域之一；牠大於歐洲兩倍，而人口僅七分之一，土地是不缺少的，人人都有享受權。在政治制度上，南美諸國亦皆做北美行共和制。然一考南美諸國之實際生活，他們都無一幸免地淪於浪費，破產，和貧困痛苦之中。在政治生活上，過去各共和國是永久處於流血混亂中。各共和國都是以武力為基礎，他們的全部歷史是一種不斷的革命和混亂。已經聯合的各邦復成分散，先前分立的諸國忽又聯合。總而言之，他們是牠們同洲的北美共和國之反面和諷刺物！

凡是看到這種顯明不同情形的人，將不期而然要提出下一問題，這種不同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原因安在呢？法蘭西的心理學家和歷史學家賴朗（Gustave Le Bon）曾認為是由於種族不同造成的。這就是說，北美因為是盎魯薩克遜種，而南美由於是拉丁種，即西班牙人，但是這種論斷，牠却忘掉一個重要事實，即北美共和國的人種，絕對不是純盎魯薩克遜種，並且不管是在獨立前和獨立後，牠都是歐洲——不，世界——人種的博物館。在美國有好多大城市，不僅是盎魯薩克遜種佔多數，而且是佔絕對的多數。譬如，在芝加哥，在一百萬居民中，只有四分之一的英倫人，牠有四萬德蘭人，二十二萬愛爾蘭人，五萬波蘭人，二十五萬五千捷克人。但這四分之一的原有美國人中文不知有多少是屬於盎魯薩克遜種。雖然如此，但芝加哥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既不類似專制主義的德國，也不類似當時被人

侵略被人統治的波蘭或捷克，牠仍是百分之百的美國式的生活。這種反證是無須的，美國人自己不是早在一八三一年就標出「吾國卽是世界，國人卽是全人類」格言麼？美國人自己既不欲驕傲他們的入種來源是出於某一族某一種，我們又何必效法那般歷史學家硬要給他們找出一個特定種系以解他們的立國特徵和民族呢？

還有，就是美國人種和國民雖皆是來自歐洲各國，但牠的文化生活和風俗人情却完全是美國所持有的，美國文化和國民性絕不是盎格魯薩克遜種的英國文化和國民性之擴大和重演。馬克爾洛說得好，美國的種族雖是異常分歧，但卻有牠的統一性和特殊個性。一個人可以是盎格魯薩克遜種，並且生於英國，卻是一個美國人（Anglo-American）。一個人可以是一個純血統的日耳曼人，但他仍是一個美國人。進一步說，一個人可以是一個北歐種。是個地中海種，猶太種，希臘種，法蘭西種，俄國種，波蘭種，愛爾蘭種，或其他甚麼種，但他一經來到美國，他便有一種美國精神，而與真正的美國人並無不合之處。就種族說，美國雖不過是歐洲的一種分流，但就政治社會和文化說，牠不僅具有一種超越一切種族的統一性，而且是融和諸種不同種族的國民爲一新種族。

美國這種不同的民族性到底是由於甚麼原因造成的呢？筆者以爲我們與其把美國優良特性歸結於一種，實不如歸結於階級。而牠與南美殊異之原因亦可以從階級特徵上加以證明。我們要曉得，南美並不是西班牙人的移民地，而是西班牙人的征服地。最初來到南美的

西班牙人，他們並不是他們本國的生產階級和勞動平民，而是一些以驕傲自矜的西國軍人，貴族，和一切寄生階級。這般人來到殖民地的目的，並不在殖民和開發生產事業，而是在爭奪統治和聚斂。所以，弄到結果，不僅在政治方面，帶來了西班牙的腐敗和貪污，而且在社會專業上，也無處不暴露出西班牙腐敗階級之不道德性。

反之，我們在北美所看到的歐洲移民成分便完全不同。這裏一切移民，不論是在獨立前和獨立後，大多數都是屬於舊大陸被壓迫的生產階級和平民勞動階級。就政治傾向說，這般人是天然痛恨壓迫，和富有平等自由及反抗思想。就宗教說，他們不是清教徒，便是加爾文教徒，和路德教徒，很少加特力教徒。由於他們多數是屬於勞動階級，他們不僅習於尊重勞動，而且視勞動為自然之事，為光榮獨立之保證。由於他們都是富有反抗思想的，所以，他們不只是能自治自理，而且還使他們視自由平等為神聖不可侵犯。他們向日在本國之所以不能發揮這種勞動自治精神者，完全是因為他們沒有發揮這種神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換句話，是由於英雄無用武之地。但是當他們來到這遠離祖國的新大陸時，因為這裏沒有舊大陸那種根深蒂固的階級壓制，不僅使他們能證實一切人在上帝和法律之前一律平等，而且因為這新大陸有無限的處女地可供自由領故，還使他們一切人在財產和財富所有上也能一律平等。

近代民主政治之發展，其根本動力，本來是由於財產變化所引起。自十字軍東征和美洲

發現後乃希侯們因圖謀侵略而破產。貴族們因奢侈和戰鬥亦精疲力竭，一般僱傭亦因新的經濟生活之變化，都變為社會上失敗階級。這只有第三等級的平民，特別是資產階級，卻因城市商工業發達之結果，而變為大的財產所有階級。

經濟的和財產的優勢，必然要造成政治上的優勢。貴族身份在中世紀視為無價之寶，到十三世紀便可以買賣，更後到了十五六世紀，國家大事不僅以金錢的權威，甚且使一般為人所惡的金融家已握有政權。

但是，在舊大陸的歐洲，甚至就是在海洋國的英國，平民勢力不管是如何發達，民權政治無論是如何澈底，他們絕不能根本剷除舊社會勢力的影響，甚至支配，因為在舊大陸，舊社會勢力支配一般國民太久了，他們的某些力量 and 影響甚至因經時過久，國民已經視為自然，其次，舊大陸的貴族階級，不單因為他們是文化傳統的保存者，新社會在某種限度內，對他們非加以取用不可，而且因為他們之中，一部分因為能適應新的環境關係，他們且居於社會之領導地位。因之，他們對無論是由革命或改良所產生的新社會終不能不烙下他們的特殊的精神印記。

然而在新大陸的美洲便完全兩樣。她是世界史上真正的新民族的新民族。她沒有傳統的歷史，因此，她既無傳統的光榮，也不受傳統的惡害。她沒有民族童年時代的記憶，因此，她就不受民族童年時代的思想拘束。她會由英移民殖過少數貴族及貴族主義，但在獨立革

命時代，因為這少數貴族是保護帝國主義統治的，他們已與革命的掃帚把他們掃出美國之外，南方的奴隸主亦欲應用過去制度之遺物阻止自由勞動之發展，他們又受到從前貴族受到的同樣命運。他們的政權給摧毀了，舊的財產給釋放了，甚至有些連土地不動產都被沒收了。自此以後，自由女神非但是這個民族之主要統治神，而且是牠的惟一統治神。

雖然此自由女神如果和歐洲一樣，一開始就與競爭的商工業發生關係，此自由女神之精神發展必不長久，爲甚麼？因為商工業之自由競爭牠能很快的產生出反自由精神的獨佔來。但美國的自由女神天生幸運，她一開始並不是與商工業競爭發生關係，他是與爲十九世紀美國所特有的獨立的農民發生關係，此種獨立的農民在歐洲，特別是在英國，因種種經濟原因和社會原因是漸漸衰敗逐漸縮小其數量的，但在十九世紀的美洲，因牠能有無限的土地可供開展可供佔有關係，牠們的數量非但不是日漸縮小和減少，而且是不斷地擴充和加多，整個十九世紀之美國全部的社會繁榮是基於下一事實：歐洲廉價勞動自東方輸入，西部處女地之不斷開發。輸入勞動而無西部土地可供估價，必會降低美國勞動者之生活水準，西部土地之估價，如無輸入勞動，必使東北工業不能大量發達。反之，輸入勞動與剩餘土地如不斷供給，她便是美國在一世紀內的發展超過歐洲數世紀的發展之原因。一八六二年的移民法，規定凡美國人或願意歸化美國的外國人都可以不費一分文得一百六十畝公地。此種急進的法案之通過，不僅使外來的移民迅速增加，甚至也使城市工人都願離開他們的作坊工場，到西部去

做獨立的國民。

這種爲人類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優越的生活條件，對於美國國民重勞動，樂觀和實際主義天性之養成給以如何有力的影響，這種用不着多加說明。我所要指出的，就是美國的國民之勞動的一質素和生活條件的優良，不僅使牠能建立一個近代的模範的民主國家，重要的，尤在使牠能藉此建立一個爲其他民族所沒有的民主社會。

十九世紀波蘭的大文豪顯克微支（H. Sienkiewicz）在其「遊美雜記」一文中，對於美國民族性曾如下描寫。

「首先——顯克微支說——我們以爲一個民主之政府，不一定就附連着一個民主的社會。其次，歐爭雖有好幾個民主的政府，却實在沒有民主的社會。

「拿法國來作例罷，自從大革命以後，法國政府之爲民主的政府已經沒有人起疑問了罷，然而大家會同意說，雖然牠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可是牠沒有民主的社會。牠的風俗和人情不是民主的。牠的醫生，商人，政府公務員，勞工，農民，兵士，教師和銀行家，真正在社會地位上平等麼？是不是這些階層各自分開，劃然有界限就跟印度的階級制一樣的麼？

在美國那就不同了，社會也是民主的，正和政治一樣。在美國，民主不只是一種制度一種理論，並且是實際生活。

「社會的民主根源於重視勞動。在各種勞動同樣被重視的一個國家內，要把勞動的人們分爲高階級和低階級是不可能的。我們歐洲人沒有——而且不能有美國人那種把一切勞動同等看待的概念，在這一點，美國人斷然比歐洲人進步。在我們這裏，儘管我們職業上人人平等而民主，但假使一個上層階級的人不得不用他自己的勞力來維持生活的時候，他的同階級的人就要着低他了。於是他就喪失他本階級的階級地位，他跟他本來個字裏的一切關係都會斷絕，而落進了所謂下層階級裏。在美國可不是這樣。歐洲所謂社會階級這一個字的定義美國是沒有的。織業雖有不同，然而一個鞋匠可以跟一個律師一樣是紳士身份。」

「這是因爲輿論並不把鞋匠對於社會的服務跟律師對於社會的服務視爲絕然不同而且有高低之分。」

「這一個對於勞動的新奇的态度就是新世界的社會爲甚麼不分成劃然不相混犯的階級的根本原因。這供給我們一個鑰匙，使我們了解那初看時很不能懂得的亞美利加德謨克拉西。這對於勞動的態度，又起於歷史的和經濟的根因。歷史的根因是美國社會本由移民而成，而這些移民本來是屬於體力勞動階級。他們回顧看他們的父祖用手來謀生時代，因此，他們習慣地只以人們實際服務於社會的能力來品評人們了。經濟的根因也是同樣易明而且合於理論的。跟這國家的廣大領土比較起來，人口就缺得很，體力勞動因此視爲珍品了。用一句商業上的話，需要超過了供給十倍，於是結果不但提高了勞動者的物質報酬，並且以提高了他們

的社會地位。

「其次，自治制度——這是傾向於把現行的社會實踐和理想的烙印在公共設施上——也使得這個對於勞動的態度引到了政治生活方面而且把民主的精神吹入了政治生活內。這在教育上尤為顯著。雖然我們歐洲人早已承認了教育勞動者是重要的事，但事實上我們的精力和金錢却專注於中等學校和大學校而不是初級小學。事實上歐洲的一般民衆簡直被摒在中等學校和大學校的門外，而且因此公共教育在主意和目的上都成爲上層階級的專利，結果使現在的階級界限愈趨於尖銳——這是不用我來說的。

「在美國那就完全不同了。美國的教育目的不像歐洲似的只注意在科學的進步而亦注意於民衆的一般文化。當然美國也有高等教育機關，但公衆注意大體集中在初級小學校，這是最大多數的人民完成了他們的教育的地方。因爲這個緣故，可以說科學在美國比較的進步少，但教育却遠比歐洲發達。教育在美國好比一條大河，人人得從此汲取他所需要的。讓我再補一句，美國的初級小學校教授的課程比歐洲的也要多得多。我們歐洲初級小學校的課程只是學習讀寫而已，美國却除讀寫以外還教授了數學，地理，自然科學和公民。閱報和自由的社會交際（一切階級的人民中間的自由社交）又使得這種初級學校的教育過程延長到一個人的終身。

「結果就是你在美國看到的人全不憂被關或法國的農民愁襟眼界狹小——除了新移過去

的奴隸，每個農民，機器匠，馬夫，或水手，能够開通地談論到內政，外交，紙幣和硬幣之相對利弊。以及幾乎一切與公共福利有關係的問題，除了文學和美術。他們這些知識是從初級學校，從報紙上，以及選舉運動時得來的，他們的見解並不常常深刻，有時只燈染了他這一類人的愚笨，然而一無所知的人實在難得碰到。我這話一點也不誇張，一般的美國人是沒有學問的，可是腦力發達的人，我們在歐洲到處看得見的有教育與無教育階級中間的大裂口，在美國就沒有，這是爲甚麼美國既有政治的民主又有社會的民主的第二原因。讓再指出第三個原因來。

「在歐洲，上層階級之所以別於下層階級者，尙不僅在職業，財產和教育，而也在態度的風雅。這所謂「風雅」好比一種嬌貴的花草，只有放在暖房裏才能够發育，具有這一條件（暖房）的只限於最少數的人。在這最小的圈子裏，我們已經達到了美國人甚至還沒夢想到的發展階級，就是爲這緣故，美國人常常以他們那粗俗的態度，他們那烟草的嗜好，他們那把腿架在桌子上或窗沿上的習慣，以及別的許多使我們看了覺得野蠻的習慣，叫一個新到美國的歐洲人感着不安。

「一個人不能了解美國的德謨克拉西，或美國的生活一般，除非直到他認識了這三個原因：對於勞動的重視，沒有顯著的教育上的差異，以及沒有顯著的舉止態度上的不同。我還記得幾個月前偶然看見一件事情，那時候使我非常的驚訝。一個馬夫載我們到一個百萬富豪

的府上。到了以後，他並不守着他的馬在門外靜候，却和我們一同進客廳，在沙發裏坐了，就跟主人的女公子隨便談閒話。這一套，在我們歐洲人的立場上完全不可解。那時我還不懂英語，當然不曉得他們談些甚麼；但是我們那馬夫的動作看來是我們那主人的世界內最自然不過的事啊。馬夫也是個紳士，他的職業是養了馬出租并且戴他的顧客到他們要去的地方。馬夫跟別的市民完全平等的啊。

「像這樣的事現在我不再詫異了。我看出了那美國的百萬富豪在態度的風雅上比歐洲同樣身份的人要低得多，然而那美國的馬夫他的社會習慣却比我國同樣職業的人要高上十倍還不止。」

最後，顯克微文發表他的同情的意見說：「要是有人問我，到底是那一種社會制度能夠產生更完全的文明呢？那我將毫不遲疑回答道，是美國的那一種。在歐洲，文化只是那享有一切專利的特定社會階級的貢獻品。其餘的民衆爲了這特定社會階級的便利而存在的。只是這一特定階級的份子才有特權去享用科學，詩，藝術，以及知識生活——一句話：凡是一切使得生活真正完美的東西。……這一上層階級的著作，發言，構成輿論，刊行報紙，鑄錢畫苑，充實了圖書，創造了戲院。總而言之，是這一特定階級組成了一個文明的人羣，浮在（好比是）一個低級的民衆的大海上，這些民衆過的只不過是物質生活，沒有文化，沒有學問或高級的經驗。」

「在美國知識和文化多少可以說是屬於一切人的。所謂德度的風雅這東西，雖然在美國沒有達到歐洲的那樣完全，但是比歐洲更爲普遍地傳播着。這一切都是表現美國德說克拉克西的。讓我再加說幾句：如果更高的文明不是快樂之源，那我們就應該離開牠而回到我們人類從前茹毛飲血的時代；但如果文明是像我們一般所承認是一種福利的話，那麼，我們必須承認在美國的人民全體享有那福利的權會遠比歐洲任何地方爲大。」

美國知識文化與國民大衆之驚異的接合，不止顯克微支是如此說，十九世紀的英國大歷史學者博克爾（Buckle）也完全持同樣的見解。由博克爾看來，歐洲諸國的知識文化，例如德國，其最高的思想常常是超越其國民的普通進步，因此，使司知識文化的階級與國民大衆之間，總缺乏同情和接觸，而他們的偉大的著作家無與於國家，而僅爲個人間的研究而已。不特如此，德國知識份子之努力，非但未同化德國的下層階級，反而增加了思想家與愚昧的一般人的距離與隔核。

「另一方面，在美國——博克爾說——我們看見恰是一種相反的文化。我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國家，像美國這樣缺少最有學問者及最愚昧者的一種現象。在德國，思想家及一般實事求是的人是完全分離的；但在美國，他們便完全混合在一起了。德國每年間皆有新的發現，新的營學及推廣知識範圍的新方法。而在美國，這些研究幾乎全被忽略了。自從愛德華（Forstner E. P. Ward）底時代以來，從末曾有偉大的形面上學家出現過；對於自然科學方面很

少注意，並除了法律學外，像德國所不斷工作的那大的題材從來沒有甚麼成就。美國的知識底積量是異常的少，但已分佈於各階級，德國的知識積量甚豐足，却只限於一個階級。

L

博克爾到底是生於前世紀六十年代前的人。他對於六十年代以後的美國知識文化的發展和變化可惜不能看到。美國一直到現在確然是如博克爾所說，未出現過一個偉大的形而上學家。但這事對於美國並不是一種損失。爲甚麼不是損失呢？因爲美國沒有這種出現偉大形而上學者的需要。我們知道。偉大的形而上學者之出現總是在那一民族或那一世界先有嚴重的痛苦和困難而非根本解決不可的時候。美國從來沒有這種痛苦和困難。所以如像古代的柏拉圖，近代的黑格爾這類偉大的形而上學者，在美國實沒有任何必要。反之，對於有充分的勞動條件和生活可能的美國有必要的，倒是那立刻獲實效或結果的知識，就是詹姆士與杜威所發揮的實驗主義 (Pragmatism)。

至於博克爾說美國人「對於自然科學方面很少注意」的話，這也許在前世紀六十年代前是如此，在此以後，特別是現在，恐與當時完全不同吧。恰是相反，美國現時的科學發達是誠如一八二一年一位英國作家所預言，「牠的天文家，望遠鏡，比你衰老半地球上所產生的高貴得多，深遠得多，照遠得多。」

雖是這樣說，但美國的科學家仍不丟掉美國的特色，即美國最偉大的科學家都是愛狄生

型的，並不是牛頓型和愛因斯坦型的。這就是說，美國最天才最偉大的科學家仍然與美國國民大眾的需要相一致的。

尼德蘭獨立革命

法國一七八九年革命的榜樣，就是一六四八年的英國革命；英國革命的榜樣，就是尼德蘭人反西班牙的暴動。

第一章 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

遠在十六世紀時代。當一般封建勢力和專制政治正統治着全歐洲各民族時，這時候在歐洲大陸的西北部，有一個很小的民族，第一次舉起反對外族專制統治之旗幟並且經過四十多年的英勇鬥爭？卒獲得民族自由與民族獨立之光榮，這個民族就是尼德蘭（Netherlands），就是現在的荷蘭（Holland）。馬克思說，法國一七八九年革命的榜樣，就是一六四八年英國革命；英國革命的榜樣，就是尼德蘭人反西班牙的暴動。由此可知，尼德蘭獨立革命，實開以後數世紀起類鬥爭之先河。

這固不錯，在尼德蘭獨立革命之前，在商工業發達較早的地方，如意大利各城市，早已就發生過資產階級反封建運動。但是這時的革命運動，最多只有城市的意義和地方的意義，而沒有全民族的意義。至於尼德蘭獨立革命，它完全是民族性的和全國性的，是絕非中世紀末期

城市共和國運動所可比擬的。

其次尼德蘭革命，它不僅是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並且也是被壓迫民族反對外族統治和壓迫的民族革命，中世紀數百年，歐洲人並無愛國情操。當時市民只知愛城市，農民只知愛鄉村，騎士只知愛自己的領主，但無人知道愛國，知道愛自己的民族。歐洲人知道愛國，並在強烈的愛國觀念之下，高舉民族革命的旗幟，也是自尼德蘭獨立革命運動始。

這樣看來，尼德蘭獨立革命，對於以後數世紀的世界史，實是一種啓示和範型，而研究這種啓示和範型，對於此後的一切革命史之理解實有必要。

第二章 尼德蘭民族的簡史

尼德蘭民族，是歐洲大陸西北部一個濱海民族。它位於歐洲三大河流入海之處。這三大河流就是萊因（Rhine）河，美斯（Meuse）河，和色耳特（Schelde）河。尼德蘭一字，原為「低地」之意，這就是說，它所佔據的地方是一遍低原地帶。尼德蘭分兩部；北部尼德蘭，即現今的荷蘭，完全是一遍內海港灣和沙丘，是很不便於農耕的。只有南疆德蘭，即現今的比利時和盧森堡（Luxembourg）是比較適於農耕的。

尼德蘭的人民，北部為日耳曼人，弗來銘人（Flemings）和荷蘭人；語言與德語相近。南部為富倫人（Wallons），用法國方言。論種族，尼德蘭人本來是德人一部分，但因為種

種的歷史演變的結果，不僅分裂了尼德蘭與德國的天然關係，並且使以後的尼德蘭對德國，如秦人之視越人。十字軍東征時，尼德蘭於歷次戰役皆著偉績。如襲取耶路撒冷（第一次十字軍）之高夫里（Godfrey of Bouillon）即係比利時人；而創立君士坦丁地方拉丁朝（第四次十字軍）者，就是法蘭德斯人鮑爾文（Baldwin of Flanders）。迨至十三四世紀時，特別自諾曼族南侵以來，尼德蘭之商業和市鎮即日臻繁榮。蓋萊茵河，美斯河和色耳特河為地中海與北歐諸國通商之要道，尼德蘭適當三河之下流，因擅此地理之形勝，故商業巨埠，如根脫（Ghent），布呂爾（Bruges），伊泊爾（Ypres），烏得文（Utrecht），萊丁（Leiden），哈連姆（Harlem）列日（Liege）諸城市，均於此時興起。

就政治說，中古時期的尼德蘭，初不過是些好戰的貴族統治下諸封建小國之總稱。迨至十三四世紀，上述重要城市興起以來，牠們就逐漸從貴族手裏得到特許狀。而且有些城市，貴族政治，已為比較民主的市民政治所代替。如根脫，伊泊爾，布呂爾各市鎮，在表面上雖為法蘭德斯伯爵所管領，但實際統治者皆為富商，且有一種由自己的工人所組成之軍隊，非俟伯爵發誓尊重其利益與規定，彼等不肯服從伯爵，且伯爵即已發誓，彼等仍時與之戰。

自一三八四年起，終十五世紀，勃根第公爵（Duke of Burgundy）佔有法國東部勃根第公國以來，他即以婚姻，以金錢，以詐術，以武力及其他種方法漸漸把尼德蘭十七省併為己有。待後當查理斯勇（Charles the Bold）即位，他更想把散在各處的領土變為一個堅固

與統一的王國。因此，他對於尼德蘭各個城市的特殊利益，不但不欲保存，反而盡情加以破壞。但是查理斯這種努力並不是沒遇到阻礙，根脫，底南堤，列日諸城市均一度起而反叛。雖然這些反叛皆爲查理斯所鎮服，但他爲了取得尼德蘭第三等級之不繼續反叛，他却不能在尼德蘭成立一個限制自己權力的三級會議。因此，自一四六五年以來，一個共同的國會即成立於布魯塞爾。此會議是由十七省的貴族，僧侶和平民所選舉的代表組成的，其任務在審定新稅。八年後，尼德蘭又組織一個政務會議，這一會議更握國內最高司法和行政權。

當查理斯在世時，他本想在德法之間建立一個強國，但爲其政敵法王路易十一所反對，卒未實現。一四七七年，查理斯戰死於南錫（Nancy）之役，路易十一即出兵奪取勃根第公國，把法蘭加以擴大。但查理斯在尼德蘭的遺產則傳於其女瑪麗（Mary）。同年瑪麗嫁於奧國馬克西米連（Maximilian），因此，尼德蘭此後就長期爲奧國哈布斯堡族所統治。

尼德蘭雖然經過這樣多的政治變遷，但它的各城市之繁榮仍日增無已。當時尼德蘭的宮廷炫耀甚於同時任何君主。其永久的紀念尙留於今日者是著名的金羊毛獎章（Order of the Golden Fleece）制度。此爲十五世紀勃根第公所創造。當時尼德蘭的毛織業以英國羊毛爲原料，而這項產業是尼德蘭興盛之基礎。

當哈布斯堡族查理第五（Charles V）爲皇帝時，他本可以把尼德蘭對德國的關係，即

因物根第公佔有而破裂了的關係，加以恢復。但他不如此去作，他却使尼德蘭與他新繼承的西班牙王國爲最密切的聯絡。

一五五五年，查理第五將西班牙王位傳與其子腓力第二，於是尼德蘭就變成腓力統治下的兩班牙王國的殖民地。

這就是尼德蘭民族的簡史。

第三章 革命前夜尼德蘭的經濟情況和階級關係

我們已經指出，尼德蘭是低原地帶，是一遍港灣，治澤、沙丘和不適於農耕之地。這雖然是其缺點，然而同時也是其優點。尼德蘭是低原地帶，正因為它是低原地帶，它才成爲中歐三大河流和財貨匯集之地。待到十五世紀末，世界通商的中心由地中海移到大西洋以後，它這時更是世界通商之中心。

港灣與治澤，雖不適於農耕，但却適於漁業，運輸業，海外貿易和海上冒險等事業之推進。並且正是因爲這種地理條件關係，才使尼德蘭人民能先歐洲其他各民族起來爭取民主政治和民族獨立之大業。

因爲交通便利關係尼德蘭各城市的居民，多係來自異地，且多爲農奴出身，他們在社會上雖無固定地位，然強毅有爲，並富冒險精神。他們始以剽竊，繼營負販，終則成爲富商大

賈。至於北尼德蘭人，他們除營商工業和航海業外，更能從事撈魚業。這兒爲全歐洲最大魚市場，魚產能供歐洲各國之需要。因爲地理形勢便於發展海上事業關係，北部半數以上的男子皆服務於海上。

尼德蘭土地不豐，所產五谷，不敷所求。惟其因此，尼德蘭才成爲歐洲食糧貿易之包攬人和工業品之供給者。地中海的物產及新大陸的出品由此轉銷於歐之西北部和波羅的海，同時則將尼德蘭所產之布疋，毛貨，美術品，宗教用品等貨物又運銷到中歐西班牙半島及新大陸。

當十六世紀時，尼德蘭全國共有二百個城市。而通商碼頭多至一百五十。鄉村計有二千三百個，北部最大城市亞姆斯特丹（Amsterdam），爲當時歐洲最大國際貿易之中心，它每年出賣七萬夸脫的食糧，而其在本地是一夸脫也不產生的。中部大城市歐偉爾（Antwerp），商業之繁盛，更居世界第一。茲偉爾的海港可停泊二千艘海船。外商居此者不下五千人。全歐各大商號皆有經理駐此。一五四五年，其出口額就已達六百萬立佛。此外，如工業城市法蘭德斯（Flanders）和布拉奔（Brabant）所產工業品，佔全國半數有奇（註一）。

註一：茲偉爾與亞姆斯特丹的商業之發達，茲有另一重要事實可以證明，卽近世「交易所」一字是由尼德蘭的不呂爾發明的。布呂爾的商業當時多集中於意大利使館前的廣場中，這個廣場名「（De Bourse）」。至十六世紀，交易所一字又得盎摩爾

之承認，此後，這個名稱便繼續流行於各地。

交易所的位置即在城市商人便於集合的廣場之地。此處有兌換所。商人必須兌換貨幣和期票才能在遠處購買貨物。兌換處可以存放現款，發行期票。此種期票到期即可以兌現。

當十六世紀時代，世界商業中心即在色爾特河靠岸的魯佛爾城。此地離萊因河口亦甚近。魯佛爾市府爲便利商人起見，使商人能認識各色的貨物，因此，在埠口的旁邊建築一座美麗的大廈，名之曰「交易所」。在屋之上部寫着下面的話：「爲各國商人謀利益」。當時有一個考察的寫道：「在這座房子裏可以聽到各種語言，見到各色的服裝，總而言之，這一個交易所是世界的縮影。」

在魯佛爾交易所可以聽到世界的消息，這些消息可以確定交易的價格，成爲交易所流轉的因素。價格的起落依特別通信的機關及外地市價報告爲轉移，因爲這種原故，上述的交易所漸漸擴大了本身的影响。魯佛爾交易所之發展，與十六世紀的商業發展有密切關係。在市面流通的資本逐漸增多了，一切的貨物規定了適中的價格之後，即將價格揭示於交易所。

在期票及借貸資本流行中，魯佛爾的交易所的意義更爲重大。爲便於這種流通起見，造成了一種公斷的觀念，設立了支付商號。

尼德蘭獨立革命

雖然這時交易所本身技術尚未十分完善。待亞姆斯特丹交易所成立時，已經很完善了。因尼德蘭獨立時，查偉爾因遭受西班牙兵變之焚毀，故一切商業都移往亞姆斯特丹去了。因之，此地交易所的意義，非常重大。牠第一次經營股票交易。而股份公司當十六世紀遍佈於荷蘭和英國，甚至其他各地。

根脫（Ghent）和布呂爾為毛織工業之重鎮，而色爾特河兩岸，亦以此項工業著名於世。尼德蘭的毛織品，不僅是漢薩（Hanseatic）商人所需之主要商品，並且也是全歐洲的商人所售銷的對象。因此，產生這類商品重鎮的布呂爾，在十六世紀已擁有十八萬居民。

這時，尼德蘭的工業組織，其主要形態，雖是手工業，然而因為商業資本侵入之結果，整個手工業已完全操縱於少數由英國和西班牙輸入原料的大資本家之手。這般大資本家把原料分配給各個老板，待其製成熟貨後，再由他們運至世界各地去發賣。尼德蘭工業生產的總值已達四四、八五〇、〇〇〇金佛羅令（Gulden）。

十六世紀的尼德蘭既然是以工商業立國，而農業只有次等作用，那麼，基於農業經濟的地主階級的勢力自然不及商工業資產階級勢力之強大。雖然尼德蘭的土地大半為地主和教會所佔有（教會佔全部土地三分之一），但在革命的前夜，地主之中也有不少的城市資產階級，並且他們的土地大半是從產貴族那裏購買來的。

至於尼德蘭的城市貴族，他們因為城市發達和城市地租增漲之結果，遠在十四世紀，他

們就已經不是從前的貴族，而是商人，銀行家和資本家了。以蓄積的地租去擷取工業技術上進步的價值，使城市貴族的生活與市民生活完全相混合。這是在獨立革命中，尼德蘭的貴族能與資產階級親密合作之主要原因。

至於尼德蘭的平民，特別是北部的平民，他們是和同時代的英國人一樣：富有危險性及冒險精神。

好比脚踏實地

而奔馳於暴風狂雨之中

由於尼德蘭北部盡是曲折的海岸與夫海港魚灣不計其數，遂使這裏的人民變為向海上發展之有力分子。在這裏的尼德蘭人看來，浪漫生活與致富生活既無俗雅之分，而奮不顧身的冒險和由通商以取得大利實有相聯關係。因此，在這裏，凡在故土得不着安身立命之所者，盡投身海上。有甚麼人能如海上的人那樣自由？

從我們為世界大陸民族之典型的民族看來，海不僅是尼德蘭的經濟繁榮要素，並且也是尼德蘭容易產生獨立革命的要素。為甚麼？因為在近代的交通工具未出現以前，那些爭求民主共和政治的革命運動，永遠是為海洋民族和半島民族所特有的歷史運動。這並不是如十八世紀的歷史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所解釋（註一），是因為海洋民族和半島民族物產不豐，而民之有自由之樂，等於無牙者使之有角，而是因為這些民族，國土不大，天然交通發

達，和對四鄰關係的密切等原因，一旦當它自身走上商品經濟發展階段時，它一方面，容易利用天然交通關係，發展對外貿易，吸收他民族的血液，以達到本國繁榮之目的；他方面，箇同一原因，又使它容易排洩其因本國商業資本發展所生產出來的剩餘人口於海外。因為它能吸收他民族的財富以自榮，故它能產生強大的資產階級。又因為它能排洩其本身所不需要的貧窮人口，它便能減去威脅資產階級歷史運動的危險分子的舉動，即減去爲大陸民族所特有而爲海洋民族和島民族所不知——有亦不算甚麼——的農民大暴動。因此，這類民族的資產階級便會愈堅定地走上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大道。而尼德蘭的北部較之南部之所以能進行更堅決的民族鬥爭者，其原因卽在此。

註一：孟德斯鳩不僅是十八世紀光輝煥發的法律學家和政治學家，而且也是當時最大的歷史家和歷史哲學家。孟氏在其不朽巨製法意中，對於地理與歷史之關係，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所可惜者，孟氏的地理的歷史觀點，不該爲其同時代的自然唯物論的觀點所限制，遂不免有妄生臆斷之慮。如孟氏論自由與地理之關係時說：「君主獨治之規，多見於富饒之國，而庶建之民主，成於瘠壤者爲多。以物產之不供，而民之有自由之樂，是亦無牙者使之有角之道也。徵諸希臘，則阿狄克之磅確，其政府爲民主矣；而賴思軍蒙之齊腹，其政府爲賢政矣。其所以僅成賢政者，以當時希臘之民，無智愚皆以一君之政府爲危道也。而賢政則次於君主

之治制也。布魯達奇之傳梭倫也，戴雅典既平士郎尼亞之亂，其民分拆居市府間，各成徒黨。門戶之分，猶其土權之爲異。於是高原之衆，樂自治之民主；而處下澤者，則願貴族爲之君。至於海畔居民，則又欲雜取二制之長，並用之以爲政也。」於是孟氏遂結論道：「島國之民，其愛重自由也，常過於大陸之民。」但氏旋又覺自己結論不免矛盾。爲甚麼？因爲氏之時，日本亦島國也，何以日本人不如希臘人和近代英吉利人之愛自由呢？於是氏乃自證道：「日本之民爲例外。因其島之幅員甚大（?!），又以習於奴制之故」。

如此說來，到底是自然環境限制政治制度呢？抑是政治制度（如「奴制」）可以不爲自然環境所限制而能獨立發展呢？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以孟氏之歷史灼見，也祇使他看出島國與大陸國發展之殊異，而於殊異之原因，仍未明確說出。日本人在過去之所以不如希臘人和英國人之愛自由者，並非因「其島國之幅員甚大，又以習於奴制之故」，而是因爲它不該孤處大洋之中，不該在它的四圍沒有較接近的民族，可資貿易，可資移植其國內過剩人口。這種情形，遂使島國的日本等於一個大陸民族。這只要一看過去的日本沒有希臘英國那樣富有的資產階級，沒有排洩國內剩餘人口的移民運動，而能有爲其他島國所沒有而爲一切大陸民族所常見的農民大暴動，我們就可以知道，日本民族在十八世紀以前不能有自

由政治而只能有君主政治之真正原因了。因為自由政治，無論是在古代和近代，都是富有進取精神和吸收國外財富的資產階級發達之結果。

反之，如尼德蘭的南邊，特別是盧森堡，因為海岸港灣和交通條件不及北方關係，其農民雖因資本主義之發展，能從農奴制度中解放出來，但因解放出來的農民，除極少數有可能變為地主的和教士的佃戶外，其餘大多數不能取得向外發展和漸趨生的機會，自然只有變為農村無產者。因此，他們和大陸的貧民一樣，遂成為資產階級歷史運動之重大的威脅。他們有時不僅可以變為西班牙人統治其祖國的工具，從右邊（註一）對革命加以壓迫。而且在革命高潮時，由於他們是土地和財產之破壞者，他們時而還要從左邊對革命加以壓迫。

註一 因參看本篇第五章

至於那些在南部居民中佔半數的手工業者，以及在新興手工工廠工作的少數無產階級，他們自然是獨立革命的重鎮。但同時也因為他們的勢力過大又太急進，因此，也就不免威脅了資產階級之進展，使南部革命運動即早發生分化。

第四章 西班牙對於尼德蘭民族之壓迫

十六世紀的尼德蘭民族以其經濟發達和社會進步離冠蓋全歐，但因為前述歷史關係，這個民族的統治權卻不是操之於自己，而是爲當時與它完全無血緣關係的西班牙民族所操縱。當十六世紀初，查理第五爲皇帝時，尼德蘭不過是查理統治的領土一部分。因爲查理的領土除了尼德蘭以外，還有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待到查理第五於一五五五年讓位於其子腓力第二以後，德國與意大利皆脫離其統治，於是所餘只有西班牙和尼德蘭及美洲的殖民地。

當查理第五統治時期，尼德蘭以偏小的十七省所供給他的稅收，竟等於其他各處供給之總和。供給的總數，達二、〇〇〇、〇〇〇金基特爾。在九年戰爭中，尼德蘭還另納四〇〇、〇〇〇金基特爾特別稅以充軍餉。尼德蘭這時向查理所納的稅款不爲不重。但因爲查理生長於尼德蘭的關係，他對於尼德蘭的繁榮，尙知設法加以保護。例如，他給尼德蘭人在他統治的一切領土及殖民地內以貿易權，又給他們在西班牙內以食糧貿易權。因此，尼德蘭這時向查理所納的這宗巨款，它在查理統治的領土內之通商中很快又收回去了，並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尼德蘭這時雖感查理第五宗教政策之迫害，然尙未興起革命之巨

註一：意大利給查理的稅款爲二、〇〇〇、〇〇〇金基特爾，西班牙爲五〇〇、〇〇〇金基特爾，美洲殖民地爲五〇〇、〇〇〇金基特爾。

但自查理第五逝世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查理逝世後，首先給尼德蘭一重大打擊的，是德意二國的脫離，這是使尼德蘭突然失去與中歐南歐諸城市之通商關係。其次，是腓力第二削奪尼德蘭人與西班牙殖民地貿易權及尼德蘭在西班牙的食糧專賣權。不特如此，甚至爲尼德蘭王業所必需的英、羊毛，亦因西班牙對外政策的關係，現出完全停絕的危險。

尼德蘭人現在所遭受的經濟損失已達極點。西班牙這時對尼德蘭的困苦不但不思減輕，而且因爲自己的領土縮小，生產低落，價格革命和不斷戰爭等關係，反而使它加緊對尼德蘭的財政誅求。這種財政上的誅求不已，便迫使尼德蘭的資產階級起而反抗。最初反抗納稅，反抗未得三級會議同意，候向人民徵收特稅，繼而因要求未遂，更起而反抗西班牙統治。

除上述財政壓迫外，在尼德蘭更有一種可怕的宗教上的迫害。尼德蘭因爲資本主義和城市生活發達較早關係，從中世紀末以來，已經是歐洲新教革命的熔爐，是加爾文派運動的策源地。而新教徒中，資產階級和工匠又爲最多數。反之，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因爲種種歷史關係，却是當時舊教勢力最忠實的支持者。當查理第五時代，尼德蘭就設有迫害新教徒的宗教法庭。這種法庭之慘酷實非地獄中之嚴刑所能比擬。

「於此罪惡尚未遠播之前，亟應斧其根株焉。」

這就是查理第五懲法新教徒的精神。他自詡其在尼德蘭之殘忍道：「凡執迷不悟者，生焚之。自悔者斬。」因此，尼德蘭因這種宗教迫害而喪失生命者不知有多少。

待腓力第二（註一）卽位後，他更認他所統治的領土內之宗教統一，直是其政治統一之基礎。因此，他更不惜任何犧牲以求舊教之統一。他自述其宗教政策道：

國家之利益與宗教之保全至有關係。一國而有兩種不同之宗教，則公侯之權威與人民之和合皆不能存在。吾輩失所有邦國而不願接受異教徒之主權。若吾而存百條生命吾亦寧願捐此百條生命而不願接受異教徒之主權。保全一破壞不完之國家以事上帝固猶勝於爲魔鬼及異教徒之利益保全一完整之國家也。」

「一語可以破的。腓力第二的宗教政策之中心，就是要根本消滅尼德蘭的新教徒使它的宗教與西班牙一致。」

註一：腓力第二爲繼查理之西班牙國王。據歐洲名歷史家研究，他的性格實爲哈勃斯堡性格與西班牙性格之混合。例如，哈西貴族都是頑固拘泥的，而腓力則狂熱迷信。哈西貴族皆天性野蠻，對人毫無同情心；而腓力更有甚焉。哈西貴族皆門閥森嚴，排除外人，而腓力簡直非他人所能仰望。更如哈西貴族皆喜踏在覆尸上，與死人爲伍的，而腓力更是殺人不眨眼。據說，他一生只笑過一次，這就是當他得了聖巴多羅妙屠殺的消息的時光。在他看來，僧侶應當就是官吏，而靈魂治療不過是森林學的變形，或者像郵政管理似的。因此，終他一生，他使他所統治的人民備受艱苦，壓迫和種種流血慘痛，而尼德蘭獨立，原因雖不一，要之，也是忍

受不起這種野蠻統治的一種遜而走險的表現。

當腓力執政時期，他使西班牙的各級會議等於消滅。他最初曾承認亞拉岡的傳統自由，但爲時不久又被取消。他畢生的任務有三：（一）使國王的專制戰勝各地的傳統自由；（二）使西班牙統治全世界；（三）使天主教戰勝其他的異教。這三個任務可以說都未完成。

這表示西班牙人不僅宰割尼德蘭人的財產，甚且連其宗教良心一并宰割之！

腓力第二又不僅是壓迫尼德蘭的資產階級和一般平民大眾，就是對於尼德蘭的貴族，他也不想使他們享受昔日的優越地位。當查理第五時代，尼德蘭的最高統治權固操於皇帝之手。但皇帝以下的直接統治多爲尼德蘭的貴族。尼德蘭的貴族這時被邀與參戰，並時被賜以優厚利益和土地。但自腓力常權以來，完全一反查理之所爲。腓力視自己只爲西班牙國王。而尼德蘭不過其殖民地。因此，他執政以來，即罷免尼德蘭貴族一切要職，而以異國人和西班牙天主教徒尼德蘭執政。其次，尼德蘭的貴族，各市長及政府官員，雖不拒絕迫害新教徒；但他們對新教徒最多只願處以罰款或徒刑。並不願因宗教而處人以死刑，尤其是生焚之刑。但腓力第二完全固執己見，他強迫他們對新教徒應加以極刑。

凡此種種開罪低陸國貴族的決定，已經迫使他們不能不起而反抗西班牙統治。他們歡迎反西班牙人的政變。因爲這種政變是可以使他們自己掌握尼德蘭政權的。

至於一般國民，他們因不能忍受西班牙人之種種壓迫和殘害，更是希望能早日摧毀西班牙人在他們身上的鎖鍊。

於是，革命巨波的展開遂成爲不可避免。

第五章 獨立革命的爆發和經過

我們已經說過，從一四六五年以來，尼德蘭就有一個由各省貴族及僧侶及一般平民所選代表而組成的三級會議。到腓力統治時期，此三級會議即與西班牙派駐尼德蘭的執政不即腓力異母妹帕馬瑪加特（Margaret of Parma）發生劇烈衝突。

先是腓力第二因繼續和法國作戰，需要金錢，遂決定召集尼德蘭的三級會議，通過徵稅案。此徵稅案結果是通過了。但三級會議却提出交換條件，就是要求在對法作戰完結後，西班牙在尼德蘭的駐軍，須一律出境。後來法西戰爭果於一五五九年結束，帕馬女公已準備應允尼德蘭人的請求，撤退西班牙駐軍。但腓力第二這時大表不滿，且決定對尼德蘭出重兵。同時他更授意羅馬教皇，要他簡派十個新主教和許多審判官至尼德蘭，目的在用殘酷的方法壓迫與尼德蘭政治革命運動同時生長的新教運動。

一五六五年，尼德蘭的貴族，因不能坐視西班牙在尼德蘭的暴政苛法之繼續，特派哀格蒙特（Esmont）伯爵爲代表晉見腓力。他們要求的是：（一）將尼德蘭政權一概交給由國德

蘭的貴族代表所組織的政府委員會；（二）取消異教審判。可是腓力第二對於這些要求，并不欲接納，且宣稱凡不滿意於現存統治者和異教徒，一律受刑。尼德蘭人的怨恨，此時已達忍無可忍之時。於是騷動，毀壞教堂偶像，和散發反西班牙傳單時有所聞。

一五六六年，尼德蘭的貴族更組織同盟會，同時並由各省派代表向帕馬女公請願，仍繼續要求增加尼德蘭貴族的權力和取消異教審判。結果這些貴族竟被帕馬的近臣斥爲「乞丐」（Peas）。這時這般貴族之中，有一人即刻就在自己的項頸上掛上一個「乞丐」的袋子和木碗，並在木碗中斟上滿碗的酒，以觴祝「乞丐萬歲！」自此以後，「乞丐」這一名稱就成爲尼德蘭愛國黨人的徽號。

這個發動於貴族的運動，即時就爲廣大的民衆所展開，這一年，有許多教堂被毀壞，許多修道院被焚燒，許多偶像被搗毀，和許多教堂的牧師，職員被驅逐。尼德蘭是燃起革命之火了。一般新教徒羣衆遠較「乞丐」爲激烈，且其復仇之念並不減於其仇人之壓迫。

腓力第二能够緩和尼德蘭人這種革命運動麼？他不但不能緩和這種革命運動，他甚且認爲這是不能容忍的大逆不道，他爲了要壓服尼德蘭人這種不能容忍的大逆不道的行爲，他於一五六七年特派名將兼劊子手亞爾法（Alfa）率一萬五千大軍進駐尼德蘭以屠殺革命民衆。於是尼德蘭各城市皆駐有軍隊，城市之中並建築柵欄，且強迫市民納此項建築費。魯偉爾一城，就繳出四十萬。

在政治上，亞爾法進駐尼德蘭後第一着，就是解除帕馬的執政，和組織「叛逆法庭」(Council of Troubles)。此法庭專門爲了審判叛逆案的，因其專以屠殺國民爲能事，尼德蘭人遂把它稱作「流血法庭」(Council of Blood)。「道路上的木棹，籬笆都吊死尸，樹枝上掛的人頭，像結的果實」。恐怖氛圍，這時普及尼德蘭全境。貴族反對派的代表袁格豪特下和哈倫伯爵早已變爲白色恐怖開幕典禮之犧牲品。亞爾法報腓力第二書中云：「使吾而能攻下亞爾克瑪，吾決不生留一人，吾將以刀割盡一切人之咽喉。因爲哈連姆的例子，證明殘酷是可以使別的城市知所警惕。」(註一)白色恐怖之殘忍，由此可見一般。在亞爾法進駐的六年中，據其自供，是殺過一萬八千人。但實際上，此數還不到三分之一。此外，一切參加過運動的人，其財產均被沒收。僅就所沒收的土地說，其價值已達二千萬達勒(Holland)。

至於被迫出國的，在亞爾法人駐在的第一年，其數已達十萬以上。人民大批移居英德之結果，更使尼德蘭工商業幾爲之停頓，因而造成全國大恐慌。

註二：亞爾法報腓力書全文如下：使吾而能攻克亞爾克瑪，吾決不生留一人。吾將以刀子割盡一切人之咽喉。因爲哈連姆的例子，證明殘酷是可以使別的城市知所警惕。任何事沒有比赦免和慈悲更無意思。請陛下詳細思索一番，對於這種人民可以施與何種恩惠呢？事件到了這種程度，生長在一國的人，從來是維持慈悲的，現在他們脫離了這種觀念。他們有這種意思，認爲亞爾克瑪不必留一個活人，應該

完全殺死。陛可以相信，雖然我自己先視異教徒和叛逆者，但是世界上沒有一個
人比我慈悲」。

納稅人之突然減少，亞爾法不思補救，反而更向三級會議提出新的財政要求，增加三種
新稅：其一，爲不動產值百抽一；二爲土地買賣值百抽五，三爲貿易值百抽二十。第三項稅
率之苛刻，全不近乎情理。因爲若一旦實施，則全國商業必立即停止。因此，三級會議只承
認第一項稅收，而對於後兩次，表示拒絕。但亞爾法竟不顧三級會議意見，就自行頒佈命令
實行徵收。

亞爾法的倒行逆施，只是更進一步去激釀尼德蘭人走向革命一途。至一五六八年八月，
尼德蘭的革命領袖奧倫基親王（Prince of Orange）便發表如下的宣言：「西班牙人統治本
國甚久。他們無惡不作。他們設立異教審判，使尼德蘭人失去一切自由。當尼德蘭人起而反
抗時，他更公然在一切富裕省分擴展搶劫運動。我們的損失太重了。我們是再不能做西班
牙的順民，以靜待燒殺和搶劫。因此，我們現在應舉起反西班牙苛政的大旗。只有亞爾法的
流血行爲停止之時，尼德蘭各省才能獲得自己的政治權力和組織善良政府的自由。」這個宣
言是尼德蘭宣告獨立的信號，同時也是它對西班牙採取武裝反抗的通告書。

遠在十六世紀以前，繼承弗萊銘人已失商業之尼德蘭航士和冒險好功之士，駕私人武裝
船隻航行大西洋沿岸以搶劫和搜捕他國船隻者本大有其人。至現在這般人便爲親王，威廉所

組織，成爲最有革命性和戰鬥力的海上武裝。這般人現在被西班牙人叫做「海丐」(Sea Beggar)。比之我們解放戰爭中，陸上的遊擊隊，他們可以稱謂海上的游擊隊。陸上的遊擊隊在破壞鐵道，公路和橋梁，並乘其不意，給敵人以打擊。尼德蘭海上的游擊隊，便專在搶劫，破壞和搜捕西班牙船隻。這種海上游擊隊，永遠爲亞爾法心腹之患。永遠與西班牙進行着英勇的鬥爭。他們時常侵入尼德蘭的內河，以鼓動陸地上的革命或幫助陸上作戰。他們在不斷地困乏敵人，擾亂敵人，並時常攻入敵人心腹。他們這種持久的游擊戰術，遂成爲低原民族軍事藝術之得手佳作。而後來強大的荷蘭海軍即肇始於此時。

爲自由和獨立而鬥爭的尼德蘭民族，實爲歷史上罕見的英勇民族，而其衛國守土之犧牲精神，尤可以爲一切爭求解放的民族之模範。當西班牙的軍隊在頓腓特烈(Don Frederick)領導之下圍攻哈連姆時，七月而不能攻下。繼而當圍攻亞伊克瑪時，西班牙雖新由倫巴底開到精兵兩團，自信勝利可操左券，孰知居民之英勇抵抗完全出乎西軍意料之外。當時城內居民皆身臨城上。他們以大砲，小槍，手鎗，等攻擊圍兵；復隨時以澆水，瀝青，煤油，融鉛，石灰等自上傾倒而下。此外更用燒紅之鐵鉤取圍兵之頸。若圍兵冒險從攻破之城洞攀登而上者，守兵爭以刀劍刺之，並推之使墜於溝中。

圍兵三次進攻，愈攻愈猛；市民三次抵禦，更堅忍不懈。而衛城之守兵除死傷外無一離位者。當時有西軍某旗手名安利斯(Salis)者，曾於戰時從攻破之城洞攀緣而上，雖被推

下，幸免於傷，歸語西軍說，吾俯視城中居民并無盔甲自衛；不過多數質樸人民作漁夫裝束而已。孰知打倒亞爾法之精銳者卽此質樸之漁人也。後來當亞爾克瑪被攻最險之時，奧倫基親王已允許決堤以淹沒西班牙全軍。惟隨帶此項公文之人入城時，不知何故竟使此公文落入亞爾法之手，於是亞爾法遂決定不待敵方決水，卽下撤退令。而亞爾克瑪城之危急卽獲解除。

夫尼德蘭人之最有力的反抗，本不在陸地，而是在水面。自一五七二年，他們佔取了布里萊（Brille）並死守住兩棲的有牆城市哈連姆，萊丁和亞爾克瑪等，卽爲他們獨立革命成功之大原因。

當革命軍在北部取得勝利之時，於一五七二年就召集北部三級會議，其成分以第三等級（資產階級及手工業者等）的代表佔大半數。奧倫基親王卽靜默者威廉當選爲統治者，管理軍政大權和對外交涉。

然而革命並不停留於北部。實際上，北部革命的浪潮不久就攻入到南方數省。這時候南方的城市固然和北部一樣起來響應革命，但南方的大半數的鄉村貧民對於革命却持反對態度。這般農民現在爲亞爾法所召集，並被編成軍隊，以攻擊北部革命和革命軍。這就是說，這一部分草昧無知的農民，在獨立革命中，反盡了一種反作用。雖然如此，但這一次進攻也並未獲得效果。一五七三年，當亞爾法的艦隊爲尼德蘭的革命海軍擊敗以後，於是西班牙陸軍

被迫不能不退却。從此以後，尼德蘭北部隨完全脫離西班牙統治。這時候，討伐革命無功的亞爾法已被召回西班牙，其經任人黎圭孫（Requesen）更不及亞爾法遠甚。因此，北部革命的展開更爲順利。如教會和移居國外的貴族的土地概被沒收，所沒收的土地盡賣給資產階級和富農，因此，農民與革命的關係比以前更密切。但是農民既與革命發生關係之後，他們便不僅以獲得土地爲滿足，他們更進而要求擴大政治權利，如派遣代表到政治機關等。僅因爲二級會議大半數爲資產階級，這種要求遂未實現。

一五七六年，是代替亞爾法的黎圭孫死的一年。這一年西班牙的駐軍因無糧餉關係，已不斷地發生兵變和搶劫，受這種兵變和搶劫之禍最甚的地方是盎偉爾。因盎偉爾不僅爲變兵劫掠一空，且全城亦遭焚燒。時人把這次暴行稱爲「西班牙狂暴」（Spanish Fury）。

雖然，腓力第二在尼德蘭的統治並未完全失敗。他幸而還有尼德蘭南部的社會矛盾和階級衝突可資利用。他第三次派住尼德蘭的新執政帕馬公弗勒塞（Alexander Farnese, Duke Parma）恰能看這一點。他便乘機施展其壓迫和離間之手腕，使南部諸省脫離革命，並仍舊歸於西班牙。

使尼德蘭南部與北部不易互相體會之原因以前雖雖然存在，但南北社會關係的不同因革命發展日益分裂亦是不容諱言的事實。北尼德蘭以航業致富，其居民之大多數皆商人航士和漁夫，而南部多爲容易形成階級對立的資本企業家兼營製造業之商人和手工勞動者。北尼德

蘭在革命前特別自革命以來，新教勢力高於一切，但南部人民大多數還是信奉天主教。北尼德蘭的社會是急進的簡單的，政治多為城市富民海上航士所左右，反之，南部社會則為保守的複雜的和充滿矛盾的，在政治上貴族猶佔重要地位。然而南北社會最大的不同，還在北部因天然交通發達關係，其貧民容易向外謀得安身立命之所，不易發生貧民革命之大焰；

一五七六年，當革命潮流發展到南部諸省時，南部諸省，即在根脫召集七省三級會議，其目的在謀與北部聯合，以共同抵抗西班牙。其時西班牙的軍容尚蟄蟻未去。

從此，尼德蘭便分為兩部分，便各自發展其歷史。南部尼德蘭這以後稱為「西屬尼德蘭」(Spanish-Netherland)，更後又稱為「奧屬尼德蘭」(Austrian-Netherland)，受反動的哈布斯堡族統治垂二百年。北部七省締結烏特支條約(Treaty of Utrecht)，組織「永久聯邦」，叫做尼德蘭七省同盟。一五八一年，七省代表在海牙開會，決定宣佈獨立並發出如下宣言：

不是人民爲了皇帝，而是皇帝爲了人民。因爲沒有人民，就沒有皇帝。皇帝的存在，是爲了要根據法律正義統治人民。倘若皇帝不如此對待人民，而視人民如奴隸，他就不是皇帝，而是暴君。人民不能從暴君得到身家性命和財產之保障，因此，人民便可以根據三級會議的合法決定，廢除這個皇帝。一

一五八四年，尼德蘭執政威廉爲西班牙人所暗殺，翌年新教徒便佔據魯偉爾。這時雖智

勇健具的法國亦不能再向荷蘭進攻了，於是至一六〇九年，他終不得不與荷蘭締結三十年協定。後來當三十年戰爭時，荷蘭又與西班牙發生戰爭，直至一六四八年，威斯特發里亞（Westphalia）和約締結時，西班牙始正式承認荷蘭爲獨立國（註一）。而尼德蘭獨立革命也就獲最後成功。

註一：獨立的荷蘭分爲七省。各省皆派代表參加大會及等級會議。各省共同組織聯邦，而各省又爲各城市之聯邦。省聯邦機關有省代表大會和省的等級會議。一般說來，荷蘭的政治制度是以城市爲基礎的。荷蘭城市組織的特點，在於資產階級具有特殊的作用。資產階級之中，有銀行家，船主，商人，漁業主人等，他們握有全國經濟生活的權力。每一個城市的行政都在他們的把持中。從經驗上，他們知道，爲了共同利益，只有聯合他們自己始能保持其獨立。省代表大會開幕後，城市委員爲一城市中最高行政機關。全國以全國代表大會爲最高機關。在聯邦共和國中，以荷蘭省最重要。荷蘭省享有委派駐法，瑞典及德國公使的權力，因此，便以此省的名稱代表全聯邦。荷蘭省的等級會舉行於Hague之故宮，該處多名畫，至今尚未存於故宮中。此會議共有十九個表決權，屬於貴族者二，屬於城市者有十八。因爲貴族只有一個表決權，故不甚活動，僅旁觀而已。荷蘭省的十八個城市皆有代表參加等級會議，其中十七個佔有一等位置。每個都有若干代表，他

們都是代表市委員會參加全省等級會議的。他們指定一個主席代表，任期為三年，在大會中代表全體代表發言。其產生的手續，應由市委員選舉。

出席荷蘭省代表大會的代表共有一百至一百五十人。但表決權僅有十九個。

荷蘭的等級會議每年召集四次：二月，六月，九月，十月皆為集會之期。大會討論一切關於全省的問題，其中有委派官吏等問題。大會選舉三個行政委員會，六個關於築堤，辦學的委員會。監察及司法委員亦由大會選舉。聯邦大會的決議也受其指揮，因為他們的代表在等級會議中負有全權。因此當表決每個問題時，應供獻其意見，他們的決議預先在小委員會討論，委員由各重要城市的代表充當。如果關於媾和宣戰問題，應有一致的表決。

荷蘭的等級會議有自己的各部總長，任期五年。他們有一個代表出席全國等級會議。荷蘭省的等級會議中又有參議代表，人數為十個，一由貴族選舉，其餘九個由人民選舉。他們所組織的委員會類似一省的執行機關。他們辦理財政，軍事等公務，召集非常等級會議，執行等級會議的決議。

荷蘭省等級會議的大廳，其富麗輝煌更足以增加其權力。會場位於故宮的第一院，周圍五色玻璃，另外繞以樹木，牆之四圍有繪畫，其中繪有各國人物。在這宮中的另一大廳，即是聯邦等級會議的會場。他們整年的在這裏舉行會

議，人數約爲三十至四十，皆由各省推舉，每一集團祇有一個表決權。大會主席由各省依次充當，每星期更換一次。荷蘭省共有四個代表，其中有一個貴族代表，終身不換。其餘的三個是人民代表，任期爲三年。除此四代表之外，尚有一個省全權代表。

全國大會決定關於全聯邦的問題。規定軍隊的數目，全國各邦的支出，委派海陸軍的高級軍官，與外國締結和約。全國等級會議的權力極大，各邦的等級會議應服從其決議，各邦的決定如不得全國大會的同意，即不發生效力。國家委員亦須服從全國等級會議，委員共計十二人，執行聯邦命令。

第六章 尼德蘭革命成功之原因

第一，是社會階級的原因。近代史每種革命運動，其勝利或失敗，無一不是由社會階級關係來決定的。一民族對外舉起反抗旗幟時，如其它的社會階級關係，是趨於一致和團結，它就已經取得勝利之保障，反之，當它舉行反攻旗幟時，它的內在關係如不幸發生強烈的階級分裂和反目時，這個革命就非失敗不可。

尼德蘭北部獨立革命成功之原因，即因爲北部貧民便於向外發展關係，而沒有生出下層階級與上層階級之尖銳的對立。由於北部沒有這種對立，才使北部國民全體都一致捲入對外

族的鬥爭中，因而，便加強了獨立戰爭的持久力。

第二，是經濟上的原因。英勇的尼德蘭民族，當他們一旦提出「與其教皇，無寧土王」口號，而與西班牙進行頑強的民族鬥爭時，他們不僅是長於海陸兩方面軍事鬥爭的，並且因為他們在平日都是長於商工業競爭的，他們在戰時還是頂好的善於經濟鬥爭的民族。一六〇七年，某時入記尼德蘭與西班牙經濟鬥爭的情形道：「荷蘭叛民，與西班牙之易西及航業，多假英法及日耳曼之名行之。二十二年來，彼等以波羅的海沿岸各地所產之麥，魚，肉，皮酒，蜂蠟，以及其他製造品，以換取西班牙巨量之金銀。倘彼等僅有北海之漁業及波羅的海之航業，則決不能蓄積如許之財富。其與西班牙交易也，輒以種種隱蔽之方法，偽造證書護照，並假託丹麥及威其商人之名義，以圖混蒙而達其獲利之目的。」（註一）

註一：參考新月書店，胡紀常譯：近世資本主義發展史

尼德蘭之反叛西班牙，於其海外商業及殖民事業，尚有一極幸運之影響。蓋自一五八〇年，葡萄牙為腓力二世所吞併後，尼德蘭便再不能在列斯本購取遠東之香料及一切寶貴之貨物。於是不得不自展其航，到印度及印度羣島，就地採購。因此，葡之遠東商業及殖民地盡為荷蘭所侵奪。待至一六〇九年，因哈德遜的發現，他們又在白美找得根據地，並名哈德遜河沿岸諸新地為新尼德蘭。尼德蘭這種經濟鬥爭之成功，不僅幫助了它的獨立運動，並且也使荷蘭到現在還能保持着海上霸國的資格。

第三，是地形上的原因。尼德蘭為低陸國。這種低陸在軍事上給尼德蘭人以天然優勢。蓋港灣與沼澤，一方面可以增加敵人行軍之困難，他方面，它們又成為尼德蘭人之天然防禦。且河堤遍佈，於緊急時期，更可以藉毀堤以淹沒敵人。亞爾克瑪之得守，與基汲(Navy)水閘之開掘實頗有關係。

第四，國際的原因。自十六世紀始，直至拿破崙消滅神聖羅馬帝國止，歐洲這一個時期的鬥爭，實可以視為歐洲歷更多元的發展反對中世紀以來的一元發展的鬥爭，也可以說，是歐洲的離心力反對向心力的鬥爭。原來所謂神聖羅馬帝國和西班牙本是舊歐洲的傳統勢力，但十六世紀美洲和好望角的航線發現後，歐洲因地理關係一下子進入空前的多元發展，這時在西歐有葡萄牙，法蘭西，英吉利，在北歐有瑞典，丹麥和普魯斯。這些國家的對外政策雖不統一，但他們却有共同之點，即他和都是想分割羅馬帝國和西班牙的勢力以發展自己之勢力。因此，尼德蘭民族所反抗的一個帝國，並不是一個方與無敵的青年帝國，而是一個樹敵過多行將就木的老大帝國。腓力要應付的敵人太多了。他一方面，要忙於對英作戰，他方面，他又要干涉法國內政。由於他相信舊教過烈之故，他不僅把國內足以幫助商工業發達和經濟繁榮的平民階級驅除或殺戮淨盡，而且迫使一切信仰新教的國家與尼德蘭聯盟，使尼德蘭能獲得一切必要的國際援助，一五六九年，英國扣留西國載往尼德蘭的軍餉，一五七二年，英國資助尼德蘭的「海馬」攻取布里萊，一六一八年爆發的法國的波旁王族反哈布斯堡王族

的三十年戰爭，以及一六四八年威斯特發里亞和約之締結，皆大有影響於尼德蘭獨立運動之成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初版

各國民族統一運動史論

定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費)

著作人 李 建 芳

發行人 李 素 心

發行者 大 道 出 版 社

重慶中二路二九二號

印刷者 勤 治 印 刷 所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77
404014

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閱字第捌叁伍號

